戴晴

在如來佛掌中

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中文大學出版社

戴晴
在如來佛掌中
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在如來佛掌中

戴晴

中文大學出版社

戴晴 在如來佛掌中 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在如來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戴晴

简介

戴晴笔下的知识分子——张东荪

在如来佛掌中

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戴 晴 著

在抓阶级斗争的时期，由公安部某局负责侦控的一个政治案件，通过据用技术手段，查获了被侦察对象的一些可疑活动。因为该对象是个社会名人，须及时向中央报告，又要注意保密。案件的进展情况公安部只报周总理和毛主席。上报材料不打印，由专人手抄一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签名后，以绝密件报周总理办公室。几天后，原件退回，上面有毛主席亲笔批示："在如来佛手掌之中。"

--邢俊生：《公安史话：我给徐子荣当秘书》

（2007年11月21日）

开篇 投票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以悲悯胸襟，迎接世界大变局。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1948年9）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最后一天。

这一名称非常重要。之所以选择这一名称而非其他，暗含了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之合法性。因为，如果国内、国外舆论已经认可了国民政府于1946年召开"老政协"对改组政府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所具有的合法性、那么，把为"国民党反动派"所破坏的政协会议接着开下去，就有了不言而喻的正当性。筹备期间，参与者多泛称其为"新政协"。1949年9月会议正式举行后，新政协郑重更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此，毛泽东毫不隐讳。他在开幕词中说：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破坏了......1

按照议程，两项选举将在这一天举行：先以"整个名单"（即"主席团所提名单"）付表决的方法选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80名；然后、全体代表再以无记名联记的方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56名。

宋云彬在日记中对此有详尽帮助。他提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选举，是依据29日全体会议的决定，以无记名联记法投票，代表在选举时有权舍弃名单中的任何一人或若干人而另选。选票上每一候选人姓名下都留有空白，如代表不愿选某人，可在某人姓名上加一"×"，在下面另写上想要选举的某人姓名；只"×"去某人，不另写他人也可。2

据《人民日报》第二天报道，这项选举，出任9月30日大会执行主席及选举总监督的是刘少奇、李立三等五人，周恩来则对选举办法作扼要

帮助。事实上，面对年龄、经历各异的投票人，为防止出现废票，周恩来的帮助还真不算"扼要"。比如，他简直像对小学生一样，就选举方法对投票人谆谆叮嘱："要用钢笔，没有的我们秘书处会送上毛笔。在要选的人名字上打圈，要重重的圈。不要选的打叉，叉要重。折叠的方法是这样的……"他还特别帮助代表们可以圈选自己。3叮嘱之后，刘少奇宣布："到会有选举权的代表共576 人。"

《人民日报》记者对会议作了如下描述：

……如数发下选票后，在我们开国史中最庄严的仪式正式开始。每一个人经过一度深思，立刻在选票中表达出自己的希望。其实代表们都是胸有成竹的。谁领导了中国的革命，谁把灾难重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谁一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会继续领导我们，永远走向胜利。

大会选出六十个代表作监票人。九个票箱由九个监票人监守着。监票人详细检查了票箱，小心谨慎地锁起来，钥匙交给执行主席，然后开始投票。整个过程是那么严肃认真，表现着政协会议从始至终的精神。毛主席仔仔细细写好了自己的票，在四时二十分整，把票投进第三号票箱。

从开票箱中捡出五百七十六票，与发票数目完全相符。执行主席李立三说："有选举权的代表都投票了，我们的投票是有效的。"人民热烈鼓掌，庆贺投票手续的完美无缺。4

投票完毕，检票人进行检票时，全体代表没有闲着：通过了政协会议宣言、给解放军致敬电、竖立纪念碑决定，还随即到天安门广场行纪念碑奠基礼。然后，回到会场听取选举结果。

再看《人民日报》的报道：

七时三十分，执行主席刘少奇宣布选举结果。他一字一句地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五百七十五票！"会场代表一致起立，热烈鼓掌。乐队奏起"东方红、大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乐曲。代表们合着乐声的节拍鼓掌，其中并夹着"毛泽东万岁"的口号声。乐声刚刚停止，有节奏的掌声又升扬起来。全场情绪沸腾，欢欣鼓舞。这是众望所归，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投了伟大领袖一票而感到光荣、骄傲。5

当时的军队代表、作家刘白羽的叙述尤为生动：

（从天安门广场）回到怀仁堂，我忽然感觉到今天的灯光格外明亮。今天在这里，一个全新的、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所有的代表都和我一样，心里有着一种兴奋和激动。

七点三十分，执行主席刘少奇按铃、开会，随即宣布了选举结果。当宣布道："毛泽东以557票（读者知道这数字应为575。这一错讲，不知出于排版工人的疏忽，还是到作家自己激动得顾不得那许多细节了一一著者按）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全体代表都兴奋得站起来，一面鼓掌，一面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乐队奏起"东方红，大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历史在这里翻开了新的篇章。毛主席巍然站立在人海之中，垂手肃立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大家都知道，他接受的不只是全场的鼓掌与欢呼，在这一刻，他承担起了中国人民的命运。……

至此，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主席团的工作结束，下面请新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主持大会闭幕式。毛主席首先走上主席台，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而后主席、副主席一起站在主席台上。宋庆龄站在毛主席左面，朱德在毛主席的右面：

毛主席站了好一阵，等候人们激动的浪潮平息。但浪潮一直没有平息，他终于提高声音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已经圆满成功，现在请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

当朱德走向台口的麦克风，戴起老花镜，宣读闭幕词时，会场才暂时安静下来。他宣读完毕，毛主席站起来正要宣布散会时，一个梦幻般的奇迹出现了：庄严的讲台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身后的帷幕上，呼啦啦展开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这是经过全体代表决议通过、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它是那样庄严、美丽，从那一刻起，它就一直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也同时飘扬在每个人的心里。

毛主席等代表们就坐之后，刚要开口讲话，暴风雨般的欢呼、鼓掌声又一次升腾而起，达到整个会议的高潮，大家都感觉到，从此刻起，在这一片神圣而光明的土地上，人民终于成了主人。

毛主席等待着，一任大家把饱满的情感宣泄出来……

但时间终于到了，毛主席毅然说出了"散会"两个字，随后整个会场的沸腾又一次腾空而起，大家再一次为新的共和国诞生鼓掌欢呼……6

可能有人注意到，投票人576名，投毛泽东票的是575人！那时他们一定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呀，那没投的一票当然是毛主席自己的--以伟大领袖的谦虚、自信、豁达，他一定会这么做。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对此，起码在当时，在场的人没有过丝毫怀疑。

但是错了。因为，就在当时，就在那红旗翻滚、乐声嘹亮、热泪挥洒的当场，起码有两个人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两个人。一个是确实在自己名字上边郑重地画了圈的毛泽东；另一个人就是没有投他票的那名代表，唯一的一名--本书主人公、时任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

读者会说，别忘了，那是"无记名联记"，谁知道哪张票是谁划的。更何况，就算有一位代表没有在毛的名字上画圈，谁有兴趣追究？你的结论下得未免过于唐突。

说得不错。可惜属于正常推理。如果我们以此逻辑（而且仅仅以此逻辑）推断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的行为，那就失之于简单了。

著者在此提出一个可能已经有相当多共产党基层骨干知道的故事：

生于1886年的张东荪育有四个儿女。长子、北大教授、生物学家张宗炳（1914年生）；次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宗燧（1915年生）；三子、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的张宗颎（1920年生）；最小的女儿、高能物理学家张宗烨（1933年生），如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宗烨1952年考入北大物理系，属于成绩优秀的安静学生。毕业时候填报志愿，因为太爱物理而政治上不大开窍，竟填报了"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也即1958年后的原子能研究所。可能因为这女学生实在是"除了物理，不问其他"，居然皮肉无损地从事高度机密的工作凡五十年。

大约1993　、1994年，在一次会议或者工作间隙，张宗烨碰到了五十年代后期从中宣部调到该所，除物理外，一直从事党的工作--当时是近代物理所的党支部书记、如今也已是按时交纳党费、一切以党的利益为上的何祚庥同志。

在和她聊天的时候，忠于科学忠于党、性情却是天真又直率的何祚庥，突然很感慨地对他的老部下提起当年"老话儿"："这么些年都没告诉你，当时我们可是大大地保了你。你到所里一直是内控使用。……我们给你说了好多好话。其实对你一直就是一种……。刚刚解放，中央人民

政府选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边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虽然不能肯定，但他们猜除了他不会有别人。"

张宗烨没敢追问何同志这内部信息的来源。她估计是反右期间传达下来的。当然她也没敢去想，"他们猜"里边的"他们"究竟是谁、以及到底为了什么、依据哪条规矩，去研究那张反对票。

"何祚庥跟我说，当时他印象非常非常深：那时刚解放啊，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有人投反对票--敌人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了。"7

如果读者（特别是历史学界）依旧认为这也属于不可尽信的"孤证"，我们只好寄希望何祚庥和别的一些为党所信赖的好同志站出来作证；8如果他们不肯，而普通人对政协与人民政府档案的查询权仍不见任何松动……就请读下边的故事吧。

主人公的故事将告诉你，那一张连投票者自己都知道绝对不会对结果发生任何作用的、在毛的名下划了"×"的票，为什么会在这时刻投出去。

于是，我们将知道，对历史以及活跃其中的人的命运的阐释，有没有板上钉钉的证据，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因为证据会失落（甚至会篡改或伪造），但由思维主导着的行为，却会在一个接一个历史时刻，爆发出耀眼的道德与智慧光彩。

注释

1、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342。

2、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共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页170。

3、庞松：《共和国年轮，1949》（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页365-366 。

4、《"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记人民政协最后一天大会》《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

5、同上注。

6、刘白羽：《难忘那一天》，《光明日报》，2004年11月1日。

7、摘自1996年12月15日著者对张家亲属的采访。

8、已经有亲历者撰文叙述开票经过，参见王仲方：《我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人民公安》，1999年第1期。

第一章 1949这一年

1949这一年，多少大事--

历史走向、家国命运、生死契阔……

竟翻覆于立决的一瞬。

六十四岁的主人公给推上前台，

扮演起不过一介书生义不容辞、

勉为其难、搭补帮衬、勗励规箴之角色。

但在这年，中国是容不得书生的--

特别是，不谙为政权变、不知审时度势，

而且，还不肯通融。

一 年初：军委来电

1949年1月6日（农历腊八），北平西郊。

两名皮帽长袍、学究模样的人，正冒着凛冽寒风，一路北行。他们是谁？

年序更长、身骨也更弱些的，正是本书主人公、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与他结伴前行的，则是国军的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1他们将代表守城的傅作义，与围城之共军谈和。

那天清晨，傅的政治部主任王克俊先接上他，到西城李阁老胡同张东荪长子张宗炳家会齐，安排出城车辆并通报出城路线及联络记号；接着中共地工崔月犁到场，代表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为两名和平使者安排过火线的路线：出西直门直奔海甸（今称海淀），在那里有人接应，联络口号"找王东"（往东的意思）。据周北峰1979年撰文：

我与张东荪乘车出发，到西直门后，汽车停下受检查。这时过来一个（著者注：国军）军官，……奉命在西直门接应，说："出西直门后，直奔万牲园（即现在的动物园），在前面白石桥拐弯处，有人接你们，请吧！"

我们坐车一直向颐和园方向驶去。到了白石桥，一个（著者注：国军）军官拦住我们的汽车，打开车门看了一下说："汽车不能向前开了！请下车吧！"他又对我说："这是第二道防线，距前沿战壕只三五百米，你们步行到那里后，有人指给你们穿越火线的路线和办法。我认识您，前面那个军官不认识你，我给您写个条子，你交给那个人，他是个连长。"接着他们给了我一个纸条。

这样，我们这两个夹着皮包戴着皮帽的大学教投打扮的人，持杖步行前进。我与张东荪一面前进，一面注视着近旁的情况。走了十几米，后面那个军官大声喊道："请走马路中间，千万别走两旁的土路，土路上埋有地雷。"

我俩继续向前，到了前沿战壕。这时从路旁草棚里走出一个人，我即将纸条给他。他看后说："你们过去吧。从昨天到今天这里很安静，没有响枪，你们小心点就是了，听到打枪就卧倒，等那边招手再向前

走。"我们又走了约一百来，突然听见有人喊："站住！"我们顺着声音音看到农研所门口的石桥上有六、七个解放军战士。我们就摇晃着手中的小白旗向他们走去。到了跟前，他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门说我俩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久没有回家了，要回家去。一个班长模样的战士象是有点了解我们的情况，便领我俩到了他们的指挥所。

这个指挥所设在海甸镇西南角的一个大院内，一位干部和我们谈了话。我们说"找王东"，并简单地帮助了来意。他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面条。饭后让我俩在一个屋子里休息一下。看样子，显然是预先接到关于我们情况的告知了。2

此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围城解钮"（北平和平移交）之一步。他们摇着的那面旗子，是一条刚从东荪先生孙子、时年四岁的后来的"×案件"主犯张鹤慈小床上撕下来的床罩，旗杆则取自他的玩具红缨枪。

燕京哲学系主任、年届六十四岁的张东荪，怎么卷进赳赳武夫的游戏中？

让我们回到1948年底1949年初。在这俩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正经历着近代以来最后也是最惨烈的一場最惨烈一场大撕杀。两边打出的旗号，一曰主义，一曰正统。被战争蹂躏不堪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两个曾为"兄弟同志"的武装政治力量，从1927年反目到此时，谈谈打打，已有二十一年。

这时已不是1928年。在那一年的北伐之后，城市和国民革命军中的"赤匪"已几近杀光、侥幸逃脱的"革命火种"刚刚流窜到国际本部（莫斯科）与偏远山乡。

这时也不是1938年。那年，在抵御外侮的大局之下，四万六千工农红军编入一百七十万人的国军序列，接受政府的统辖与供给。

到了1948年冬天的时候，已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八路军、新四军，跟国军已经打了两年多。到辽沈战役（歼敌四十三万） 接近尾声、淮海战役（歼敌五十六万）合围已经完成之当口，用毛泽东的话说：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估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

经迫近的标志。3

障在他们面前，最主要的就是华北剿总傅作义的领地。这里有工商重镇天津，还有集中国文化精粹的五朝古都北平。共产党虽然志向宏远，话也说得气冲牛斗，但从"万无一失之决胜"的军事角度，此时共军不仅人力不足，而且已经相当疲乏。华北的拿下，当然最好少花些气力，要是同时赢得"文明之师"、"仁义之师"之名声，就是先哲孙子所谓的上上策了。

我们的主人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拉到了历史前台。在这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历史悲喜剧中，他的作为，至今未见厮杀双方正式论述。非政界呢？无论在当时与事后都一直关注时局的他的老友，有如下评说：

"调停傅作义功"（张君劢：《张东荪先生八十寿序》）；

"和平解放北京，张东荪是有功人之一。"（梁漱溟：《这个世界会更好吗》）。

所谓"之一"，是说还有其他关键人物，第一个当然要数最后下令献城的傅作义了。

正式献城三周后，抗战名将、前傅司令长官宜生请求前往西柏坡"拜见"毛泽东，开口即称"我有罪"。毛对这谦恭的降将说的第一句话则是："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你。"4

后世读史的人，几乎无人不将这"大好事"定位于拯救古都于焚毁、免除生灵于涂炭云云，却不知其所以又"大"又"好"，以毛泽东，还有他攻城略地之战将林彪、聂荣臻等人的角度，其实是"大好"在"抑留"--得以将傅作义和他辖下的五十多万军队"抑留"在华北，最后接受改编切割到班，以单兵身份加入解放军，为顺利拿下南中国战场提供最大优势。

如何才"抑留"得住？毛林聂的部署是"围而不打，隔而不围"，"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塘"，5逼降傅作义。为催促疲惫不堪的东北野战军迅速进入，毛对林彪说得最为直白："你们是早点入关，抓住敌人，把敌人歼灭在平津地区呢，还是等平津的敌人跑了，你们再去追击，追到很远的地方去歼灭它？部队要休整也可以，但休整完后，你们就要到长江以南去打仗了，现在舒服将来吃苦。"6

但"歼灭"须动刀动枪。能不能调动军事以外的力量（政治、经济、舆论、人情），争取不费一兵一卒，达到"稳定傅作义不走"7之目的呢？毛本人也不是没有过和平解决北平的打算--谁不愿意兵不血刃而获胜呢？从已经披露的资料看，第一次是在1948年那次有名的"九月会议"中间，他曾向徐向前偶然提起。吃够了阎锡山苦头的徐当即否定。

但这回已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傅作义也不想再打了。

他原先和蒋介石商定的是，撤离北平、固守津沽，万一不利，立即由海上撤退。到1948年底，无论国民政府还是蒋本人，都已让他彻底失望。加上李宗仁、司徒雷登与其他党国故旧的说项，傅作义已经倾向于以自己的实力，联络第三方面力量，实现平津地区和平解决，最后在华北成立联合政府。

我们可以看出，这设想，与共产党的志在必得平津、得华北、得长江和全中国，有多么大的差距。

差距愈大，和谈就愈难，也更具挑战性。谁来挑这个头呢？

如果不将北平地下党在这一阶段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无所不包的工作算在内（因为它本是共产党处于前沿的组织）。作为不同政治势力，最早介入的，是有"势"也有"力"，且自以为真正站在国共中间、担纲"第三势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

他的代表彭泽湘1948年10月抵达北平，通过傅作义心腹兜售最能打动他的言和方案，即"走第三条路线，独树一帜、既不追蒋，也不投共。通过谈判，宣布起义，华北独立、成立联合政府"。8在察觉傅作义希望中间力量的阵容再强势一些的时候，立即拉上了民盟、农工民主党和在他看来有影响的社会贤达。9

为把事情做得万无一失，彭不仅事事通过北平地下党，还搬动了虽然无党无派、却是极有份量的符定一，因为他曾是毛泽东的校长和老师、还从军阀手里救过这未来革命领袖的命。

由彭所代表的"第三方面"，将傅"有意言和"的信息，通过与符定一联络的地下党，于11月7日和14日送出去之后，不见回音。傅作义于是通过自己女儿、再用与她有联络的北平地下党的电台直接给毛泽东发电报，希望能派南汉宸来谈判。中共依旧没有搭理。

符老先生自己赶到石家庄（11月18日）。

傅作义这回得到了回音。只是没有从毛泽东，而是从他在华北的老对头、也是当时直接与之对峙的将军聂荣臻处。这封实际由毛泽东自己起草，在他的符老师抵达第二天发出的回电，虽只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希派可靠代表前来接洽"（11月 19日电），10但作为运筹帷幄的主将，当时毛却是真的"灵光一闪"、而且真的行动起来--他立即将不过一天前的考虑"东北野战军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11改为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11月18日电），12而且"行动须十分荫蔽"，又指挥胡乔木编撰假消息、例如林彪如何在沈阳休息庆功等，以迷惑敌人13--"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14

果然，从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十个纵队开始入关、华北的两个兵团进抵平津地区。到了月底，看见等着谈判的傅军"尚是固守计划，没有撤退计划"（11月26日电），偷偷进关的共军也乐得从容布局，间作小小休整。两周之后，包围北平、切断平津之部署完成。15

这样的调动，傅作义不可能全无察觉。虽然对全盘计划的来龙去脉尚不完全摸底，但也不能再端着架子等。12月中旬，他正式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下属报系《平明日报》社长），姿态低了些，但依旧"嫡系部队保留，成立联合政府"。

这边只接受了"谈判"这一说法（上次算是"传信儿"），即史称"第一次正式谈判"，但开出傅作义难于接受的高价码："全部缴械、接受改编"。目的只为争取更多的时间："对平、津、张三敌的正式攻击，须待部队休整一时期方能开始。"

在这持续十天的僵持中，固然林聂得以调整部署、小作休整，实际也给了国民政府以机会，以将华北的六十万军队调到南方作最后一搏。

12月中以来，蒋介石连连派出心腹：身边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军统局长郑介民；最后是携带了总裁亲笔信的蒋纬国--连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也出面了，16力劝傅作义火速南撤。而傅辖下的中央系部队，有的一直在压他，有的已准备自己起事配合共军。17

在这样的战局之下，共产党是绝对不愿意"和"了，立即公布四十三名最著名的"战争罪犯"（国民党军政要人），故意把事情做绝，把没用的中间人物都打成敌人：谁提和平，谁就符合敌人的"和平阴谋"，就是共产党

自称所代表的"人民"的敌人（"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凡是劝和的人，都"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18

这回有点坐不住的是毛了。他感到应该抓住时机，主动出手。这就是"48/49年尾年头"那两天里的"军委来电"--本书主人公登场。

12月31日中央军委覆林彪电：

转来两次北平地下党来的电报已悉。19请你覆电北平地下党，转告傅作义派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你们那里来谈判。

数小时后（1月1日凌晨），又追了一封：

（一）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作。

（二）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

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也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些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20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丁、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唯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己、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也不要信任他。

（三）上列六点最好由平市党委派一可靠同志，经过傅作义亲近的人（出城谈判之崔某如何）的引进，当面直接告诉傅作义，并告傅保守秘密。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21

无论当事人还是后世史家，都习惯将这封长电称为"军委六点意见"，即电报中的甲、乙、丙、丁、戊、己共六点具体指令。电报的抬头写的虽然是"林"，读者如果仔细揣摩六点中开头的一句话，这指令竟然是发给谈判对手傅作义的。

在古今中外的谈判史上，似乎少见这样的案例。

让我们再对电文作仔细分析："六点"中的前三点，针对的是傅作义本人，是在"抑留"他的军队已经不成问题的情形下，如何防他本人或只身投蒋，或"不成功，则成仁"。毛泽东要的是一个活着的、能当招牌为他所用的前国军三星上将。

接下来的两点（丁、戊）就是实现规划的具体安排了，包括人员选定。其中显得突出的，或者因为史料披露过于零散，而让后世读史人觉得蹊跷的，是在不过数百字的电文中，三次提到粗粗看上去，和战事没什么直接关系的燕京大学教授，也即本书之主人公。似乎不仅毛泽东本人已经认定，和前线将领们也已达成共识：这事就托付他来做吧。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一环扣一环，按照电报所规定向前推进：-名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将这六点牢记于心之后，返回北平。经电报中指定的崔载之的引荐，李"来到中南海，当面对傅作义'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六条意见"。22

1月2日，在地下党通报消息并带敦促（包括客人名单拟定）之下。第一任北平市长何其巩，出面请傅作义、邓宝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后来的第三次出城代表）、张东荪到家中便餐。偶然的老友聚会？何其巩儿子何嗣铋回忆：

傅作义与父亲是北伐时期的老朋友，多年来一直持着联系。父亲接

受党的指示，长时期地争取他，从未与地下党组织隔断。解放大军包围北平城郊后，地下党传来党中央、毛主席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战略意图，父亲约同邓宝珊、张东荪等配合行动。

1949年元旦，父亲找傅作义没有找到：就要邓宝珊转告，次日约请傅作义、邓宝珊、张东荪等来家吃饭。元月2日，客人到来后，父亲首先赠送给傅作义一幅条幅，上面是父亲亲笔书写的陆游两句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傅笑着道谢收下。宾主坐下边吃边谈。这顿饭吃了六七个小时，谈话始终围绕着在当前形势下，傅作义的出路问题，反覆进行研讨。

最后，父亲对傅说："我是北平第一任市长，这座古都，这么多古建筑，能够完整地保存到现在，么的不容易！""希望你留芳千古，不要做民族罪人。"23

席间没有人提共产党和军委电报（或者回忆者不知情）、好像一切都出自自己的主张。但起码四人当中的三人，都已经从不同渠道确知"军委六点"。

1月5日，措辞强硬的林、聂《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发布。傅作义再顶不住，遂按照电文中（丁）项的安排，先派政治部主任王克俊把张教授请到居仁堂，得到"同意参加和谈、转达意见"的肯定答覆后，于夜问召见了他的心腹，即电文规定的"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周北峰。读者此处或许记得1月1日"军委来电"中毛泽东周到的嘱咐："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但教授还是决定自己走一趟。对这次居仁堂见面、当时读小学的张饴慈后来听父亲说，爷爷回家告诉爸爸："气氛相当紧张，他打着裹腿，枪就放在桌上手边。"

1月6日，两位教授在双方前线部队的安排下，通过火线。具体情形就是本文开头时的那一幕。

下午，他们在西山见到了程子华；第二天清晨，坐着大卡车，在-班武装战士护送下，下午到了蓟县城东南八里庄。用饭时，聂荣臻出迎。

这显然不是一顿礼仪性晚餐，聂是来先探虚实的。24将傅作义的"底"摸清后，前线立刻发电报到军委，明确报告傅的条件：

1）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

2）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

3）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

4）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25

作为在五十年代后即到北京读书，后来一直在北京生活写作的人，著者真为这四条中的第二条，即在如此严峻时刻，即将献城的傅将军，还想着北平的新闻自由，不免心头一热。无奈半个世纪过去，北京的报纸直到今天，依旧在中共一家控制之下。

张东荪和周北峰见到聂荣臻，显得很激动。周北峰首先表明来意："傅将军上次派出的崔载之、李炳泉二位代表，到这里一个多星期了，谈判没有多少进展，很是着急，就又派我们来了。"张东荪说："傅先生这次派我们来，就是希望能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以免北平毁于战火，二百万人民遭受涂炭。"26以他的学问经历，对军阀政客的全部心思未必了然。他表达的，是他认为此次使命所在，即他与交战双方仅有的共识。

毛的答覆当夜（1月9日凌晨）就到了。双方久经沙场，在合围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傅作义在军事上会取什么态度，本来已在意料之中。所以毛此时的答覆，已将重点转到政治和经济的赢局上：如何减少损失、如何获得民心。即同意1、4两条，补充"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避免平、津遭受破坏"等。27

电报特别强调，"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一定"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逼傅在12日开始实行"-- 实行什么？用林彪的话说，就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区一律解放区化"。时间比毛所定宽限了两天：1月14日。

对于傅作义所提的第2、第3两项，毛只一句话："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林彪更提到："关于出版、信仰自由问题，我们的民主纲领中早有阐述，这里不多说了。"28

手握重兵、杀生无算的双方，在如此紧急的时刻居然都谈到民主政治，是不是因为张东荪在场？

后来的故事我们已经非常熟悉：

1月9日，双方在《会谈纪要》上签字。周北峰将文件密藏在衣服夹层，于次日回到北平：立即向傅回覆。傅犹豫着，但眼见时限已到，不得不再派出代表请求延期。周北峰和邓宝珊到五里桥后，他还在犹豫。直到丢了天津，才最后在《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上签了字。

张教授呢？据周北峰回忆，张说："我不签了。……周先生是傅先生的代表，由他签字就行了。"对于此后行止，虽然毛主席在电报中特别提到"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入妥为照料"，29东荪先生决定还是先回家。前线指挥部遂派车将他送回已经在共军掌控中的燕京大学。

家里人见他吓了一跳："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指出城），因为家人都以为他在城里宗炳家中。到后来知道他人不知鬼不觉地绕过海淀去了趟蓟县，张家后人回忆，奶奶（也就是东荪夫人吴绍鸿女士）接过教授带回的对手所赠礼物，一件狐皮袍子，不知是嗔还是赞："三过家门不入啊！"

共产党的全胜虽然已在意料之中，但仗其实还没打完。对于他自己刚刚经历过的那场冒险，以及那时正进行着的"只要签字就立即熄火"的第二次和谈"他什么都没提，只说在家不能久呆，即将啓程到石家庄见毛泽东。"

2月1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毛泽东起草），30分析了为什么结局 可能更漂亮的"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未能付诸实施：

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二十九个钟头内十几万人解除武装，陈长捷、林伟俦、杜建时等一齐被俘，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人民解放箪十五日攻克天津，十六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位将军即和傅作义将箪的代表邓宝珊将军、周北峰将军成立了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协议，往后数日又成立了细节方面的许多协议。周北峰将军是在一月八日由张东荪教授引导出城和林彪将军等谈过一次的，这回出城是第二次。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难道还不明显吗？31

张东荪的名字在一个月内第四次出现在由毛泽东起草的共方文件

中。

在这个评论中、毛用"由张东荪教授引导出城"所传达的意思似乎是：读者诸君，请注意和谈的主动方不是傅--这名战犯的代表是由代表民意的教授引出来的--正合了他在1月9日电报里耿耿于怀的地力；避免仅由"傅作义派人出来具有欺骗作用！"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傅已经接到周北峰秘密带回的《会谈纪要》、但挨延着不答覆的时候，毛愈来愈心耐烦--这批不识好歹的家伙居然"拒绝我们迫其就范的方针"，妄想"迫我就范"。两天前曾表现出对民主自由子民优容的"雅量"（也即1953　年梁漱冥曾向他要求而啬给予的）很快就不见，倒是气不打一处来。"此外，并提出什么报纸及政府用人等事、好像他们是代表人民说话，向我们要求民主权利。"32这封电报是到二十世纪末才公诸于世的，替傅作义传达该意图的张东荪当时不知道，其一生也没可能知道。

到了1948年12月底，傅作义最终的就范，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无论谁陪（或者"引导"）傅的代表前来，结果都是一样。这段时间，到傅将军面前荐人与自荐，甚至信息已经由地下党传到中共中央总部的，也不在少数。比如最早动议并且一直张罗策划的彭泽湘：比如毛自己最信赖与亲近的老师符定一；比如傅的老师刘厚同（他有女儿在延安）；比如老市长何其巩和下一任市长何思源，还有更加散淡的侯少白或张伯驹……或者在最紧张的1月16日，应邀出席傅作义"听意见"西餐会的徐悲鸿、朱光潜、许德珩、杨人缏等。

为什么单单选张东荪？

毛泽东要借重的，是张东荪的份量与社会信誉，显示共产党"北平和平交接"用心最光彩的一面：文明与仁义。他要借重张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由他将共产党形象传达出。起码毛当时认为，与新华社的报道相比，张教授亲口说将更加服人。

毛的设计完全实现。

1月下旬，傅作义宣布了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2月3日军队入城。

在《会谈纪要》签订后回到北平的当天傍晚，张教授在燕京礼堂作了那个著名的"老鼠与花瓶"的演讲：

北平是个花瓶，傅作义是瓶子里的老鼠。老鼠是可恶的，人人都想消灭它，但它却躲在一个精美的花瓶中；既要消灭老鼠，又要不打碎花瓶，就不得不采取和平方式，用和平的辩法解决。

听众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大家一致认同他的比喻：北平攻守双方力量之比，如大汉子和小老鼠。而那灭鼠的人，不但很知道花瓶的价值，更有珍惜之心。张家后人多年之后还记得常时情景："很多人写诗吹捧，他自己也有点飘飘然起来。"

飘飘然是家人对他的打趣。他看重的，其实是个中的奉献、艰辛，以及历史上的份量。张家至今保留一幅山数封八分信笺横着装裱起来的"围城题咏"，记有邓之诚、张伯驹、林宰平的诗作，褒扬同为文人之老友的斡旋之功。条幅的最后是东荪自己写的句话：

戊子冬，北平围城，余与刘厚同、侯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当时虑或不成，栗栗为惧，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义之，有此题咏诵，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因装成幅，留示子孙。（断句标点为著者所加）

对于不觉之中做了共产党的啦啦队，张教授既不曾细想，也没有察觉。他依旧处于巨大的兴奋中--为北平、为民众、也为自己的理念。不少人记得他对自己此举所作的那个评断："北平和平解放，平生第一快事。"

快事之后，就剩下闭门著述了么？不，作为中共尊贵的客人，他，还有经他推荐的燕京与清华同美国关系密切的教师，将出发赶往西柏坡--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

想来，如果八个月之后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推举发生在这时候， 毛泽东是笃定能得到全票的。因为在出发前往西柏坡的时候，润之先生在张教授心目里，是够格做国家首脑的。

注释

1、周北峰（1903-1989〉，山东永济人。曾留学法国，获硕士学位，历任哈尔滨法学院及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1938年曾被傅作义派到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后作为傅部代表与八路军会商。与侯少白并称为傅系最具学识的将军。去世前历任北京市政府参事、绥远民政厅长、内

蒙古自治区水利厅长、区政协副主席、区政府副主席、区人大副主任。

2、周北峰：《北平和平解放》，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七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页225-234。引文有删节。

3、毛泽东：《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1948年11月14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1360。

4、董世桂、张彦之：《北平和谈纪实》（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页344。

5、《准备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灭芦台塘沽之敌》（1948年12月8日）、《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年12月11日），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340-343、360-362。

6、陈伯钧：《兵临城下--回忆解放北平》，载《红旗飘飘》，第十四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皈社，1995），页104-120。

7、194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392-393。

8、董桂之、张彦之：《北平和谈纪实》，页71；周北峰：《北平和平解放》，页225-234。

9、侯少白同傅作义谈了以后，告诉彭泽湘，傅认为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同彭面谈，也不便接受李济深的信，但委托侯少白作他和彭的联络人，双方意见由侯传达。经过几次间接交换意见后，傅作义就表示愿意考虑彭所提出的问题。这时彭就约民盟在北京的负责人张东荪及农工党负责人张云川共同进行。彭同时找到符定一，由符定一帮助彭和中共取得联蘩。符定一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即赴石家庄与中共面谈傅作义提出的和谈问题。参见马连儒：《彭泽湘：辉煌与坎坷伴随一生》，《人物》，2001年第7期。

10、毛起草以聂荣臻名义发出致彭泽湘电文为："符老先生带来处寒（处寒，即七日、十四日--著者按）两日大示收到，当即转呈上峰，弟个

人认为某先生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敬希转达某先生。"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395。

11、"（一）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二十五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二）不管蒋、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休整到十二月半然后南进。两个方案何者为宜，望考虑电覆。"（11月17日电）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392。

12、"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11月18日电）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393。

13、"部队行动须十分荫蔽"，"请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11月20日电）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396。

14、11月18日电。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393。

15、具体为："华北剿总"五十万军队，已经被分割、包围在五个地块上，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之作战业已开始。（12月11日电）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415-416。

16、据周北峰回忆，傅作义派他谈判前，曾对他说："前些日子胡适偕司徒雷登来北平，曾谈过让我退守山东沿海一带。"孤证，暂立此存照。1949年，蒋匀田在华府与魏德迈见面，谈到美海军青岛基地--目的在于支持平津三角地带傅作义的守军，牵制中共军队不得即刻大举南进。前提是傅作义守军"恐将牺牲，无法撤出"。参见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香港：友联出版社，1976），页229 。

17． 1948年12月底，刘仁向林、聂作关于北平地下党工作的全面汇报时说，如果"傅作义不接受和谈条件，我军要攻城的话，有人给我军当内应，不会费多大力气，就可以进城的"。参见董世桂、张彦之：《北平和谈纪实》，页162 。12月23日，中共已经决定接受候镜如的九十二军起义，"该军最大作用是便利我军攻城，最好该军能于适当时机在取得傅作义信用的条件下，控制一两座城门，或于我军攻城时夺取一两座城

门，或给我军伪装部队以进城的便利。"（12月23日电）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427 。

18、《将革命进行到底》，载《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页72、1377、1378。

19.据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内部资料）1983年第1期头条文章《自述》作者彭泽湘讲述了从11月中至12月底，他在北平与各方联络的情况，特别提到这一工作"直到12月31日傅作义答应派代表出城会商为止"。可见中央军委电文中所提两次地下党来电，与彭的居间工作有直接关系。

20、指12月23日发给人尚留在平津前线指挥部的他的代表崔我之的那一封。与第一封比较，傅这时已经放弃自己的"建国之道"表示"绝不保持军队，也无任何政治企图"，但希望给他一个"转圜时期"，在这一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即毛在军委来电（丙）中说的"所取态度不实际"。崔为傅作义之心腹，傅系《平明日报》社长，第一次前来谈判的代表。

21、"军委六点意见"目前找到权威机构公布的全本，为北京市档案馆编的《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页54-55所载引文之中粗体字部分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新生》（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页75）一书引用的版本所有，但《北平和平解放前后》没有。

22、董世桂、张唐之：《北平和谈纪实》，页172。注意：该书作者（军人作家董世桂）这里的用词：传达。

23、何嗣铋：《何其巩：北平第一任市长》，千龙新闻网。

24、至于聂是怎么探的，他本人的回忆录里没有明讲，周北峰说是共方背着张东荪特别通知他："聂司令员在东边的那个院予里，请你过去谈一谈。"但在董世桂、张唐之的书里，聂则与张东荪单独谈话。

25、1949年1月8日林聂致军委电报。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431 。

26、王红云：《北平和平解放和谈记》，《纵横》2002年第1期。

2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431。

28、董世桂、张唐之：《北平和谈纪实》，页185。

29、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页59。

30、该篇评论题为《面临全国革命高潮和国民党大崩溃，伪南京政府被迫同意北平和平解决，全国问题的解决就有理由遵循这一道路》。

31、《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页278。

3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432。

二 正月：西柏坡

如今的70后、80后们，很少知道保安与西柏坡了。作为红色中国之国都，史书上多提北京（1949-）与延安（1936-1947）间或有人说说瑞金（1932-1934），非党史行业而知道西柏坡（1948-1949）的，多已达书痴级。

西柏坡其实是中共的骄傲。从计谋叠出、调兵遣将而最终得到江山这一点而言，毛泽东在这里真是把他的才具发挥到了极致。正如周恩来后来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1

我们的主人公和他的朋友，在国共内战的第三个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迎着凌厉北风，踏进了这间司令部。

他们大约是1月15日前后出发的。一行四人，全部是"民主人士兼大学教授"。

民进中央理事雷洁琼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她的夫君犯罪学家严景耀，与她同党派、同大学、同系。另一位是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当时不仅在业务上已如早晨十一点钟的太阳，在思想文化界也非常活跃。2

为什么单单邀请他们四人？

据雷洁琼回忆，他们夫妻是受人在香港的马叙伦先生之委托到西柏坡与中共中央共商大计。3

民盟费孝通的见解没这么笼统，也没这么简单。在晚年（2000年）回答朱学勤提问"当时去西柏坡是怎么一个去法"的时候，他只含糊回应："这个内幕不知道了。被挑的人，我、雷洁琼〔和她--著者按〕的爱人、张东荪……他是政治活动家。……首先是张东荪把我引到西柏坡。他是带队的。"4

至于张东荪，我们现在确切知道的，只有数日前，对峙的双方在蓟县签订《会谈纪要》时候他说的那句话了："我不日便到石家庄去，不回北平了。"（周北峰回忆）；5"我这次不回城里了，准备先返回燕京大

学，然后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泽东主席。"（聂荣臻回忆）6

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他们乘坐大卡车，由八名解放军战士护送，从西郊八大处出发，途经石家庄，好像在那里等了几天，7最后直奔西柏坡。作为后世读史的人，很少有人不存疑惑：啊，在那几天！8毛泽东有时间见闲客？

或许不算闲客，因为北平快解放了，共产党要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了，总得经过一个手续，取得全国（甚至世界）认可吧。他们的应邀，以及随后享受到的高规格贵宾待遇（以当时的标准）、或许就是这大策略中的一环。

据雷洁琼以官话回忆：

周恩来同志把我们介绍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华东同志和我们夫妇亲切握手问好，与我们共进晚餐。他谈笑风生，气氛十分活跃愉快。饭后我们围坐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彻夜长谈，聆听他关于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知识分子问题、对民主党派的要求以及新中国建设的谈话，使我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9

费孝通当然也有说套话的时候，10在晚年，并且面对自己出类拔萃的学生，倒没再浪费读者时间，说了有实质内容的话，坦承这次前往，是他日后政治生活的起点：

我那时是知识分子的头头，经常发表政论。符合知识分子的心理，符合知识分子要求的水平，又要西方，又要中国，我两面都有了，所以那时是知识分子的代表。　我当时是中国最好的columuist（专栏作家）……我的思想的高潮，是民主、人权。……

我与政治的关系，首先是张东荪把我引到西柏坡。……一共四个人。

朱学勤插话："那很奇怪，当时比费先生更有知名度更有影响的人还大有人在啊。"对此，费孝通承认：

多了。……他（张东荪）对我不错的，但我不太买他账。我在燕京大学时旁听过他的一门哲学课，我听不出什么道理，到考试的时候，他给我70分。我没有70分的记录的。我是记得他的账的，他如果给了我90

分，我就服了他了。这很有意思。他同我一直不错的，我到西柏坡去，就是真正成立联合政府，共同纲领就是这时写的。他带我一同到西柏坡。……

储安平想去没有去成。他还怪我怎么不叫上他。他也不知道内幕。但我们知道背后肯定有一套东西在运作。

什么东西，又如何运作呢？2000年俄罗斯解密的斯大林毛泽东秘密档案，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他们这些忧国忧民的学问家，在中共棋盘上的位置。

解密档案公布了毛在大约一年前（1947年11月30日）发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在汇报了战事进展后，毛提到抗战胜利后如何对待曾一同争民主、争自由的盟友：

随着民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不复存在。民盟中有同情我们党的人，虽然它的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迫于国民党的压力解散了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11

毛在这里指的，是1947年11月6日主席张澜正式宣布"民盟总部解散"（意味着共产党在国统区失掉了有组织的呐喊者）明明知道民盟解散是出于"国民党的压力"（包括军警特的磨刀霍霍），却归结为受害者的"软弱性"。此事件当时具体出主意的，即在谁都不肯表态的时候向张澜递了一张小条的，实为自诩"内方外圆"的黄炎培。读史的人一直弄不大懂，在1957年，毛为什么毫无道理地对任之（黄炎培）下那样大的狠手（六个子女，五个被打成右派）。从这封信的口气，或许能看出些端倪。

不知为什么，斯大林在拖了几个月之后（1948年4月20日）才就此观点回电。他说：

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他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要保留自己的领导权，也就是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一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布为联合政府。12

其实，"打倒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也不用斯人林给他们上课。因为早在半年前，在1947年10月解放军发布的宣言和12月为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里就提出了。

但斯大林4月20日那封回电，可能还有些作用。因为到了1948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刚刚搬到西柏坡，毛泽东就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摆上首要日程。在他致电中央其他几个书记，通报即将召开中央会议的时候，列在第一位的，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13

这"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的甄选特别重要。因为共产党（包括苏共）要的，并不是什么平等联合，而是一党绝对领导下的好看场面、雅称"同舟共济"。究竟哪些有实力的前同志既请得动、撑出来的场面又最看得过去、就大有学问了。除宋庆龄必须摆在适当的地方，毛泽东将李济深、沈钧儒定为首位，于5月1日亲笔致信。

对方响应热烈，载入史册的"五一口号"出笼。14虽然强调"必须由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周恩来还是开出共产党最倚重的二十九人名单。15为后世史家大书特书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从此正式上了轨道。16

二十九人中有张东荪和雷洁琼，没有资格尚浅的新星费孝通。估计就在这前后，北上参与筹备的邀请送到张东荪手上。去还是不去？或者用毛后来的话，翻成"这贼船，上还是不上？"张家后人记得：共产党曾请他到哈尔滨参加政协，张东荪说：课还未完，暑假后即去--但实际上没有去。他心中的这番犹豫与最后的推托，与他的盟中同志张澜、罗隆基，其实是一样的。据叶笃义回忆：

1948年，周新民曾几次写信给我，劝说张澜去香港。张澜先是说："任之（黄炎培号）去我就去，任之不去我也不去。"后来黄炎培没有给我们打招呼而独自离开上海了。张澜又说："努生去我就去，努生不去我也不去。"罗隆基说："我同他们不一样。他们的行动是比较自由的，而我是被拘留在疗养院里的。我的行动太不方便。"17

后来同为盟内领袖的史良出面规劝罗隆基的时候，罗隆基又抬出一个新的理由："浦熙修现在被关在监狱里，我一走就一定连累她。"

张澜还是说，罗要不去，他也不去。……时间一拖再拖，拖到1949年5月10日，国民党特务终于把他们扣留起来。

这一扣，反倒成就了共产党。不久，被中共地下工作者搭救出来的张澜等人，已经不得不立即前往北平，拜望毛主席了。

扯远了，再回来讲西柏坡的故事。

如果仅从雷、费二人在共产党中国稳步上攀的高位看，张东荪这回还真挑对了人--这两位与中共的关系，可谓善始（于西柏坡）善终（非共产党人士而长期担任高官并获高规格葬仪）。读史人一般容易忽略严景耀。在名额如此珍稀的情况下中选，当然不会仅为陪伴夫人。严本经燕京选派赴美国读博士，却在那里接触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还曾到苏联教学并研究。虽然思想左倾，司徒校长对这个自己一手培养的高足（以及杭州"小同乡"）却毫无芥蒂。

这对夫妇所在的民进18一直保持温和好乖特色，不大具有鲜明独立政治见解，此即雷洁琼仕途顺利之奥秘所在；费孝通略有不同：民盟人才济济、大佬云集，张东荪向毛泽东推荐他，是因为爱才。但要越过诸位大佬，比方说在1949年就当上中央政府副主席，一时也没那么容易。所以他的发迹，除了赏识他的共产党一路护航19和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之外，更要靠他盛年之后，只过着中共安排给他过的政治生活，而在极有前途的社会学研究上，几乎毫无建树的自我牺牲上。

张东荪本人呢？

若论他和共产党的交情，绝非雷、费两位可望其项背。在这一节，我们先不说他与陈独秀的私交；不说他早在共党魁首之先，就会过了真正的中共缔造者（共产国际派来的维金斯基）；不说他和早期中共理论鼻祖的论战；不说《八一宣言》后他怎么力排众议，呼吁社会容纳共产党这样一支民族自救的政治力量；不说他如何与彭大将军签订共同抗日的协议；不说他冒着性命危险为"中共地工"斡旋汉奸；不说他在老政协上的表现；甚至不说共产党最看重的"是否参加伪国大"上举足轻重的选择--这些，我们都会在以后的故事里从容道来。只说说中共中央书记处迁到西柏坡之后，他作为民盟非"亲共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究竟做了什么，使得毛泽东随后作出一系列颇令人费思量的举措。

至今未见学界对共产党在1948年打定主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不

再提"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做出细致推敲。

"政治协商会议"这几个字，直到1948年4月还没出现在当时共产党的语言里--或许在他们心中，重庆的那个"政治协商"，自1946年被蒋介石、陈立夫破坏以后，已经成了一件往事，一个历史词汇。

4月25日，毛泽东通知他的同志们开会的时候，说的还是"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但两天后的27日，"政协"这一名称突然出现在毛泽东写给刘仁（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信中，请他"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东荪、符定一，感谢他们的来信，对他们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表示热烈同情，并邀请他们二位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20

信中所说的张东荪、符定一来信，是一封什么信呢？21毛泽东特别嘱咐"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些什么人"，在这里，张、符二位所得到的信赖、倚重，甚至超过了"五一口号"的两位头面人物。为什么？

读者切不可小看这一名称的确立，这是共产党在中国当政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中央人民政府是由各政党参加的政协所选出的。共产党政权不是打下来而是民众推举出来的。

如果联系到半年后在和平解放北平的拉锯战中，对这位燕京大学教授超乎寻常的倚重--召开政协的主意，会不会是来自这位平日说话不多、但将"协商与对抗"看作是现代社会基本要素的老政协会议代表？而把"目击、协调北平和谈"这一历史荣誉"送"给他，除了信赖，带不带点答谢的味道？

其实，在"政协"的主意纳入运作、"五一口号"也提出之后，毛泽东还曾有过动作，想将张东荪拉得再近一些。这就是5月31日致函刘少奇等四书记，考虑将张东荪等四教授尽快接到共产党治下的华北政权做官的主意。22这计划想来没有得到回应。

不知4月27日那封信刘仁是怎么传的。7月间，在符定一率周建人、刘清扬、吴晗、楚图南、焦菊隐、马彦祥等民主人士到达华北解放区的时候，没有张东荪。后来，在8月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里，仅张东荪的一位同学、同志、密友外加亲戚接受延揽，担任副主席、即1949年后出任

最高检察院副院长的蓝公武。23

据雷洁琼回忆，在他们四人的西柏坡之行（1949年1月）中，毛当时还提到"将革命进行到底"，毛说："革命胜利后就要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24

毛说这话，究竟用的是什么口气，开玩笑？还是郑重警告？不具幽默感的雷副委员长、是无法在她的官样文章中传达出来的。

据《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一书记载，就在那次，张东荪送给毛泽东一本封笔之作《民主主义与与社会主义》、毛泽东回赠一套东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25张东荪向来看重自己呕心沥血之著作，也有把新出版著作送给知音的习惯。比如1946年参加老政协的时候，就曾将《理性与民主》赠周恩来和吴玉章。到了亲身介入的北平围城解钮大功告成，他那时或许认为，作为士、作为学者、作为以言论干政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与面前这个相识已久但一直末深交的、26如今即将成为一国这首的湖南青年，在未来中国应该怎么治理这一话题上，是有共同语言的。

张家后人证实了这本《毛泽东选集》的存在：深蓝色布封面（可算是当时的精装书），后来一直保存在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手里。张饴慈在父亲家中见过，只是没有毛的签名，为此张宗炳还觉得有点遗憾。这一细节提示我们，第一、互相赠书时，张东荪没有要求对方签字；第二、他并没有把这书当成手边案头读物--像沈钧儒那样（"书桌上满是毛著"），或是向客人展示的阿物儿--像郭沫若那样（"他满墙挂的都是毛诗词"）。

张鹤慈在六化年代初当大学生的时候，读过这册珍本。不仅读了，还直接导致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统制的反感。这是赠书者当时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吧：

我对毛泽东的反感，源起于读他的解放前老版的毛选一卷本，那是毛与我祖父的见面礼。我突然发现《论联合政府》中的许多文字和新版的都不一样，尤其是提及美国的部分，我当时的感觉就如抓住了小偷：修改可以，但必须有说明。

这部毛著"珍藏版"在文革中被抄走。如果是从张宗炳家抄走，北大生物系63级的同学应该有人知道是谁干的。

张东荪带到西柏坡的，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增订四版。据《观察》杂志广告，该书1948年秋业已付印，到1月份，正是书已寄到北平可以送朋友的时候。之所以称做"增订"，是因为将去年7月完稿的"书后结语"，即《增产与革命》，正式放到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书里边。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像往常一样一概否定革命，而是认为："一个社会或国家倘其演变到生产不能再增的地步，则这个国家非革命不可。"

至于革命的对象，针对中国的现实，他指的是完全不事生产的地主和豪门与官僚资本。对于那些"不但没有把旧有的生产限制的藩篱冲破，并且亦没有开辟出来增加生产的新天地"的种种"起事"，他认为根本不配称为革命，无奈"这一类的革命在中国为独多，我曾名之为换朝代"。

这样的议论，在1949年1月，正奉行改天换地的毛泽东大概不会觉得被刺伤--不仅"换朝代"对他而言没什么负面意义；"开辟增产新天地"--如果不问基础与制度，他的梦比谁都浪漫。

估计毛有机会读到他的文字。因为当时北平地下党设有一个第四室，主要任务是对国统区报纸杂志进行剪辑整理，并将其中与城市工作有关的内容摘出，编印成简报送给领导参考。只是不知在西柏坡他们有没有机会就此深谈，否则发表出来又是一篇与"窑洞隆中对"并驾齐驱的"泥房隆中对"了--只不过议论的要点没放在民主制度，而是放到了普通民众之物质幸福不可随意剥夺上。这是因为，虽然张东荪没有一概反对革命，但他对革命加了一个限定条件，即"以增产而求平均，并非仅以再分配而求平均"，他认为：

这其间区别甚大，因为均贫富既非增加生产总量，并且同时对于增加生产的努力进行上反是一个妨碍，故必须力避此种过激而有害的举动。须知凡是一个革命，如果仅是把经济上的不平等用再分配的办法来平均一下，其结果并未使生产总量有所增加，这个革命终归失败。

此时，距离揪住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还有一年；距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还有七年；对东荪先生的高见，即将进城的将领们或许还没有什么抵触。

大约也在这前后，太湖林屋山暴方子之孙暴春霆，带了《林屋山民送米图》图卷，到燕东园拜望索题。张东荪写道：

窃尝读史，每当革命之起，其前必有一黑暗时期，无是非，无赏罚，固不仅贪婪无能而已。……盖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辨，赏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也。27

至于眼下被广泛引用的《张东荪传》中关于张东荪与毛泽东在外交"一面倒"上的当廷面争，包括见面的气氛甚至对话，著者倾向于是后人杜撰。28

外交是否"一面倒"，这个已经超越外交范畴的政治选择，对毛和中共太重大了。那时候，他希望前往苏联觐见斯大林的要求一次次被驳回，而斯的代表米高扬要几天后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还没摸到实处……。面对着四名任教于有美国背景大学的教授（其中三名还是留美生），毛或许会很有意地提个头，观察他们的反应。这其实也只能从张家后人的回忆里得到片面证实。

回到北平之后，对西柏坡一行，张东荪仅和他的长子有所议论。到文革时候，有感于对刘少奇的批斗，他又与长孙张饴慈谈起西柏坡一行，总的说来，"回来以后非常失望"。祖父对他说："在石家庄西柏坡见到毛，话不投机。……毛大谈梁启超。并说将来外交上'一面倒'。"

不知在当时，毛有没有对张东荪说，读他和梁的作品，早在青年时代做着"救国梦"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是1921年1月1日、2日两天，毛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

张饴慈记得爷爷还说，他们谈话的时候，"刘少奇进来又出去了。毛在他走后说：'这是我们党里犯错误最少的人。'"张东荪甚至没有告诉自己的亲人，共产党方面曾问过他对做"北京大学校长"的兴趣--这都让他觉得气闷。而这气闷，要到遭整肃后的1959年才在他的词作中抒发，29这我们以后还要谈到的。

1月31日半夜，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周恩来看完电文，当即派干员连夜出发去北平，以备党中央迁入。

2月1日，周恩来安排滞留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一起进城接

收。雷洁琼夫妇参加进这一队伍，还在燕京当了一夜东道主。张、费也同车回校（"入城式那天回来"），只不过没有那么激动，也没那么投入就是了。

同一天，2月1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六人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里边没有张东荪。

他没有参加致电，毛却在自己为新华社写的述评中点了他的名。30

2月4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清华、燕京教授发表宣言：《拥护毛主席声明》，张东荪名列其中但没有领衔。

到2月25日，当林伯渠陪同赶到东北的民主人士乘火车离沈抵达北平的时候，"到车站欢迎的有中共方面的林彪、罗荣桓、薄一波、叶剑英、彭真，各界民主人士中有张东荪、胡愈之、楚图南、千家驹、雷洁琼、费孝通等及全国学代会代表、铁路工人代表共百余人。"在这条消息里，他的名次排到最前边。

3月25日，毛泽东一行乘坐汽车从西柏坡出发，到涿县换火车抵清华园车站，在颐和园稍事休息后进北平。从留下来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张东荪作为"各方民主人士之一"出席了西苑机场的欢迎式。他只穿了一件呢大衣（里面还是长袍布鞋），站在谭平山与沈钧儒之间，背后是陆志韦、李维汉和朱德。

当天晚上，毛泽东约他的非共产党朋友到颐和园乐寿堂吃饭，张东荪也在应邀之列。晚饭后，即开始座谈，一直谈到次日清晨。

共产党拿下了古都北平。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新的战场--心灵。

注释

1、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等二十四场战役。他在一间仅16.3平方米的旧民房里，共为前线起草197封电报。有关三大战役的统计如下：

战役名称 时间 天数 歼敌数（万人）电报数 共军与国军兵力对比

辽沈战役 48.9.12.-

48.11.6. 52 47.2 46 70万：55万

淮海战役 48.11.6.-

49.1.10. 66 55.5 64 60万：80万

平津战役 48.11.29.-

49.1.31 . 64 52.1 89 100万：60万

2、在《观察》第4卷第22期（1948年暮春），有一篇清华教师胡庆钧介绍费孝通的文字："一个年纪刚到三十八岁的中年学者，在社会人类学的岗位上努力了十年，享到了如许的盛名，获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这不能不说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件罕见的事。"

3、"民进的马叙伦同志从哈尔滨给我们来信，请我的爱人严景耀去华北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参见雷洁琼：《一次难忘的幸福会见》，载邵康主编：《毛泽东和党外朋友们》（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页35 。

4、朱学勤：《费孝通先生访谈绿》，《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5、周北峰：《北平和平解放》，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七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页225-234。

6、王红云：《北平和平解放和谈记》，《纵横》，2002年第1期。

7、吴黔生等：《肝胆相照》（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页41。

8、1月14日，解放军向天津守敌发起总攻。三十小时后双方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十四条。21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城内守军接受和平改编。接着，最重头的：斯大林代表米高扬将于31日到达。估计他们是在协议签定之后出发的，一直留到重头戏开场。

9、雷洁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真理》，《光明日报》，2001年6月12日。

10、1998年纪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五十周年之际，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赴西柏坡参观学习。民盟中央名誉主席费孝通说："抚今追昔，我认为五十年前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聚集在中国共产党周　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个正确的历史选择，是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11、转引自A·列多夫斯基编，马贵凡译：《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份电报》，《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2、同上注。

13、1948年4月25日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的电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304。

14、"五一口号"非同小可。因为接下来的新政协将以此划线：各民主党派凡赞成积极响应者，可以参加新政协，后来者则需审查资格。新政协筹备会关于代表资格的政治标准是严肃的。有些党派、有些个人虽然提出申请，却没有被接受；也有些党派、团体、个人，却被主动邀请参加。负责拟订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的是第一小组，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第一小组提出处理意见，再报全体会议决定。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除中共及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十个民主党派，又增加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三个党派单位。

15、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明确指出：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开出二十九人名单："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约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马叙伦、章乃器、张炯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复亮、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参加协商。"周恩来后又亲自拟定包括上述人士在内的港沪和江南民主人士七十七人名单、平津民主人士二十四人名单。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比较一下上述名单和后来进入政府与政务院的非共产党官员。

16、直到1948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才得以

覆电香港李济深等十二人并转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称"5月5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可见将"蒋介石反动派"之外的各种力量纠合在一起又多么困难，特别是中间还夹着一场"美帝"对第三势力的扶持。读者如果记得我们在第一节中说过的毛对李济深的代表彭泽湘打算拉傅作义建立第三势力的愤恨，就知道这拖延了三个月还得不到回音让他有多焦急。

17、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页68-69。

18、即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成立，是上海文教界与工商界恳谈会的底子。

19、费孝通对朱学勤说："我的生命路线的选择，不是我选择的，是共产党决定的。向哪一条路走？当时有好几条路呢。一条是做教师，在清华是我做事里面生活最安定的一段时间，待遇啊、条件啊都很好，朋友很多。当时彭真与李维汉争我，彭真想给我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的职位，后来李维汉把我要去了，他是统战部的，他地位很高，在江西南昌起义时被称为'罗迈'，他权力很大，总理下来就是他，他是总理的秘书长。……我们同李维汉处得很好的。他是赏识我的人，知识分子是要别人赏识的，李维汉是共产党里面第一个真正赏识我的人。……回到民族学院，宣布我是右派了。他们也很复杂，决定我是右派也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一直帮他们的。他们后来也承认，统战部后来帮我的人不少，李维汉帮我的，到后来也是他把我弄出来。所以我受的罪不多，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真的开始。"参见朱学勤：《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2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304-305。

21、这封信一定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根据"中央挡案馆国家档案局利用部"发布的文件，中共对其档案工作，是相当重视的。1945年9月，在中共准备离开延安向东北（和全国）发展的时候，成立了"材料保管委员"，"征集、接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要档案资料并负责转移"，由中央秘书处处长，也即日后的第一任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负责，第一次大转移是从延安到兴县，九十箱，驴驮人背走了一个月。第二次是从兴县到西柏坡，毁了一部分（不是苏区清肃AB团的档案吧？--笔者叹），装入六十四个铁皮箱，全部由牲口驮运。第三次是从西柏坡转向北平，这回装了两辆大卡车，周恩来和杨尚昆统一指挥。当时，对于即将成为

第一执政大党，中共颇为自诩　，所以在西柏坡时期，有档案的规定叠次出台，如《中央秘书处村料工作细则》、《中央办公厅关于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等。

21、毛泽东5月31曰致函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请考虑将张东荪、吴晗、许德珩等尽快从平、津接出来，以便征得他们同意后，选为华北行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人任部长，一　二人任副部长。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313。

23、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选举董必武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为第一副主席，蓝公武为第二副主席，杨秀峰为第三副主席。

24、雷洁琼：《一次难忘的幸福会见》，载《毛泽东和他的党外朋友们》，页37。

25、郝在今：《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杜，2000），页166。

26、据记载，1919年11月，张东荪、毛泽东、舒新城发起创办《湖南教育月刊》。参见于平凡：《中国民主自由运动史话》（香港：自由出版社，1950），页72。

27、钟叔河编订：《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长沙：岳麓书社，2002），页175-176。

28、参见左玉河：《张东荪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页422-423。

29、《贺新郎》的前言："曾有人两度以北京大学枝长向余游说，一在虏狱中，一则在石家庄旅居时。又一九五二年陈某欲余自白，以不得为部长为憾。当时引为侮辱，嗣知人之自视与他人之相视，实有千里相隔，亦不足怪，但可一笑置之耳。偶然忆及，纪之以词。"

30、该述评刊于1949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石家庄版）上，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页277-280）时改名为《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三 炎热的夏天："一边倒"

从西柏坡搬进双清别墅的毛泽东，穿的虽然还是那身大棉袄，头脑中的战场，早已不再是四平街上的杀戮。在客厅、在书房、在握手与交杯换盏中，他将与他想象中的对手进行毫不妥协的较量--心理、性情与智慧。这场他名之为"其乐无穷"的大战，将覆盖他1949-1976年（五十六岁至八十三岁）后半生，并从此与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齐奥塞斯库等比肩列名现代暴君榜。1

这场战争正式开场于1949年，这改变了几代中国人命运的、瞬息万变的一年--虽然腹稿，早在1948年、1947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打了。

不长于交际的张东荪，2在1949年春夏之交的大热闹里，显得出人意料的孤单。

在这无可与人言，甚至也无从著文排遣的孤单中，有切盼、有焦灼、有追悔……他感到有什么即将发生，但又不能确切预知，更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比如北平易手之际，这边气势汹汹发布的那个"罪大恶极，国人皆日可杀者"的四十三名头等战犯名单。前四十一名均为国民党大员；到了第四十二号和第四十三号，曾琦、张君劢居然也列进去了！

他依旧住在燕京，只在城里有事的时候，暂时在长子宗炳外交部街的家中歇脚。虽然"收归国有"的指令要到1951年2月才正式下达，但在1949年的春天，贝公楼一带已是另一番气象。身着军装、腰扎皮带的人进进出出。临湖轩再不见老校长的身影。

1947年南京最后一面之后，张东荪再也没有见到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但书信往来依旧保持--既非礼节性的问候，也不是挚友之间无隔阂的交流。研究西方哲学，并正在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张东荪，3没有宗教与留学美国的背景。英文水平虽然已达到可在专业领域自如阅读，听也过得去，说还是要靠翻译。仅就私交而言，张东荪与司徒雷登似乎并不很亲密。他太严肃、也太专注，专业学问之外的兴趣相当有限，对于"行乐须及时"等人生格言不仅无由领悟，反倒常为远得没边的国事、天下事日常着急。他是燕京教师中唯一一名国民参政员（1937年、1938年）、老政协代表（1945--1946年）、国共两边首脑都着意笼络的民盟领袖人

物。

司徒雷登1946年改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后（仍兼任燕京校务长），不免从新的角度看待这位任系主任的同事。到了1949年，期望通过以峻刻自律、操守严谨而闻名学界的张东荪，与即将成立的新政权建立不露痕迹的联系，也就顺理成章。另一方面，张东荪、虽然早在老校长大使任命刚刚发表的时候，就已"看透中国政情之复杂，深知此任务（调和两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难以完成。一旦失败则势必有损司徒雷登一世清名"，4但对司徒雷登与中共沟通的意向，从他自己的想法或从同事之谊而言，于公于私，也自然愿助一臂之力。

这年春，司徒大使和傅泾波依旧在南京。

对燕京四教授的西柏坡一行，想来他们已有所闻。但他们未必知道，毛泽东已经相当兴奋（或日有意试探）地向他的客人们透露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基本国策；更遑论打探到斯大林的特使不日之内即到解放区，并将与中共首脑人物会面这一重大消息。

几乎就在同时，北平"解放"后的第四天，1949年2月4日初，美国国务院数月前（1948年9月8日）制定的那份《重审并制足美国对华政策》文件，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文件着重分析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成功的原因，明言美国必须摆脱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并和中共打交道--不仅必然而且可行。5

虽然对蒋介石的评价颇高且私交甚厚，但司徒雷登敬爱此人，更多是出于作为前传教士，将他看成是中国巨变时期皈依了基督的政治领袖。司徒诚挚地寄予情感与厚望的，是他出生与倾注心血的中国6--作为大使，执行本国政府政策更是实无旁贷。所以，对国务院的"新精神"，司徒没有任何抵触，立即以基督徒与大使的责任心，打点精神上阵。

动得最快的，是感到自己的机会终于到来的国民党内反对派（民革）。3月下旬，陈铭枢即开始派自己秘书罗某到南京联络美国大使。司徒在罗的陪伴下到上海，托陈向即将建政的共产党人（比如周恩来先生）致意，说自己将建议美国政府，支援中国的经济建设二十亿元。7

在这敏感的、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日子，傅泾波尽量保持与燕京旧雨的联络。时间急迫、局面微妙，老校长需要与人交换意见：和一个具有学识和历史感，却与老的和新的政权都没有利害牵扯的人交换意见--当然

这人最好是意识形态上色彩不浓烈，且公正不阿。

形势发展很快，快到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1949年4月21日，毛、朱二人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其实意味着，中共将成为"除了南斯拉夫外唯一真正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不直接依靠苏联军队而获得政权的，他们必定会引以自豪并坚持独立自主"。8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次日，入城先头部队三十五军一名侦察科长当街被请上吉普车，驾车的"鬼子"自称代表美国大使馆，说"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鄙处一叙"。由此可见司徒与新政权搭线心情之迫切。

接着，就是那已经广为人知的、意味深长的情节：国民政府"迁都"广州，美国仅命使馆参赞刘易斯·克拉克（Louis Clark）以"代办"名义赴穗。大使本人居守未动，故宫机场还留下了一架大使专用双引擎小型运输机。这一举措的余波是：除了苏联，西方主要国家的大使馆，都没有随原国民政府南迁；司徒本人在战时交通管制环境下，还能在各个城市往来穿梭。

所有这些，对红色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政策，我们今天已经可以说，是长在毛的心里，而非盘旋在脑中--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长久以来，读史的人大多以为"一边倒"这一基本国策的确定、定是出于讨好老大哥苏联：第一、在冷战中给社会主义阵营这边加码：第二、在中共心目中：只有大哥高兴，方可依赖。用毛的话说：打架，背后站着个大个子，心里踏实。

而苏联，起码在中共已经渡江拿下上海那一段时间，是不是如人们想象的，正摆出僵硬凛然的冷战架势，不许自己的"小兄弟"与美帝有任何勾搭呢？

据大约半个世纪后披露的资料，在 1949年中共进人北平，拉开架势与南京李宗仁政府和谈的这段时间里，斯大林曾多次事无巨细地介入到国共、中美事务中。细究苏联这时的态度，确实看不出要在中共与美国之间使坏，加剧二者间之紧张，以为其所用。

斯大林4月间的那份电报，起码在表面上奠定了后来几个月里，毛泽东颈毛直竖地与美国打交道的基础。历史学家杨奎松写道：

就在中共决定开始渡江战役的几乎同时，针对毛泽东去电征询斯大林关于新中国政府建立及其有关政策问题，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回电中特别说明了他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建议。他提议：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正式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那么，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因为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9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斯大林对新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所提条件只有一条。即"正式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而到了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还向司徒雷登表示：苏联愿意改善美苏关系，并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10

4月20日，渡江战役发动之前，黄华就奉周恩来之命，南下钟山，担任为他所负使命而特设的"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直到1999年接受电视台与党史研究室探访时，刚刚从副总理位置上退休的黄华，才将当年这一最高机密昭示于众。原来，是周恩来特意安排他这名燕京肄业生前往南京，"伺机和校长司徒雷登接触"。司徒在日记中写的则是："据说黄华是因为我的关系，才被派到这里来的。"

4月25日，出了一桩三十五军擅自派兵入侵大使官邸的事。司徒大使合乎情理地生了气。毛主席遂亲自起草电文过问--这一并非由政治家设计的细节，直接导致中共入沪部队动人的纪律严明。女作家陈渝庆五十年后告诉著者，她的父亲、建筑学家陈占祥，就是因为见到这些可爱的睡在屋檐下的战士，而毅然决定留下不走的。11

也是在这几天，与"大兵闯使馆"异曲同工，怀着"新中国主人公"之骄傲，还出现了南京电报局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的事情。此节又劳动毛主席于4月30日亲自写下关于"好"、"坏"记者的绝妙电文：

我们认为南京、上海两处暂时均不要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南京方面应重新开放，让外国记者发电，并且不要检查。待他们发一个时期看其情况如何，再由中央决定或全部停止外国记者发电，或准许好记者发电，停止坏记者发电。12

4月20日，长江上发生英国舰艇紫石英号事件。毛泽东为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撰写了措词严厉的反帝声明。与预期相反，司徒大使推进"新精神"之决心，不仅没有因这事受到干扰，反而决定加快步伐：5月6日下午，一直静待未敢擅动的黄华，接到傅泾波的电话，以老同学的口气，

问什么时候可以去看他。

在第二天的会面中，傅泾波几乎将春天批准的国务院文件《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悉数告诉了这位前同班同学。除了"美国一年来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的认识错误，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等，还委婉道出他们长于教育与宗教事务的老校长坐在大使位置上的为难之处：在国外获得的任命；对外交不在行；对国务院不熟悉……。傅还谈到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司徒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触。而这点，是获得了国务卿艾奇逊同意的。

接下来的，当然是安排黄华前往拜望老校长了。致电北平请示之后，5月10日得到毛泽东的回电（细心的读者此时一定可以注意到、前边之所为，多出于周恩来的布置。至此，毛泽东亲自介入）：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二）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

（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详见下文--著者按）；

（四）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13

对比前文所述斯大林的长电文，第三项"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这一条，毛泽东说得非常详细，甚至前后语句重复（这绝对不是他写电报的风格），已现胸中之气蓄势喷涌之前兆。兹将全文誊录如下：

来电说"空言无补"……（接上）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式

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勋，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望读者特别注意"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象。飞机大炮？面粉巧克力？人权观念与民主制度？

5月13日，有毛主席指示在胸，黄华前往大使官邸。会面时傅泾波在座。杨奎松在他的分析里说："人们事实上可以把这次谈话看成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美双方的第一次重要的外交接触。"此言甚是，但是，外交往往对内政发生很大作用。比方说，它对后来毛绝对不许外人干涉"内政"倾向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当然这里所说的外人，已不仅仅指外国人。比如文化人梁漱溟就是国家农业政策制定的外人；经济工作也不是彭德怀份内的事。至于这"内"与"外"会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划定，只能听凭伟大领袖自己"胸中鸿猷"了 。

在会面中，黄华忠实转达毛的电文"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对此，司徒书生气十足地解释，"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并得到美国承认，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多半不会因为中共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改变"。

接着说到至关重要的"干涉中国内政"问题。作为崇尚自由主义的司徒雷登，以大使身份表达的--我们后世读史现在已经清楚看出--是一句多么要命的话："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14

5月17日和31日，傅泾波再见黄华，明确告诉他，在对中共的政策问题上，美国国务院与国会是存在着极大分歧的。形势紧迫，对于司徒雷登力主与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望得到中共方面的信任和谅解。

北平方面没有回音。

陈铭枢就是这个时候作为李济深的代表，带着大使馆代为收集的美中关系资料，北上专程拜望中共的。

张东荪也有回信。据司徒5月28日日记，他邀请张东荪7月20日前到南京面谈，张也答应前来--以到上海会见民盟主席张澜、罗隆基为契机。

为将事情做得更确实，司徒本人冉次前往上:海，这回是会见民盟的领袖人物罗隆基：

司徒约见罗隆基，其向周恩来传达这样的口信 ：中共如果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装，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共六十亿美元的支援，帮助中国经济建设。罗隆基到达北平之后，在未传达这个信息之前，听到民革的陈绍枢已经向周恩来做了相同的传达，而遭到周的斥责。于是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15

到了八十年代，在华盛顿傅泾波寓所，燕京老校友、东荪先生的学生林孟熹曾直接向这位当年不离左右的校民私人助理发问："司徒校长在中国政局问题上，究竟最听信谁的意？""张东荪。"傅泾波毫不迟豫地回答。16但张东荪自己在1952年被逼作"检讨"的时候，说的是："因为国共谈判没有成功，对美国政府能接受司徒雷登这样的建议，根本不抱希望，也就没有任何动作。"

他的这一说解，其实在许多同侪之上。因为他的"不抱希望"指的是正积极活勧的司徒、傅泾波背后的"美国政府"而非北平的态度。他持如此见解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秘密档案还没有公布，没有可能确切知道当时美国的政策："美国的安全利益要求将中国置于苏联的控制之外。"17他这样想，大约源于1947年7月同当时的总统特使魏德迈会面时，美国方面对民盟切切给出的忠告所持的无知的轻慢。后来事态的发展，包括美国政府自己的自省，都证明了受到双重理念制约的美国，18与毛泽东这个游刃于儒、法、道、术，经千年之提炼而成就的"人精儿"打交道，有多么困难。

虽然处于心情况重的失望之中，对于老校长的托付，还须有所交代。到了夏天，在美国已经决定撤回全部外交人员之后，张东荪、罗隆基、周鲸文前往驻北平总领馆，为柯乐博（O.Edmund Clubb）送行。他郑重地托柯将自己这回"有负重托"的过程转告司徒先生。这时，他强调的是北平方面。也就是说，司徒，包括他们自己作为"第三势力"所期望的"以民盟来做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桥梁"这一"幻想"，在中国已经完全没有

实现的可能。

他们的赴约道别，发生在1949年初夏，没有打算也没有必要对北平军管当局隐瞒。而由于南北交通阻隔，他们与司徒间的信件往来都通过美国驻北平总领馆，总领馆也立即向华府详细报告，包括司徒所报："我已要求张前来，并深信他所掌握的情况将来我带回华府甚为有用。"

这封电文附有总领事柯乐博的帮助：

张说他已经向周（恩来）提出，占领上海之后，他需要前去看看。周已经批准张的建议。因此张暂定五月底或六月初动身。他……要求我告诉你如果他去上海的话，随后他会去南京看望你。

这里的"前去看看"，指的是在"左派"民盟人物已"紧随党的教导"去了香港、去了东北、又来了北平之后，他作为这个圈子之外，但仍受到共产党倚重的民盟中委，名正言顺地到上海联络张澜、罗隆基（其实其时史良等也在上海）。此行得到周的首肯。对此，可以理解为共产党对当时还具有相当份量与影响力的民盟"非左派"人士的关切，或许也含有周为了"非一面倒"，对他们有所倚重的意味。

后来，由于有国共两边的特工戏剧性地介入抢人、救人，张澜"投向党的怀抱"已成定局，张东荪南下已无迫切需要。司徒和傅遂收到张的回覆："妻子有病，不便远行。"林孟熹记得，这年夏天，他正听张教授的课，"并未闻师母有疾。"也就是说，上海解放前后，由于客观的或者主观的原因，张已不能或不便与美国驻华大使直接联络--虽然到了 6月18日，笃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的司徒，在致电国务院时候还说：

……我推测陈铭枢及其他人已北上参加北平之政治协商筹备会议。在返回华府之前，我将设法取得有关之第一手资料。张东荪也将是代表，他仍会经上海来南京看望我。

然而，对于司徒希望"带回华府甚为有用"的"他所掌握的情况"， 用不着亲自到南京，张东荪已经对柯乐博谈过了：

张昨天见到周恩来，后者特别在与外国贸易的问题上显示出能够接受的姿态。他（张）说像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这样的人，已意识到重建贸易和对外关系的需要，但尚未达到足以将他们的观念和判断加到比较下层的头上的地步。那些人是受另一条路线教育出来的。他强调他的信念：目前在如何对待美国的问题上，已存在一种向调整位置发展的

趨势，但共产党人行动得很慢。（电文附件）

看来教授对"泥腿子"们已经多少有些领教。但对毛泽东显然看走了眼，也不了解其下属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对毛的绝对服从。其实在对美关系这样重大的题目上，毛、刘和周会是一样的人么？"比较下层"的干部，干涉得了毛么？"贸易和对外关系"，包括与其息息相关的平民生活，在毛的考量里，又能占什么份量？

对张所说的"行动得很慢"的位置调整，司徒和傅，可能还有张东荪，都还没有彻底绝望。

5月底，司徒提出想到刚刚易手的上海。黄华反应相当正面：对"一名普通美国公民"的要求，按照"特殊情况"做了周详的安排。

6月2日，柯乐博致电国务院："……张宗炳在三次不同谈话中主动表示，相信共产党人终将会'接受美国援助'--这一重要政治判断，大家都相信源自张东荪。"

6月6日，柯乐博致电国务卿："张宗炳告知，周恩来最近对教授们的演讲中，说到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走铁托主义路线。张宗炳说此番解释不符合情况。据他父亲的看法，事实上，共产党人正在走这条路线。"

读史人现在已经清楚看出，张教授的判断，其实是在没有认清本质前，对"中国共产党人"书生气的赞扬：气节操守，兹事体大，"中共诸公"怎么会做他人尾巴？

在同一天（6月6日），黄华在得到批准后，主动约司徒（还有傅泾波）在外事处再度面谈，对原先谈过的（也就是毛规定的）三原则，不敢有一丝松口。司徒则就国际法向他的学生解释，在"中国没有一个新政府"的局面下，无所谓承认，也不能与尚有存在条件的旧政权断绝外交关系。更有甚者，第一次当大使的司徒雷登一点不具外交官常持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practical convenience）的灵活姿态，再次明确告诉黄华，承认与否，将视未来中国的政府里是否能够尽量吸收一些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而转移。20

读者此时可以想象，读到黄华发回去的报告，周与毛的感受--不同的感受。

对比毛此时的"原则性"，和他1944年在延安见美国政府代表谢伟思

时候的灵活性，可知他最崇尚的，本是实用主义。至于1949年初夏他所持的具有实用效应的原则性将落实到何处，详见后文。

在这个时候，苏联怎么想呢？据杨奎松研究，作为冷战的一方，它相当坐得住，对美中关系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竟没有丝毫的紧张不安：

这时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的整个谈判过程，几乎都是在斯大林的密切关注与建议下进行的。毛泽东不断地向斯大林详细地通报这种接触的最新结果。斯大林甚至明确认为：未来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如果能够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某种帮助，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21

斯大林的这一姿态，决定了毛泽东1949年春夏之交时所持的态度：姑且听你的，且耐下性子，一边"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一边等待转机。而在南京，勉为其难地当着外交官的教育家司徒雷登，与自己学生王汝梅（黄华在燕京读书时的名字）之间那场"鸡同鸭讲"式的接触，也就一直维持着。这会晤，引起了留在南京各国外交使节不小的议论。天性乐观并勇于行动的司徒，决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继续向前推进。

6月8日，傅泾波对黄华说：使馆接到美国副国务卿魏伯电报，希望司徒雷登"在返美前能够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获知中共方面的意见"。这一提议颇具可操作性。因为依照多年惯例，每到6月24日，司徒校长总是在临湖轩与燕大师生一起"过生日"。傅泾波希望黄华将此意向北平方面传达。如能成行（即得以赴北平面见周恩来）、校长"返美活动将更有力量"。

估计就在这前后，张东荪以及燕京其他能使得上劲的人物，如校长、总务长、教务长等也接到傅泾波的信，望大家齐努力，以促成此事。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至今未能白纸黑字证实的情况：6月1 日，司徒雷登接到一份由北平总领馆转来的所谓"周恩来密讯"，称中共高层领导在对苏对美方针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华府对此很当问事，不料覆信为周恩来峻拒。后世研究者认为这不过是当时西方报人（兼情报人员）对北平上层"有所闻"（外加猜测）之后掀起的风波。22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没有具体文件对此加以证实，但只要读过毛氏雄文，就知道在那一阶段，他确曾面对过来自"自己阵营"的质疑："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要做生意"，"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23正因

为这样的愿望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国内国外、官方民间，事情的发展，违背了众人的期待，反而为以后毛泽东重大的"一面倒"加了码。

行文至此，著者特别想提醒读者诸君注意属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中，常常发生在专权者身上的"偏执""逆反抗拒"性格：愈遭反对，强行推进的欲望愈强烈。综观毛泽东一生，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1959年庐山那次--原本打算反"左"而召开的会议，最后以反右大开杀戒。

再来说1949年的故事。

要求前往北平（循旧例于6月　24日在燕京大学过生日）的试探气球抛出，却得不到回音--也就是后来张东荪（在被迫检讨时候）说的司徒与傅"迟迟不能成行"。

6月11日，有三名人员陪同照顾的司徒雷登赶到刚刚"解放"了的上海，见到三百多位燕京历届毕业生，包括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盟友，比如章汉夫。司徒对大家说，在南京见到了王汝梅，他现在是共产党在南京的外交代表。十三年没见面了，现在与他见面交谈，还是和过去一样没有拘束。在后来的日记中，司徒雷登提到周裕康（燕京大学总务长蔡一锷的亲戚）告诉他："毛泽东宣称，我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6月18日，黄华主动问傅泾波，司徒访问北京的时间安排，有没有得到肯定的答覆。希望读者特别记住这个日子，因为就在第二天，6月19日，已经起起伏伏拖了半年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一事突然公布。

不仅在当时，就是很久以后，也没有几个人将这两个事件联起来想。后人知道的是，终于，6月25日，老校长接到现任校长陆志韦十天前发出的邀请信。陆志韦写道："昨天（6月15日）上午我见到周先生。……毛泽东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估计当局可能予以同意。"24--大家注意到了吧，到这时，北平方面有所介入的人士都在强调，虽然最早的安排是周做出的，但此时的决策者，已经是毛本人。

然而一封重要函件晚到这么多天，恐怕不是因为邮路尚未恢复。因为在这十天里，中共方面有了不少动作，以通俗的政治术语形容，就是一手硬、一手软，大棒、胡萝卜一齐上。在同意司徒北上的同时，6月19日，中共采取了自春天以来第一个针对美国政府的强硬行动，突然公布

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仅仅公布而已，依旧留着将来或不了了之、或再度升级的余地，这我们在后文还要谈到）；两天后，6月21日，毛特别就司徒有意访问北平一事对南京市委及华东局专门做批示，称不管他是否再提，在司徒雷登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25

6月28日，黄华正式通报大使馆：已获北平来电，同意校长的燕大行；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当傅泾波为抢时间，提出司徒雷登此时已是"衰弱老人"（七十三岁），无法长时间乘火车时，黄华也很有诚意地表示"如要乘坐（他自己的那架）飞机亦可安排"26--处于对立位置上的老同学相当默契，都尽力避免因细节不慎而毁掉全局。而细节安排到这一程度，已经是在重大决策上时时窥测圣意、如履薄冰的周恩来，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据林孟熹在九十年代中期与傅泾波的谈话，在接到中共方面传过来的信息之后，考虑到美国当时的舆论民情，以及院、会之间的分歧，比如不过几天前（6月25日），十六位共和党议员和四名民主党议员曾联名致信杜鲁门总统，要求他不要承认中共政权等等，依傅泾波的意思，大使应立刻出发，行到半途，也就是想要阻挡也已经来不及的时候，才依照规矩请示。但信奉主，而且终生不打妄语的司徒，爱怜地骂了他这半子、半助手一句："You rascal"（小玩闹），于6月30日，将此局面正式电告国务卿艾奇逊：

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的更好了解……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与中共领袖进行非正式谈话的唯一机会。此种机会可能从此不再。这将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行动，显示美国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的开明姿态，并将可能令今后中美关系获益。

历史机缘往往就是如此不巧，据傅泾波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分析：处置该案，本属国务卿职权范围。如果当时美国有一位强势国务卿，而不是比较弱势的艾奇逊，在接到司徒报告之后，完全可以立即拍板，不必请示总统，拿到国会去讨论。可惜……

接到司徒雷登的报告后，美府院双方立即进行紧急磋商，结论是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造成美国即将承认新中国政权的错觉，并在国内引起反对派的攻击。于是，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即将启程北上的驻华大使，接到国务院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后来的研究也证明，就算不论强势弱势，国务卿艾奇逊远不是一名如英国凯南那样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得以挣脱"基于意识形态的道德要求"而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27

傅泾波不得不将"请示"及驳回一节，如实通报黄华。事实上，根本没等到美国方面的明确回应，中共中央已明确表示，从我们已经同意之后你还要再请示的6月30日起，对于司徒雷登来北平问题，不再有任何兴趣。毛泽东在对他的同僚做了有限让步之后，等到了自己的机会：难道是我们共产党人在主动邀请你么？这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毛泽东以自己的风貌出场--《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当日发表，28 "一边倒"正式出台：别再梦想什么铁托的第三条道路！新中国将义无反顾地倒向苏联！至于什么"真正容纳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对不起了，用不着你们多嘴。我们要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例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29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自己，以及自己的长辈、亲属、朋友、熟人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从人民民主专政到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共在代表入民对自己公民"实行专政"的时候，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其帮凶们"的界定，有多么的随意！

将黄华派到南京的周恩来，在这样重大的时刻，必须显得更愤怒、更决绝才行。据杨奎松叙述：

周恩来电称：司徒雷登去燕京及希望与当局晤谈，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事实上，同意司徒雷登前来，也只为分化美蒋，"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30

到8月2日，司徒雷登"挟起皮包走路"了。8月5日，就在他抵达珍珠港的当天，《美中关系白皮书》发表。一周后，8月12日，新华社（我们已经知道，其实就是毛泽东）在接下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撰五篇评论，"对白皮书进行透彻的分析与批判"，其态度之峻刻、用语之刻薄、行文之一泻千里，为受尽了委屈与蔑视的中国共产党人吐气伸冤之酣畅淋漓，外加对美国的仇视、疏离与无知，不仅在政治，甚至从文化与文学层面，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毛的笔下，司徒雷登，外加张东荪、罗隆基们，成了这个样子：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31

综观中国外交史，似乎未见有人撰文论述，一个主权国家，应否由笔力雄健的领袖，如此恣意地抒发郁闷于胸中的怨与恨--完全不顾如此激扬文字，是否会给他国政府造成"蓄意激怒"的印象，32而为以后的外交操作造成障碍，乃至悲剧性地改变历史走向。不错，一个巴掌拍不响--你美国是怎么对待我们中国人民的？33但综观《美中关系白皮书》，其中虽然有对中共的不恭之处，但主要内容还是检讨他们自己错误的对华政策，并拿腐败无能的蒋介石问罪。作为主要靶的，蒋介石反应相当平静，只例行公事地发表了一个语气平和的抗议声明，而本应对这样的检讨表示欢迎甚至加以利用的中共方，却是出人意料地激烈。怎么回事？

近年来，美国检讨该阶段自己作为的文字，以及中国的专家研究美国政策的文字，已如汗牛充栋。但对毛泽东此刻的借题抒发，以著者之有限阅读，只有他自己的评价与事实最为接近。这就是在国门给关上二十多年终将重新开启之时，这人半仰在沙发里，对来访的尼克松说的那句直将翻译打翻在地的话："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34

从后来被歌颂为"秋收起义惊天地，文家市上军号响亮"的1927年到

中共"七大"，历经十八年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毛泽东在共产党内正式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了"无法无天"的资本。但是，从本质上讲，这名出身农家的师范生，就其心理定势而言，依然没有脱出埋藏很深的追逐实利之心机。究竟出于何等样的实利考虑，使得他不仅不为数十亿美元经济援助所动，连靠山斯大林的劝说也敢置之不顾，坚决与美帝所崇尚的文明决裂？五篇洋洋大评，对他而言，仅为满足一时之快意？

如果我们将此前此后发生的另一件事，一个看似没什么直接相关的案子--"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案"的处置，放在一起想一想，也许能找出破解的线索。这就是始于1948年底，经几次反覆，拖了近一年方结案的"华德间谍案"。35

对于"美帝以金钱为诱饵，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中国内政"，毛泽东忍到这时候，已经够了。就算没有在他看来纯属装模作样的"司徒请示"以及《美中关系白皮书》的刺激，他也迟早要与"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彻底翻脸。

6月19日，中国方面奉毛之命，公布"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

五天后（6月24日），毛泽东决定将此事件升级，亲自批示公开广播题为《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6月30日，按照"好"、"坏"记者的原则，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并决定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据杨奎松研究，这一决定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的，短到来不及具体通知中共东北局，短到来不及研究是否应当追究华德等人的间谍罪责--今天的读史人已经很清楚，这样做当然有目的：为《论人民民主专政》造势。

细心的读者此时一定已经注意到了，这正是陆志韦获得授权发信给司徒，但那信却可疑地滞留在不知什么地方的那十天；也是张东荪说的他"迟迟不能成行"的那十天。

我们知道，从1941年到1949年，美国政府支持的，一直是毛的死敌蒋介石（对毛而言，日本侵略者还在其次）。"迪克西使团"到延安的时候，毛之热情表现空前绝后：主义可以放在一边；"共产党"三个字也可以不要。无奈，寄托了巨大期望的援助依旧未到，希望再次落空。到了1946-47年，美帝国主义凶相毕露，军事上前所未有地大力援蒋，就差亲自放枪了。结果如何？如今我自己抢回了江山！坐在金銮殿上的，已是

我共产党人！这回，想要用我对付苏联了，是么？

这累积了八年，累积于两场大战中的气，自不待言。但毛什么人？记在肚子里几十年的仇，爆发前一分钟你都察觉不出来。

他怀着高度戒惧，在苏联粗心浮气的指示，周恩来小心翼翼的怂恿推动下，与美国发生接触。他牢记曾经受过的创伤，谨守着七届二中全会（当年3月上旬召开）制定的自卫之底线：尽管美国人想承认我们，我们却不忙于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关系，而要特别警惕帝国主义"内部破坏"的阴谋。用毛的话说，就是防止孙行者钻入牛魔王的肚子捣乱，而"孙行者即美帝是也"。

有这样的想法垫底，他同意黄华前往接触，"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从黄华发回的报告里，他知道自己的戒心确确不是无的放矢：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广泛吸收"开明的民主分子"参加--这难道不是要干涉中国的内政？南京市委当时就对司徒雷登这段话做了生动解说："联合政府内应吸收美帝走狗"。36

但广泛吸收开明的民主分子参加政府，本是1946年马歇尔特别使华，希望迫使蒋介石政府接受的条件。所针对的，是中国这个大国里边的专制独裁，无所谓国民党或者共产党。中共当时对此不但竭诚拥护，还作出若干相当智睿、大度之举措，以促其成功，很有成熟在野大党的气概。而台上的蒋介石，则以或虚与委蛇、或翻脸不认账，迫使美国政府"知难而退"。

从来国共两党，因为同为党国专制，总是在不同形势下"反之亦然"。但到了1949年，在冷战的大背景中，毛泽东心里清楚，绝对不会再出现一个属于他的"红色魏德迈"了 。

毛泽东对美帝的警惕，并非始自黄华报告。有据可查的是，早在1948年底〔12月4日），正当三大战役血肉横飞之际，不知从哪个渠道发回来的一则"谈话材料（说是从一个美国记者那里获悉）"，引起他严重注意：

美国国务院现政策之中心，在于如何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美国则在某种方式下承认新的联合政府，恢复与中国贸易，对新中国投资，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统一战线，竭力支持联合政府中之非共产分子。美国承认联合政府的条件是政府的构成须

为美国可接受者，联合政府得承认美国海军、陆军在上海、青岛等地的基地权。

毛将此"传闻"批送全体相关中共要员（刘、朱、周、任、彭真、胡乔木）："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37

而当被周派到南京"侦察对方意向"的报告发回，美帝"赤裸裸地打算在新中国政府里支持民主人士，以抵抗共产党之政治攻势"这样一个阴谋坐实之后，毛泽东的基本国策一锤定音：对外，"把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成自己头号敌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且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对内，则把试图钻进牛魔王肚皮的美帝代表，一个个收拾掉。

作为一个大国至高无上的统帅，他正面临一场新的战争。在这场如何"造福"他的子民的战争里，他的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新的、凌驾一切之上霸主地位的主要威胁，已经不再是王明，不再是张国焘，不再是蒋介石和青大白日旗下乘战机、驾坦克的百万大军，而是有帝国主义在后边撑腰的民主个人主义者。38

对这个大小毛猴，伟大领袖向有他的一套！"自由主义者"或谓"民主个主义者"么？管你西装革履，管你长袍马神褂--他的战场，不见销烟、不见升旗降旗、不见合同条款，他将直戳心灵。好名的，好利的，好面子的、好风雅的……你总有一好吧？我就斗你那一闪念，让你从此规规矩矩--什么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清除干净，从此绝了你美帝的望！

在1949年炎热的夏大里，张东荪忧虑地注视着自己自己曾经寄希望的共产党人--怎么突然间换了一副面孔，从西柏坡返回，面对着新中国（同时也包括他自己）的"大好形势"张东荪倒"消极"、"苦恼"，也从此枉担一生"反对一边倒"的名誉。

其实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看透：他不主张"一边倒"，觉得仅从常识判断，也不该有这样的外交方针啊，这不明明加剧冷战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么？他在这里真是低估了毛。这名将自己列位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上的师范生，想的远不止此。这雄才大略的共产党领袖，最讨嫌的，是"有人干涉他的内政"：干涉他从农村征粮，干涉他发动政治运动，干涉他清洗异端……。为什么要"一边倒"？套句《红楼梦》中的名言，人家苏

联就从来不说这样的混账话。

在有可能被看做"孙悟空代表"的人里面，也有明智机巧的。在毛泽东确立"一边倒"的关键时刻，民建39表现突出：《白皮书》发表之后，新华社第四篇文章还没有发出，黄炎培上席已亲自撰写了一篇《我对于美国这份白皮书的看法》，接着民建以党派组织的名义对美帝予以斥责的声明：《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出现在《人民日报》上（8月24日）。声明特别敬告《白皮书》作者：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毛泽东极为高兴，这正合了他几天前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断言：

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40

毛立即函告胡乔木：这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文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他本人则连续（在两天里）致信"任之先生"：

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

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41

美帝若想把民主自由的希望寄在以民建为代表的工商、文教人士身上，是没什么戏了。

与美帝决绝后，中共一手包办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数量可观的开明民主人士给安放到直令革命老军头跳脚怒骂的高位。1949年10月1日，新政权决定向世界公布刚刚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单。感到由衷高兴的张澜，建议同时公布五十六名委员--"让全世界看看我们的阵容"！当时没有人想到，或者想到了也没有胆子指出，这阵容会

持续多久。

"一边倒"在红旗与热泪中收场。开国大典只有四名外国记者到会：苏联一位，意大利一位，朝鲜两位。在紧闭的大门里，毛泽东完成了他的镇反、肃反、统购统销、工商业"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外国政府就此干涉，也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就"反文明"或"反人类"罪对他予以正告。大门里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呢？

注释

1、澳洲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历史及文化专家白杰明（Geremie　Barne）有言：如果毛泽东这时候（1949年）得暴病死掉，定列位世界公认优秀领导人物。

2、林孟熹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一书里，对本书主人公曾有"一向惯于周旋于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定评。此说或许可以看作张东荪在危难之时介入政治运作时候的风格，而非喜交朋友、爱热闹的习性。

3、1946年后，《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继出版，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建立起哲学体系的思想家"（郭湛波）。

4、同注2，页67。

5、张伟：《1949年，司徒雷登差点到北京》，《环球时报》，2002年7月8 日，第十九版；黄正瑞：《台湾问题面面观》（北京：台海出版社，2004）。

6、"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参见阎人俊译：《在中国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香港：求精出版社，1955》。

7、陈铭枢于上海解放后的6月初启程，并特请美国驻华使馆为他准备一套有关"美中关系及美国援华之事实材料"。陈在北平交流材料，并获

得毛、周等接见--但也就是接见而已。7月，陈铭枢返回南京，带回毛、周的答复，称中共既定原则是美国必须停止援蒋，容忍中共结好苏联，才能同美国进一步谈判。参见薛瑞汉：《1949年司徒雷登滞留南京与中美和解问题浅析》，《世纪周刊》，2004年8月27日。

8、埃德加·斯诺：《中国将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吗？》，《密勒氏评论报》，1949年4月19日。转引自杨奎松：《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六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预测》，《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

9、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0、郝在今：《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曰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1、在1949年10月之前，几乎所有美国在华情报人员和外交官，都怀疑中共建政能力。司徒雷登认为，"国民政府可以给中共造成更多的困难，包括带走全部档案和撤退富有管理经验脸的政府人员，就足以让从农村出来的共产党人员难于适应城市的生存。"参见杨奎松：《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六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预测》。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492。

1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499-500。

14、转引自注9 。

15、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页57。

16、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页166。

17、参见注11 。

18、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19、此八个字，见《司徒雷登日记》手稿第一册最后一页结尾处中

文手书。

20、转引自注9。

21、同注9。

22、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

2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1473-1474。

24、杨奎松对此节的描述，虽然日期稍有出入，但基本事实并无差异：6月27日，傅泾波携来陆志韦16日给司徒雷登的信，称毛泽东已宣布你来访燕京之意，事实上这也确实是毛泽东的意思。参见注9。

25、《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转引自注9

26、也有研究说：司徒雷登接信后，以返美行期迫近为由，要求早日去北平，并希望他乘留在南京的美国飞机前往。周恩来指示允许司徒雷登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他如来京只能坐一卧车，派人护送，不能许其乘美机来平。参见张业宝：《毛泽东为何写＜别了，司徒雷登＞》。《大众网》（2006年5月24日）

27、参见注18。

28、官方论说披露，6月24曰下午六时，毛泽东曾给胡乔木写信，请他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胡乔木的稿子写出后，毛泽东没有用，自自己重写了一遍，这就是毛泽东说过要答覆张治中、张澜等观点的文章，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29、同注23 ，页1473、1475。

30、转引自注9 。

31、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载《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页1496。

32、同注18。

33、此处"中国人民"在毛的心目里，最大可能是他自己。参见中美

关系史学者们有关1944-945年"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的叙途：迪克西使团"鉴于作战上的最高需要，……传统对华政策的原则（即仅支持非共产党的国府一一著者按），不得不改变，以适应一个前所未有的局势"，意欲支持中共这支抗日力量，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受到同志加贵宾之接待，但最后毛期待的访美面见罗斯福却终成泡影。

34、进入七十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和中苏战争的压力，迫使毛泽东向"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尼克松访华，缓和中美关阕系，意图结成中美反苏同盟，来顶住苏方咄咄逼人的攻势。1973年2月基辛格第四次访华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了著名的"一条线"战略的设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条线），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国家（一大片），整那个"王八蛋"（指苏修）。可见苏中两国的关系已经与交战国相差无几。当时翻译没弄懂伟大领袖此处文采风采兼具的调谑，将"无发（法）无天"直译为"不见天的光头"。

35、1948年11月15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接到沈阳军管会通知，令其将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在三十六小时之内送交保管。通过公函往来，华德根据此前中方的符合外交规范、甚至堪称友好的态度，请求"准予继续使用"。不料几天之内，不仅器材被没收、领事身份不被承认，还失去了人身自由--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供应也被全部切断。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其实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应苏联驻军之请，将美、英、法留在沈阳的领事馆"挤走"的策略。随后，在中央的开导下，他们又将自己的行动调整为"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对英、法则稍微缓和些。没想到军事形势的发展，出乎意料地快。到月底，考虑到全国胜利之后可能与美国建交，华德的软禁状况好转。就在这时，一起重大间谍案在东北破获，据称全部为美国特务，并直接由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提供装置、经费及领导--虽然至今未见确凿证据。华德此后依旧被软禁，但毛泽东手里多了一张牌。1949年5月中旬，美国政府表示将关闭沈阳領事馆，中共方面也没有具体考虑是否要追究华德等人的间谍案责任问题。到6月初，东北局对于华德等人的软禁相当放松，华德本人已得到沈阳当局的认可，并且开始做闭馆和撤退的准备。突然，6月中，毛泽东通过直接与间接的方式，向希望到北平的美国大使传达"可以"之信息的同时，发布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从事间谍活动案"。参见注9杨奎松文。

36、转引自注9。

3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410-411。

38、艾奇逊在《白皮书》中预言"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成为改造社会的有效力量"--"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39、民盟元老、第一任主席黄炎培，虽然没有完全退出民盟，但1945年底又成立了自己的活动平台--中国民主建国会。

40、同注31。

41、《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333、335。

四 天凉好个秋：民主个人主义者

《白皮书》提出寄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们是谁呢？最容易想到的，可能是经首次"行宪"而当选为副总统的李宗仁。事实上，在《白皮书》发表后，美国公使曾主动拜访他，李宗仁立即投入实际活动，有意成立由美国政府支持的、居于国与共之外的"第三势力"，哪怕暂时在异乡。不过，这一努力很快就胎死腹中。至于著名的自由派民主人士如胡适、傅斯年、张君劢，也已纷纷离开故土。

留下的民主党派人士呢？对即将建立的政权，他们会有些什么作为呢？

综览1949年还存在并活动着的"第三势力"，其成立有早有晚、与新的当政者渊源有深有浅、组织之间也有分有合。组建的初衷，也大都是反对一党独裁。究其较有影响力者--青年党和民社党，因"立宪和行宪国大"，已经倒向国府；它们之外，有在中共敦促下凑数的；有些口气虽大，但号召力有限的……；真正居中且成气候的，似非民盟莫属了。

1949年的民盟，既不同于1941年作为第三势力党派联盟（名字也是"民主政团同盟"），也不同于1946年政协会议时，有自信、有承担的民间多元利益代表。那时，它居于国共中间，虽然没有一枪一卒，却以言论和无时不在的影响力表现自身份量。究其缘故，第一当推有美国在后边撑台；第二是国共当时都想拉拢（而非灭掉）他们；第三，他们赶上了古老中国千载难逢的机会：世界性民主潮流的胜利，批留洋学子返回并身居要津（他们起码不会动不动就抄家伙，"给老子两个连……"）。用我们的主人公张东荪的话说，他们"接受西方文化虽只有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自由胸怀的陶养'。"1

这些好不容易汇集在一起的因素，在大战结束、众生期盼和平的时刻，居然使得这个千年专制古国，鲜见地透出一丝生气：正当的言论不仅可以发出，还能让虎视眈眈地握着枪的豪强坐下来听。和今日文教名流们相比，其发言人考虑更多的，确是国家民族而非自身得失升迁。

张东荪一直是民盟中常委兼华北地区总部主委。1946年梁漱溟担纲调解和平失败辞去秘书长之后，他还曾勉为其难并且毫无作为地当选充任了几个月。到1947年夏，国共和谈破裂、国府发布"动员戡乱令"，民

盟因为明显的反独裁倾向而显得靠拢在野党的中共，最终被老蒋定为"乱党"而且开了杀戒。当此危机时刻，本以为可当作靠山（哪怕精神与舆论支援）的美国使馆，明确表示"不便干涉"。为了盟员的人身安全，主席张澜在11月忍痛宣布"自动解散"。

1948年1月，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2等，怀着愤恨与理想，通过中共的鼓励外加具体安排，逃亡到香港，坚决拒绝蒋帮的反动政令，召开民盟里程碑式的一届三中全会，成立起了临时总部--没有主席参加（张澜在上海），人员也不够法定人数。临总号召盟员"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坚决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积极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的武装"。3如此气血贲张，毛泽东只淡淡地评说道：

将自己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某些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的突然的攻势之下，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事实证明：经过此教训，民盟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了。4

所谓"主动"，以未参加该全会的民盟非左派人士看来，自己的组织，正"从一个走所谓第三条路线的中间派，逐渐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民主党派"。5

张澜是什么态度呢？民盟文件信誓旦旦，说沈衡老行前曾与他密商。但从表老没有应他们之请，写"代表授权信"（同时在上海的史良就写信请沙千里代、吴晗也请千家驹代），说明张澜、罗隆基，估计也包括本书主人公张东荪，对这一猛打舵转向之举措，尚持观望态度。该全会激烈的反蒋、反美声明，张澜似同意前者而对后者有所保留，6但在民盟官方出版物上，则有这位主席"提出倾向中共一边的口号是及时的"一说，可惜未注明出处和时间。7不管怎么样，作为民盟威望最隆，而且是主要筹款来源的前主席，他还是不止一次，命叶笃义从民盟基金中为临总诸公汇寄活动经费--这或许是民盟机关最后一次花自己的钱了。

1948年秋天，在周恩来、潘汉年的安排下，这批民盟"左"派领袖，按照党的计划（包括共产党出资、通关节、租赁外国货轮），从香港到了东北解放区，"共同筹备新政协会议"。第二年，"民盟总部"抢在共产党前边，3月5日就迁到了"人民的北平"。抵达第二天即致函张澜--没有这名"圣人"出任主席，别说对绝大多数盟员，就是共产党那里，也是说不过去的："本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已于5日在北平宣告成立，盼早日命驾来平，参加领导。"临时工委二十二位委员中，没有张东荪--他本是民盟

元老，直至那时为止还是头面领导，而且当时人也在北平。此中原委，未见民盟官方史家撰文披露。究竟是"左"派们匆忙间的有意疏忽，还是他们邀请（甚至推选） 了张东荪，而这位教授因为意见不同（比方说，临时工委一成立，即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愿以至诚接受贵党领导"），而予以婉拒？

电报是发出了，可惜"住"在虹桥疗养院的表老，已经处于军统监视之下。

5月下旬，上海被攻克。北平这边立即通过潘汉年向张澜等人转达"请即联袂北来，主持四中全会，商订本盟今后决策"之诚意。8这回落款人里有了张东荪，排在民盟北平五要人中的第四位。张澜立即回电（6月1日）："沈衡山、黄任之、章伯钧兄转民盟临工会公鉴：各电敬悉。盟员中有数人遭难，弟等平安脱险。澜、努、良、沈同叩"--收电人里没有前发电人张东荪。这显然不是为电报省字，也不是上海方面的大意。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以罗隆基之精明，准是刻意将没有到香港、不是北平"临时工委"成员，也从未表态同意一届三中全会声明的东荪先生，从"那路人马"中分出来。

收电人里也没有前发电人中的第五位周新民。在罗隆基看来，他算什么盟员？根本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周则大度地对罗这种无原则的爱恨情绪 化不予计较。据章诒和文，反右之后，盟中"左"右两派（此时章伯钧已经从"左"派给划到右边去了）在一家西餐厅不期而遇，罗与"打手们"怒目相对，"左头儿"胡愈之（1933年共产党员，当时的民盟副主席兼常务秘书长--章伯钧反右前的职务）装作没有看见，周新民则踱过来与他们一一握手。9

北平上空飘起红旗，在经过生死的大起落之后，在共产党打下的地盘上，两路人马又走到一起。张东荪此时的位置，只能用"微妙"二字概括了。比如到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的时候，民盟七代表中本有中常委五名。但在真正有点实权的筹备会常委会里，却没有了主席张澜、罗隆基和张东荪。荣列常委并与毛主席光荣合影的，是沈钧儒和章伯钧（他们在七代表中排名第一、第二 ，主席张澜第三，张东荪第四）。

细究大家在此前一年间的活动，或许可以对上边说过的"小动作"予以索解。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后边有共产党直接介入的"大动作"。

就在国共内战的大局基本已定，沈钧儒等联袂乘船北上的时候，同

样怀着对新中国的期待，张澜等留沪中委对即将执政的中共说的，却是另外一番话。也就是后来几乎把经手者叶笃义吓个半死的那封罗隆基执笔的"致中共《建议书》"。10据叶笃义记忆，其主要内容共有四条：

1）内政上实行议会制度；

2）外交上采取协和方针（即对美苏同样友好）

3）民盟有退居为合法的在野党的自由；--著者按：这是相对于国民党政府以"贩毒"、"通共"等罪名，曾对其实施过的政治压迫。此处重提，可能意在对即将上台的中共防着一手。不错，中共后来的确没拿这种低级手段去消灭民盟。民盟自愿置于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故事（从1947年至今），只能证明，比之于捧读《圣经》和《曾文正公家书》的老蒋，毛实在是技高一筹。

4）盟内共产党员应公开身份，党员和盟员避免交叉。--著者按：这是无论公开还是私底下，都拒绝共产党或显或隐的领导。11

也是在这前后，在马寅初离开上海到解放区的时候，张澜送行，给出两条意见特别请他转告中共：

1）用人唯贤而不要用人唯党；

2）"共"字上面必须还有一个"中"字。言外之意，绝对不同意中国第一执政大党是哪个国际的支部。12

那时候报纸13上还出现过这样的报道：张澜表示希望毛泽东成为中国的铁托。14

对于革命，包括武装化的政治，终生竭尽全力保护地方与平民利益的张澜曾经说：

一旦社会主义之潮流汹涌澎湃而来，盲动盲从，徒袭社会主义之名词、揭社会主义之旗帜，而肆行其掠夺杀戮之惨，其祸之广延迅捷，为有十百倍于近年之以土匪而冒护法靖国之名荼毒地方者。15

所以，中共夺得政权奠基之举的"三大战役"，在表老眼中，无疑以数百万生命和刚刚得以喘息的民间活力为代价，是不会有什么好印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不仅中共，连他的在沪中委都一直催他，但他一直拖

着，不肯去香港，也不肯去哈尔滨，直到军统毛森把他抢到手，准备塞进驶向台湾的船里--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周恩来直接策动"戴罪立功"的特务，在最后一分钟将他夺回党的怀抱。

被夺回之后两周，张澜抵达北平，周恩来、还有"他的学生"朱德接站。总司令上来就是一个军礼。毛泽东第二天到他下榻的饭店拜望，当晚家宴恭候。

这是张澜。张东荪呢？

从西柏坡回来后，他没离开过北平。他本该很忙，很张罗，很兴奋才是，但是，从春到夏，竟然是从未有过的无精打采。

去西柏坡前，他曾经应邀出席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与会者多为燕京、清华和北大的教授：许德珩、章友江、袁翰青、雷洁琼、吴晗、严景耀、张伯驹、闻家驷、樊弘……依惯例，东荪先生为座谈会开场，也如往常那样，对时下大家最关注的题目发言。他没有回避，但只说了短得不能再短的几句--要么在敷衍，要么教授自己也正糊涂着：

今天知识分子在中国问题并不严重。所以有问题，是社会有了变化之后，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上也将有变化。

以后的问题，不是人家对知识分子怎样，而是知识分子本身对国家如何贡献，以及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譬如在心目中想像一下将象的社会，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自己就决定以哪种知识来贡献，这样做自会心安理得。作为发起的话，简单如此。

不能说通篇无一句肺腑之言（像他惯常那样），但对照不久以后执政党把知识分子放在砧板上的架势、希望他们既跟党走又"心安理得"，怕是高得离谱的奢求了。

讲话记录发表在当月的《中国建设》，并依惯例出了小册子《知识分子的新方向》。16封面上，张东荪名列第二，压轴的一篇已经是时新人士对苏联的介绍：《新知识分子的理论与实际》--自此，上海营造社的《中国建设》遂成绝响，成为北洋时期以来，中国出版自由可怜的尾声。

而不过三个月前，在他应清华学生之请，到校作题为"双十谈国事"演讲的时候，却是那么清醒、犀利。那大他谈的是革命，不仅因为"双十"本

是革命纪念日，即将到来的共产党的革命，也让所有（非地下党员）的学子既兴奋、又好奇。张教授并非一概反对革命。他认为"社会不公到了一定程度，改良又无法推行的时候，革命必发生。究其所以发生，与其说缘于革命者，毋宁说在于被革命者"。17

这回，在"革命胜利"即将到达之时，他希望青年们有清醒的判断。在列举了自辛亥以来中国发生的一次次"革命"之后，张教授说：

三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换朝代也不知有几十次。如果这样的换朝代也算是革命的话，在这三十多年中，命也革过几次了。袁世凯被革之后，张作霖、吴佩孚不也都被革了吗？国民党的革命与历史上的革命完全一样，吴稚晖先生就曾说过：革命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我看这是不对的。既然是革命，就要拿得出自己的一套。土地改革也罢、其他也罢，总要拿出自己一套本领来。在这种打倒你、我来干的政治中，民主是无从谈。

对于革命的认识，要打倒假革命，才有真革命。革命就是要使中国走上一条崭新的路，绝不是历史上任何的旧路。

盟中之"左"派呢？什么是他们心目中"崭新的路"？沈钧儒1927年刚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就已和中共早期党员宣中华等密切合作。后世据其做派，赠送给他的那条"比共产党还左"的雅谑，早在当时就当之无愧了。18后来，从1936年的救国会、到1939年的国民参政会（在1941年时跟着共产党不出席）、1946年的老政协、1947年的国民大会……若说沈钧儒、史良诸同志之行止，唯借赵树理之妙言不足达意："中共说长，盟'左'说不短；中共说方，盟'左'说不圆……"，包括戏剧效果极佳的"交红心游行"之类行止。19只可惜"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这一确评，直到1963年1月2 日，在敬爱的周总理为他做八八米寿的时候才郑重赠给他。

至于章伯钧，无论从其青年时代的经历（恽代英、萧楚女志同道合的同志，由朱德介绍入党）、其学养〈专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其感情色彩浓烈的反蒋、作为国民参议员在延安的表现，20四十年代后期与中共之珠联璧合，21还有"建国"之后的名利双收，包括得知被定为头号右派时候所表现出对党的体贴和谅解（"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22），以及"老毛"对他从来没有像对真正党外人士那样"多礼"……仅定位为中共赋予实权的头号民主人士都不够了。整个一个"光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呀。

至于史良，我们只须对比一下她正式发表的、其八股气无人企及的著作，与称她"史阿姨"的章诒和对她音容笑貌之描述，就知道政治将人异化并分割，能到多么匪夷所思的程度。史良担任司法部长，正值上百万人惨遭冤杀的"镇反"、"肃反"，她有过什么作为？紧接着，完全违背政协《共同纲领》而且毫无法律程序可言的"五反"（我们权且把"三反"看成中共内部整风），就算不敢抗拒，可曾有过哪怕一、二进言？有明确记载的倒是，在1957年6月14日民盟中央的批判会上，她曾以法学家的资格，认为储安平的言论"有罪"。作为女性政治家，我们只希望她在对中共政治无甚大碍的《婚姻法》上，有些说得过去的业绩（著者眼下还没找到）。

这些深刻的、融入血液与意念的区别，外人难于区分。李宗仁代行总统之后，积极谋和，最看重的第三方面人物，是李济深、章伯钧和张东荪--特别发出电报，邀请他们三位去南京。23当然为共产党所阻止。

民盟"左"派来到北平--如今当然用不着张澜筹款了。经费哪里来呢？据杨尚昆回忆，关于共产党党务活动，可否"依靠党产收入和党员党费，而不吃国家"，还真有过不那么霸道的提议：

当时经营党产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进北平前，要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任弼时同志和朱老总提出：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受到大家的重视。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分析利弊，毛主席在会议结论中明确作了结论：对待民主人士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他们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后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向他们帮助就是。24

不仅吃（共产党的）国家饭，连办报的钱党都打算包办了25--民盟还能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路线么？在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共产党给了民盟十八个代表名额，大权控制在组织部长章伯钧手中。论功行赏在即，民盟里边的派系纷争，从原本正当与正常政治见解切磋，滑落到人事纠葛之下流--无权的非左派也得"扎堆儿"了。据章诒和叙述：

这个"无形组织"的宗旨，用罗隆基自己的话来说，它的"主要对象是章伯钧，是不让章伯钧独霸民盟的组织委员会。"而此时，代表第三党的父亲又是与救国会的史良亲密合作。于是，民盟中央内部便形成了楚汉相争的局面。一边是章史联手的当权派，因统战部的支持，他们自命为左派；一边是罗隆基、张东荪为首领的非当权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

由主义者色彩，被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右派。而民盟领袖沈钧儒、张澜，针这两派也是各有侧—重。这个情况，别说是具体管理民主党派的中央统战部，就连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心知肚明。一九四九年，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周恩来拿着民盟出席会议的名单，都是先和沈钧儒、章伯钧商量，再与罗隆基、张东荪讨论，而决不把这水火不容的章罗两派搅和在一起。因为周公知道：他俩碰面只有吵，什么事情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26

叶笃义说的也大同小异：

我到北平的第二天晚上，罗隆基就约我同到刘王立明家谈话。……张东荪当时也在刘王立明家。当天晚上罗对我说，我只弄到一个候补代表，还是张东荪和他力争出来的。张表老没有替我说一句话。他还说沈钧儒和章伯钧各有一个小圈子，而又互相合作，我们盟内一些无党派的人应当彼此多联系，否则一定处处吃亏。我听了这一席话非常动容。于是以后经常不断地到刘王立明家碰头。……

小圈子第一个集中谈的是政协及政府人事安排问题。张东荪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心满意足了，把政协委员让给曾昭抡。罗隆基看到章伯钧和史良当了部长，而他没有当上，满腹牢骚。周鲸文想当政务院委员，我想当副部长：：除了张东荪而外，其余的人都为自己的安排不满意，而认为自己在盟内受了排挤。27

张东荪的确介入了这个"小聚会"，确实将政协委员让出来，也的确曾为叶笃义的代表资格而力争，但若说他得了赏赐即"心满意足"，恐怕是最终成为共产党员28的叶家老五，对这个他曾经出生入死协助工作的盟内前辈最大的误会了 。

其实，在为自己的地位，还有为共产党是不是"生了我的气"等忧心的时候，叶笃义对张东荪还是有观察的：

罗隆基重视人事，张东荪却不感兴趣，他对政策和国家中的名位都无所谓，而想的是可能变天和第三次世界大战。29

除此以外，张东荪—直忧心于士或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职责，更为他的同侪难过：

知识分子今天已分化了，直成一个五牛分尸的状态。所以分化的原因乃是由于各人太思虑自身的利害而把大局的利害置于次要之列，或竟

置于脑后。

什么是大局？除了前边说的中国将走上崭新的路、世界大战等，梗在他胸中的、是私兵传统深厚的中国军队--平民膏血供养、党酋私倚为至宝的枪杆子。他认为：

中国自有历史以来，军队只是为帝王打天下的，从来很少有替民族全体来抵抗外来的侵略者，即偶有之，也总是战败……中国今后的安全，仍是托命于国际的安全保障理事会之手。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大胆主张中国没有保留巨额军队之必要。换言之，即中国的军队既不能单独作战以抗击侵略者，则其用处至为有限。不妨彻底裁兵，而改为国民征兵之义务教育，使每个公民皆有军事知识，一旦有事即听从国际军队之指挥调遣。至于在本国既决定实行民主政治，想从政治上得着一个永绝内战之道，则决无军队分省驻扎之必要。即军分区亦可不必。……军人当以其军事上的学识而见重于社会，不必拥有军队。于是军人便与政治不发生直接关系，使其不为任何人争地盘与打天下之用，不做拥护某一人某一派的工具。必须如此，中国方能上轨道。

此番言论，在执政者依旧坚持党指挥枪，明确反对军队国家化的今天，不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后来，叶笃义被任命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上班拿工资）， 与党走得愈来愈近。依曾昭抡看，是"得到了党的信任"；用罗隆基的话说，是"党内有人缘"。这名老资格的小字辈则反过来替老伙伴们着急：

解放后我一方面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党的信任，一方面觉得罗隆基、张东荪同章伯钧、史良比起来有些像扶不起来的阿斗。……我经常劝罗隆基多同统战部接触，借此同章伯钧、史良竞争。我经常劝张东荪多写些表示态度的文章，怕他的消极态度惹起党的不满。30

但张东荪不仅扶不起来，还不吃"扶"。

在6月底7月初，文化学术界"组织起来"的时候，随着新法学、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纷纷成立，新哲学研究会也召开了"发起人"会议，讨论筹备会的组织章程和暂行草案。主席是老党员李达，三十年前"社会主义论战"的对手、《张东荪现原型》作者；副主席是延安来的艾思奇，十四年前"辩证唯物主义论战"的对手；此外倒也延揽了一位研究康德的郑昕。这个"发起人"会议选出了十一人的"筹委常委"，把他、还有金岳霖、汤用彤

都算了进去，加上专攻马列主义的胡绳，却没有了怎么看都应该延揽入局的冯友兰。

此局面，估计毛的意见起了作用。冯友兰第一次与毛泽东直接接触，是在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他也写了一封，大意说：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那封"取老实态度"的信就是这次回的：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覆。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31

两人说的都是实话，虽然不算直白。想来毛对冯在"旧中国"努力靠拢当道的表现略知。今日之靠，态度虽好，总显得有点酸。况且，对于将此等样人玩于股掌，毛不仅乐此不疲，心里也是有数的：对冯友兰的重用终于到来--在文革中。

新哲学筹备会提出组织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的意义："团结全国哲学工作者传播马列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以期正确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批判吸收旧哲学遗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展开对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批判。"

这类"大话"，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或骗骗小孩子，或吓唬没底气的。张东荪什么人？就算他对这些新、老革命家和他们的"哲学"研究，曾经心怀非比寻常的宽宥，考虑到他不过几个月前，还曾针对他们对"批判"之喜好而写过的奉劝，如今在这样的号令下与他们共事，怎么打得起精神：

我却有一个印象，似乎民主人士（此处的民主人士是张教授对正倡言民主的革命者非嘲讽性恭称--箸者夹释）的言论中很少对于这一批非伪

装的自由主义者采争取与联络的态度，总是动辄稍见异议，即不问动机，一律加以驳斥。态度尤其是往往流于尖刻毒辣、尤其是对于自由主义一词不加以分析与剖解，只是一味蒙头盖脸，乱骂一阵。这样实在容易使人误会，以为民主人士没有容忍与宽大，亦就不具有自由的胸怀的陶养的风度。我虽然并不承认民主人士是真正如此，但我仍愿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语来奉劝民主阵线的一班言论家。32

他说的，是1948年底那次超乎寻常地失了分寸乃至风度的批判。据马逢华回忆：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十五日到次年二月一日，北平是一座围城。黑暗、寒冷、饥饿、肮脏。北京大学的五十周年校庆，原来预备扩大庆祝的，这时因为局势急转直下，终于草草了事。校园里面，除了在"安全委员会"领导之下，有一部分学生在"民主广场"挖掘避弹壕沟之外，其余是一片死寂。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先生一天在北楼饭厅里苦笑着说："咱们都像是下了锅的螃蟹，只等人家加一把火，就都要变红了。"……

北平围城的后期，……沉闷了好久的北大"民主墙"上的那些壁报，忽然又热闹起来，并且不知道为了什么，有几个板报集中了火力，向沈从文展开攻击。还有一份板报把郭沫若从前在香港写的辱骂沈从文（"粉红色的作家"）、朱光潜（"蓝色的作家"）和萧乾（"黑色的作家"）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报指责他的作品中的"落伍意识"，有些则痛骂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妓女作家"。33

其实，对"前进阵营中的民主人士"，张东荪在这里十分客气。他不知道，这批"民主阵线言论家"其实是在奉命行事。所谓"命"，即发布于1947年10月底那个驳斥"和平统一大同盟"的党内指示。在这则周恩来起草的指示中，毛泽東特别加写了一段关于"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的话。34张东荪那时候不知道，郭沫若、邵荃麟辈哪里是欠缺"自由的胸怀的陶养的风度"，他们当时的地位是"挨了批评的香港地下党"，必须以过头的战斗风采再度赢得组织信任。他同样不知道的是，类似具有相当杀伤力的闹剧，还要在以后三十年不停搬演。

共产党指挥若定，包括对张东荪的指挥。作为人所共知的"功臣"，张东荪不用活动，已经在新局势下"得到了重用"。

除了即将撤离的美国领事馆人员，在这段时间，与张东荪有交往

的，还有下文将说到的一位名叫王志奇的"小卒子"。35至于大学同事在前地下党学生的指挥下所作的表演（8月5日《白皮书》发表后，燕京大学124位教职员联合发表声明，斥责这一文件），他只有站在一边冷冷地看了。

但"小圈子"不能光发牢骚。在宪政与法制方面的所长无法发挥，36罗隆基只好另辟蹊径，组织"聚餐会"以文会友，开展学术报告和讨论。诸如《苏南义田的历史研究》（潘光旦）、《美日媾和的法律问题》（梅汝璈）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共产党，对这类题目自然毫无兴趣。但组织这类研讨的"罗隆基、张东荪小集团"，已然按照共产党的标准被确认了。

这就是美帝怀着切望、毛泽东忌之极深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9月21日，周恩来最后报告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和代表分配情况：张东荪列位民盟正式代表（共十八名）；任大会主席团成员（民盟五人之一，开会时须登上主席台）；参加"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

9月30日，他以得票倒数第二，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37

紧接着，该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第三次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副总理--民主人士占了一半；政务院委员十五名--民主人士九名，占60%；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九十三名--民主人士四十二名，占45%。张东荪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这回，只能借用广东人的话了：哗！居然到了这样的比例--不仅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渴想，几个月前叨叨絮絮的美帝，也不曾料到吧？

毛泽东笑了：未来中国的政府里尽量吸收一些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用得着你美帝来干涉么？至于这样的比例会在决策中起多大作用、会维持到什么时候，更是你管不着的了。

做到这一步，也只能出自毛这样的大手笔。谁都知道，古今中外，革命之后，最难之处，莫过于处置功臣。谭震林在春天里，就曾经得意洋洋地在市干部大会上说："毛主席在北京做皇帝，我们都是封疆大吏。"38到真的建了国，政协会议代表（各党派、团体）名单一公布，打天下的英雄们立时炸了锅：什么！？老子在战场上打倒、活捉的败将，怎么全混进来了？同志们出生入死，一个月才五块钱；他们大米加猪

肉，我们小米加青菜。有的更形象："什么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

但在毛看来，有些人可以"拔了就拔了"，比如北平和谈时候的彭泽湘，比如国共和谈时候的甘介侯39，乃至何其巩。但有的大角儿，不拿在手上玩玩，不仅不够意思，其教喻意义（或曰杀鸡儆猴效用），也放弃得过于轻易了。

1949年11月中旬，民盟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这是怎样的一个会呢？叶笃义以为不过是"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方针。批判的对象集中在罗隆基的亲美路线"；40殊不知其更为重大之处，直到八年后的整风反右，才由周新民明确道出：

这次全会，在盟章上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张东荪深为不满，但是他们鉴于大势所趋，又不敢公开反对，乃借人事安排闹得四中全会开了一个多月，无法闭幕。罗隆基、张东荪、潘光旦、范朴斋等四人曾请求周恩来出来帮助和指导。周总理接受他们的请求，约定沈老（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以及其他负责同志于某一日晚间，到国务院（著者按：应为政务院）西花厅商谈，沈老和其他负责同志均准时到会。等到深夜十二点钟，罗隆基和张东荪仍拒绝不来，四处打电话催促，罗、张始写一信派范朴斋送来。经周总理严厉批评，范朴斋又仓皇奔回，报告罗、张，到了深夜一点多钟，罗隆基、张东荪才狼狈而来。41

会议中间，毛泽东到场，给批得灰头土脸的自由派留了一条活路：

1949年12月5日傍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参加民盟一届四中全会的全体代表。毛主席和代表们一一握手，关心地问到了开会的情况，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政党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总是要有错误的。克服的方法就是要多加分析。一个党内有许多山头，但是要克服山头主义。没有不团结的理由，都是民主人士、革命同志，只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就会无往而不胜。42

周恩来也专门为他们开了招待会，说民盟"是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双方（在共产党的斡旋与指导下）达成协议--中国民主同盟，作为"参与政权的一分子"终成正果：

"本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之密切配合工作，以期在革命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尽其最大的努力。"从此，中国民主同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制度下参政的新型政党的地位，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43

这是张东荪最后一次过问民盟事务，是他打起精神最后的抵抗--以惨败告终。用罗隆基的话说："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44

到12月底，安排人事的五中全会接着召开。除了无可摇撼的正副主席张澜、沈钧儒，设立了十人"中央政治局"，章伯钧被挑选为"政治局"秘书长（总排名第三），张东荪从原先排名第四，落到最后一名。

没有出局，可能出于统战部的客气。但他们这批"曾经犯过错误"的亲美分子，在大家都一门心思、一股劲地靠拢党、争取进步的时候，也不能说完全没用。政协民盟代表第十名的周鲸文后来回忆：

北京政权成立不久，统治民主党派的中共统战部，先把各党派中的民主人士，分成三类格：一、积极分子；二、中间分子；三、落后分子。我和罗隆基、刘王立明等人被列入"落后分子"这一格。每有发言，就有积极分子攻击批评。此外，统战部俨然以民主党派的太上皇自居，不但遇事指导，而对个别的人又常给以颜色看看。45

但在开始的时候（《白皮书》发表和新政协会议之前），毛泽东确实没把张东荪当外人。除去种种场面上的应酬，毛、江伉俪对他的宴请，在同类人中算是多的。这些，正史、野史都未见记载，但张家的人记得"爷爷回家说"，有一次，张东荪、张奚若46在座，毛主席说："中南海里盖了房子，是不是搬进来住？"二人均辞谢。毛没有生气，只说了一句："你们是要自力更生呀。"对此，张奚若好有一评："宴无好宴，这是对你不放心。"

后来，在别的场合，毛（也许是毛的属下，曾转致毛的好意）问起东荪先生对位置安排、待遇等等"要求"。张东荪表示，一切职务不要，也不进中南海，只保留燕京大学教授。至于办公室、秘书、警卫等，他都谢绝了，但接受了司机和车（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待遇）。张饴慈记得：爷爷什么职务都不愿承当，在盟内也不愿。每每开会回来，就一句话："拍马屁！"

黄炎培显然不作如是想。1949年3月毛刚到北平，宴请大家之后的第二天，又单独设晚宴招待，两人畅谈时局直到深夜。他的传记作者说"这是其他人士没有得到的殊荣，使黄心潮澎湃。"--这澎湃几个月后就落到了实处：民建在《白皮书》上立了大功。至于报答，声明的起草人孙起孟47转年1月即被接纳为光荣的共产党员，黄本人则在几个月后被安置在副总理位置上。

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张澜的夫人及儿女从四川迁到北京。表老保持其一贯风格，一次次拒绝国家为他安排的住宅--在他看来，那些院子委实太大了，房屋也委实太好了。后来，终于找到一处小小的旧宅院。48开国大典前几天，按照周恩来指示，有关方面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他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张澜婉言退回，说："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但总理的考虑是对的，我保证着新装与民同庆。"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罩在旧棉袍之外。49

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据他的女儿回忆：在那时候曾经提过一个意见，说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太优待了--他当时住的房子很宽敞，很漂亮，还有一个警卫排。……他每天都打打太极拳，还很喜欢打乒乓球。对于时事，父亲非常关心，对于当时的书报阅读得非常认真，在他的书桌上，摆满了主席的著作。

章伯钧表现的，无论房舍还是气概，与中共高官没什么差异。章诒和的著作给出了不少细节：

那时，父亲官场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这院子后来）一分为二，正院住的是中共高官，先搬追去住的是万里，后为段君毅。跨院分给了艺坛领导高占祥。

新中国成立，我父亲在政府和其他部门担任许多职务，……每年都要出国，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他春风得意，心情舒畅。50

斡旋失败后就离开民盟的梁漱溟，上边的热闹都没有参加。他是在1950年1月，"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到北京的。毛从苏联返回的第二天就在颐年堂设宴招待，问"梁先生"："这次到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梁迟疑片刻之后的回答是："像我这样的人，现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么？"这前后他一直借住在亲戚家，毛得知后，令徐冰先将梁全家安排住颐和园石舫附近一四合院（两年），随后在城里安排了住

房。51依照毛的安排"到各处看看"之后，梁漱溟写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光明日报》1951年10 月），以及《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1952年5月，五万言，交林伯渠秘书长阅后呈毛泽东）。

比较惨的是民革的柳亚子。自以为必定落到头上的高官厚禄，不仅须自己开口，竟然在中共，更在民革连连碰钉子--最后寄希望"润之"能将颐和园"赏赐"给他。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不予满足的大窝火下，这厢里与当今唱和，那厢里却与警卫动起了干戈，终于在历史上留下那句不大为人所知的主席调侃"醉尉夜行"52，还有几亿中国人倒背如流的领袖名句："牢骚太盛防肠断"。

细细思索1949年从春到秋，也就是大家涌进北平之后，共产党（主要是毛泽东）对美帝曾寄予希望的"可能成为钻进肚皮的孙悟空"--张澜、陈铭枢、梁漱溟、罗隆基、张东荪、刘王立明、叶笃义……的态度和处置，不禁感喟交集。敬谁拒谁，亲谁疏谁；什么时候把哪个拉一下，什么时候对谁推一把……，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诸同志配合得丝丝入扣，把古人"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53 的道理玩得淋漓尽致。

力主阶级和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绝对不敢苟同的张澜，从出任民盟主席之始，就声言："共产党能放弃阶级斗争，走上民主的道路，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共产党还要蹈袭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民主同盟绝不与之合作。"54--说这话是在1945 年。那时候，西南地方将领刘文辉、潘文华、龙云等，还有相当一批实业家，包括国府官员都是民盟的秘密成员，毛泽东当然硬着头皮听。进北平之后，虽然被胡耀邦赞为"高尚的精神，这就是他的顽强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55当年风采已然不再。唯一令人尚感欣慰的，是1953年梁漱溟遭毛训斥时，他没有像别的"民主人士"那样给极峰助威，而是在第二天"上书"毛泽东，说"'反动透顶，一贯反动'，其言重矣，其论失公正矣。"56

对陈铭枢的安排，与他的期望值相比，可算是快"说不过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作为军人政治家，他对国家政治体制没有什么建言，批评毛，多集中在执政风格上："政治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不周；自然为党见与感情所沸动，生出了浪潮，喜功好大，难以制止。……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是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可惜这些话直到1957年，遭民

革老同志痛批之后才得以披露。1953年的大会上，他是仅有的在发言中没有对梁漱溟恶言恶语的与会者。

梁漱溟理论修养自成一家，根底深厚。对毛，是无论私下还是公开，无纶身处高位还是低位，都能讲出自己真见识的人--或许性情使然，或许对领袖的"雅量"及与自己的私交，有不切实际的估计。他1953年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小组讨论上说的话，本被周恩来看好（"很有代表性"），才建议他第二天大会上发言的。没想到多年积聚在毛心里的不快（估计是从梁那里总不见阿谀），骤然爆发。之后梁漱溟鞠躬退场、闭门思过，"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也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因为从此没了声音，1957年也用不着再整一次，直到批林批孔的1974年才又见风采。可惜到八十年代接受本著者采访的时候，对1953年那次令好几代人钦佩的风骨一现，居然一再说"是我不好，我不该惹主席生气"。

遭迎头痛击之后，罗隆基调整步调，努力适应新社会。虽说给归到一个小集团，他与张东荪其实很不同。张倾心自由与独立，多出自学理思考，而罗隆基推崇民主与现代政治，主要来源于他所受到的训练--包括他的性情。他当然知道民主政府须基于平等与协商的原理，但从他所发的那个精彩之极的不平--"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57可看出他长于运作而缺乏深邃探索，特别是对古老中华君臣将相思维定势缺乏认同的特征。行书到此，著者忍不住非引一段可与此相媲美的1957年大会批判词不可了：

诬蔑我们的领袖是大独裁者，……说他"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陈铭枢，你这种歪曲和污蔑连三岁小孩子也能把你驳得体无完肤，也要举起他们的小拳头来活活把你打死。58

淳厚、贤淑的刘王立明本来最得张澜信赖。她不大有己独到的见解，不料1951年因无城府而说了实话（苏联军人在东北的违纪行为），给一把抓住，以"反苏"言论受盟内严厉批判。她从此脱离"小集团"，只乖乖地按照党的要求做无伤大雅的妇女工作了。

公子哥儿出身的叶笃义，当年以自己刚刚继承的资财办进步书店，多么富于朝气。1949年惊吓之后被统战部梳拢：最后从1983年起连任民盟五届、六届副主席。靠拢党几十年，出生入死、打成右派、坐牢，一样不少，少年时候自由派底色仍难于抹去：最后出版了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读者读到了"九死"，读到珍贵史料，却弄不清叶先生究竟为

什么而不悔。

张东荪在1949年受到的对待最值得思量。

平心而论，他名声不那么赫赫、人脉联络也不是那么广博，没有四处活动，眷宠却从天而降。如果不是张澜的特别坚持，只能看作是毛泽东的安排了 。

毛泽东这么对他，如若不为照顾而是有意延揽，那这回真是打错了算盘。就理论而言，如果说陈独秀、李汉俊他们都已经离开，陈伯达、艾思奇毕竟小了一辈，弄得毛对张东荪早期著述不甚熟悉，但《观察》他们总会派人看的吧？怎么会挑上张东荪（还有更年轻些的张奚若）呢？或许伟大领袖受的奉承已经太多、太甜腻，反倒喜欢湖南辣子？

一直到文革初起，张东荪才对他的长孙饴慈谈起毛泽东的"厉害"。他说，建国前，有一次在颐和园开会，毛站起来跷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读者可能还记得傅作义到西柏坡去看他的时候，毛说的第一句话："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会后张找到毛，表示这样说不合适，因为北平和平解放，尽力者大有人在，"这样说，我要得罪许多人了"。毛回答说，得罪人是我得罪人，和你无关。饴慈还记得爷爷当时再次提起十六年前西柏坡一幕，说毛这人厉害呀，他大谈梁启超，以崇拜的口气。对《时事新报》前后那一段，是相当了解的。

张东荪和张奚若确实以对独裁政府没有好感而闻名。徐志摩在1925年说，"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岩石）。""他的身体是硬的"，"他的品行是硬的"，"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到了1956年张奚若仍直言："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对毛泽东的估评，就是那个名句"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了。

他们过去表现得"硬"、反对专制独裁、对当局严厉批判，这固然给处于困难时期的共产党帮了大忙，但毛泽东难道不清楚，其中起作用的是学养与诚实，并非投机与投靠。

看走眼一次没关系。他有的是时间改正。

无论是得意的沈钧儒、章伯钧们，还是开始失意的陈铭枢、罗隆基们，可能都不知道，早在若干年前，共产党对他们这批人的"地位"、"名份"，早有打算。毛泽东说：

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59

周恩来在1950年也承认：

我们所以承认这些人物，是因为他们有群众。我们所以要做他们的工作，也是要经过这些人物去教育其群众。60

这些，他们自己知道么，在1949年9月？

天凉好个秋啊！

注释

1、张东荪：《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观察》，第5卷第11期，1948年11月。

2、周新民（1897-1979），法学家、政治活动家。安徽庐江人。1926年加入中共，1942年加入民盟，1943年被中共南方局派往昆明，受命扩大爱国统一战线。1947年底民盟酝酿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对他这名最早的跨党党/盟员有什么具体指示，目前尚未见文字披露。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最高检察署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组织部长、中科院法学所副所长等。

3、孙晓华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页167-168。

4、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载《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1298。

5、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页58。

6、据叶笃义回忆，参见注5，页58-59。

7、方然：《民主的求索者--张澜》（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第15节。

8、电文：上海市政府潘副市长转张主席表方暨罗隆基，史良，郭则沈诸同志：世电谅达。诸同志久困沪滨，领导盟务，殊为敬佩。上海现告解放，请即联袂北来，主持四中全会，商订本盟今后决策。特电欢迎，并盼告行期。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暨临工会全体同志1949.5. 31。

9、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页358-359。

10、这封《建议书》还在讨论的时候，史良、楚图南、郭则沈等即表示反对，最后以"在沪中委致信沈、章"的名义，由叶笃义交给当时正在上海的吴晗，委托他交沈、章转中共。1949年8月，叶笃义辗转到北平后，对照当前局势，想起这封信，吓得夜不成寐，只希望吴晗没有转。读者细想，有这个可能么？沈、章怎么可能不希望共产党知道罗隆基辈有过这样的心思。果不其然，信正在共产党手里。只是在1949年那时候，李维汉高姿态地容他"过去的就算过去了，一切从头学起"。参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

此信，据吴晗在1957年批判会上揭发，内容略有出入：罗隆基托他带封信给沈钧儒，信中罗隆基要求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几个条件：（一）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协和外交；（二）民盟成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网领、据此与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参见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页309-310。

11、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67。

12、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68。

13、据叶笃义记忆为《申报》。

14、张氏称："我希望毛泽东抱定《新民主主义论》里的理想，而不要服从共产情报局的政策。"转引自赵锡骅：《张澜在开国大典前夕》，《红岩春秋》，2004年第5期。

15、同注7。

16、《中国建设》北平版第1卷第2期，1949年1月，中国建设出版社。

17、张东荪：《增产与革命》，《中建》半月刊，第3卷第4期。

18、1927年4月大清洗中，他最亲密的中共战友宣中华遭杀害，在其遗物中，发现他称沈钧儒为"真左派"。参见沈谱口述：《沈钧儒：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中国政协新闻网"，2005年4月18日。

19、那是在1958年，北京民主党派向新疆同侪学习，民盟的游行队伍高举纸糊"红心"，率队者沈钧儒。参见钱钢：《红心的故事》，"民间历史"网站。

20、赴延安访问的六位国民参政员之一的傅斯年，对其他五人恭维毛泽东不敢苟同。他形容早年参加共产党的章伯约在延安的表现，可看做是"由第三党归宗"。

21、1946年底蒋记国大前后，司徒雷登以自己的观察，私下问过与他有师生之植的叶笃义，"沈钧儒和章伯钧是不是共产党？"。参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60。

22、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页304。

23、李维汉：《真假和谈的斗争--记北平和谈》，《中共党史资料》，第16期。

24、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页11。该回忆显然回避了党的经费中苏联援助、"打土豪"（劫掠）和其他黑色收入（如鸦片种植和贸易）。精细的研究有待同侪精进努力。

25、1949年5月1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了民盟总部第十一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统战部委托其接管敌伪报纸的事。会议决议提及"开办费请政府拨款"。另外，关于国库负担党费问题，民盟本来概念清晰。章诒和追忆章伯钧、罗隆基晚年谈话称：1941年的民主政团同盟为政治民主化，要求结束党治，特别提出：政府一切机关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包括政党活动之所需经费。当时这些条款都是针对网民党的。蒋介石看罢，为此对张澜大发脾气。而此前黄炎培怕对国民党刺激太大，曾明确要求删去反对国库负担党费等条款。参见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页31、338。

26、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页305-306。

27、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78-79。

28、叶笃义一生三次提出入党：1953年、1962年和1981年。最后得到批准是在他已经从民盟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的1993年，时年八十一岁。叶家兄弟姐妹十几人，各有所成，个个出类拔萃。

29、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80。

30、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82。

31、《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344。

32、同注1。

33、马逢华：《怀念沈从文教授》，《传记文学》（台北），1963年1月号，首发自《自由中国》（台北），1957年2月1日。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248。

35、叶笃义回忆，张曾带王志奇到民盟总部见张澜和他，说王想送张澜一件皮袄。二人见了王，也接受了礼物。

36、罗隆基的核心政略概括起来有两项。一是要求政治民主化，另一个是主张军队国家化。而政治民主化的内容就是结束党治……比如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机关、学校推行党务；政府一切机关严行避免一党专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包括政党活动之所需经费等等。

37、据新披露的宋云彬日记，在张的名字下边划"×"的，有宋一个。宋先生从专业看，属于文字学家、教育家。政治倾向（以及待遇）：沈钧儒麾下救国会；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1957年未能幸免。

38、武宜三：《千家驹们的悔恨与徐四民的明白》，"新世纪新闻网"，2005年10月27日。

39、甘介侯，李宗仁幕僚。因在"解放战争"中曾试图和缓局势，毛

亲自著文臭骂之--"这类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参见《中共发言人声明拒绝甘介侯来平》，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页281-282。后李宗仁回国，提出一个可以动员回国者的名单，其中便有甘氏。周恩来看过，当即划去甘的名字，并告诉李宗仁，此人不能回来。甘最后客死美国新泽西。

40、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73。

41、转引自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页312。

42、孙晓华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页178。

43、同注42。

44、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页312。

45、周鲸文：《与中共领导人谈法治》，载《中国大陆自由化运动救中国、救亚洲、救世界的钥匙》（香港：时代批评社，1982），页275。

46、政治学和法学教授张奚若在《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文中说："帝国主义国家仅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俄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欧战后帝国主义还高唱尊重我们主权口头禅，苏俄竟然无缘无故地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帝国主义只能暗中帮助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然明目张胆地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你说它不是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徐志摩说：中国对苏俄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的一个毒瘤，里面的浓水已经满了，但是却没有独立见解的人去触动它。他认为张奚若是这个最无耻的时代里能够挺身而出的最知耻的人。参见智效民：《火烧晨报事件》。在国民参政会上，张奚若发言批评国民党，被蒋介石打断，张愤然退场。国民党当局将下次开会车马费送上门，张说"无政可参"，原费退回。

47、孙起孟（1911-），教育家，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4月后，先后当选为民建第一至三届中央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副主席。1987年12月后，先后当选为民建第四至六届中央主席。1996年12月、1997年11月先后被推举为民建中央名誉主席。他也是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8年4月、1993年3月先

后当选为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48、张澜并非1949年才如此。他任四川省长期间，不造公馆，夫人在家乡务农。1943年任"慈惠堂"理事长时，住该堂所属培根火柴厂简陋车间。

49、梁晓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纪念张澜先生》，《出版参考》，2006 年第17期。

50、章诒和的著作也提到，当了右派以后，房子没有变。虽然失去了在怀仁堂看戏的资格，可以到全国政协参加晚会，去特供的小卖部买肉、蛋，到新侨、听鹤馆等供应首长的内部餐厅就餐；除每日三本的《参考消息》，司机、警卫、勤杂、秘书、保姆一应俱全。更令章怕钧欣慰的，是得到西方世界的看重。据章诒和文，"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参见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页367。

51、吴黔生等：《肝胆相照》（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页95。

52、毛泽东1949年5月21日致柳亚子信："某同志妄评大著，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今后和他们相处可能好些。在主政者方面则应进行教导，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505。

53、分别引自《老子》和《战国策》。

54、《民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原载《新中国日报》，1945年2月26日，第2版，转引自方然：《民主的求索者--张澜》。

55、转引自丁石孙：《"他有很高尚的精神"--纪念张澜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国统一战线》，2002年第8期。

56、同注49。

57、引自《大公报》1957年8月11日吴晗发言，转引自谢泳：《政治与学术之间--罗隆基的命运》，载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页292。

58、发言者蒋光鼐，原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时年七十岁。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

5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页34。

60、周恩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177。

第二章 学人·思想者

由洋翰林而现代学人，绝非难事--

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整一批，

近乎两、三代。

可见认知上的现代化转型，

并不如"打倒孔家店"者所溢估。

由现代学人而党人，竟如江河倾泻，

多少优秀者里挟其间。

主人公徒然呼朋引类、扩大阵容，

可怜在覆盖了全社会的党人与党争里，

势孤力单……。

一 洋翰林

张东荪生于光绪十二年（1886），逮住了同光期的尾巴--清代末年难得的一段社会尚得休养生息的安定时光。

他的生日是12月29日，按华历算，属丙戌年末，比同属狗、但生于1887年1月的张君劢年长二十天。陈独秀比他年长七岁，毛泽东则年少七岁。

他的故乡是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杭州）。这地方近代文化名人出得太多，夏曾佑（1863）、梁实秋（1903）、施蛰存（1905）、高阳（1926），弄得他们已经没兴趣以自己为家乡、或以家乡为自己添光彩。著者与张家子弟接谈，很少听到他们提起"老家"，好像已经忘记自己光风霁月、人文荟萃的故里。

这或许与幼年东荪一直随父亲住在他河北任上有关？在公开场合（以及对子女），他讲带上海口音的官话；在家中对发妻，说的则是苏抗一带的吴语。

东荪属于从海宁迁到钱塘县的张家第十世。他的高祖第六世张云傲，嘉庆时湖南安福、湘潭知县（其父侍郎、副都御史张映辰，舅父大学士梁诗正，岳父大学士嵇璜）；第七世张裴，泰州知州；第八世张之杲（东甫公），泰州知州；第九世张上龢，也就是东荪的父亲， 一直在直隶偏远、贫瘠小县（昌黎、博野、抚宁……）任县令。东荪出生的时候，上龢正在内邱任上。到第十世，已经是他这一代了：长兄张尔田曾中举人，官至刑部主事。所以，东荪所在的钱塘张家善诗，从第五世张映辰起，"皆仕宦，代有撰述，称为清门"。1

张东荪晚年曾续修家谱，2属自己那栏，一直空着。家谱，依传统须标上"官职"、"业绩"。他对自己在国共两方所获"官职"，不说不屑一顾，想想也是痛苦多于欣慰吧。但将子孙的名字无遗漏一一亲笔写上，是不是觉得毕竟"张家有后"--自己的遭际一言难尽，孩子们的成绩足以告慰先祖了。

还不足八岁（1894），母亲即病逝。时值光绪末，兄弟二人随父扶柩返籍。钱塘县家中，三位同父异母的姐姐都已出阁，年龄长他一轮的

兄长从此担负起扶持幼弟、敦促读书之责。

张尔田（1874-1945），一名采田，字孟劬，号遁庵、遁庵居士，中国近代史家，词家。居上海时，与海宁王国维、孙德谦齐名，时人目为"海上三子"。三子之中，国维于史重地下文物，孟劬（即我们主人公的长兄兼启蒙师傅）于史重"文史互证"，所着《史微》八卷，曾为日本列为大学研究文史者必读之教科书。时至二十一世纪，还能见到青年学子在网上逐条逐句就《史微·题辞》"疑义相与析"。尔田任刑部主事是在光绪年间，后改官江苏试用知府。辛亥后，"高隐不仕"，潜心著述。1914年，应赵尔巽之聘，任清史馆协修。到后来，虽然没有如他的挚友王国维那样"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到民国后还曾担任北大教授和燕大国学总导师，但终生笃信孔孟，唯求"心安义尽"，"有犯之者，必大声所呼以斥，虽亲旧，无稍假借"。3

张尔田藏书巨，著作丰。4东荪也一样。除此以外，两兄弟无任何资财。尔田藏的主要是史书，东荪书架上的，除了中外哲学著述，全是成套的诗书与词书。

在东荪成长的年月，清末新政已经开始。张家因世代为官，并一直以文名自诩，头脑中难免根深蒂固地重文轻商，这对张东荪内心深处（或曰下意识）的价值抉择，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少年时候，对当时正蓬勃生成的自由经济，以及这一阶层对法制的要求，他一直没有特别关注--直到1920年陪罗素到湖南乡下，才惊呼"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联想到他们整整一批呼啸于当时的启蒙学者，耗费大量心血于国体、政体、立宪、组党，而对中国说来如此致命的领域缺乏倾心甚至血肉相依的关注（张澜似应除外。当然这已是另外的故事了），虽然在下湖南那次，他曾断言"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但对"私有财产"，以及"恒产、恒心"与人格独立，以及结社、组党……之间的关系，有概念却无彻心通骨之痛；对统领公民全部资财的大规模国有计划经济，有议论却少切肤的警慑，5很难不让后世论者为他们感到分外痛惜。

张家流传着八世祖东甫公任泰州知府时候的故事：太平军攻陷江宁之际，坚守泰州，病死任所。东荪一生，既不曾大富也未大贵，对集聚财富几乎没有概念。他不喜欢按照"田"字排序而轮到自己的"万田"，自作主张取了"东荪"--"东甫公之孙"这样一个名字，立志终生效仿先贤，以个人之学识操守，建功立业--或许也包含了对暴民革命的厌恶。这些，我们全都能从东荪日后之悲剧人生中寻到踪迹。

东荪没有进过新式小学，也没有玩伴。不知父、兄以《诗》还是《书》为他开蒙。从他以近古稀之年一上手就显出不同凡响的诗词造诣，6可以看出长于文史的张尔田施之于幼弟的严格训练。但儿童总是儿童。没有铁环、空竹、百草园，孤独的孩子，身体并不强健，往往沉溺于遐想：

著者于幼年时候常常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怀疑，觉得天下最奇怪的事情莫过于有"我"：究竟"我"是哪里来的呢？何以几千几万几亿几兆的人都不是我，而只我一个人是我？何以几千几百年无我，而忽然于此时有我？"我"就是一个什么东西？真是不可解！天下最神秘的恐怕莫过于此吧。7

对于没能受到普通中等教育，他的确有一份遗憾：

很惭愧，我就从来没有受到很好的中等教育（新式教育）。现在大学教书，时时感觉到中学根基不够。像哲学中，有许多地方要碰到物理化学的问题。因此我感觉到，在今天，中等教育的重要性，实在超过了大学教育。8

他对专业的兴趣，在很早的时候就打下了 ：

著者有哲学兴趣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当时得读佛书（《大乘起信论》与《愣严经》），不禁手舞足蹈。后来看了心理学书，反对于佛学大起怀疑。9

但有机会读到非国学领域的现代社会科学著作，比如心理学方面的书，是到日本以后的事。在出洋之前，基于少年冥想的性格特点，依旧流连于佛理中：

我是十八岁读《楞严经》便起了哲学的兴味。平素尝有一种痴心妄想：以为非窥探宇宙的秘密、万物的根由不可。于是习作冥想。中间虽有几年动了救国的念头，从事研究政治，然而始终没有抛弃这个痴心。10

他实际上活在中国由传统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这样的时代，对劳作与悠游其中的自由人、知识分子、士，乃至操生杀大权的政客、究竟怎么一种感觉？对他们由良臣、顺民向现代社会公民（包括现代政治家）转型，有什么样的基础要求？

两兄弟从此一直共同生活。夏循垍在《张先生孟劬传》描述了长兄幼弟恂恂悦悦的情景，并不是一般作传者的谀词：

先生幼年失恃，介弟东荪，年在髫龀，庭训之余，抚教并施。友于至笃。迨其授室，雍睦之称，遍于戚党。阃门内外，迄无间言。其刑之于化，孰能及之。至若接人以诚，苟属知交，咸生敬暮。其启迪后进，孜孜不倦。平生寡嗜欲，自奉约而与人厚。……

两兄弟各自成家后，无遗训、无宗族制约，不仅一直住在一起，钱粮上也没有分开过。大奶奶（尔田夫人）任由弟媳当家，直到1950 年去世，凡四十年。自立世起，兄弟二人对鳏寡戚属的扶助，从来没有停止过。宗烨的姑母、姨母，以及她们的孩子，都曾长期住在张家。孔孟之教对这两兄弟而言，不是知识，而是精神、人格与日常生活哲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都市，几近硕果仅存。

对孔孟之学，及其在转换时期的地位与作用，张东荪其实有相当精到的解说：

我们若果把后世对于孔子的推崇（实即利用）一概不论，则必可看见孔子本身是人类中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至少可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鼎足而立。11

在号称民国，且鼓动"全盘西化"的"现代"中国，他不主张全面抨击传统（比如"打倒孔家店"），自己也不以儒家自居。对儒学，他认为：

所不幸的就是自汉朝以后，儒家独尊，于是史家的思想格局乃只有一个了。以后便只是以儒家的"史眼"来编历史。……汉朝对于秦朝可以说是一个反动，儒家又起来了。这个儒家却和原始的儒家不尽相同。毋宁说是把道家法家都杂拼在内。12

孔子的真正主张只是一个政治理论。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断没有不修身养性而能齐家的：断没有不诚意而能治国的；断没有不正心而能平天下的。梁任公先生名此为德治主义。13

这是他们兄弟终生遵循的原则。胡适在这里稍不小心就显得轻飘；少年即入清华的罗隆基则有"知识性功利主义"之嫌；至于终生包里在线装书里的毛泽东，主要师承，应该说是法与术，外加江湖权诈，与孔孟一直格格不入--从这些典型的、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身上，我们或许可以品味出西学浸入传统中华文明时候的非一律性。

1901年8月，清政府下令，自下年起，科举考试不再用八股文。光绪也在他的"上谕"中明令各地兴办学堂：北京设京师大学堂、省书院改设大学堂、府厅设中学堂、州县设小学堂和蒙养学堂。14

钱塘县似应得风气之先。张东荪那时十五岁，却没有赶这个潮流。两年后，1903年，张之洞拟定《约束游学生章程》及《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清末留日高潮开场。

这回，他赶上了 。

其实清廷在这时候还成立了以载振为尚书的商部，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如《奖励公司章程》等。对此，张家好像没什么感觉。大批留学生到日本，首选近代军事技术，他也没有动心。

1904年，张东荪十八岁，获选清廷浙江省公派留日生，"去长发，更服装"，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与蓝公武、冯心支一同挤住在本乡丸山新町。

那时候，他还不认识梁任公。但梁对于留学生（"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的期望，则几成为他们一批人的自许与自励：

人之天职，本平等也。然被社会之推崇愈高者，则其天职亦愈高，受国民之期望愈重者，则其天职亦愈重。

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诸谁人也。15

读者此时是否注意到，任公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实业与实业家。没有实业与实业家，没有由此而带来的工商业的繁荣、以及应时而生的交通、通讯、协议、合同……并由此生成的法律，中国努力推行现代化的学人终如浮萍--空怀一腔从外部世界学来的知识，往往难逃军人政客的利用、拨弄。

但无论如何，当时的中国确实处于很有希望的转折点。无论民间还是当政者，都有了一番新的气象。1905年12月、清廷派五大臣到日、英、法、比、美、德、意、奥考察宪政并奏请立宪。他们带回大量政治书籍，编成《列国政要》及《欧美政治要义》，供立宪参考。接着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可惜实施之日一拖再拖。

留学域外的读书人却是竿头日进。随着眼界的拓展，张东荪的研究领域已经从佛学进入西方社会科学，虽然主修哲学，但以二十岁的精力和敏锐的感知力，他实际上已经行动起来，意图将一般性的"学务"，提升到学术研究的层次，担当起"天将降之大任"：

中国近来学务虽似发达，至于学术尚在幼稚，此俗之所以不治而无由进入文明之域也。

于是和他的同学发起"爱智会"--

专以提倡国人学问为务，并欲会合东西哲人，共研究宇宙究竟、人生究竟二大问题，以增进世运，划除俗污，裨大地山河，得光明庄严。16

这是他们的成立宗旨，也是东荪在当学生的时候，立下的志向。遣词造句上，难免留有佛家典籍遗痕，文体也是文言向白话的过渡。这篇宣言草于1906年，整整一百年后，中华大地上二十岁年纪的人极少再关注这些"大问题"，而流行唱"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不仅办社团，三个年轻人还办起了杂志，即1906年创刊于东京的《教育》。钱从哪里来？广泛征股。刊务等杂事谁承担？就他们三个人。且看《教育》所辟栏目：社说、学说、科学、思潮、批评、记事、杂俎、文苑和问答。这份120页的"大型综合期刊"在东京出版印刷，由上海四马路开明书店总经销，国内、日本之外，居然远销至香港、南洋等地。当时他们有没有想到，不过十多年后，三人中的两人，正掌控着中国最有影响的报刊呢（《国民公报》、《晨报》、《时事新报》、《改造》）。

有趣的是，张东荪致力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是从佛学而心理学，进而由"唯用论"（今译实用主义17）入手。当时他最为心仪的，莫过于在法国起步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了（当时的译名为干母斯）。青年东荪接触到他的学说，正值詹氏晚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一段时间。他的理论，估计对后来张氏最有创见的"认识论"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可惜无论詹姆斯、皮尔斯，还是张东荪，都没有对共产党治下的新中国，在信仰--经验--认识--政策相互砥砺的链条上发挥任何影响。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国思想界方"惊喜"地发现，原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意即毛主席的话未经检验，不能一概当成真理）。这一其实相当粗浅的社会政治（而非哲学）命题，虽然在依旧将毛泽东思想奉为护

法神祇（注意此处之"法"为合法性的意思）的中国，尚有其"先进性"，但只要想想，一百年前，二十岁的清廷留学生，就已经在思索：

实践是生活之路，但通过实践人未必即获得客观的真理。虽然每个人都是从生活的实践中获得他对世界的看法，但每个人从生活的实践中获得的看法各不相同，则是理所当然的。

要想真正地认识普遍存在的、被所有的实践分享的、被历史所证实的真理，一个人要获取一个"超信仰"。这个超信仰是无法被实践证实的，但它可以帮助一个人使他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和美好。18

也就是说，"真理"与 "信仰"，是相当个人化的，不能由谁来指定。有趣的是，直到2007年，当一位据说富于"智慧与学问"的明星在官办电视台脱口说"老百姓要信仰国家"，为学者指出其谬误的时候，19居然还引发-场口水战。张东荪说：

所以从社会观点看，有了文化的需要，就会有理论，理学便是这样的东西。如果一定要去问这是不是真理，那就麻烦了。真理是相对的，上帝并不像热水瓶一样，可以拿出来印证。理论的产生是基于文化要求，社会要求，时代一变，要求一变，真理也就跟着变了。以前的真理便不再是现在的真理。我对于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对论"并不同意。他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公婆都有理，岂不没有是非了？相对不能是Relativism而应该是Relationism，就是说在这一环境中是有效的，在另一个环境中就没有效了。理论是不能实验的，科学才是能实验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看看哲学是什么与哲学家应当做什么。20

后来，到了1947年，在他为《观察》写《狱中生活简记》的时候，谈到"身体机构是一个独立自成系统的东西，并不受心理指挥"的实际体验，从而"平素所不欢喜的两元论，便为不可逃避的结论"--"可见一切真理必由于实践与亲历，专凭空论不能有所决定。"--著者将他的两段话引在这里，供长于思辨的朋友细细驳析。而对于另一条因为出自毛泽东之口而在当代中国几成金科玉律的命题："理论联系实际"，只有水利及气象专家黄万里给出公开批评："世上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上升不到理论的实际。"

学成回国之后，东荪回忆起这段写、译、编，并且不时相驳辩的日子：

在日本留学时代就看马克思主义的书，蓝公武我们三个人住一间屋。从思想上讲，（接触）马列主义在苏联大革命前。…… 后来我对马克思以外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等都有点同情，凡是左的都好。21

我于宣统年间曾撰有一文，名曰《真理篇》（介绍西方各哲学流派），载友人冯立德、蓝公武氏合办的《教育》杂志，现早散失无存了。自撰那篇文章后，我自命为一个唯用论者。我十余年来时时咀嚼，觉其滋味正如橄榄一样，愈嚼愈有味了。22

有趣的是，后世主流史家在肯定这三位青年的努力以及所达到的学术水平时，给出的，居然是符合"主旋律"的赞扬：

《教育》……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社会科学学说的传播，对封建文化思想的冲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客观上有利于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23

这真是秦琼夸关公了。他们对革命没有兴趣。排满、罢绌学吏、种族革命、政治革命……，所有这些热血贲张之举，当时日本清廷留学生闹得多么起劲，这几个青年都没有投入。他们心系于基本的社会改造：

当清末造，不佞与三数友人，聚谈于东京，愤政治改革无术，乃欲先从事于社会改良，即所谓者，以为预备焉。唯政治改革，为功也速；社会改革，为功也迟；二者虽相互为表里，然其成事之迟速，固不可同日而语。须知改革当务其本，治国首在人心。人心为因，国治为果。改革人心之道，首在教育。24

虽然不如晚年感受那样深切，他在当时已经模糊觉得"为功也速"的政治改革，如果没有"为功也迟"的社会改革为基础与后盾，太容易为大、小政客所利用了--结果也只有一个：政治与社会的倒退。我们在后边会看到，仅仅这细微的认识上的差别，造成他与陈独秀、毛泽东怎样不同的路。

这批1904年赴日学生，是在辛亥革命前夕，即宣统三年时回国的。六年苦读，张东荪获得的，想来是东京大学哲学学士学位。这一学位，由清朝皇帝看来，就算是完成了会考，获得贡士身份。一路公车回到故国京都，部试、保和殿复试（这是清室最后一次考试大典，想必尽量简化，起码"大卷子"是不必写了，因为五岁的宣统绝无可能"朕将亲览

焉"）、鸿胪寺点唱之后，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即后人戏称之"洋翰林"。

一同参加殿试的，还有一位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的江苏生员张君劢。1907年，他们在日本就已经结识，在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谛闲大师东游讲经那次，从此开始了他们延续近七十年、覆盖中国三个朝代之终生友情。

殿试之后，清廷已经没有设庶常馆的规模，诸位海归新进也无所谓到馆。张君劢留在北京教书。张东荪则首途上海我拜见兄长，带着几箱户书和一肚子学问。虽说冠了一个"洋"，幼弟得授翰林，对张家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桩大事、何况"功名"于张尔田，就算到了民国，也是有相当份量的。

东荪这年回上海，成就一生中第一件大事：他正碰上《东方杂志》改版，结识了张元济新启用的主编杜亚泉，并且"圣心"为笔名，发表了他"议政生涯"中第一篇政论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

与长兄尔田差不多同龄的杜亚泉，也曾跻身功名。感受到世外吹来之疾风，毅然放弃"正途"，转向自然科学。他自学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并以自己之大名，在上海创办科学期刊《亚泉杂志》。东荪他们赴日本读书的那几年，亚泉加盟商务编译所，任理化部主任。到他们回国的时候，除了理科的中小学课本，他的三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自然科学辞典：《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和《小学自然科学辞书》已告完成。那年，杜亚泉（笔名沧父）不过三十四岁，正在"应上苍之命"，对《东方杂志》大动手术，把原先的"选报"杂志（其头条当然是《宫门抄》与《奏折》），变为具有现代风格、现代智慧，并立足现代知识前沿的大型综合刊物。

"圣心"的《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使用的依旧是半文半白体--东荪以此文体写作，又持续了七八年，直到主编《时事新报》。这篇文字，从踏上故土的直接感受开始，接着是在大量阅读基础上广征博引：

人民之弱益见，亡国之兆益深，欲从而兴之，其谁是赖？

昔之怒骂政府，今则转为苛责人民。向之希望人民者，今则对人民

而悲涕矣！

放眼神州，昔日德教甚隆之文明古国，怎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种种原因之中，张东荪认为"政制"为首要：

专制之国，人民多恐惧忌避之心，伪诈卑贱之行；战败之邦，人民多利己苟安之想，无勇敢自尊之气。

道德之堕落，靡不基于生计困难；生计困难，实由于政治不良。

而国门开启、西风东渐，又是什么结果呢？

西洋文明输入，吾人象受其益，而已先受其害矣。……当西货入口，无不争购，人心之趋赴，实有不可制止之势。不数年，吾民生计大易其形状：向之朴素者，今变为浮华；昔之俭省者，今易为奢侈。……种种不品之行，皆发源于此。

像不像已临二十一世纪之今日中国？合不合余英时所说："一种文化传播，总是从最边缘、最浅薄开始……"

如何救治？述说落到他坚持了一生，还为此发生过几次大争论的观点上。除宗教、鸦片等等，最为紧要的，是由政制而导致的教育：

现今教育系统之不完备、制度之不良，稍有知识者，皆能道之。盖教育之为事，貌似易而实乃艰。苟不计社会之状态，而所教育之人皆不能应社会之要求，则社会必日渐衰微。教育之为害，实有不可言喻者也。

但教育状况实际是社会的反映。他不可能预见到五十年代初那场将人工具化的教改；也无法估量将教育置于意识形态宣传之下，对巩固政权所具的功效。他呼唤的"未来"，在那时候，颇带有社会转型期"贤人政治"、"开明权威"之色彩：

改革人心，必自政治、经济、教育始，而三者之中，尤推教育为先。革政之事至艰，非一二书生放言高论所能成事。必有过人之力，超人之识，刚毅中正，慎言笃行者，其使民也有方，其化民也以理，于是天下之人皆从而为其所使，固不必一一执人心而正之，否则抑亦迂矣。

篇末，这位学成归国士子空怀一腔报国之心所发的感慨，几成他自

己日后奋争与挫折的写照：

嗟呼，今之国民道德如此，政治如此，经济、教育又如此，吾欲托空言以济世，得毋迂乎？然而自奋其力，不饶不屈，人人如此，则后之结果正未可知。固不待概世之雄出，而天下已将期于治。吾愿普天下之人，咸矢斯志。其庶几乎？其庶几乎？

东荪以一首译诗作为文章的结尾--语出丁尼生。如此精彩的译作，恐怕中国诗坛再也不会有了：

今吾子之沉迷兮，

正长夜之将来；

弗以吾言为谑兮，

岂尽谬而不然。25

东荪在日本苦习六年，究竟能阅读几种文字？张家后代也百思不得其确证。这篇《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相当自如地引用了英、法、德、俄、芬兰等国十多位学者的原文著述：Westermarck（韦斯特马克），Spencer（斯宾塞），Montesquieu（孟德斯鸠），Novicov（诺维科夫），Hill（希尔），Le Bon（勒庞，法国心理学家）……虽然不无青年学子大抖书袋之稚狂（那年他二十三岁），但也可以想见，他们那时蜷伏在丸山町埋头啃大部头的狂热。

见过兄长后，他又返回北京。是否得到了什么差事？未见文字记载。很快，革命爆发了 ：

我虽不敢居功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一分子，但在革清朝的命的潮流里也曾厕身其中。当时不知道成功与失败的条件是什么，就只知要革清朝的命。那时候有了一些民主主义的书像卢梭的《民约论》等对我影响很大，不过那时候我们不是说"民主"，而是说"共和"。26

由于清王室逾常的懦怯无能（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无力制止贪污；侵犯大众利益的统制经济），致使一生主张平缓过渡的"洋翰林"如张东荪者，都跳过了在中国推进君主立宪这一可能的国运，直接进入由"革命"催生的"共和"。

辛亥那年八九月间我还在北平，一些主张革命的地下工作者一听说武汉革命于是纷纷南下，我也坐船到了上海。到南方后，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我还在内务部当了一名小官。……当时我感到命是革了，这个国家从别人的手里拿到了我们自己手里，但不知怎么办才好。……我看了一下周围的人都不像在作事情的，于是没几个月我就走了。我认为自己贡献的道路不在这里，还有其他的地方。27

所谓内务部小官，指的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张季鸾当时也在南京，任总统府秘书，大总统就任第一篇义告就出自他之手。"这个国家从别人的手里拿到我们自己手里"，"我们"是谁？怎样才算是"拿到了手里"？代表前进方向的新的政治领袖人物，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声望最高的孙文，无奈之中，先是决定自己改行当实业家（修铁路），后来在掌握着私兵的独裁者之卑劣残忍面前，以同样独断和不堪的手法发动"二次革命"，然后从已经成长并日渐成熟的政党退回到宣誓效忠个人的会党。

最有资格的政党领袖梁启超（"人气集于一身"）虽然有立宪运动、"政闻社"、《新民丛报》的广泛基础，但对于新出现的专权者袁世凯，潜意识中的"明君良相"意识，竟然在每个困难关头成为其行为之主使。1912年回国之初，张君劢等曾百般劝说，劝他把自己的位置定在独立的在野党领袖位置上，任公偏偏选择"抛却宿怨、倾心辅佐"--看不到经清末新政，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民间社会，也看不到他们要求自己政治上代言人的局面。对沿着现代政党政治（批评与监督专权者）向民主与法制推进，梁启超竟无由摆脱"以国师自居"之情结，甘居策士地位，被老袁玩弄于股掌。

张东荪太清高耿介，有见识而无耐性；"解放脚"式的过渡期政党政治，令他无法忍受--"自己贡献的道路不在这里"。在哪里呢？

我本身虽始终是一个独立思想者，但却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就是从来不愿在行为方面无故与人立异。所以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曾参加孙中山先生所组织的南京政府，后来政府解散大部分人都到北京参加袁世凯先生所组织的政府，我则不愿参加。彼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国民党，把凡在南京任过事的人一律作为党员，我的名字也在其列，但我亦未加承认。后来我的朋友以进步党人为多（蓝公武、张君劢均为骨干），且较密切，我却从未正式加入该党，也向不与闻他们的党的活动。外间对我的这种不明白我是知道的，但我亦不希望人知。我以为一个人只要行心

之所安就够了。急于向人表白是现代人的一种做法，中国儒家的精神根本不是如此的。28

这里说的国民党，即是由同盟会等四个小组织在1912年8月间合并而成的新党。其情势可以从居正29的描述略见一二："自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同盟会的声光确是一跃千丈"，"自南都建立，一日附者率数千"；"然以现势权位之所在，投机分子，均纷纷入会，同盟会固有之纯洁性质，已渐变而进于复杂之途"。这样的局势下，张东荪选择大异于常人的抽身远避--1949年9月30日那惊世骇俗之举动，此时已略见端倪。

新老党人涌向北京。他则返回上海，加入《大共和日报》担任编辑。

这张报纸1912年1月4日在上海创刊，章太炎任社长，马叙伦任总编辑，对开两张，有时还加出画报一张--其规模已经超过八十年代改革前的《人民日报》。《大共和日报》除"社论"、"要闻"、"评论"等，还有"译闻"和副刊。胡适译作《割地》（即都德的《最后一课》〉，就是寄自美国，发表于这年11月5日的。

这份报纸，一直生存到1915年。张东荪没有作得很久，也没有特别突出的约稿组稿业绩。据推测有两个原因，一是家里为他订了亲，他必须回杭州完婚。那年新郎二十八岁，新妇吴绍鸿女士出身于已趋衰败的苏州世家，年仅十七。这对因"包办"而结成之伉俪，无人前之卿卿我我，却一生情深意笃。张家孙辈记得，"奶奶说，跟他一辈子，始终担惊受怕。成亲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一天早晨出门，中午拍来电报，已到上海。"二是在《大共和日报》做编辑，他优于常人的撰述能力得不到发挥。事实上，到1913年，东荪已经开始为梁启超主编的《庸言》写稿，《余之民权观》、《余之孔教观》就发表在那时。

近代中国，梁启超本是政党政治实践的先锋，也是提出"舆论监督"这一概念的第一人。在他的"舆论观"中，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基础和重心：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少这种打基础的自由--这样的见识，与东荪自然"心有戚戚焉"。

《庸言》半月刊初创于天津（1912年底）：梁启超刚从日本返回，"和袁慰革"之幻想还没被现实所击碎。"庸言"之取名、即循着他的理想，意味着平允之言，实用之言，独立之言。至于如何实现，在梁的想

象中，共和了，三大自由当不言而喻。直到1914年，在黄远生接掌《庸言》报之后，方才在任公理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言论独立的法律保障"。

有了法律就有了一切么？三纲五常随着政治制度消解之后，平民百姓还有没有精神生活的主导？在"信仰大破，人欲横流"的社会里，"诗书传家、忠厚继世"传统已不再，于是有了"定孔教为国教"的倡议--即使新派人物也知道，"富于科学的研究性"的美国人，却同时保有"笃于宗教的信仰心"。

这前后，康有为在上海发起"孔教会"，立孔教为国教，梁启超、蓝公武都是发起人，张尔田也曾担负重要角色。张东荪对提倡孔学"踊跃三百者"，但对"立为国教"，外加祭孔等等，则有不同意见--"无足为孔子增光，追亦画蛇添足之类"。他的《余之孔教观》先在《庸言》1913年第7期发表，随后又在当时儒学会的刊物《孔教会杂志》转载。

东荪另存几篇文字：《中国之社会问题》、《论宪法之性质及其形式》、也是在《庸言》上发的。比如他关于劳动/资本的一段议论：

中国今日正不患劳动者之多，但患工场之少尔。工场兴，贫民得其生计，则盗贼自然减少。语云：衣食足然后知礼义，殆不刊之言也。……资本家立工厂必为劳动者所大欢迎，决无有反对资本主义者……。

对比1949年刘少奇到天津对实业家的鼓励，恍如昨日。

届时当政的袁世凯，虽然被后世讥为大奸雄，却还没有无所顾忌到明言依靠"枪杆子、笔杆子"以维持其专权。他，还有后来的北洋派，在他们主政期间，对言论的干涉有限，加上新国民对新事物的期待，以及梁任公和其他撰述者在思想与遣词造句上的个人魅力，《庸言》很显活力。当时的大闻人、程砚秋的老师罗瘿公30还在《庸言》包下一个专栏，专讲近世掌故：《庚子国变记》、《德宗承统私记》、《中日兵事本末》、《割台记》、《中俄伊犁交涉始末》等，很拢人气。这年年底，梁启超在其家信中说：《庸言》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31注意：当时中国人口不足四亿，当局也还没有许诺"普及中、小学教育"。

1914年，袁世凯包揽御用参政会，梁启超受聘为参政员。这实在太过分了，当即遭到相当一批进步党党员和各界人士指责。张东荪虽非该

党党员，也决定不再为《庸言》撰稿。

估计梁是在他最高官位（司法总长）上悟出自己的被利用与耍弄的。他与袁的关系，最后只剩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则告别文告--但这只属于学人心迹自剖，几乎不具政治运作功能。其实，专制者的政治嗅觉和对于"孰个劣孰个不劣"的判断，向来准确。对意志坚强、方法对头，而且软硬不吃的宋教仁、黄远生、汤觉顿诸人，老袁终于拿出的，是肉体消灭一招。

可能因为家安在了上海，也可能因为专业领域与人脉联系之所在，到了1914年，东荪开始为另一份新创的刊物《正谊》杂志（编辑人谷钟秀）撰稿--也有一说是"共同创办"--他与沈钧儒的交谊正始于这前后。32

谷钟秀何许人？他与张尔田同龄，民国以来，一直是政学会要角。谷氏为直隶定州巨室，谷门"钟"字辈兄弟早年赴日留学即加入同盟会，钟秀更是一位长于权术的领袖。辛亥起义之初，十一省代表齐集武昌，钟秀即以直隶谘议局代表参加，属于创立民国之元勋。想来他与张东荪结识，就在那前后。迨南京参院迁往北京，钟秀当选为北京参议院议员。国会成立，改任众议员，与议长张耀曾相交颇深。《正谊》创办，正是孙文的以暴易暴、国会解散、制宪停顿之时--民初以来对新共和、对政党政治、对袁世凯所抱巨大期望已成泡影。

谷钟秀在这样的时刻编这份《正谊》杂志--取汉代董仲舒听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而"促进政治之改良，培育社会之道德"。33

张东荪对"正谊"的解说，更是充满激情："正谊者，阴谋之降符也；法律之保障也；政治之救济也；道德之渊源也。"34

说白了，他们感到，提倡国民经济的同时，社会一般状况已经变为"居匕者以利诱威逼，在下者群投汤赴火日趋于末路而不自觉"。"振兴社会刷新政治"已迫不及待--提倡正谊流以招"将绝未绝之国魂"。

张东荪更为细密的分析是：

第一，当时社会特色之一，是武力权力交相为用而阴谋迭生。新进人物不提倡正谊，而"以阴谋制阴谋，以手段制手段"，对于阴谋，作者认为唯正谊，亦即"圆满一己之义务而不侵占他人之权利"可以制之--依旧未脱儒家"正心诚意"的道德范畴。

第二，法津死物。法治之国不在于有法律条文，而在于国民有担保法律之能力。此能力可体现在一国的社会和政治能力上。"社会上之保障为众意，政治上之保障为自觉，法律上之保障为法力。众意生正谊，自觉生责任，法力生效力，三者有循环之关系焉。"由此可见，在1946年底的"制宪国大"上，他与挚友的分道扬标，并非意气用事或党派情绪使然。读者或许会联想到，1954年以来的共和国宪法，因为众意无由表达、处处依赖政府的"人民"缺乏公民自觉、党委领导下的法院无独立裁决资格，不恰如一沓废纸？这局面在五十年代之后愈演愈烈。

第三，对趋于腐败的政治，作者认为执政者的良心和自觉，以及由此而生的"个人责任"是良好的政治的担保。他认为政治家良心首先体现于"去私欲；去私欲则一切阴险手段尽消灭矣"。对比四十年代末的党国权贵，对比今日捞足了就往海外跑的贪官，—肚子书，且着迷于传统德治的张东荪显得多么呆气。

有论者认为，"以谷钟秀与杨永泰为代表的《正谊》派基本上照搬了儒学正宗的心性论，在学术与思想上皆无标新立异之处"，35著者以为未必公正。1915年张东荪发表于该刊的一篇长达万言的《中国之将来与近世文明国立国之原则》，正可作为反驳之证据。

在他看来，"国之支柱"，既不在版图人口，也不在GDP或者尖端武器，而在于"国民之人格"。中国国民人格的未发达，正缘于"政治之摧残"。至于摧残形态，则是我们中国人已经觉得如空气阳光一般无任何不自然的"政府干涉"（或如今日更加朗朗上口的"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党疼国爱"）。

但自由与竞争，对中国人，包括最优秀的人物而言，是不是太隔膜了些？与他们已经"融入血液"的揖让、容谅、中庸……是否太冲突？张东荪对此无丝毫回避。他说：

捉摸近世文明国之根本意味者，有章君秋桐之调和论及不佞之对抗论。不佞非敢自慢，实以为苟不及。

他自己虽然远离党务活动，但在认识上，则坚信为抗衡强大之专权，"社会上必须有对抗"，而"细观近日梁任公所言所行，似于对抗之理，尚不得其三味"：

第二次革命以前，即保持对抗之局，维系至今，绝无今之黑暗可断

言也。吾民无识，一闻党争，辄为不愉。于政府初立之秋，党争固烈，而吾民之恶党，亦同时增高。实则恶党与党争同属感情作用，绝无一分理由之可诉。吾人痛切言之，党争果偾事乎？党争果有损于国家之元气乎？当彼沸腾之时，鲜不为答，然自今日已无党争之际观之，则前次之党争实未偾事，且未尝致丝毫损害于国家。苟有闻吾此语而惊者，其人必仍留有当时感情之遗影，为其所蒙不能自立也。……

自由竞争为一切进化之根源，无自由竞争则无发展，吾民而欲束手待毙也，则永永束缚于一樽可也。36

怀有"国师"情怀的梁氏在理论上固然"不得其三味"，在知识上受足了西方教育的胡适又是如何对"蒋公"？费孝通等一干人对"伟大领袖"岂不更是惶恐趋附？　　1949年后，在"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粉饰声中，"对抗"何曾体现过？东荪所倡之对抗，不是一直到了蒋经国解除"戒严"后，才逐渐在台湾践行的么？

早在两年前，在另一篇《对抗之价值》中，他更提出现代政治中的"有形之对抗"，即摆到桌面的政治斗争，必须遵循"三原则"：

相反二势力，不使其中之一居于国家最高机关；

对抗二势力和平竞争，不得动用武力；

二势力之竞争应限制在宪法之下。37

可以说，近、现代中国，没有一个杀向政坛的势力（或个体），能够遵循这些原则，包括如今的商场、职场。到二十一世纪：已然腾飞的中国，商场上最牛的一句话是"上头有人"；平民抗议，动辄武警（包括正规军）出场；而中共以纪委、政法委凌驾于各级法院之上，宪法还有尊严么？

1918年前后他曾坚决反对组党，个中要害也在能否对抗：

近代各立宪国之政党所以成立发达者，皆由于此也。返观吾国之政党为如何乎？除献媚于政府之外，不能有自由之主张；除屡进屡退之外，不能有活动之余地，此无他，对抗力不厚故耳。38

不仅当时的进步党、国民党，到后来蒋、毛时代，哪个非执政党不是如此？但强大的民间社会、洁白无私之政坛人物，能由《正谊》之呼

吁而生成么？就算这样的人物出现，就一定能让以"起事"为上上手段的革命党、以谋差事而吃国会饭的代表、议员们（如今是"被党挑中进入人大、政协"），能在对抗中求协商，协商下互谅互让，最终达成妥协，保障共和政体健康运转？能让现代民主政治基本观念：自由、民主、法制、政党，在济济一堂的政客中形成共识？

《正谊》出版了九期，到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宾天"，即告停刊。政治，凡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都知道，不过是利益与力量较量之后的妥协。利益在哪里？哪些力量可依仗？不仅《正谊》没有回答，东荪自己也已看到："泛言对抗与调和，而不从社会活气着想，终为无济耳。"

那时《新青年》还没有创刊，《文学改良刍议》也还没有出笼--此二者，被此后的正统史家封为启蒙运动之先声，"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再加上1919年5月4日的街头抗议，以及俄国人带着钱来建立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此四大件，套一句章士钊1962年说过的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

仅以在应用领域提倡白话文，《文学改良刍议》也算不上"号角"吧？且看这则京师自来水股份公司在1910年报纸上登的广告：

我们公司办这个自来水，是奉皇上旨意办的，全集的是中国股，全用的是中国人，不是净为图利啊。只因水这个东西，是人人不可离的，一个不干净，就要闹病，天气暑热，更是要紧。所以开市以后，凡是明白人，没有不喜欢这个水的。

没有一句违背胡博士的倡言吧？无论就遣词达意、情感抒发还是流畅通顺。

"溢量"，出于无知，还是政争？

但中国正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政论家张东荪的感受是：革命家、改革家、政客……，全都在"政治摧残人物、社会淘汰优秀"的基底上忙乱，"政象停止、社会苟安"。以民国三年之经验，他总觉"政治革命太速，社会革命太迟耳"；"政治革命若离开社会革命而独立，则为全无意味"，39　"必政治与社会分离，使政治之干涉范围愈小，则社会之活动范围愈大，于是社会以自由竞争而得自然发展也。"

有没有一点像中国七十代末执政的共产党决定给农民松绑的景象？至于中国"近世文明国立国之原则"，在他看来，既不是外汇存底，也不是

联合国席位，更不是以远远超过唐代和清代的"官吏/纳税人"比例：

国之支柱也，恃国民之人格。……

中国国运之兴也，不在有万能之政府，而在于有健全自由之社会。而健全自由之社会，唯由人民之人格优秀以成之。此优秀之人格，苟政府去其压制，使社会得以自由竞争，因而自然淘汰，则可养成也。易言之，中国之存亡，唯在人民人格之充实与健全，而此人格则由撤去干涉而自由竞争，即得之矣。于诸自由之中，尤以思想自由及思想竞争为最也。40

这是从最最细微处来讲"立国"了。这一观点，通贯其一生。但他自己呢？他后来的思想及精神生活处于何种境地？张东荪一生，没有离开过他的故国。从二十七岁立身立言，到生命结束的八十七岁，政府的压制，竟是一日甚于一日。我们今天讲他的故事，正为述说中国达到"近世文明"之艰难。

好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袁，以及后来广东、广两打的那几仗，与鸦片战争以来六次内外战争相比，规模都不甚巨，平静了几年的民间，获得休养生息。更因为自清末新政发布，至此已经二十年，"生死存亡迫使这个专制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与此同时，北洋诸武人，不仅不怎么干涉言论，对清末新政所奠定的自由经济的制度基础（人才成长、资金集聚），也未加触动。41

从南到北，整个中国社会（特别是大都市、交通发达的城镇），呈现久违了的活气。

羽翼渐丰的工商阶层和知识阶层自行其事，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这是不是就是张东荪寄予期望、看作一切变革之基础的"社会活气"？连他向来最不屑的"世风日下、淫邪奢靡之小说、在坑满坑在谷满谷"之代表《礼拜六》，也在"二十一条"面前表现出凛然的品格：发表"国耻专号"、搜集各报正义新闻。"哀情巨子"周瘦鹃也专门创作了《亡国奴日记》，最后还在"反袁救国"的游行示威中朝鼓吹帝制的《亚西亚日报》扔炸弹。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以不两只的风格，七手八脚地把老旧之中华拖向新时代。这难道不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更新？不是开始了延续至今的艰难启蒙？

这一年（1914年），他还与丁佛言等创办《中华杂志》；与汪馥炎、杨端六等在上海创办《新中华》杂志；并开始在章士钊于东京主办的《甲寅》杂志上发表政治理论方面的文章：《政制论》、《宪法与政治》、《吾人理想之制度与联邦》等。虽然不如他的挚友张君劢介入得那么具体而深入，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段时间，一直活跃地参与政治活动，"动了几年救国念头，从事研究政治"--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制度来介入。42

归国四年，就个人而言，成效卓著。一是"洋翰林"已成就为民初著名的政论家；二是已然为夫为父--成家立业是也。1914、1915年，两个儿子相继在家乡老宅出生，了却张家自1886年即不见添男丁的焦虑。二十一年后，这两青年同时考上全国每个学科只有一名的留美庚款名额，这就是后来相继归国服务的长子、著名昆虫病毒学家张宗炳，和次子、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

往后的两年，未见东荪有新作发表。不为别的，只因时局紧张起来。

1915年12月18日，梁启超为"倒袁"到上海，这是张东荪第一次见任公。同时会面的还有蓝公武、黄炎培等。一周后，护国之役爆发。第二天春天，梁到广西，东荪没有随同前往，但也一度被袁世凯通缉，避入租界。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认识他（梁任公）是在民国四五年，那时他到上海，我们大家共同反对洪宪帝制。自此以后，过从渐密。43

到后来袁世凯要做皇帝推翻共和，反对的我也是一个，不能说有功，但可以说，在反袁一幕中对得起自己的良心。44

他或许已经想到，扳掉一个显形的皇帝，并不意味着搬掉枭雄们套上总裁、主席冠冕的皇帝梦；更无法把忠臣良相转变为现代政治家：

倒袁的时候，我以为这是化除政争的好机会。因为到了那时，无论缓进激进，无论极权分权，无论总统制内阁制，而共同的敌人只是帝制。既有共同的敌人必须有联合的战线。联合战线一经组成，则党争便可化除。久而久之，养成一种联合的习惯或同盟的习惯。不料倒袁以后，各方面所得的教训却正是一个反面。他们不但不认为与人合作为必要，却反而以为以前的排斥人家没有彻底。于是大家都想来一个彻底的

排斥。45

1918年末，梁启超同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以半官方身份考察欧洲。上船前夕，"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46

"从思想界尽些微力"，张东荪从此"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以"教育、著书、译书"终其一生--多么些微的愿望。唯独在二十世纪之中国，则几近奢望。对日后时局之险恶，容不得他们从容办教育和出版，显然没有足够估计。

虽然应梁之请，慨然接手护国军时期"唯一之言论机关"《时事新报》，但他自己的志向实不在此：

弟对于政治，厌恶已深，以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将以译书著书报答与族众。即杂志与日报之言论事务亦颇思摆脱。将来如有教育事业可为，弟愿追逐于当世诸公之后。或兄等为社会活动，弟则以教育为助。兄等对于旧势力为炮兵、骑兵以事攻击，弟则愿守辎重，或作农夫，为诸公制造粮食也。47

可能正是这则宣言，引出了陈独秀在1920年9月出版的崭新面貌之《新青年》八卷一号上对他的揶揄：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48

对此，张东荪没有回应。我们在后边将会看到，无论谈与不谈，中国这方广袤贫瘠的土壤，理想家洒下的血，有时候连痕迹都留不下。

注释

1、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页450。

2、《增订张氏近世考》，为张家所藏家谱。

3、张尔田：《与人论昌明孔教以固道德书》，转引自左玉河：《试

论民国初期张东荪政治思想的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1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张尔田著作包《史微》、《槐后唱和》、《逸庵乐府》、《遁庵文集》、《蛮书校注》、《钱大昕学案》、《玉谿生年谱会笺》、《蒙古源流笺证》等。

5、见他的封笔之作《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1948）。

6、1952年代被"养起来"之后，东荪即作"独宜老人《草间人语》"：行年六十有七，始学为诗，继而又勉为词，乃竟忘老至，不自量力，妄欲与诗伯词宗抗手，亦良堪发谑也。三年间积稿，词得一百三十阕，诗七十首，录而存之，以诗附词后，共二百首……

7、张东荪：《人生观ABC》（上海，世界书局，1928）。

8、张东荪：《从事教育与问政治》，《国讯周刊》，第427期，1947年。

9、张东荪：《理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序论》。

10、张东荪：《新哲学论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自序》。

11、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正风》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5年1月。

12、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2月。

13、同注11。

14、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5、梁启超：《敬告留学生诸君》，转引自李安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述》，"中国新闻网"，（2003年8月8日）。

16、《爱智会之成立》，《教育》，第1卷第1号，1906年10月。

17、即Pragmatism，胡适曾为该词的中译大费踌躇，可惜的是，"实用主义"一词在中国也快一百岁了，却一直没有将它原本所含的"讲求实际、活跃执拗，实干且重贵效"等积极含义突出出来。在今日汉语里变得相当负面，几成无原则是非，一味取巧重实利。张东荪先生所译的"唯用论"似比较中性。

18、张东荪：《哲学家是什么？哲学家应该做什么？》，《时与文》第 1卷第5期，1947年。

19、黎鸣："任何人信仰的对象都只应该是超越的、抽象的东西，例如上帝、真理，或在社会生活和国家中，至少也必须是类似真理的副本--宪法。"至于那位明星，大家都知道，北师大于丹是也。

20、同注18。

21、《新燕京》，1952年6月3日。

22、张东荪：《唯用论在现代哲学上的真正地位》，《东方杂志》第20卷第15、16期，1923年6月。

23、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441。

24、张东荪：《中国之社会问题》，《庸言》，第1卷第16号，1913年7月。

25、英国诗人丁尼孙（Alfred Tennyson，1809-1892），今通译丁尼生。名作如《海斯佩丽德丝之歌》。原诗为：

Thou art mazed，the night is long，

And the longer night is near；

What！I am not all as wrong，

As a bitter jest is dear。

26、张东荪：《论真革命与假革命》，《展望》，第2卷第24期，

1948年10月。

27、同上注。

28、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序论》。

29、居正（1876-1950），1900年中秀才，1905年赴日本法政大学预备部。同盟会元老。1935年国民政府司法院正院长，1949年后任台湾国民党监察院委员，潜心佛经研究。

30、罗瘿公（1872-1924》，名惇，字孝通，瘿公为其号，以号行。顺德大良人。著名剧怍家。与梁鼎芬、曾习经、黄节合称"近代岭南四大家"。曾官至邮传部郎中（清代）与国务院参议（民国）。藏书繁富，特别留心当代史料的搜集辑存。

31、丁文江、赵堂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页661。

32、陶菊隐《政海轶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有一则"办共和"："民国三、四年，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选举科主管干事杨永秦、干事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张耀曾、伍先建、仇鳌等。文事部主任干事杨光湛。政务……。"

33、谷钟秀：《发刊词》，《正谊》，第1卷第1号，1914年1月。

34、张东荪：《正谊解》，《正谊》，第1卷第1号，1914年1月。

35、黄岭峻等：《民国初年：道德规范的寻求与传统文化的回潮》，《江汉论坛》，2005年第11期。

36、张东荪：《中国之将来与近世文明国立国之原则》，《正谊》，第1卷第7号，1915年2月。

37、张东荪：《对抗之价值》，《庸言》，第1卷第24号，1913年11月。

38、同注36。

39、张东荪曾记有一段趣闻："我记得君劢与稚晖在德国的时候有一段趣话。那时正在推翻袁洪宪，张君劢说，我代表立宪党，你代表国民党，我要求国民党先让立宪党执政五年。雅晖不答应。原来他们都没有得国内的消息，哪里晓得全没有这么一回事呢！"参见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

40、同注36。

41、袁伟时：《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二十一世纪》（香港），2001年2月号。

42、同注9 。

43、张东荪：《我亦谈谈梁任公辛亥以前的政论》，《自由评论》，第19期，1936年。

44、同注26。

45、张东荪：《党的问题》，《再生》，第1卷第3期，1922年7月。

46、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47、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号，1920年7月。

48、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

二 现代学人

1 办报

1917年，张东荪接手《时事新报》。那时候，这份报纸不但已经有了近十年的历史（如果从汪剑秋创《时事报》、狄葆丰创《舆论日报》的时候算起），其间在张君劢、黄群任事期间、即袁世凯称帝前后，还相当火爆。那回，《时事新报》先是发表邵飘萍极力倡导新闻救国的《论新闻学》；接着，和北京《国民公报》呼应，公布袁的复辟密电，在全国形成绝非老旧中华帝国所能有的"舆论"；紧接着，是流传于后世的时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1

张东荪这回接手，算是真正有了自己的阵地。对他而言，最须恪守的，自然是言论的尊严和人格（报格）的独立，诚如梁启超（署名时事新报同人）在《时事新报》出满五千号时候所写：

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线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滋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2

而最拿手的，对东荪而言，应是论说、时评与对西方学术文化的译介了。这几项，应该说是创造性继承而非创新，因为《时事新报》从来就不是一份娱乐或商业性报纸。

1918年元旦，柏格森的《创化论》（张东荪译）开始报上连载，共三个月。3这位曾因为"文笔优美、思想富于吸引力"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27年）的法国哲学家、历来强调"创造与进化并不相反，因为宇宙是一个'生命冲力'在运作，一切都是有活力的"。他反针科学上的机械论，心理学上的决定论与理想主义。颁奖的瑞典学院认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在批判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机械论和决定论，以及解放人类思想方面，具有巨大意义。

《创化论》是柏格森1907年前后在欧洲发表的，正是东荪留学日本的时候。想来那时他们就读到了这部著作。从他随后动手翻译，并介绍到中国，前后不过十年--那时柏氏还没有获奖。

接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影响深远、并孕育出大批优秀文人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出笼：

方今社会为嫖赌之风所掩，政治为私欲之毒所中，吾侪几无一席之地可以容身。与其与人角逐，毋宁自辟天地，此学灯一栏之由立也。4

开篇，即是一直困扰张东荪，让他时刻牵挂于心的主题：教育。

近来吾国教育弊端百出，如学制之荒谬、教员之堕落、学风之卑下，此外邪说披猖，道德陵夷，尤为伤心之象。苟有人焉，以铸鼎燃犀之笔，为之一一揭发，与纰缪之主义激战，以其文字投诸本报，当敬为披露，并愿以优厚之酬资，为定交之纪念。5

可能觉得如此抽象的号召，在八股、制艺、策论依旧盘桓于文人（哪怕没了辫子的）头脑的时候，还不足以得到生动、活泼、具有战斗力的文字。几周后，再发"启事"：

本栏征求全国中等以上学校调查报告（详述历史沿革及现在状况，如能将校长照片及校舍摄影附寄，尤所欢迎）。诸君如以平日参观所得，赐稿鄙报者，无任欢迎。6

光号召还不够。他通过专栏设置，让投稿者清楚明白自己议论的方向与方式。"教育研究"，"教育界消息"，"讲坛"，"学校指南"，"青年俱乐部"……逐一开辟。《时事新报》的这个综合性副刊，占了整整两版：随报附送，也可单独订阅。因为初创，总主笔不得不亲自撰文以打下根基。据研究者翻检旧日报刊，在头一年的前八个月里，仅"讲坛"一栏，张东荪就为《学灯》写了《国人读书力之缺乏》、《中西思想之绝对相反》、《说鬼》、《论译书》、《论报纸》、《运命思想亡国论》等十数篇论说。对"教育小言"栏目也是如此。

当时《新青年》杂志创刊三年，正处于它声誉最高峰：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

呜呼！太西有马丁·路德创新教，而数百年来宗教界遂开—新国土；有培根、狄卡儿创新学说，而数百年学界遂开一新天地。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已呈！（吴虞）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中国人要过"现代生活"，就必须与孔教决裂，与孔教为核心成分的整个旧文化、旧伦理，旧道德、旧思想，甚而旧风俗、旧习惯决裂。（胡适）7

张东荪没有对陈、胡、鲁迅、吴虞的言行做过抨击。他对于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毛泽东语）看来并未认同。更为关键的是，他对口号式革命委实不敢恭维。有趣的是，在五四文化论战中，他的对手是章行严和梁漱溟。他主持的《时事新报》明确提倡：

对于原有文化，主张尊重，而以科学解剖之：（读者须知我是主张用科学，即民族心理学、人种学、地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来研究东西文化的。）

对于西方文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调和而一并输入，排斥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

他的根本观念是：

我们若认定中国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我们就该尽量充分的把它输入，不要与那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挑战，因为他自然而然会消灭的。8

所谓"浅薄科学论"，以他们当时的见解，显然指西方流行的"科学主义"或曰"科学万能"论：

只讲"德、赛"两先生是不够的，还当讲"费先生"（哲学）。欧战后西人想到了须请"费先生"出来，讲个根本和平的办法。因为费先生是很可以

帮助赛先生达他的目的，并且人类应该有一种高尚的生活，是全靠费先生创造的。总之，前数十年是赛先生专权的时代，现在是赛先生和费先生共和的时代。这是欧美一般赛先生和费先生的门生所公认的。何以贵志只拥护赛先生，而不提及费先生呢？9

张主笔亲自编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先是刊载外国文学译著（1918年12月首发），到1919年4月，开始发表国人的创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第一年（1918年）3月创刊，《学灯》先是每周一期；两个月之后每周二次，到年底已经是每周三次；第二年干脆改为日刊，本来星期日休刊，后来为作者、读者所鼓舞，终于逐日发行。

这年6月，新辟了"社会问题"、"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等专栏。受欢迎的作品有介绍无政府主义、杜威实验主义、新村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杜里舒、罗素、柏格森唯心主义哲学的译著，也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在文学方面更是不拘一格，先后介绍托尔斯泰、安徒生、莫泊桑、哈代、屠格涅夫、魏尔兰、波特莱尔、爱罗先珂、惠特曼、左拉等不同流派的作家，出版"歌德纪念"和"但丁六百年纪念"专号。

那时的"当代文学青年"，受到《学灯》热情鼓励。宗白华应张东荪之聘，在《学灯》上增设"新文艺"专栏，开始刊载新诗。郑振铎征得张东荪的同意，在《时事新报》上开辟文学副刊《文学旬刊》。三次在他处投稿而遭拒的郭沫若，其"火山喷涌"般的诗作（《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鹚》、《死的诱惑》、《凤凰涅槃》），就是从这里突泄而出，从而"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10--1919年夏天，这名正在海边磨蹭着不想念医科的穷学生，接到主笔张东荪的来信，请他将手边零星翻译的《浮士德》"整个儿译出"。

沈雁冰的一系列白话翻译小说《在家里》（契诃夫）、《一段弦线》（莫泊桑）、《情人》（高尔基）……也是在《学灯》上发表的。日渐成熟之后，候补文化官员的演练也陆续出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

随着一个又一个博学、热诚、人脉广阔的编辑11的引入，特别是主笔在选题、观点、行文风格上开放，《时事新报·学灯》实在可称为新斗士、新文艺家的沃土 。

蔡元培的《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发于1920年元旦

的《时事新报》增刊。俞平伯读了他的《石头记索隐》之后所写的批评文字《对于〈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也发表在这里（1922年）。郁达夫处女作《银灰色的死》，发表于1921年。徐志摩的诗《听槐阁之讷乐剧》和《康桥再会罢》，也在这里连续推出。

还有张闻天的《对于中华书局新思潮社管见》也上了报。

在早期共产主义者中、最具学者气质者属张闻天。他在给张东荪的信里说：

吾们且看现在青年普遍的心理什（么）样？他们自己没有对于各种学问做根本的研究。人家要研究问题，他也加入研究，拿他的直觉写出来。写出直觉还不要紧，而心目中另抱出风头的目的。……在思想改造的时代，此种事情当然免不了。但是此种现象，只能一现，长此以往，国家破产、思想破产。12

毛泽东1920年5月抵沪，继续驱张（敬尧）《时事新报》成了他的言论阵地。《湘人为人格而战》刊于6月9日。待到驱张成功，又接着发了《湖南人再进一步》。他那篇"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胡适语）的《民众的大联合》经俞颂华之手，在该报全文转载。后来又为《时事新报》撰写了《反对统一》，认为各省自决是改建真中国的唯一的法子：

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取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13

出身清苦的潘汉年还只有十七岁，就已经《时事新报》的订阅者。他十四岁开始在家乡当小先生，第一篇论述《打破小学教科书之我见〉就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接着，又发表了《致张东荪先生的信》（1923年10月20日）、《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1924年6月7日） 和《到乡间去--为暑假学校问题，敬与王平陵君讨论》（1924年8月26日）等。

"她"字的诞生和普及，《时事新报·学灯》功不可没。刘半农的《"她"字问题》和相关争论，1920年在这里发表。闻一多《一个观念〉那首诗（收于《死水》）也是该报首发。

鲁迅无疑是《时事新报·学灯》的读者。虽然没有主动"赐稿"，但涉及了不只一次的论争。如对大学生胡梦华批评《蕙的风》的批评；对驳

吴宓《新文化运动之反应》的评论等等。14为回应他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对《时事新报·泼克》副刊讽刺画的批评（"我辈即使才力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时事新报》则发表署名"记者"的《新教训》，骂鲁迅"轻佻"、"狂妄"、"头脑未免不清楚，可怜！"（1919年4月27日）

还有胡适痛批周作人"新村运动"的演讲《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1920年），质问他怎么能用改良手段去"变旧社会为新社会，变旧村为新村"？

担任主笔的张东荪主要主持言论，在青年编辑眼中，很有老夫子派头：

（他）每天下午来馆，处理论说文稿（自撰社论，审阅特约专论、来论、译述文着）和《学灯》稿件，交排字房后即回家。有时社评回家去写，则指定工役专人于晚间去他家取来。15

1920年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时候报纸所持姿态，很具东荪特色。何思诚写道：

（届时）从南到北，骤然煽动起一股破坏学生爱国运动的逆流，厚诬青年"旷课不读书"，大叫大嚷"回课堂去"，气焰甚为嚣张。就中以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罗家伦之流，纷纷提出口号、发表文章，此唱彼和，最为卖力；而《时事新报》和《学灯》也大喊"学生上课"，遥相呼应。从这时起，《学灯》的报头上（即刊名上） 绘了一幅小图案画，排列着"哲学、文艺、科学"三本书，作为提倡读书的标签，借以眩惑一些人的眼目。16

曾第任《时事新报》助理编辑、要闻编辑、编辑主任，最后担任副主编（从1923至1931年）的何先生，在二十世纪末对自己报纸所作批评，特别具有旧文人接受党改造的热诚：

如问读写什么样的书呢？只要一看该刊尔后所端出来的一套"大杂烩"货色，就可窥见一斑了。例如：哲学，巴罗素、詹姆士、杜威、帕格森等的东西都搬动过，甚至对尼采的超人主义，叔本华的厌世主义，以及斯蒂纳尔的极端个人主义，也无例外地吹嘘。社会科学也一样，趁罗素、杜威、孟禄、杜里舒等人来华讲学时际，多方稗皈他们的唯心主义观点，连篇累牍地刊登他们的《教育哲学》、《社会结构论》等讲稿，

宣扬不遗余力。17

梁实秋在回忆文章《我的一位国文老师》里，写到《时事新报》及其主笔，在那个新旧交错时代的社会影响：

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林琴南致蔡孑民书》是他讲得最为眉飞色舞的一篇。此外如吴敬恒的《上下古今谈》、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以及张东荪的《时事新报》社论，他也选了不少。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提高了不少。徐先生讲国文之前，先要介绍作者，而且介绍得很亲切，例如他讲张东荪的文字时，便说："张东荪这个人，我倒和他一桌上吃过饭。……"这样的话是相当地可以使学生们吃惊的，吃惊的是，我们的国文先生也许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吧，否则怎能够和张东荪-桌上吃过饭？18

《时事新报》首发作者茅盾，成名而后成官。即使晚年回忆也不失最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的立场（望读者特别注意此"人生之成功者"对分寸的拿捏）：

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夏之交，五四运动爆发了。在它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学生杂志》不适合刊登的，我就投稿给上海的《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由于我常在《学灯》上投稿，《时事新报》的主编张东荪办《解放与改造》时就约我写文章。张东荪属于研究系。研究系在政治上属于右翼，但在"五四"运动后，也伪装进步。张东荪甚至还与陈独秀他们共同商议发起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解放与改造》刊登介绍外国各派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登载拥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但当梁启超（研究系首脑）从海外归来，态度即变。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社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即为自己重复右倾找"理论根据"，以后就不谈社会主义，且反社会主义了。……《解放与改造》上有一栏叫"读书录"。……我在这上面介绍的第一篇是张东荪给我的材料，叫《罗赛尔〈《自由的几条拟径〉》（《解放与改造》一卷七号），小题目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罗赛尔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那时已是一九一九年尾，我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我觉得看看这些书也好，知道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学派。那个时候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

那是在1920年，商务印书馆当局还没有约我主编《小说月报》的时候，《时事新报》的主编张东荪见我经常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投稿，认为发现了一个人材，有意要拉我到《时事新报》工作。大约是七八月份，他因事离开上海，把我请去代理了二三个星期《时事新报》的主笔。也就在那一段时间，我在《时事新报》上写了一些短文。后来，我终于没有被张东荪拉过去，一则我要编《小说月报》了，二则，这也是主要的，因为我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而张东荪却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了。19

至于后世论者所说"'五四运动'后，《学灯》益趋保守，逐渐沦为抵制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舆论阵地"。20这，我们知道，已经属于宣传官员的套话。

至于那个直到二十一世纪才得到史家注意的中国命运之关键转折--陈炯明反对孙中山未成，《时事新报》或者就是主笔张东荪，则对此见解鲜明。他坚决反对武力北上，主张各政治势力合作妥协。其反对革命的意向，直接表现在版面上。何先生记载：

3月12日孙中山在京逝世那一次，当电报传到上海时，《民国日报》……进步人士……深表哀悼。但仅有几步路相隔的《时事新报》，在接到京电之后，第二天就在刊登孙的逝世新闻的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孙文死矣》的社评，态度之恶劣　，达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在通篇充满敌意的社评中，竟说"孙的精神，早已死于他和陈炯明破裂之日，今死者，仅其躯壳而已"。可胃极尽了恶毒诽谤放肆攻讦的能事。21

这样的社评（《孙文死矣》），在二十年代中期，张东荪等报政主持人看来，不过一己之言论，没想到当天下午，就"吃到了一枚炸弹"。而到1927年革命军进占上海之后，贲临大员张静江劈头质问《时事新报》访员的，竟是"为什么一再讥讽我们？研究系真不是好东西"；"不要以为躲在租界里就惊动你们不得，我还是可以封你们的门，试试看！"

在张东荪主持报务时期，由于当局的压迫（不允许到租界以外发行），经费窘迫之阴霾从来不曾散去，有时候到了主笔须捐出自己薪水的地步。

《时事新报》对社会的覆盖可说相当广，但几乎没有农民和农村研究，也少见银行、商会、企业家、金融家论说，虽然曾有一位应修人（1900-1933，湖畔诗人、烈士），在给主持《时事新报·学灯》笔政的

张东荪的一封信里，说他要痛下决心，投身农界，"改良农业，造福农民"。

接办《时事新报》的同时，亦即梁出国前夕通宵畅谈前后。他们一批人还成立了一个"新学会"--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的心变，以作为"新中国"的基础。《新学会宣言书》由东荪执笔起草：

我们现在创办这个"新学会"，就是抱定……第一，我们现在承认国家的革新是没有取巧的捷径的，是必须经过那条思想革新的大路的。第二，我们承认学术思想的革新有—条捷径，那条捷径就是研究欧美先进国几百年来积聚所得的最后的结果。……我们的希望是研究世界最新的思潮、最新的学说，用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种种问题的参考材料，再尽我们的能力把这种学说传播出去，使全国的人都添无数参考印证的材料，使中华民国的思想有一些革新的动机，使中华民国的新生命有一个坚固的基础。22

"新学会"当然要有自己的会刊。《解放与改造》杂志于1919年秋创刊。张东荪的《第三种文明》就发在这期上。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从人类文明的分期谈起：

人类的文明，自有历史以来，可以分做三个时期，每一时期各有特征，可以说第一种（习惯与迷信的文明）、第二种（自由与竞争的文明）和第三种（互助与协同的文明）。23

他认为，二十世纪前的数百年，是西方社会经历"自由与竞争"、也即"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文明"的蓬勃期，而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绽一齐暴露了；也就是说，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

我们说大战比如春雨，第三种文明的萌芽经了这春雨，自然茁壮起来。但是尚须吸取阳光，才能成熟。

那"互助与协同的文明"，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呢？张东荪认为，

因为尚未成熟，不能详细帮助。然而也有几点可以预言的：

一、思想上道德上必定以社会为本位。

二、经济上必定以分配为本位。

三、制度上必定以世界为本位。

四、社会上必定没有阶级的等次，虽不能绝对，也须近于氷平线。

对照今日，不能不为他们当年敏锐、精当的思虑鼓掌。当然就分期而言，以我们今天对世界的有限观察，有大约二十至三十年的误差。24

中国能否跟上世界的步伐；

不过我们有一个最苦痛的地方，就是中国今天的现象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人聚于一堂。虽则欧美先进国也是复杂的，他们的思想也有差池，但是新的究竟居多数，且相差也不甚远。我们则不然，一则开化很少，二则距离得大远。大多数的人仍逗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不但没有第三种文明的资格，并且也没有第二种文明的陶养。这个真是苦痛极了。

后进的先觉者之苦痛证之于李璜：

自五四以来，这十二三年间，我们真是受不了。十五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所有"人性"的要求，十七八世纪启明（蒙）运动所有"个性"的要求，及十九世纪的"国性"的要求，三样东西一齐来，怎不令青年朋友要发狂了呢！25

但我们的主人公居然越过孙传芳、蒋中正、毛泽东和邓小平，直接预言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

世界改造以后，必定是取互助主义与劳动生活。互助主义不必说了。从劳动生活说来，我们人口很多，生活很低，自然能取得一个地位。不过大改造未成以前，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不能不有一个办法。据我看来，第一是文化运动--广义的教育；第二是设法变外货为外资：第三是移民。

什么样的文化运动呢--

提倡互助的精神，培植协同的性格，养成自治的能力，促进合群的道德。

而"提倡"、"培植"、"养成"、"促进"，绝非革命性格，无不指向教育与渐进的改良。在这样一个新阵地，当时的战士，虽然在笔战上火花迸

溅，并没有党伐之戾气。陶菊隐说：

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是北大，研究系与这股暗流早有合流共趋的迹象。张东荪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蓝公武在北平办《国民公报》，陈博生办《晨钟报》（《晨报》前身），都是文化运动的前驱。26

虽然没有随梁启超到欧洲"旁观和会"，留在上海的张东荪十分关注他们的行程，特别致书张君劢：

公等此行不可仅注视于和会上，宜广考察战后之精神上物质上一切变态。对于目前之国事不可太热心，对于较远之计划不可不熟虑。27

1920年，梁启超从法国回到上海，雄心勃勃，打算办报、办刊、办大学，要推动留学、组织学术社团，还要办贸易公司、轮船公司……但中心还是文化运动，一如艾恺所说，践行他"不断将西方思想对中国引介的事业的一个延长"。

当年5月，梁将《解放与改造》更名为《改造》（由新成立的"共学社"主办），将基尔特社会主义精神向"实际的方面"贯彻，宣传温和的社会主义，主张脚踏实地的社会改良。

除了作计划，"以浅近简明为主"系统编译西方名著外，他们还打算专门聘请外国学者来华演说--"讲学社"应运而生。经费哪里来？董事捐款：当时中国社会已经有此能力。周沸海记得他从日本给《解放与改造》投稿的日子：

第一年除学校功课以外，专门只看社会主义的书籍，……当时梁任公一派的人，在上海办有《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刊载出来，稿费非常丰富。这种稿费，大部寄回家养母，一部拿来买书。

民国九年夏天，动身（到杭州）之前，到《时事新报》馆访张东荪。他是《解放与改造》的主持人，我因投稿的关系，和他常常通信。我到了报馆，他还没有到。……后来东荪来了，却谈得非常投机。他们当时组织"共学社"，翻译名著，请我也来译一本，我便担任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张东荪告诉我，陈忡甫（独秀）要见我。……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人吴庭斯基在座。……28

这次渔阳里会见，就其历史份量与场面戏剧性而言，精彩之极--这我

们在后边还会说到。

除了办刊，"共学社"还曾邀请国际大学者来中国讲学，如英国哲学家罗素、印度诗人泰戈尔、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等。本来还要请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柏格森等，因故未成。当然最大的成就还是编译新书，仅1922年就出版了四十多种，总计大约一百多册。引入了许多社会学、哲学方面的书籍，涵盖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不同的思潮。

在这期间，在这批政治、社会理想相近，但学理、见识尚有切磋余地的伙伴间，还发生了一场后世为"科玄之争"的辩论--今天有论者认为是"中国现代哲学真正的逻辑起点"。29双方的言论阵地就是丁文江主持的《努力周刊》和张东荪任主笔的《时事新报》。

事情的开场极为平常，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根源早在他们游欧、在批评"浅薄的科学观"的时候就埋下了。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人生观"，认为人生的问题不能仅用科学来解决，"意志自由"就是一例："人生观为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人格各异而是单一性的"，"科学"则是"客观的、为论理方法学所支配的、分析的、受制于因果律的，起于自然之齐一性的"，"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自身而已。"

地质学家丁文江（同时也是张君劢的至交）见文"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科学的进攻。立即撰文回应，拥护胡适所提"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和需要，即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称张君劢被欧洲来的"玄学鬼"附身。"科玄论战"开场。

张东荪是在"科学派"已经取得压倒声势的时候才上阵的。他先是在《学灯》上发表梁启超、孙伏园的答辩文章并加按语，接着，在刊出林宰平的重头文字《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以及陆志韦的《"死狗"的心理学》之后，终于按捺不住：

其事起于张君劢论人生观而又轻蔑科学之言。丁在君起而维护之。一方以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故人生观不能统一。他方以为凡人生无不可入科学，故终可得一定于一尊之科学的人生观。丁在君之维护科学，是也；乃因维护科学之故而侵犯哲学，痛诋玄学为无赖鬼。于是爱哲学者，如屠孝实等，为之抱不平焉。余亦其中一人。30

只因为我有个脾气是不喜欢锦上添花而只喜欢雪中送炭。在丁先生第一篇文章发表时，就有人来报告于我，说丁先生方面已预备有许多人对于张先生自己一个人来"群起而攻之"（这个话本是谣言，不过《努力周报》迄至今日除张先生自己的文章外，所有谈到"科玄论战"的无一不是反对张先生的）。我当时听了这个传闻，虽明知不可靠，但却预料丁先生方面（即攻击张君劢的方面）总不会寂寞的，用不着我来凑热闹。于是我决定对于丁先生来烧一烧冷灶。31

张东荪这篇《科学与哲学--一名从我的观点批评科玄论战》，为台湾学者叶其忠评为"对科玄论战最有份量的论著"。32

不久，"唯物史观派"参战。现在尚不见有研究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述，这一"参战"行动，究竟是该党早期的组织行动，还是他们自己的言论抒发。但"高瞻远瞩"凌驾一切、特别能扣帽子，以及"亲不亲，阶级分"之特色，已跃然纸上。见共产党人邓中夏的评述：

东方文化派……他们真狡烩！他们如道光是摊出东方的旧古董来，恐怕不能博得青年们的叫好，于是乎不能不翻个花样，好搅乱青年们的眼花，麻醉青年们的神经。"东方文化派"可分为三条：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为一系……梁启超一系，底子上虽然是中国思想，面子上却涂满着西洋的色彩。他们讲玄学，却把西洋的玄学鬼如柏格森的"直觉"，倭依铿的"精神生活"，欧立克的"精神元素"都搬来作他们的幌子。这是他们的花样了。

东方文化派可说代表农业手工业的封建思想（或称宗法思想），科学方法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资产阶级思想，唯物史观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有他们的背景。33

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包括在内）、梁漱溟，政治中的研究系，……教育中之黄炎培……等这些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34

到了年底，东亚图书馆将双方的文章归并，编成《科学与人生观》，由陈独秀、胡适作序。

陈独秀认为重要的是"历史观"，而非"人生观"。个人之"情感"、"意志"、"信念"、"良知"，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苍蝇嗡嗡叫而已：

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35

胡适则断言：

我们要知道，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几个反动的哲学家，平素饱餍了科学的滋味，偶尔对科学发几句牢骚话，就像富责人家吃厌了鱼肉，常想尝尝咸菜豆腐的风味；这种反动并没有什么大危险。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决不是这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36

胡适怎么如此遣词？无论从做人与问学，都显得反常。不幸（或有幸）他当时不为人知的信函逐一发表。读过这封致陈独秀的信（1920年底），我们或许得以窥得胡"博士"更深的内心活动，比如说，好（此处须读第四声）名位？（信中之"他"为梁启超）：

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37

张君劢二十多年后，在为张东荪的《思想与社会》作序的时候，更透彻地阅明了自己的观点：

吾辈当时提倡此派学说，初非由柏氏反对黑氏，乃由此派哲学侧重人生，尤好言人生之特点，为自由、为行动、为变化，正合于当时坐言不如起行，唯有努力奋斗自能开出新局面之心理。

科学主义并非科学，只是一种幼稚浅薄的哲学，科学不能包笼一切。共产党取此念时为努力抹杀科学之外的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这是典型的"五·四"之后的浅薄思想，最终为政党所用。

决心以激进的革命改造中国、并且成功获得政权的共产党怎么看待这批人的努力呢：

刊物发表了大量宣传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文章，提出要"从唯物主义转到精神主义"，"去马克思而返于康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反封俄国十月革命，强调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资本主义，企图把革命高潮拉到改良主义道路上去。他们的言论受到了《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的批评，引起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38

然而自视为马、恩嫡传的共产党人，无论在当时还是掌了权（包括绝对的话语权）之后，都不见提及恩格斯的这段话：

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道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39

《解放与改造》虽于1919年9月创刊于上海，却以北平"新学会"名义出版，一共出了两卷共二十四期（主编张东荪、俞颂华）。一年后，从第三卷开始，更名《改造》（主编梁启超、蒋百里）。改版之前，也即该年7月，张东荪把他和张君劢讨论国事的三封往来信件发表了，标题是《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主张中国只能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而不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路。

《改造》出到1922年秋天的第四卷第四十六朗，也告停刊。

1925年10月，徐志摩担任《晨报》副刊主笔，发起了一场"对俄问题"大讨论：中国对苏俄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的一个毒瘤，里面的脓水已经满了，但是却没有独立见解的人去触动它--即日后著名的由"首都革命"好汉"火烧晨报"的直接动因。张东荪发表《甘地动机与马克思动机》参加辩驳。

1927年，北伐军拿下上海。由张公权作伐，史量才购进《时事新报》。他的初衷当然是期望保住这份报纸在上海所具之影响力，但无论政局，还是勉为其难的留守人员，都已无法坚持原先风格与方针。被革命军作为"学阀"而通缉的前主笔，留在报社已没有可能。

用何思诚的话说，就是"迭经内部商讨，对张东荪言论失策啧有烦言。张乃悻然引退，拒不到馆"，"张东荪的离职，在该报来说，虽移开了

一大目标，但沉淀于某些人心胸中的不愉快，总不是一下子所能澄清冰释得了的。"--这里的"某些人"，指的应是刚刚端着枪、打进上海的权势人物。待到蒋介石的"文胆"带着国民党的宣传津贴费入驻，取悦当道、竞逐猎官，已经成为这份曾经生机勃勃的报纸的基调--其生命自然也就终结了。

本来已经在中国公学以教务长代理校长职务的张东荪，经此事变，"顺理成章"地从办报转为办学。

2 办学

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返国，应邀到中国公学演讲。

清代规制，民间只许办中学和小学，成立于1906年的中国公学，遂成为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百年过去，翻检发黄的纸页，品咂一拨又一拨人对它的描述，随着述者的不同喜好与立场，只令读者堕入五里云雾之中--同盟会办的？立宪派办的？革命的大机关？现代学人的政治基地？比如先做学生（1906年）后来又做校长（1928　年）的胡适的叙述，40就并非无意地不提梁启超在1915年和1920年间的努力。

最有意思的是，这所大学最初的筹办者，竟是在读的学生。

1905年，清廷驻日公使馆与日本文部省共谋、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目的当然是为剿灭留学生中的革命活动。那年，我们的主人公张东荪正蜷伏在东京本乡丸山新町的小屋里如痴如醉地读书；少年胡适刚到上海，尝试着用白话文编小说。但同盟会那时在东京已经相当活跃。这年11月，先有八千多名留日生罢课抗议，接着江庸、汪精卫、许寿裳等人发起"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复课派），　然后是"归国派"和"复课派"口诛笔伐，互相拆台。这里边还掺杂了清廷在上海张开的准备兜捕的口袋，以及孙文为保护革命同志命令"归国派"收敛等等。

但高潮中还是有三千多名学生退学回国。怎么办？留学生里边出现了自强的领袖人物。几名剪了辫子并着洋装的青年（绝对令当时上海人侧目）奔走、筹募，最后在北四川路租了一所民房，义薄云天地按照自己的理想，筹建了面向全国十三省的中国公学，并组建了体现民主与共和的执行、评议两部（负责校务）。他们策划了大学班、中学班、师范班、理化专修班等，聘请于右任、马君武等教员。可惜万难之中，原先的激愤与豪情多在冷眼与寒风中消逝，到1906年春天开班时候，只剩下318名前留日生。

骨干之一、担任最为艰巨的庶务的姚宏业，为唤起国人对公学的关注，愤而投黄浦江自尽；另一名骨干张邦杰也在两三年后，为校务尽瘁而死--都在二十上下的年纪。另一名从一开始就担任执行部干事的王敬芳同学坚持着，以无比的坚韧与见识，包括博大的心胸与灵活的姿态，混迹于高官、大贾、实业家与学界泰斗之间，终于撑到了1920年。

如果此时不是1920年，而是他们刚立住脚的1906年，激进学生领袖王敬芳或许不愿拉拢在《新民丛报》上连载"开明专制论"，并与胡汉民、汪精卫拉开架势辩论的梁任公。但此时公学已经走过了大佬提携（郑孝胥、熊希龄和两江总督端方，他们都属立宪派）、地方常款补助、民国政府财政拨款、大兵占领校舍、实业公司助款等各个阶段，它的创始人也一步步成熟--校长王敬芳已经是一名实业家，正担任着中国公学最主要的注资机构河南福中煤矿公司的经理。

在他的坚邀之下，刚刚游欧归来，带着满脑子见解和一肚子计划，而且在1915年曾经担任过公学校董会董事长的梁任公决定接办。他（以及校董会）的目标，是要把这所学校办成"文化运动、社会事业、政治运动"的重要基地。

经过反覆衡量--特别考虑到办学经费的筹措，任公请王敬芳继续留任，而自己一定殚精竭虑，多方活动筹款。至于金钱之外最关键角色，他选择了张东荪：教务长〈即代理校长）兼大学部主任。

这一年，王敬芳三十五岁上下，任公四十七岁，东荪三十四岁，从一开始就事无巨细介入的蒋百里三十三岁。

平心而论，梁启超这样的招牌人物，本是应该出任校长的，但为蒋百里反对掉了。他还反对使用"大学"二字，主张把精力放在"精"上，创办高深学问的学府。他认为梁启超必须到校教书，把任公活泼人格的研究精神作基础，采用中国古代书院和近代英国的讲座制。对此，张东荪是不赞成的，认为不仅近代教育与古代不尽相同，也不赞成以任公一人之人格为中心，而应依仗"一团人"（志趣相同者）之人格。东荪最看重校中之教员--不仅为学生，更觉得"许多学者，非设法养之不可，不然其学者之地位失矣"--"以教员之方法而养人才，亦为办学之目的也"。41

但一报一刊正入佳境，张东荪难于割舍。对此，梁启超的意见是：

公决任教务长，甚喜。唯同时摆脱报务，却可不必。挂名主持，大事乃过问，不碍事也。改大学今年已来不及，须俟来年暑假否？抑中途尚有改进之余地，请示覆。42

东荪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学校的规模、建制、课程、教师……的运作中。他之所以甘心跳进这样一所炼狱，当然主要出于对教育的理念。年轻的姚烈士十四年前遗嘱中关于"中国公学不啻我中国民族能力之试金石

者也"；中国的教育，"莫不有民立学堂与官立学堂相竞争、相补救……今我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张东荪肯定不仅同意，甚至愿意为此献身。

他投入运作。第一当然是选人--最先选定的是俞颂华，"应东荪邀请出任中国公学教授兼教务主任"。据这位教务主任回忆：

我在参加《东方杂志》工作之前，曾与张东荪先生同在中国公学服务度并担任些教科。他办学的时候，据我所知道，有两个特色：一是毫无党派成见，专门聘请好的教授；一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这话在那时中公毕业及读过书校友都能负责证明的。所可惜的，那时经费有限，而且他主持校政的时间亦不够长。不然，我相信中公一定能如北大和燕大一样有悠久的卓著的成绩。43

关于延聘好教授，俞颂华说：

有一个时期，我曾主持过教务事宜，要物色一位法律系主任教授。我请钱先生44介绍，他经过考虑之后，郑重提出谢冠生45先生，介绍我去和他先谈谈。那时东荪求贤苦渴，立刻同我去访问谢先生。谢先生同我们彼此都陌生，从未见过面，不过我们邀聘之意甚诚，并且有钱先生介绍，他信任钱先生，就也与我披诚相见，最后他竟欣然允诺。谢先生国学极深，我们还请他出其余绪，兼讲过一学期"国学门径"，全校选读此学程者真是十分踊跃。我们法律系的人才，经谢先生造就的很多。全校同学当时但知谢先生是国内不可多得的名教授，却没有一个人知，谢先生的执教"中公"是钱先生介绍的。46

东荪自己在中国公学担任"现代政治名著选"，选的是拉斯基的《政治典范》。这门课，原拟请张君劢来讲授，后来虽由张东荪讲授，用的却是张士林（张君劢笔名）所译的讲义。

努力延聘的人里边还有刘秉麟、舒新城。

年龄少东荪五岁的刘秉麟原曾是中国公学中学部及大学预科的学生（1909年-　1912年）。后入北大经济系，毕业后又回母校效力。在梁任公接管前，正担任着公大学部教务长，张东荪接掌后，他得以抽身到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班、德国柏林大学经济系研究员班进修。五年后回国，立聘为大学部教授兼商学院院长。

后来被冠名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辞书编纂家"的舒新

城，还不满三十岁，即受聘为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对这位精力无限的湖南人，东荪可说相当不陌生。1918年10月，作为长老会基督徒，并任职教会学校，他就有一篇文字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我于教会学校的意见与希望》），不意引起长沙教会教育界的严重不满，舒斗士只好卷起铺盖走路。转年秋，他又在长沙创办了《湖南教育月刊》，自任总编辑，以"研究我国教育应采之宗旨，介绍世界教育之思潮，批评旧教育之弊端，商榷新教育之建设"为方针。

1920年，一种新的，注重"个别教学"，也即试图将"关注个别差异"和"完成集体统一"融为一体的教学方法，所谓"道尔顿制"47传到中国。不知舒新城通过何种渠道获知这一成果，可以想象的是，满脑子全是如何改革中国教育的这名革新家，在得到这一信息同时又获得聘任时，有多么兴奋。这年秋天，"道尔顿制"开始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实验，并迅速得到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关注。与此同时，舒新城还在他的地盘上开男女同学之先河，并且把"选科制"和"能力分组制实验"、课程结构以及学生自治会改革等等一齐推上日程。不仅如此，他还招朋引类地延聘了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刘延陵、吴有训等一批少年新进。有趣的是，他所作的一切，无论在北京的梁启超，还是现场负责的张东荪、王敬芳，包括身临其境的或活泼或老成的学生，都乐观其变；对他的大力革新难掩反感的，竟是他的同事，也即后世记录者所说的"守旧派教师"（包括老派学生）。他们观念虽老，方法却时新："煽动学生闹事，排斥几位新教员"，双方都采取"强硬的办法"，互不妥协，风潮延宕。用胡适的话说："上海中国公学此次有风潮，赶去张东荪。内容甚复杂；而旧人把持学校，攻击新人，自是一个重要原因。"最后，张东荪离开中国公学教务长职务。俞颂华、刘秉麟、金国宝等著名教授也相继辞职。风潮结束。

到了1924年夏，张东荪曾再度受董事会推荐，主持中国公学。这回他辞去《时事新报》主编而专任。但很快就不再主持校务而专门教书了。

这不过是所有繁难事务中的一桩。

最主张东荪头疼的，是几乎所有学校都面临的，一口气都松不得的经费不继……。对这类有良心的校长都铁定面临的"死的心都有了"之局面。张东荪自己没有留下文字，48我们却可以参照他的同龄却不同经历的老友蒋梦麟（他也是1886年生，但没有在十八岁留日，而是在二十二岁上等到了庚款留美第一拨）就学潮和经费的记述。蒋梦麟提到，最大

的困难是校方与政府之间的经济纠纷，政府的校款总不能按时拨到，无法实行预算。政府只有偶尔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无法购置教学设备、扩充校舍，连教授们的工资都发不下去，真是伤透脑筋。学生要求更多的自由行动，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正迅速增加的白发。49

蒋梦麟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比喻自己就像一只飞虫投到了蛛网里，一不小心就有蜘蛛从屋角爬出来咬上一口，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就被吓退了。劳心至极也只有拿王守仁的四句话"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策驱虎如驱牛"来自嘲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任凭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之前，我不妨做些做人应该做的事。50

具体到中国公学，那一团乱麻的日子怎么过的？可见于1928年之后的校长胡适的描述：

十一年（1922），公学请张嘉森先生为筹办大学主任，计划改组大学事；次年（1923）张东荪先生辞职，由陈药山先生代理校长，即将原有之商科专门提高程度，改升大学。十二年夏，因添办高级中学，学舍不敷用，故将商科大学迁设上海。十三年夏（1924），董事会推张东荪先生任商科学长，陈築山先生专办高中。十三年之秋，江浙开战，浙军占用吴淞校舍，高中遂停办。十四年春间，商科大学迁回吴淞，同时筹划添设哲学、政治、经济诸学系，拟仿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制度，做成一个社会科学的大学。51

此时，中国实业尚未恢复，但大的文化环境，因为没有拿枪和掌控资源的"党"所规定的一统天下，中国学界可说自由之风吹遍大地：博大、镇定、自信。

1925年，与中国公学有着差不多的"一怒为自尊"经历，而且一直被目为中国最好的民办大学之一的光华大学，在一片反帝与自强的浪潮中创建。张君劢〈接受五省联防总督孙传芳之资助所开办）的政治大学（后改自治学院，吴淞政治学院，后为国民党查封）也开课了。张东荪在光华任哲学教授兼文学院长，讲授"伦理学"，同事有潘光旦、容启兆，王造时等。在政治大学，张东荪任哲学讲习，"张尔田、孙德谦等，任子史讲席，海外归来者，潘光旦、闻一多、吴经熊、吴国桢等，也各就所学讲授，一时称为得人，校声鹊起。"52此外还有张季直的吴淞政治大学（江苏省公办，讲解英国的民主政治模式）。

但一流人才仍不敷分派。"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主张'自由讲学'。延揽了国内外许多名流学者，不分党派，利用这个最高学府讲坛，充分发表个人的政治主张，让学生也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信仰。"1922年夏天，学校董事会决定仿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办了暑期学校。担任暑期学校课程的教师，除该校权威教授外，郭秉文还罗致了海内外知名之士：美国杜威博士讲授"实验教育哲学"；美国吴卫士博士讲授"昆虫学"；美国孟禄博士讲授"教育学"；德国杜里舒博士讲授"生机哲学"；胡适博士讲授"实用主义"；梁启超教授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江亢虎博士讲授"劳动问题"；张东荪教授讲授"新闻学大意"。还有该校常务校董和工科教授杨杏佛的"政治改造思想"等，此外还延聘了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作了一次"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世人所必需"的讲座。

南开大学的类似做法是在第二年：梁启超应聘主讲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还代校方转邀名学者罗素、杜里舒、泰戈尔以及张君劢、梁漱溟、蒋方震、张东荪等来南开讲学。

梁启超的梦是"占几所大学为据点"，"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他与他的同志者自己办学、在著名大学获得教职、举办讲座，占为据点。所谓"要之清华、南开两处必须收作吾辈之关中河内"。舒新城在致梁任公书中描绘说：若能张东荪等掌中国公学，张君劢、徐志摩在南开讲演，公及蒋百里往南京尤其是东南大学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

这类生机勃勃的活泼局面，在后来的战乱与"定于一尊"轮番戕贼的近百年中国里，再没有出现过。

其实，正是从这时候起，张东荪的专业兴趣慢慢回到求学年代的哲学思索与探究。《近代西洋哲学史纲要》53就在那年出版，与自己的学生姚璋（又名姚舜钦）联合署名。后来（1930年），到姚璋自己的专著《八大派人生哲学》出版的时候，在《自序》中，专门有一段对老师的回忆：

（求学时）……幸而遇到哲学家张东荪先生来光华大学教授哲学，于是得闲辄往请教。张先生非特给我许多鼓励，并与我具体计划以写成此书。每草成一篇，即为我详细校正。遇着光华图书馆里的书不够参考时，又把他家的藏的名贵书籍借我应用。书成之后，更为我作序文，与书局接洽印行的事情。总之，此书之成，最当感谢张先生。兹将此书谨

献给张先生，聊以做一个纪念罢了。54

张家两兄弟都为这青年学子写了序言。我们且看张东荪序言中的一段，可知他当时备课和辅导学生的努力：

我们须知，不讲ethical theory则已，苟要讲更无法离开types。

我们试检下列各书：（中文书名为著者试译）

Dewey and Tufts,Ethics.《伦理学》

Mackenzie,A Manual of Ethics .《伦理学手册》

Martineau, Elements of Ethics.《伦理学原理》

Muirhead, Elements of Ethics.《伦理学原理》

Paulsen,A System of Ethics.《伦理学的一个体系》

Seth, A Study of Ethice Principles.《伦理学原理研究实例》

Sidgwick,The Methods of Ethics.《伦理学方法论》

Thilly,Introducition to Ethics《伦理学入门》

De laguna, Introducition to the Science of Ethics.《伦理科学入门》

Wright, General Introducition to Ethics《伦理学撮述》

Broad,Five Types of Ethical Theory.《伦理学理论之五种范例》

Hyde,Five Philosophies of Life.《生活哲学之五种》

Riley,Men and Morals.《人与道德》

Dunham,Peinciples of Ethics.《伦理学原理》。

Carritt,Theory of Morals.《道德伦理》

以上诸书还是我见及的为限，此外遗不知更有多少。

还没等到这本书的读者一本本翻找教授指定的书，局面又变了--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

后世读"新中国"教科书长大的三代人（生于六十至八十年代）， 只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突然间翻脸大杀共产党人。没有人告诉他们翻脸前上海的情形，没人告诉他们，那时候应"五省联帅"孙传芳之请，担任淞沪商埠总办（相当于上海市长〉的，是最具缓进革新思想的丁文江。55只要不开仗，社会总能休养生息。而刚刚有了点气象的工商文教，统统为自命正统的军事占领当局所打断。

丁文江首当其冲：改造大上海的计划泡汤，先避走大连，后蜗居北京；一整批文化人也以"反动学阀"的罪名遭通缉：章太炎、张君劢、张东荪、黄炎培、沈信卿、蒋维乔……连刘海粟都名列其中；《时事新报》被接管；中国公学由党（国民党）所信赖的人接办；张君劢的政治大学遭封闭……青年党李璜记载了当时"不革命即为反革命"的气氛：

民国十七年左右，大家被国民革命统一了中国，其执政者，右如胡汉民，左如汪精卫，皆志得意满，而瞧不起五四时代新起的这一班，年在三十余岁，留学外国，而学识略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一律认为是自由主义者，非排斥不可！……其时，清党已了，中共之未被杀被囚者，不是远走高飞，便是在国民党内藏之深深，……柳河之役以后，胡汉民忽然唱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斯大林式的一党专政调子，不但思想与三民主义不合的国家主义派青年党不许其并存于中国，就连同是国民党而首倡反共抗俄的西山会议派，也一并在排出政坛之列。56

这是一阵相当了得的"革命风暴"。侧身其间者，已能感到些许肃杀之戾气。但平心而论，随着国民政府在南京站稳了脚跟，那风么，真是吹过就算了，与五十年代之后将文化人再度客气地请到台上，由共和国总理带着他们集体自辱相比，其凶险、致密、绝无藏身之处与可遁之途，就对中国文化传承与传承者的伤害而言，只算是"小儿科"了。

如若不信，只看张东荪随后的经历。作为叨陪末座的被通缉学阀，他没有窜逃，仅避入租界数日。他不再办报，用他的话说：

我之所以脱离报界就是因为民国十六年以后，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只在民元到民国五、六年之间短短时期中真有言论自由，这是我所亲历的。57

中国公学不能做了，李璜创办的知行学院（1929年，上海英租界干部训练学校）开张。张东荪义务教授"哲学概论"--对这门课，他底气十足。因为这几年间，他不但有《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相对论的哲学和新伦理主义》、《休谟哲学与近代思潮》等哲学专著在当时最重要的期刊上发表，《人生观》、《精神分析说》、《新哲学论丛》等重要哲学普及读物，也以单行本出版了。张君劢（欧洲政治思想史）、罗隆基（行政学）、梁实秋（英文文选）、左舜生（中国近代史）都前往捧场。李璜自己也教一门社会学。

张东荪依旧在光华大学教书（想来储安平此时正就读于此）。由于校长张寿镛无以伦比的理财能力，以及他与江浙财团的渊源，缺钱打仗的蒋介石，为笼络他，对光华大学手下留情。党治之下，张东荪等人得有一席喘息之地。此时虽然已不是"民元到民国五、六年间"的景象，"反动学阀"们的精神并未遭到毁灭性摧折。俞颂华记得：

张东荪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每次开教务会都要宣读总理遗训，张一听就夺门而出，并说："下次再读遗训，我就不来了。"在当时这是何等犯忌的事。58

到1930年，同在光华任教（政治系）的罗隆基，不过在《新月》上发了一篇维护人权、批评专制的文章，当时在教育部次长任上的陈布雷"以部令停止罗隆基在该校教授之聘"。应该说，就事情本身而言，与张教授并无干戈，但此情在他看来、实为"我国私立大学教育史上奉部令开除教授的首开记录"。为对这种恶劣做法表示抗议，张东荪教授、潘光旦教授亦随之去职。59

后来，在民国和人民共和国，比这恶劣百倍的殴打暗杀员工，批判流放教授……一桩桩一件件在同侪们的注视（乃至帮从）下发生，大家多心怀揣揣而苟且--直到2006年。这回是北京--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为学术委员会对另一名教师的不公愤然辞职：中国学界再度回到它有些许正气、些许不可犯的凛然之气之起点？

从他自己的办学经历里，张东荪对国民党的认识再度加深。民初时候的浑噩；"二次革命"时候的悖谬；北伐以后的杀戮和紧随的"训政"……弄得他不得不把自己称作"是向来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人"，认为"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

就中国人民知识能力不及格来说，倘使为事实，则必是全国的人民

都如此，决不能有一部分人民被训，另一部分人能训。被训的人民因为没有毕业，所以必须被训，试问能训的人民又于何时毕业过呢？何时同一人民一入党便显分能训与被训呢？60

自治未办，不能实行宪政，这是人人都承认的。那么就赶办自治好了，为什么要反而取消已有的人民言论自由权呢？人民自由权既是宪政要素之一。国民党最后的目的既是宪政，为什么现在必须先把这个已存在的要素的萌芽拔去呢？按理应该对于已有的萌芽加以培植。可见国民党的训政是等于斩了已生出来的树苗而偏说另外可以种出新树来。61

但萌芽--所有萌芽--上天所赋之生的愿望，以及成长的意志力，是斫伐者无从估量的。他开始与瞿世英创办《哲学评论》（1927），担任主撰述，并出版了《西洋哲学史》（上下）（1930）等教科书。

1930年秋，张府阖家迁居北平--他得到了司徒雷登的聘书，任职燕京大学哲学系，讲授伦理学。北平对张东荪，虽然算不上旧游，也曾经几度流连。只不过西郊来得不多--那年月到那地方，没准还得雇骡车呢。

对燕京源于《圣经》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也就是司徒校长说的："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与张东荪的理念无任何相悖。燕大主要通过美国教会筹资，62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教会学校。但校长司徒作为一名教育家，却明确提出"使燕大彻底中国化"。他认为，"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对于司徒所坚信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我们的主人公自然服膺，虽然据他自己说，并非事事与校长见解一致。

国学在燕大的课程安排上受到非同寻常的重视，不为别的，只因为前来就学的，都是中国学生。创始之初，教师阵容已经相当了得，刘廷芳、洪煨莲、李荣芳、赵紫宸、简又文、许地山、陈垣、吴雷川等，除了学术上的声誉，他们同时又是教友或教会名人。北伐之后，"天上掉下了林妹妹"，一整批满腹经纶却不耐烦党训的长袍先生北上莅临燕大就职：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钱穆、林宰平、郭绍虞……张东荪的长兄、国学家张尔田同时获邀，教授中国历史。

到校第二年，1931年，他开始出任哲学系主任；同时担任燕京学社顾问（adviser）。那时冯友兰虽然主要在清华，也曾在燕京兼课。也是在这年9月，由东荪提议，司徒校长电邀两年前因逃避国民党通缉而第二次留德的张君劢回国，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黑格尔小逻辑。

张东荪走进燕大讲堂--自从东京伏案苦读以来，累积凡二十年的心得，终于有了发挥的平台。只看他在燕京开的课程：伦理学； 西方思想史；Plato（柏拉图）；Hobbes（霍布斯）；Locke（洛克）；Berkeley（伯克莱）；Schopenhauer（（叔本华）；Bergson861（伯格森），以及其他当代哲学家。偶尔也涉及到唯物主义、语言、思想和历史哲学诸方面。比如在那时候，他已经向学生介绍了Comte（孔德），Hegel（黑格尔），Mars（马斯），Croce（克罗齐）和Rickert（李凯尔特）……。这无疑是学人张东荪一生当中最惬意的时光。据俞颂华描述：

（到了燕大之后）张东荪氏所处的环境，我觉得有为许多文化工作者所羡慕的。……他在燕大讲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与他自己以前办理中国公学所采的方针差不多一模一样。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发表其独特的见解，即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且还予以相当保障。不说别的，他只要和潘光旦教授的退为图书馆主任一比，轩轾立见。他所处的讲学环境，在今日的中国，可以说得是最优越了。63

东荪自己并没有辜负那段光阴--明知板结生地耕耘的艰难：

说起来，似乎太可怜了。中国不但是在哲学思想界上没有创造，并且从来没有忠实的介绍。本来我们东方要想对于西洋哲学上有一些贡献，加入于他们的创造中，这是谈何容易呢！例如日本，吸收西方思想起讫今五六十年，尚未曾出有特创的哲学家。……所以我们中国在今天实在是够不上言创造，只要好好地介绍就行了 。

我相信西方的科学要输入中国，必须把西方的哲学也同时进来。因为在思想上，哲学始终站在与科学合作的地位。虽有时矫正科学而与科学家争吵，却并不想要打倒科学。至于有人主张中国现在可以只要科学而不要哲学，这未免太不知哲学的性质了。我们只须一读科学史，便见有许多哲学家的姓名是见于科学史上的，可见哲学往往作为科学的领导。

我以为居今天而介绍西方哲学思想，对于中国前途决不是无益的事。64

世界书局出版的《哲学丛书》是由他主编，上下两卷共十六种。不仅《认识论》、《现代哲学》、《现代伦理学》等撰著收在里边，他在课堂上讲授的"现代哲学"、"价值哲学"也分别根据学生许宝骙、高名凯课堂笔记整理出版，65其火爆情形可见一斑。

1935年10月，与瞿菊农一道，又创办了《文哲月刊》。他撰写了《发刊词》，并发表了《彭基相译笛卡儿方法论序》、《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思想自由问题》等文章。

后来晚些时候，牟宗三在他的专栏"哲学周刊"（《广州民国日报》）撰文，以哲学家为对象对中国哲学界发表评论。他认为，能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必须是确有见地能成系统的人。在他看来，这样的人，中国不多，五四时期一个也没有；五四以后有三位：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三位先生分别代表了三种学问：元学、知识论和逻辑。他认为，熊、张、金三先生，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三栋梁。若没有这三个人，也只好把人羞死而已。有了这三个人，则中国哲学界不只可观，而且还可以与西洋人抗衡，还可以独立发展，自造文化。而后人认为，事实上，牟宗三本人在近现代世界哲学的宏大背景中，把熊、金、张的哲学同冶一炉，中西融通，创造性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为重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典范。

应该说，燕京大学的张东荪教授已获得公认，是五四以来第一个尝试创建中国现代哲学体系者，和"中国新唯心论领袖"。孙道升说：

中国研究西洋哲学的人，不可谓不多，说到能由西洋哲学中引申出来新的意见，建设新的哲学，恐怕只有张东荪先生一人。66

与他在有关辩证唯物论开战的叶青则说：

中国在五四时代才开始其古代哲学底否定，现在固没有坚强的近代体系，然而已在建设之中了。作这种企图的，首先要算张东荪。所读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我们说梁启超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运动者，那末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底系统建立人。67

对待同辈学人，他情谊真挚、期待热切。以佛学为基底的北大教授

熊十力，一般认为"建立了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体系"。在建构自己体系过程中，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多通过东荪转介。二人在十年间，还曾有过反覆切磋、辨析。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写道：

余其时又识张孟劬及东荪兄弟，两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则住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时余亦住马大人胡同，相距宅之遥。十力常偕皆余与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园中，或在其家。十力好与东荪相聚谈哲理时事，余则与孟劬谈经史旧学。在公园茶桌旁，则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在其家，则余坐孟劬书斋，而东荪则邀十力更进至别院东荪书斋中，如是以为常。68

在1934年7月，张教授借《哲学丛书》出刊"缘起"，再次谈到为形成新文化而引介"西方文化泉渊"（哲学）的迫切：

我们相信中国必须冲锋吸收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之总汇不能不推哲学。所以西方文化之输入不能不以哲学为先导。因此我们主张在盛大欢迎西方科学的时候，决不能把哲学加以排斥或拒绝。

我们相信人而生于现在的世界必须大放目光，看一看各方面的主张。哲学对于我们的贡献，至少可使我们免去拘墟之见。在这一点上，正助以辅助科学。

我们又相信苟其对于任何问题要下一番研究工夫，必须先养成一种批判的精神。哲学对于这一点所能操练我们的脑筋的却亦不下于科学。

我们又相信中华民族此后的生存就看能否创出一种新文化。但新文化的产生必有相当的酝酿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吸收的工夫居一半，消化的勾当亦必居一半。大家都知道不有吸收，不有消化，便不能有所创造。所以我们愿在这个过渡时期内设法使人们的胃中装得有些食料。他日消耗了，有所创造，便是今天的收功。

因此发刊这部哲学丛书，想把西方文化泉渊的哲学为真面目的介绍，同时对于将来的如何形成一个新文化亦想略略加以指示。这区区微意便是本书的缘起了。

自从因"没有办法说话"而离开报界，在大约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在稚幼荒芜、须从概念从头说起的哲学领域，总算提携了一批人手、打出了一片天地。但就总体而言，虽然"不可完全付之阙如"，似乎并不乐观：

在不得已之中，亦可寻出几点来说一说。第一是对于西方哲学的介绍，在近几年确比以前不同了。不复是"报告"（information）性质，乃兼有"研究"性质了。……就中符号逻辑的输入中国亦是可纪念的一件事。（如沈有干的《现代逻辑》与吴士栋的《论理学》）。第二，可以说是有独立研究的趋势，这一点在北平发刊的《哲学评论》杂志上可以看得出。撰稿人中有金岳霖，黄子通，瞿世英等。他们好像有一个共同点，即是只知研究而不知派别。

此外亦还有可述的：以我所见，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不失为近年来的一部奇书。书内所主张亦许为我们所不赞同，然而其为好学深思的结果，则不容否认。69

对熊十力的成就，他填《金缕曲》，诚心盛赞"熊子今传矣"，深深感慨"年来我亦求诸己。检吾躬，屏除习气，幸余有几？只愧二三知己者，世论悠悠安计？"最让他欣喜并觉得安慰的，是攻哲学的同人"养活泼自家心地"，虽然对《新唯识论》这样的大作，"初读罢，杂悲喜"。

对于几年来，本人著作颇丰，70以及被时人看作是"中国新唯心论的领袖"，说起来倒是淡淡的几句：

我个人亦曾提出一种认识论上的意见--就是认识的多元。我不敢说有何创见，然而却亦由多年思考而得。或许我此说未必能成立，然而把多元的解释用于认识作用上，这一层我愿意列为问题，请大家来讨论。现在我提到自己，亦只是为此而已。71

他最为痛恨的，是专制者将哲学变为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

哲学本来是冷门，而在中国居然热闹了。其所以然不在于国人自动地喜欢哲学，乃在于有见于俄、意的情形。俄国的共产党有他的"钦定哲学"；意大利的棒喝团亦有他的"御用哲学"，于是善于模仿的中国人便把哲学亦当作时髦东西了。但是据我看来，哲学与自由思想是分不开的。哲学而变为钦定的与御用的，这便是装甲的哲学。哲学而变为武装的，则必定不是哲学。这乃是哲学其名，而宗教其实。所以我在本篇中不愿意提起俄罗斯与意大利的哲学。（德国国社党亦有他的哲学，真是"哲学哲学，天下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72

俞颂华在四十年代对他的老友张东荪有一番论说：

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

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我们只能期待他在立德与立言方面有不断的贡献。人不是万能的，各有短处与长处。他能立德立言，并且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终能站在时代前锋，为青年学子所敬爱的导师。至于他参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的方面示范，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决不可能的。

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往独来，特立独行，而不愿受任何拘束的。对于什么政党的所谓铁的纪律，他是感到头痛的。73

注释

1、邵飘萍：《预吊登极》，《时事新报》，1915年I2月。

2、《本报五千号纪念辞》，《时事新报》，1921年12月10日。

3、选择柏格森为连载之首，不知与梁等人在欧洲与他的会面有否关联。宗白华1919年发表《谈柏格森〈创化论〉杂感》，应该是阅读《时事新报》之心得。

4、张东荪《学灯宣言》，《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8年3月4日。

5、张东荪《学灯启事》，《学灯》1918年4月。

6、张东荪《学灯启事》，《学灯》1918年4月。

7、这位新文化运动主将，晚年对自己的功绩略作修正：我们打倒孔家店，及今回想，真同打死老虎，既不能居功，以不足言罪也！

8、张东荪：《新与旧》，《学灯》，1918年12月14日。

9、张东荪：《读新青年杂志第六卷一号杂评》，1919年。

10、郭沫若：《创造十年》（上海：现代书局，1933）。

11、自创刊至1928年4月4日改为《学灯教育界消息》的十年里，先后任编辑的有张东荪、匡僧、俞颂华、郭虞裳、宗白华、李石岑、郑振

铎柯一岑、朱隐青、潘光旦、钱沧硕等人。

12、张闻天致张东荪（1919年12月12日），载《张闻天早期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页37。

13、毛泽东：《反对统一〉》《学灯》，1920年10月10日。

14、鲁迅：《反对"含泪"的批评家》，载《热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5、何思诚：《上海〈时事新报〉从研究系落入国民党手中的演变概要》，《文史资料选辑》，第136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页133。

16、同上注。

17、同上注。

18、梁实秋：《我的一位国文老师》，载《梁实秋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197。

1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页115-116，213。

20、宋原放等主编：《上海出版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页684。

21、同注15。

22、张东荪：《新学会宣言书》，《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

23、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

24、具有第三种文明特色的环境保护运动兴起、非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蓬勃，没有发生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而是再迟些，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25、李璜致胡适信（1931年），转引自耿云志：《傅斯年对五四运

动的反思-- 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6、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上海：中华书局，1948），页77。

27、张东荪：《与君劢、子楷、百里、振飞四兄书》，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893。

28、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古今出版社，1943），页28-32。

29、黄玉顺：《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30、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第2号，1925年1月。

31、张东荪：《劳而无功》，《学灯》，1923年6月9日。

32、叶其忠：《从张君劢和丁文江两人和〈人生观〉一文看1923年"科玄论战"的爆发与扩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

33、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

34、邓中夏：《思想界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8期，1924年1月。

35、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载《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

36、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科学与人生观》。

37、转引自陈文彬：《五四时期知识界的"挟洋自重"》，《书屋》，2006年第1期。

38、张仲礼主编：《上海社会科学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 2002）。

3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533。

40、胡适：《中国公学校史》。

41、张东荪　：《覆百里书》（1920年10月），载丁文江、赵堂田编：《梁启超年谱初编》，页926。

42、梁启超：《致东荪兄书》（1920年9月10日），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初编》，页920。

41、俞颂华：《论张东荪》，《人物杂志》（上海），第2卷6期，1947年6月20　日。转引自张耀杰：《俞颂华："大公至正"的新闻先驱》，《历史背后：　政学两界的人和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4、钱智修，号经宇，古文学家、翻译家，前清末年毕业于复旦公学，与于右任、陈寅恪是同窗，后任《东方杂志》主编近二十年。编译过林肯、达尔文、成尔逊等西方伟人传记。1947年病故上海。

45、谢冠生（1897-1971），名寿昌，浙江嵊县人。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商务印书馆《辞源》与《中国地名大辞典》编辑，先后执教于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及法政大学。1926年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旋即任职于南京政府外交部，兼任中央大学法律系主任及法学院代理院长，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及主席团主席。1971　年病逝台北。著有《战时司法纪要》、《法理学大纲》、《罗马法大纲》、《中国法制史》等。担任中国公学法律系主任时，应是二十五岁上下。

46、俞颂华：《忆钱经宇（智修）先生》，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页97-101。

47、"道尔顿制"，由美国教育家拍克赫斯特所创，1920年2月在美国庥省道尔顿中学校实行此制，遂以校名而为其命名。

48、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有"《时事新报》仅有三月之粮"（1922年）；"中国公学年息六万"（1923年）等。参见丁文江、赵丰

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

49、赵柏田：《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25。

50、同上注。

51、同注40。

52、张君劢：《张东荪先生八十寿序》，《展望》，第172期，1969年4月。

53、张东荪、姚璋：《近代西洋哲学史纲要》（上海：中华书局，1925）。在此之前，张东荪的作品以政论为主，西方哲学领域，他只有译著出版： 《创化论》、《社会论》（商务印书馆，1922》；《物质与记忆》（商务印书舘，1923〉。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的《科学与哲学》，属于他编辑的论争集，不算专著。

54、姚舜钦：《八大派人生哲学》（上海：中华书局，1931），页240。

55、地质学家丁在君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胡适）--虽然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为他觉得""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会一变"。

56、李潢：《谈王造时与罗隆基》（上），《传记文学》（台湾），第39卷第2期。

57、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序论》。

58、同注43。

59、沈云龙：《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页409。

60、张东荪：《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5

月。

61、张东荪：《生产计划与生产动员》，《再生》，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

62、学校的经费是教会出的。燕京大学在名义上是由美以美会、北长老会、伦敦会等教会团体合办的。基督教教会的根据地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以美国为主，在纽约有"中国基督教大学董事会"，在上海有"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多的时候，支持着十六所大学，到1947年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保留几所。燕京大学是其中之一，也是规模最大、办得最好的一所，毕业的人也多，在政治上、国际文化上影响是最大的。

63、同注43。

64、张东荪：《现代哲学鸟瞰》，《东方杂志》，第26卷第17号，1929年6月。

65、张东荪：《哲学丛书·现代哲学》（上海，世界书局，1934）；《哲学丛书·价值哲学》（上海，世界书局，1934）。

66、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

67、叶青：《张东荪哲学批判》，《二十世纪》，第1卷第3期，1931年。

68、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兰台出化社，2000），页170。

69、张东荪：《十年来之哲学界》，《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9-10期，1935年。

70、1929年：《人生观ABC》、《精神分析ABC》（世界书局）、〈新哲学论丛》；1931年：《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中华书局）、《哲学》（世界书局〉；1932年：《现代伦理学》（上海新月）、《创化论》（译著、上海商务）； 1933年：《柏拉图对话集六种》（上海商务）。我们可以看出，此时还是以译介为主。到了 1934年，具有创见的作品出现：《价值哲学》、《现代哲学》、《认识论》（世界书局）。

71、同注69。

72、同注69。

73、同注43。

三 友情与论战

在张家，有两副侥幸逃过红卫兵烈焰的条幅，分别出于康有为与梁启超之手；1除了这两位，我们的主人公与孙逸仙、蒋中正，都有直接的交往，毛、刘、周等更不必说了。然而，据张家后人说，到了五十年代，爷爷"从不谈跟孙中山的关系，倒常爱说他的旧交陈独秀"。爷爷说他"与仲甫私交最好。在上海渔阳里，喊叫着进院，二人摔倒在雨地里"（对张饴慈的采访）。

这里说的是1920年陈独秀从北京脱险之后，他们在上海的第一次见面。在年序上，东荪比这位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差了不到半代（七岁）。他们的友谊（或论战）始于何年呢？

想来不会是陈总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的时候。因为，虽然同在一地，东荪那时候年龄还太小（十一岁）。待到仲甫因为反清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闷头用功的东荪对他的激情澎湃，或许有所闻，但肯定没有太在意，因为当时这样的青年与类似的事件并不少。到了仲甫很快回国后1903年在上海协办《国民日日报》、1904年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张东荪正准备赴东京。辛亥之后，两人都当过一阵子小官，也都参加了1913年的讨伐袁世凯。

估计两人真正相互"拜识大作"，并且有了一些了解，是在陈独秀反袁失败、1914年出狱后到日本帮着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的时候.。这时，人已在上海、且以撰述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张东荪，正连续在《甲寅》上发表文章。

到了陈独秀再回上海，并且开始编《青年》（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的时候，想来二人已有相当机会晤面。张东荪没有为《青年》（和《新青年》）写过文章，可能主要因为在那两年里，他正忙着自己的《大中华》。在激情（激进与速成）与诗意方面都内敛得多的东荪，与这份杂志在格调上的差异，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到1917年独秀名声大噪，受聘到北京任北大文科学长，并且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外加红楼这样的阵地，与蔡元培、李大钊、胡适一道，提倡文学革命，介绍"德"、"赛"两先生，并且激烈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时候，张东荪和他有些渐行渐远的味道--他那时候已经

与梁启超订交，正忙着"宪法研究会"活动，2　并接手《时事新报》--以编辑、绍介中外报章、西方学术文化为主。

但毕竟他们都在为国运担忧，为中国之未来找出路。到了1919 年，对那场青年学生冲上街头的"五四"抗议，两人都曾为激情促使而行动。陈独秀就不用说了，直到6月11日还单枪匹马到街上散发自撰的《北京市民宣言》。一直对"激进"相当警惕甚至忌惮的张东荪，也没能冷眼旁观。在后来的文章里，他怀着欣慰招认说：

那年"五四"运动发动的当时，我正在上海的时事新报馆任事，立刻我就作论说，为他们的后盾。一直闹到六月三日，在上海居然又唤起一个运动，这就是所谓的"六三"运动。……我虽不是"五四"运动的当事人，然却是"六三"运动的当事人。3

张东荪"作论说"的时候，想来赵家楼已然起火，三名官员也或挨打、或逃窜。民族情绪如此贲张的当口，连东荪先生这样的人都已经忘记，现代法制国家基本秩序，起码应该与"个性解放"并列，列入公民教育的基本教程。当然那时陈（独秀）、胡（适）、吴（虞）诸位同志"打倒孔家店"狂澜的诸般后续，4还没有陆续登场，以"目的正当"为大旗的诸般激进乃至残忍的革命狂欢，也还没有彰显出对中国扎实缓进的致命性破坏。张先生1948年所说的上边这番话，是否可以看作因愤恨当道而对（学生乃至盲众）运动依旧抱有好感？

胡适直到晚年仍感遗憾，认为是五四运动打断了新文化运动的正常发展，"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无奈散发传单的前北大文科学长已经被捕。胡适四方寻求援助，曾有一信致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

独秀先生被捕事，警厅始终严守秘密，不把真相发表，也不宣布态度，直到前日才始许一人前往见独秀，他现在染时症发寒热，他的朋友听见很着急，现在有许多人想联名保他出来养病，还不知能办得到否？5

到13日，北京、上海等地报刊，都以显著版面，就陈独秀被捕、狱中遭虐等刊发消息评论。还没等张东荪动作，安徽名人胡适已得知北京的警察厅长吴炳湘属皖籍，于是以"同乡之谊"打通了关节。"思想界的明星"获释、并在次年隆冬时节化厨子逃脱抵沪。

运动的激情过后，大家归于冷静。中国新知识界开始分化。

《新青年》暂停。《每周评论》由胡适接手。《杜威演讲录》专号之后，胡博士自己最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李大钊以《再论问题与主义》回应；胡适继续做"三论"、"四论"。张东荪看重学理，对"浑朴的社会主义"的"鼓吹"、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自民国初年，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在上节已经讲到，东荪那时候正创办《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发表《第三种文明》、《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以及《突变与潜变》。他加入"五四"时期思想论战，坚决不同意以党派活动来代替思想界的自由探讨。

比张东荪又年轻了几岁的毛泽东，那时候还没有自己的阵地，正如饥似渴地攫取：1918-1919年间，毛泽东"每天不间断地阅读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的报纸，读得十分认真仔细，他的住所，满屋都是报纸"。6

这年盛夏，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对此，胡适给予极高的评价："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意外的欢喜。7

继《湘江评论》之后，这不屈不挠的青年，不仅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问题研究会章程》，开列了大小144项问题，并且北上京城，上书并登门拜望，争取这位风头最健的人物对湖南学生的支持。回到长沙后，毛立刻与舒新城一道发起创办《湖南教育月刊》，再致信胡适请求支援。这封信是在胡适研究中发现的。8　　在信里，舒新城（代表毛泽东）将观念（以及后来的命运）完全不同的三个人并列为可对自己予以提携的准师长。想来胡、陈二位因为太忙没有回应，只有张东荪作了简单回覆--立即为他们列名为刊物发刊人。9

对于胡适，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曾说在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10对陈独秀，毛在1945年七大预备会议上也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对张东荪的评语，最早见于1921年。他当时认为，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11

理念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仲甫与东荪的私交。最有趣的是新渔阳

里一幕。

新渔阳里六号，本来是李汉俊住所。后来他搬到哥哥李书城处，那里遂转给戴季陶。

常去谈天的，是当时一批思想先潮人物，包括后来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而后愤而脱党又惨遭军阀杀害的李汉俊；正在上海编辑着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三大副刊之一的张东荪；在"新中国"以茅盾之名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还有因为当汉奸而病死狱中的周佛海，以及遭暗害、遭刨坟、至今仍是谜一样的"大少爷"沈玄庐等。这一批后来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之所以聚集到新渔阳里，正如中国任何时代（或许不包括中共治下？）具有使命感的一代新知识分子一样，不过在热切地讨论问题：有争论和分歧，但只限于思想和言论。

就在这时，俄国人维金斯基夫妇到来了。

他是拿了李大钊的介绍信去见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的，名义是苏联《生活报》记者。他先是一声不吭地观察，而后介人讨论，继而提出整合三大报刊，"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云云。12当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弄清楚的是：这名苏共党员一直在作无形引导，并逐渐把"自己"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新思潮，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遂使思想界弄到如今这样的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却一点都没有。这样是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的。他的结论是：必须组党，具体说，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想法一出，大家几乎一致赞同。后来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当时很激动，说干就干，立即帮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他的这一态度事后被孙中山骂了一顿，戴只好表示以后"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张东荪是当时唯一一名坚决反对者。他坚持认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学术研究；他反对组党，更反对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开展阶级斗争。这种"消极撤火"的态度在当时的那个场合无疑于背叛，当然没人理他。包惠僧这样形容："这样一来，首先就吓倒了张东荪，他立即退出了这个运动。"13

茅盾对张东荪的"打退堂鼓"，解释说："他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14

此说其实不确。

第一，张与研究系的关系：无所谓"脱离"或是跨党行动等。张东荪自己就说过：

……从来我的朋友以进步党人为多（蓝公武、张君劢均为骨干），且较密切，我却从未正式加该党，也向不与闻他们的党的活动。外间对我的这种不明白我是知道的，但我亦不希望人知。我以为一个人只要行心之所安就够了。急于向人表白是现代人的一种做法，中国儒家的精神才根本不是如此的。15

到了五十年代他被迫检讨的时候，观念并没有变：

有的同志们希望知道一些我过去政治活动的事实。这太长，不容易讲周全。我只想就重要的轮廓讲一讲。我从日本留学归国后，认识梁启超。他请我做过研究系主办的《时事新报》主笔。但是，外传我参加过他底进步党与研究系，都是不确的。当时我没有明确的政治思想，只是无原则的介绍一些新学说，提倡文化上的启蒙运动。16

第二 ，研究系与陈独秀，并非事事南辕北辙。比如讲学社邀请罗素来华，梁启超就力促"黄任之、陈仲甫"介入迎送。

第三，这是最根本的，张东荪反对将思想与学术讨论，变为政党行为，反对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实行阶级斗争……并非起自此时。他反对的不仅仅是由外国人跑来出钱、出指导员、出政策的党，对于以党来"统制"思想，他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憎恶与躲避：

民国十三年光景，我和陈独秀先生来往甚多，彼时他们虽明知我是赞成社会主义，但在组织共产党的时候却不敢来约我。因为他们亦未尝不知我反对在这样工业未发达的中国鼓动阶级斗争的罢工与怠工。所以我始终是一个"非党派者"。17

新渔阳里六号这一聚谈场所，从此让给了坚定的激进分子，后来干脆转租给共产国际远东部--这时大家才弄清维金斯基的真实身份：他是携带着第三国际的命令和经费，到中国来组建支部的。

这次聚会之后，《共产党》月刊开始秘密发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陈独秀邀请老少人等正式成立党。毛泽东等摸索改造旧中国的激进社会主义者，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平心而论，那时候谁都没闲着。

军阀正准备开战（4月至7月，直系五都督、奉系三都督成立"反皖八省联盟"；吴北上张南"倒段"；直皖大战；段祺瑞通电辞职）。研究系和我们的主人公当然也正紧急筹划。那是他们最奋发有为的一段时间--全新的眼界和公民（并非良相、并非军阀赏赐的官长）之身份，贯彻"救治中国"的全面主张。

而就在他忙碌着、对社会不停地观察认识着、同时直率地发表自己见解的时候，竟引发了一场辩论，一场后世称作由他"挑起"的与共产党人的激烈辩论："社会主义论战"。

起因是讲学社邀请罗素来华演讲。当时正倾心于"同业公会社会主义"的张东荪全程陪同。东荪当时年届三十五，除了幼年在河北穷困县城父亲任上看过几次过堂、打板子，一直生活在相对富裕发达的江浙和南京、沪上、北京。待到他们一行人来到湖南（其实还没有走出长沙），张东荪为当地的贫困、落后、以及官吏之横行惊呆了。　他立刻在自己的报纸上写下观感：

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是穷到极点了。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主义。

救中国只有一条路，—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18

在这篇不足二百字的通讯里，他列举了种种"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多数派主义；实际是检讨自己，觉得过去太尚空谈，"富民"的实际努力不够--并没一字提到马克思、列宁，或者共产主义。没想到第二天（11月7日），为当时的激进党人所掌控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邵力子19主编）上连发两文对之痛批。作者分别为望道（陈望道）和江春（李达）。言辞空前尖锐激烈。陈望道20的《评东荪底"又一教训"》，直指张东荪的"转向"：

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

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

东荪！你旅行了一番，看见社会沈（沉）静，有些灰心，想要走旧路吗？

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沈（沉）静，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

李达21的文章比陈望道的更为尖锐，笔下毫不留情，标题便是《张东荪现原形》。李达虽然后来被尊为党内理论权威，其署名江春的文章本身只是强词夺理式胡骂：

张东荪本来是一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这几年来，他所以能够在文坛上沽名钓誉的，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特长，会学时髦，会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他作文章，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这时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间的东荪与后一瞬间的东荪是完全相反的。总之，张东荪是文坛中一个"迎新送旧者"。

李达翻出张东荪过去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与张东荪的"新作"相对比，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露了张东荪的"前言不顾后语"。紧接着，11月8日，《觉悟》的主编邵力子也亲自上阵，发表《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邵力子毕竟是报人，跟东荪是同行，话说得温和一些，但还是摆出一层层道理向"东荪君""请教"，"请东荪君仔细想想"："中国贫乏的原因在哪里？谈论什么社会主义等、是否足为开发实业的障碍？"；"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

对这些"迎头痛击"，张东荪没有直接答覆，陈独秀却觉得问题非同小可。11月24日，在把蔡元培、张申府等一干赴法人士送上船之后，仲甫坐下来，提笔写了两封公开信：《致罗素》；《致张东荪》。

罗素主张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这不是误中国人么？…… 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端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

笑。

他问张东荪：

同是中国人，何以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只有资本家可靠呢？

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的政治和经济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革命，时间上是否允许我们渐进的改良呢？

既不赞成用革命的手段集中资本，而中国的资本家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而先生等又不欢迎外国资本主义，将以何法来开发中国底实业呢？

这两封信没有占邵力子《民国日报》的版面，独秀在自已的《新青年》上专门开辟"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新青年》创刊近九十年后，陈独秀研究者撰文称：

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四号，汇集了张东荪等人文章和陈独秀给张东荪的来往信件以及陈独秀、陈望道等的批评文章，共十三篇，用"关于社会主义的对论"的总标题发表出来，以便广泛地发动大家开展辩论。在辩论中影响较大的文章如九卷一号上发表了李达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粱任公》文章，九卷三号上的陈独秀的《独秀覆东荪先生信》、《社会主义批评》等。这场争论，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社会革命，反对社会改良，深刻地批驳了张东荪等的改良主义。22

在将近半个世纪后，张君劢的评说是："五四前后，东荪与陈独秀之对立，俨如清末孙康之相冰炭其最著者也。"23

但张东荪等的改良主义究竟是什么呢？这年年底，他在自己的刊物《改造》发表了长文《现在与将来》--"做一个比较正式的说明"：

我作了一个小小的短评引起了无边的风浪，在我却是非常的荣幸，在社会上也成了一个悬案。当时和我驳论的人很多：有些是我所畏敬的师友，我无不答覆--如周佛海君就写信数次讨论此问题--有些我明知其为手指五弦目送飞鸿，所以我不屑和他们辨论（即有人骂我狂妄我也愿

受），后来刘南陔君要求我^:一个比较的正式说明，我遂作了《现在与将来》一篇。24

罗素先生说，"吾到俄国，即相信自己亦为一共产党人；然与一班深信共产主义之人来往后，我之疑念转加一千倍，不唯不信共产主义，即凡人类所最崇仰与冒苦而求之一切信条，吾亦不敢相信。……则吾深幸西方人之有怀疑态度。"我自听了这些议论以后，本来潜伏在心中的怀疑态度便发了出来。我在《时事新报》上撰了一个时评，表示我的怀疑点，大旨和罗素先生在京的演说，说"我暂不以社会主义赠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即实行社会主义必没有好结果"相同。于是许多朋友就写信来问我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一一答覆却很麻烦，不如作一篇文章罢。

我这篇就是提出几个问题而求其解答。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现状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从现状的潜伏趋势里推测未来呈何状？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25

在这篇文字里，他特别提出"伪劳农革命"，认为"或可一度发生"，则"一个是破坏；一个是假借名义"。这两点，不用说，已经由中共此后几十年的"农民运动"、"农村包围城市"、"土改"、"统购统销"、大饥荒和如今城市化大潮中的农村廉价劳力、统一压低农产品价格所证实。

第二年春，梁启超为文呼应，做八千字《覆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对达到社会主义这一理想的阶段性，对这一理想本身须作"信仰"和"学理"区分，都有了更明确的论述。他们认为当时诸般学理中，晚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比较完满，比较适合中国原有的"同业公会"制度。

随后，更多学入介入辩论，缓进改良的一方有蒋百里、彭一湖26、蓝公武等；激进革命的一方则又有李大剑、蔡和森、李汉俊等著名共产党人加入。他们最主要的观点是：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除了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以后世读史人的眼光看，双方本有相通融、求共识的方面。独秀等入虽然言辞激烈，也并没有给谁扣政治帽子以惩处的意愿和威权。

时年二十八岁的毛泽东也卷了进来，表现得比半年后的总书记还要气势磅礴--上述众论者只局限于中国，他已经高瞻远瞩地思索世界革命了：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

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27

到了 1921年9月，张东荪干脆在《时事新报》开辟副刊--《社会主义研究》。后来的事态发展，我们大家已经非常熟悉，激进者坚决地、义无反顾地"走俄国人的路"：工人夜校、农民运动、南昌起义、苏维埃、长征……直到大跃进、文革和今天的权贵资本及"和谐共建"；缓进者除了办报、办学、组党、介人"参政"、斡旋和平…… 一直未能对激进革命有任何制约。当然他们也无法阻止以枪杆子（配以扼杀思想自由的"笔杆子"）建立专制主义的一党独裁政权。

其中还想说一说的是，东荪此时特别提到的"研究与认识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宣传"。他说：

民国元年的时候只输入了"社会主义"四个大字，多一个字也没有。这两年来,却有了Propaganda（此字译为"宣传"太轻，而译为"煽惑"又似乎太重），而不像日本那样真面目的介绍，与学理上的商榷。因为这种事业必须学者来干，不单是热心的青年所能济事。所以我敢说中国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社会主义的Propaganda，一湖君虽然说尽量把社会主义不是抢产杀人的道理宣传出来，然而我相信这种宣传决不能减轻伪赤化的危险，因为这是一种消极作用，天下决没有不与积极作用相连的消极作用而能生效力的。……公武君说真的决不能引起伪的，固然不差、但是种种Propaganda却不能算真的。我并无丝毫权力能禁止他人做故这种"煽动"事业，但我总以为中国现在绝对没有煽动的必要。28

那时候，毛泽东"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说尚未被奉为真经，得以以垄断性Propaganda而操生杀大权或令自家腰包鼓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不仅为"伪赤化"成功立大功，且一直是维持该"伪"最重要的支柱。

对这场论争，八十年后，有论者这样评价道：

他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辞抨击，同时又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既努力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又强调"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不许药矣"，从而挑起了一场影响深

远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29

到了二十世纪末，中共的史学家胡绳开始以个人身份反思马克思主义。稍微不带Propaganda地说到这一次讨论：

"五四"以后，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之间，有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现在看来，梁、张等的观点虽然有许多不对，但有一点不能说是错的，那就是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很落后，还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陈独秀等对他们的反驳，无非是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怎样跨越呢？陈等就回答不了，因而并没有驳倒他们。30

梁任公的长文后来收入《饮冰室合集》。1959年，已经被赶出北大校园的张东荪"借得梁任公近著第一辑，内有覆余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者，重读之，不胜感喟，赋七律一首"：

寒夜千披旧赐书，乱丝谁可共爬梳。

激风料定千波涌，邀局轮由一子疏。

昔日徒忧今日事，何方能按此方图。

独怜隔界难通语，欲问先生笑我无。

如果说，二十年代初的"社会主义论战"，是李达等共产党理论家就张东荪的"感慨"发难，从而挑起了一场论争的话，三十年代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战，实实在在地就因他而起。张东荪那时已北上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在授课（现代哲学、知识学、康德哲学、中国哲学史等课程）、演讲（应清华大学冯友兰之邀）、出版专著（《现代哲学》、《认识论》，主编《哲学丛书》）的同时，正面地、毫不留情地、从刨老根到批评现实表现，尖锐甚至尖刻地批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以捍卫属于学理范畴（而非党派、非政治、非社会动员范畴）的纯粹哲学的纯正。

故事还要从他离开上海，北上就职开始。

1930年秋天，他受聘任职燕京而迁居北平。到校第二学期，即担任哲学系主任和燕京学社顾问，开始了他学术生涯最具华彩的一章。当时中国的"哲学界"--如果有的话，用孙道升的话说，可分为"纯宗西洋哲学的

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唯物论和新唯心论"，以及"兼综中西哲学的唯生主义、新法相宗、新陆王派和新程朱派"31、在"新唯物论"条目下，孙道升说：

新唯物论亦称辩证唯物论，马克思、恩格士、伊里奇等所倡导之哲学也。……平心而论，西洋各派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要以此派为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够与他比臂的。…… 这一派哲学的哲学家为数最多，如陈独秀、李大钊、李季、叶青、陈豹隐、李石岑、张申府、张季同、吴惠人等诸先生都是。

这许多新唯物论者又因仁智见异而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是想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去的，另一派是沿袭俄国日本讲马克思学说的态度的。前者可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论中，可谓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张申府、张季同、吴惠人等先生可为代表。

张季同即张申府弟，是"很后悔多说了几句话就陷进反右扩大化罗网"的北大教授张岱年。张教授1978年获得改正，1984年入党，青年时期"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想将理想落到实处。可惜孙道升已不能为其"归宗"而修正自己的论说。

张东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难，开始于1931年。锋芒直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从此派生出的"存在决定意识"。他认为马克思"以偷关漏税之法遂置人类之全部精神文化于物质的经济构造上"。考虑到马、恩同时还是社会活动家和革命鼓动家，他断言所谓唯物史观，不过是革命的"一种手段"，"与真理无丝毫关系"，"此种自相矛盾之谈居然列为学说，诚人类之奇耻，思想史上之大污点也。"32

到了9月，他又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上发了一篇《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对当时正红火的来自俄国、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泼凉水：

在我浅陋的脑中好像俄国最初根本上不要哲学，后来却又想另外造出一个新哲学来。所以我今天说到"俄国哲学"这个名词，似乎有些不妥，然而又似乎亦还得说下去。33

接着直指"物质"及"物质之变化"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概念。

1932年他发表了《辩证法的各种问题》，1933年1月写《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从逻辑学角度非难辩证法；1934年6月在《新中华》上发表《思想的论坛上几个时髦问题》，反对哲学具有党派性的观点。到1934年6月25日，则是三万言的《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

哲学是自由思想的产物。苏格拉地为了哲学而被毒死，但他们却造成了希腊的哲学。布鲁诺（Bruno）为了哲学而受纹刑，但近世哲学却由他们而开始。所以哲学之花，必须由自由思想之空气方能培养。没有自由思想亦就没有哲学。……

如果哲学一词是取广义的，把历史理论与社会理论包括在内，则这种学说当然亦是哲学之一种；倘使以为除了历史理论与社会理论便没有哲学，则事实确然显示：哲学于历史理论与社会理论以外，有其独具的问题，这些问题乃是哲学之本有的范围。

辩证法唯物论只是历史理论与社会理论，而不是哲学；换言之，即决不能取哲学而代之。一切无聊的争论都由于不明这个分别而起。一班辩证法唯物论的信徒总想打例正式的哲学，其实只是纠扰不清罢了。他们始终不明白马克思主义上所讲的问题与哲学上所讲的问题完全是不同的。可怜亦复可笑。34

不是有意遮掩，或者云山雾罩，他所渴想，与中国背负的重担，与中国学界须大步朝前赶的距离，委实太大：

说到可怜，我们中国人今天真是可怜！在思想上差不多一点儿自主隆都没有了，只知模仿，恰如鹦鹉学舌，猴孙弄棍。哲学本来是冷门，而在中国居然热闹了。其所以然不在于国人自动地喜欢哲学，乃在于有见于俄、意的情形。俄国的共产党有他的"钦定哲学"；意大利的棒喝团亦有他的"御用哲学"。于是善于模仿的中国人便把哲学亦当作时髦东西了。但是据我看来，哲学与自由思想是分不开的。哲学而变为钦定的与御用的，这使是装甲的哲学。哲学而变为武装的，则必定不是哲学。这乃是哲学其名，而宗教其实。所以我在本篇中不愿意提起俄罗斯与意大利的哲学。（德国国社党亦有他的哲学，真是"哲学哲学，天下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

我以为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哪一种哲学，而只是可以使哲学滋长与发展的空气。用一个比喻来换言之，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树上结的果子，乃只是一个熟手好的田地，可以容我们去努力耕种。倘使我们

能努力，不愁没有果子收获。否则生在石田里而希望果子，必不会成功。因此我以为中国研究哲学的人们不可仅急急于创造哲学条统，而同时亦应得注意于哲学空气的造成。须知哲学只有在哲学的空气中可以滋长，若在武装中则决不能生存。英国的哲学家乔德（L.E.M.Joad）似乎亦看到这一点：他约了 一班学者作了一个《宣言》，主张全世界上爱自由的人们联合起来，以抗现在各处的这个"反自由主义"狂澜。我认他不为无见。总之，中国今天的情形亦正和世界一样，所以我说不需要某种哲学，而只需要可以使哲学发展的"思想自由"。35

出而应战的，是1923年加人法国共产党、1925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归国后任中共区级或省级宣传部长的叶青（即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此公自视颇髙，觉得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陈绍禹"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一个黄口小儿'"。叶青在后来的党内纷争中，被判为托派分子而遭关押、处决。国共分家且"虎口脱生"之后，感念蒋中正的不杀之恩，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中央宣传副部长。在此任上，他接连写出《中国政治问题》、《抗战中的问题》、《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文章和小册子，说"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等等。为此，大陆这边一直把他称作托派、叛徒和战犯。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而对张东荪这个"中国近代哲学底系统建立人"36的穷追猛打，是在他被诬为托派之前。即使如此，他的奋而反击，也未入后世官方史家之法眼：

张东荪和托派分子叶青之间的论战，其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论战是国民党政府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营垒内部如何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场纷争。37

后来，张东荪把双方的论争集成一本小册子《唯物辩证法论战--Critical Essays on Red Philosophy》，副标题为"赤色哲学批判小辑"，仅收"纯粹哲学"一方的言论。用东荪自己的话来说：

本书既名曰论战，则理应登载正反双方的主张。无如赞成唯物辩证法的书籍现在大有满坑满谷之势。而反对除散见于各杂志外，从无专书。所以本书虽名日论战，而实际仅登载反对一方面之论著。

本书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

至于书中各篇章之作者，他说：

或许我们所见有相同的地方；然而亦尽管是各行其是--因为只限于编成此书，我们是合作的。至于哲学上的主张与相信，我们仍本个人自由分歧发展的原则做去，决不有任何联带关系。

叶青在1935年也照此体例，编辑出版了《哲学论战》，收入了论战两方面的四十篇文章。在这前后，按照后世史家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艾思奇、邓云特（邓拓）、李达等也参加了论战，对先时的两家：张东荪和叶青，一并横扫。"而在更详尽的资料里还列出了陈伯达、胡绳、弱缨、沧白等。其中沧白的文字《〈唯物辩证法论战〉读后感》，发表在1936年《清华周刊》（四十四卷二期），正是张岱年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前往担任助教，"较详地讲述了辩证唯物论，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的时候：

单就导演而兼任主角的张东荪来说，已经是个不称职的演员。因为他自从开始反对辩证唯物论直到如今还是一个不知辩证唯物论为何物的聪明人。

对沧白的这个铿锵结论，张东荪或许不大抵触。因为在一年后创办《文哲月刊》的时候，张本人已经觉悟到这场论争的荒谬：

我自信我近来有一个发见：就是我发见马克思派所用的名称都与我们相同，而其意义都与我们不同。他们所谓哲学不是我们所谓哲学（亦许就正是打倒我们的哲学）。他们所谓唯物论不是我们所谓的唯物论，他们所谓辩证法不是我们所谓辩证法，他们所谓逻辑不是我们的逻辑。他们所谓认识论亦不是我们所说的认识论。我们驳他们，他们来骂我们，实在都是无的放矢，非常可笑。38

他坚持认为：

自从马克思主义侵入了哲学界以来，不屑说玄学成了问题，即名学亦成了问题。于是整个儿的哲学都成了问题。

在以前哲学无论如河变化，而哲学自身终只是哲学。迨马派一出，哲学却变为社会思想的产物了，变为代表社会上阶级利益的呼声了，变为经济的结构中自然而然所发的东西，好象膀胱分泌小便一样了。

因此我个人以为马克思主义之突起于人类思想界是一件绝应注意的事。质言之，即等于一个关。若是不能渡过，削不仅哲学从此葬送，即其他高深思想，亦同受影响。

他随后还就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核心，即"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表过一系列的抨击。那时候，曾经拥抱过这一套理论的陈独秀已经被关进监狱，而苏联（第三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之政策的转变，包括南昌兵变、建立（而后撤出）苏区、被迫"长征"……共产党已经无暇把力气放在维护这一主义的光辉与纯正之上。而这段时间以来的论争、对哲学家张东荪随后观察中国大局，分析各派政治力量，也未构成无可化解之芥蒂。随着日本侵略势力一步步扩张，在民族危亡大义面前，他与他的哲学论争对手在政治层面的合作，随着《八一宣言》的发表，进入第三阶段。

注释

1、分别为："飒爽英姿舌粲莲 风流张绪又华年 三挝更听渔阳掺 击鼓岑年草百篇 东荪仁兄 康有为"；"侧身天地更怀古 独立苍茫自咏诗 梁启超"。

2、后称"研究系"，以《晨报》、《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张东荪为该系成员，并曾任议会秘书长，后由于段祺瑞的无为，一批以学者而入仕者退出。

3、张东荪：《中国民族的良心》，《国讯》，1948年。

4、如受业于北大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宋还吾，常发动学生在孔庙墙上张贴"打倒孔家店"、"打倒旧道德"等标语，暗助师生在孔庙演出悲喜闹剧《子见南子》（林语堂编剧《子见南子》，发表于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月刊，1928年11月）。

5、《时事新报》，1919年6月26日。

6、方汉奇：《报史与报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页227-228。

7、胡适：《介绍新出版物》，《每周评论》，第36号，8月24日。

8、"适之先生：前几天我写了一封信给先生，想已经收到了。现在《湖南教育月刊》已出版，特赠先生一本，并且要求先生三件事：一、请先生批评指教。二 、请先生在各报纸杂志上介绍。三、请先生做文章给本月刊。我们在湖南发行出版物，很不容易。自从去年大兵之后，人

民生计，艰难异常。教育界奄奄无生气。现在十月已经过完了，五月份的经费还没有发下。原在教育界的人，因生活艰难，都往别处去了。所以我们组织《教育月刊》，除了钱的问题，还有人的问题。并且我们处在这块地方，不比在别处，言论很难自由。从前的《湘江评论》与《新湖南》，先生都看见过的，都不能够存在。我们现在'改弦更张'，组织《教育月刊》，意思是想把生命延长，但是结果如何，现在还没有把握。我们抱定宗旨，只要一日不被高压压倒，我们总尽我们的力量，去作文章，去筹款。自己没有钱，作起文章到外面去卖钱。前回我写信给先生，要求先生介绍我们到别的杂志报章上作撰述，一面虽是为自己，一面还是为《教育月刊》。以上所讲的是我们的苦衷，除了先生与陈独秀、张东荪先生外，决没有同别人说。因为这些话，不是身历其境的人，决不愿意听的。要引起他们的同情是更不容易的。先生呵！我们的情形，先生既然晓得了，那前面所要求的三件事，总要请先生帮助指教才好！舒新城十一月四日"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页135-136。

9、《湖南教育月刊》《张东荪，毛泽东，舒新城等），1919年11月创刊于长沙。参见于平凡：《中国民主自由运动史话》（香港：自由出版社， 1950），页72。该刊后来的命运未见记载，估计顶多出两、三期。

10、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页125。

11、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年1月1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1。

12、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载《"一大"回忆录》（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页25。

13、同上注。

1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页175。

15、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序论》。

16、张东荪：检讨草稿。

17、同注15。

18、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報》，1920年11月6日。

19、邵力子（1881-1967），近代教育家、政治家。《民国日报》和《觉悟》副刊的创办人，与陈独秀共同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早期中共党员。1927年因出席国际大会脱离中共；1949年4月，赴北平和谈失败后宣布脱离国民党。

20、陈望道（1891-1977），中共一大的代表，日本留学生，《新青年》编辑，《共产党宣言》译者。1923年拒绝挽留坚决脱党。后来在修辞、语言上多有建树，《辞海》修订第一任总主编，新式标点符号推行学者。

21、李达（1890-1966），中共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他曾留学日本，撰写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工人运动的文章，归国加入《新青年》编辑。1921年出席了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同年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李达一直倾力彰显毛泽东，著述有《实残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因为脱党又入党，虽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这届那届的政协人大职务，还当了第一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最终在文革初期的连续批斗中丧生。他当时曾经写信向正在同一城市"畅游长江"的毛泽东求助。毛没有理睬。

22、帅文洁：《〈新青年〉与陈独秀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研究"网站，2004年12月14日。

23、张君劢：《张东荪先生八十寿序》，《展望》，第172期，1969年4月。

24、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

25、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

26、彭一湖（1887-1958），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建国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以直言多次遭毛泽东点名，成为"右派"代表人物。直到2007年，在中国历经八十多年的共产革命，终于从专制带来的极度贫困走入贫富分化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时候，还有左派学者在引述毛泽东1957年的斥骂："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多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参见阳敏对王绍光博士的专访，见《南风窗》杂志。

27、同注11。

28、同注24。

29、黄波：《"书生谋国直堪笑"--关于张东荪》，《书屋》，2003年第7期。

30、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创刊号，1997年1月。

31、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

32、张东荪：《道德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33、张东荪：《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 1931年9月。

34、张东荪：《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载张东荪编：《唯物辩证法论战》（北平：民友书店，1934）。

35、张东荪：《十年来之哲学界》，《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9-10号，1935年6、7月。

36、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1935）。

37、杨春贵：《"唯物辩证法"的论战》，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页907。

38、张东荪：《发刊词》，《文哲月刊》，创刊号，1935年10月。

第三章 国家蓝图

报国之攻，缓急有为。

入侵者铁蹄下的拳拳抗争，

一直为主旋律掌控者

以不屑而将其彻底边缘化。

只为平虏兼反专制，

走出书斋的主人公，

终与理念上的论敌，

结为并肩作战之盟友--

悲剧即始于此。

全副身心投入。

不见大王幡旗，

正忽远忽近地飘啊飘。

一 组党与国民参政会

1 国社党与《再生》

中国的皇权统治结束于1911年。接着是十七年的军阀混战。国民政府1928年定于一统之后，直到七十年代，第一代专权者死掉后，才在其指定的第二代专权者（其实就是他的儿子）手上，开放了党禁报禁，而到了由第二代指定的第三代专权者（他的权力渐渐"缩水"）主政之后，才见真正意义上的在野党。大家都知道著者说的是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和民进党。

从中间横插一杠，夺得了大片江山，重新制定国号的共产党中国，从一开始就宣称自己崇奉"多党合作制"。可惜直到今天，除了唯一一名真正的在野党"中国民主党"（虽然我们只能在概念而非别的一切上如是看，其领袖也不是在牢里就是在海外），别的所有通过共产党而吃国库的"民主党派"，没一个不是低眉顺眼、屏声敛气，乖乖地给有枪（从而也就有钱）的执政党当花瓶。

但在这百年历史上，有没有过哪怕一丝一毫的可能，也曾有过算是有些气概、有点规模、独立于专权之外、能为国家做出些许贡献、有组织、也有自己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呢--即使以我们后人苛刻的眼光来评定？

大家会说北洋时期的国民党和抗战胜利后的民主政团同盟。不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活跃过。但平心而论，其功效，也只在几个关键"点"上的有限运作：发表议论、分配席位、制定和约、斡旋军阀间锱铢必较的剑拔弩张……。从来没见过广铺在民间，无日无时、全面铺张的对专权的监督、限定与抗争。

中国历来重文轻商，背负了太重的农业/皇权传统。因为战乱（包括军阀们的称王和外族侵凌），萌生中的实业总是遭遇一场接一场的摧残。于是，独立政党的土坏，要么被忽视，要么无由养息。但活生生的人，说得更自诩一些，受了教育、有见识、有理想的人，或者按照张东荪的观念--"士"在新时代的变种--总要思索、要关注、要活动、要为国效力。所以，组党之议论，时时骚扰着文人，特别是那些在英、美见识了民族国家与政党政治的西化文人的心。

北洋时期为拉选票而兀然冒出的一堆大小党就不去论它了。曾经有过的，或许会成点气候的一次，是在大家过了"咸与共和"之热闹，又经历

了种种思潮之冲击，领袖人物自然涌现出来之当口。据陶菊隐记载：

五四运动的大本营为北大。研究系为了配合这股新潮流，张东荪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蓝公武在北京办《国民公报》，陈博生在北京办《晨钟报》（《晨报》前身），都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梁启超由欧洲回国后，有将研究系改组为党的愿望。丁文江、张君劢两人极为赞成，想以胡适之为桥梁，打通北大路线，表面不拥戴一个党魁，暗中则以梁与蔡元培为其领导人；并打算以文化运动为政治运动的前驱。由于张东荪反对党教合一，此议遂被搁置。此次组党虽未成，却未尝不是张君劢办政治大学的契机，也是成立民社党的一个远因。1

在这里，我们看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几可以孪生兄弟视之，友谊之笃，无与伦比"（台湾学者张朋园语）的"二张"，在应否将思想启蒙与组织政党合在一起向前推进的分歧；也可知梁漱溟在1985年8月6日对艾恺所说显然不确--

东荪本人在燕京大学教书。他跟张君劢是好朋友。一般都说张东荪是张君劢的灵魂。张君劢在政治上的行动立场都是听张东荪的，人家说他是张君劢的灵魂。

博学、沉静、坚韧如张君劢者，难道会以他人意志为灵魂？何况他们友谊虽笃，见识却是独立的。上引陶菊隐有关组党一段即其一，应该说也绝对不是枝节、策略上的分歧。1920年在"别急着组党"上，张君劢同意了张东荪；1933年，在"太可恨了，组它一个党"，张东荪同意了张君劢；再后来，到1938年参政会期间，两人心态已有很大差异；而到了1946年底的制宪国民大会，依旧友谊甚笃的"二张"，因见解（而非利益）的不同，已经在行动上彻底分道扬标--这我们将在下文详述。

通观二人之生命轨迹，情形似乎是，在对待西学、国学的引进或扬弃上，他们观念十分接近；对抗专制，二人近乎完全一致；2为此必须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素养，二人也是一致的；接着的问题是如何达成，以及其间不可免的种种操作。

每每危机或者转机出现，张君劢往往立即投入实际运作，张东荪则看重自己对重大国是发言的权利--当然到了国势危殆之关口，比如继续内斗还是一致抗日、北平能不能免于战火……他也难免出头。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九十年代，从不见在重大决策上触动当局，只在"文化"中徜徉的学者如张中行，还在刻薄他，说他"不忘朝市"。

让我们回过头来讲文人组党的故事。

三十年代前后，在一个久达的国家统一且无大战事局面下，知识界自发地开展了一场关于"民族复兴"的大辩论。虽说这场讨论主要是在"人文精英"间展开，如胡适与张君劢，但已经在国民当中掀起热潮与活气。

民国之后，几乎没有一场论争不征伐其间的张东荪，这回没有介入。不能说这次论争的主题对他没有触动，恰恰相反，许多话题，如文化与社会组织结构的重新建造，国人身上的恶习惯、劣根性，文化王道气象和霸道文化的侵略，民族主义思想淡薄……都是他在近十年间多次提出的。只为，正是这时候，他刚|刚北上入燕京，再不必为筹款、为学潮、为行政与人事发愁，得以完全专注于自己心爱的学问：授课、译介、论说、创新。3不错，1931-1935年的"唯物辩证法"论战，确是由他挑起并担纲，但主要动力在哲学而非政党。

但是，如果把张东荪看做一名书斋学者，哪怕一时一地，或者某个特别时期，也是不确的（这里所谓书斋、是—个中性名词，不具有任何褒贬）。这是一批少年时代即浸泡于正宗国学的人，下意识里难免有儒者的自我期许，不仅对周遭社会现实具有天然的敏感回应倾向--"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且容易沉潜于"笼而统之"的国学思维定势。恰如知哓"勾股弦"并用于构筑营造，而不深究几何学；恰如对"非典"采用强肺壮气以抵"时疫"，而非取出切片，查到"冠状病毒"。许纪霖认为他们太"现实"了，痛惜他们的思路过多地关注于社会公道的具体方案上，而缺乏从学理上深入地论证自由与公道之间的关系。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回到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境--

战事渐息，长于军事征伐的国民政府，还不大明了"自由"、"人权"、"法治"为何物；实业在中国正一步步生长，政府当局除了征税，并没有看到重建现代社会秩序的迫切性--正如政治教授张奚若所描述："治理国家和建设国家方面却一筹莫展"。当政的诸公欣欣于"国家终于到手"，宣称秉承"国父遗训"（即坚持社会须处于"训政"期）、施政手段却是百孔千疮，包括"党的建设"--无论是在理想劝诱、利益推动，以及致密的组织、铁的纪律方面根本无法与它打不死的政治对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相比。

那时候，长江黄河正泻千里、东北的密林绵延起伏，山西的煤也静静地睡在地下。清末官费和庚款派出的留学生，正一批批回来。他们在外边开阔了眼界，装了一肚子学问；他们忍下了近百年来国家屡战屢

败、割地赔款的屈辱，认定中国一定要复兴，也一定能复兴，只要大家一起努力-- 1929年春天，胡适一接手《新月》杂志，就把这份纯文学刊物转为兼论时事政治的园地。待到罗隆基出任主编，《新月》已经成为文人议政的战场：针对国民党的现实政治，高倡"人权"、"法治"。一时间，胡适、罗隆基变成人权派的代表人物，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不过其中一派。4

"九一八"前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聚集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大都市的一批新老朋友，用后世官方史家的话说，"研究系参与分子、信仰国家社会主义的教育界、学术界人士及青年学生，及少数失意政客、封建余孽等"，大家议论国事，磨拳擦掌、义愤填膺。他们必须发言、必须有所作为--不说反苏反共的"醒狮派"中国青年党（他们由"少共"而"巴黎玫瑰村"而"野战抗日"，1931年，终于由秘密转为公开），以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的中华革命党（后来的农工民主党），就连"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其实就是国民党翻脸屠杀之后的低潮）的共产党，就言论而言，也异常活跃--有中共介入暗中操作的"中国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等成立于1930年春天； 共产党内的"左派反对派"（托派）也在那两年成形。

当时还不时兴拿"绿卡"，也不大见成材学子千方百计获取他国居留权。那时候，无论官派、庚款还是商会资助（外加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一概蜂拥回国报效或者折腾。用张奚若的话说："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5用曾琦的话说："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用中共的话说是："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6

从名义上看，国民（而非臣民）依旧处于"训政"期。但那时候的"训政"，若与1949年以来"人民当家作主"之后的"人民民主专政"相比，无论从对资源的控制、对传媒的垄断、对异议者的箝制，特别是文人学士的自我制约……都难于望其项背。当然，那个年代的知识人也不是经历过肃反、镇反、反右和文革，任由党支部书记呼来喝去的"老九"，更不是权贵垄断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智囊新宠。他们刚刚冲出异族、皇权窒息，通体的新学问、新气概，一心渴望国家现代化、随时准备对国是发言……。

人人理直气壮、大家各有主张，政治气氛一片活跃。其中最急切、冲动、得风气之先，且因为没什么可失去，从而逮住机会绝不放手的，

还是以师范生、小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共产党--其理论和作风，多"短平快"地沿袭自俄国、日本。牟宗三说：

民十八、十九、二十年左右，国民党的统治正在蒸蒸日上，共产党政治上失败，但思想宣传上却取得了压倒的优势。知识分子一般意识上的倾向都为共产党的思想所吸引。坊间书肆，满坑满谷，都是他们的小册子。7

"训政"么？请问你蒋中正打算怎么个训法？

老实说，当局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三十年代前后，"禁令"看上去声色俱厉，但以"党国"的理论体系与人员素质，还真拿不出什么威逼性的有效约束。蒋中正曾明确宣称：

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

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8

"训政"文本和贯彻执行中的零散动作，反成为勇气十足的教授们发言之靶的。

就在这时候，在"九一八"的前一天，张君劢从德国回来：1931 年9月17日抵北平。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可以想见他们聚谈时候的激愤。怎么办？大家都有话说。先创个社交换意见吧--"再生社"在北方成立。

如果说1920年陪伴梁启超游欧，思想上受到的主要冲击是对资本主义的失望，这次张君劢回来，却从欧洲人的反思，从他们着意寻求社会制度的整治上，见到自己祖国可以借鉴的曙光：不是阶级斗争，不是苏俄式的夺权而后专政，而是德国人的社会民主主义--通过民族国家的确立，提出"尊社会之公益，而抑个人之私利"，通过"社会所有"、"公私共有"的混合经济制度，解决私人资本的集中和垄断问题。这与罗隆基的"实行专家政治"，"要求财政管理权"；与张东荪的"学术独立与言论自由"、"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没有冲突。连汤芗铭、诸青来等民宪党大佬，都觉得要放眼世界，并为国家做点什么了。

有了"社"，当然是要发言了。第二年5月，再生社机关刊物《再生》月刊出版。创刊号上出现一篇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署名"记者"，实际上是经大家议论而由张东荪执笔的创刊词：言辞平朴，却从容又坚

决。作为后世读史人，我们不难从中窥见他们一批人各抒己见之后的综合--绝对的民族主义、修正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国家社会主义。二张之间，没有冲突，也没有争论。但细细揣摩他们的立场、实已经出现细微差别：张君劢心仪国家之强大（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东荪更看重民众和个体--众人的利益不得以大口号、大名义剥夺。

1933年，想来当局在党禁上收紧，"再生社"遂作出建党的决定。他们把总部放化北平，天津则设特别区委，上海、武汉等地设分部。归国即入燕大教书，旋即匆匆离开的张君劢，往来于平、津、鲁、豫，指挥一切。十多年后，张东荪对当时的情景描述如下：

至于到九一八事变以后，忽然和张君劢先生组织国家社会党，乃纯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我既相信民主主义，当然是反对一党专政，国民党不许另外有党存在，我们民主主义者便不能不另立一个党，以表明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目的不过如此。

当时张君劢先生与我明白相约，说他日如民党有一天放弃了一党专政，我们的党便自动宣言解散。我对于这个宣言是始终留在心上。张君劢先生以后的行为如何我不敢说，至于我自己却早已自知是不适宜于党派生活的一个人。9

中国国家社会党（国社党）究竟如何作为呢？与一上手就抓军队的国、共、青三党（包括后来有此意愿的第三党）相比，国社党诸位，虽然奉上"冬烘先生"之名号有点过分，但文人、名士派头却是难免。即使这样，"血荐轩辕"之豪情也难于掩仰：

忆国社党创党人宣誓成立时，亦极机密，即在旧国会议员胡石青先生的北京寓所。胡先生系创党人之一，当天在他后院书房宣誓毕，他以主人身份，曾致互勉之词。最使我铭心而永不能忘者：他说一党专制之下，而组织反对党，无论如何行动，总难免特工之追踪。所以将来遭遇艰难、甚至被捕下狱，皆势所难免。今天大家既下决心为国家牺牲、为民主铺路，一切艰险危难，入监下狱，甚或牺牲生命，都应列在可能的预算中。今日如能如此预计，将来倘有不幸遭遇，始能临难无苟免，而处之坦然。10

张东荪曾著文回忆这位前北洋政府教育次长：

友人胡石青先生在二十余年以前曾在著述中大倡"一度革命"之说，即

革命只可限于一次；既不可再度三度接续不已，亦决不可使革命状态延长。革命完成后即当走上建设之途，不复再是革命了。11

第二年（1934）七月，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刚刚在南方的《新月》杂志和北方的《益世报》都轰动了一番的罗隆基也参加了，还当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二张"也被选为总务委员。中央总部设在北京西城石板房。

应该说，在动荡的三十和四十年代，处于全民抗日与推进宪政的大局下，当政的国民党对他们还是相当礼遇的。当时"临难无苟免"之精神准备，几成过虑。待到共产党拿了天下，"民社党"（与民宪党合并后的国社党后身）随政府迁到台湾，1989年在中国大陆编成的词典，依旧将其列名为"民主党派"，认可"中国国家社会党，在抗战时期和战后，成了中国最成气候的三个在野党之一（另外两个是青年党和第三党）"，并且客观地转述其理论基础（以国家民族本位为中心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和政治主张（"以民主政治为根本原则"，国民代表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成立容纳多党派的联合政府中央行政院。其经济主张是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使公营、私营和合作经济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分部经营管理，反对生产工具国有和废除私有制度，反对阶级斗争理论，而主张渐进的社会主义）。12

撰写词条的人认为，在文化政策方面，国社党主张学术自由独立。党员以张君劢、张东荪的学生居多，缺乏群众基础和组织力量，影响很小。

说"影响很小"，不能看做有意贬抑，尽管在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处于"言和"前沿的中共干员（如周恩来、徐冰），包括毛泽东本人，并没有这样看。13

从国社党成立到《再生》发刊这两年间，张东荪再次担起政论家之角色--这是自二十年代以来，在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办报、办学、教书和撰述之后的"再出山"。考虑到他那时候在教育界、哲学界已经达到的声望，以及本人呼之欲出的富于创建性的撰述，对他的这一姿态，同人当中，或击赏推许、或惋叹讥讽，他自己倒是十分明确：

至于我亦偶尔作政治上的文章，这只是我以为一个公民总应当对于国事发言。我尝对于现在大多数大学教授们的沉默认为奇怪。大学教授是一个资格，公民又是一个资格。正好像一个人在家庭是父亲，在商店

是伙计一样。本来可以兼的。现在他们好像做了大学教授就不必做公民了那样，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

并且须知以公民资格对国事发表意见，并不就是干政治。贯彻政治上的主张必须看其性质。若是主张共产与法西斯，自然本人非去硬干不可。但主张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却不然。我是个民主政治的信徒又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希望民主政治实现即无异乎希望人人都取得自由权。并不是我有什么固定的主义强使人家跟我走。所以民主自由主义者的政论，其性质与共产法西斯主义者的政论根本不同。而况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自由主义者的发言，与其说是进攻的，毋宁说是防御的；与其说是积极的，毋宁说是消极的：与其说是想有所取的，毋宁说是想有所恢复。质言之，即我们决不是想拿些什么强加于人，乃只是怕人家拿些什么强加于我。因为倘使我的自由权不被侵犯，则民主政治也就可以说是成立过半了--我是人人中之一，我的自由权成立则大家的自由权亦同成立。

我之对于政治完全是一种打抱不平的态度。虽时时发表政论，然从来不计及本身。……我之好为政论不外乎想抵抗那个要毁灭文化的内外潮流。14

对于1931年颁布的《训政时期约法》（当局曾允诺六年训政期限。在此期间，国民党独揽政治权，训练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权利，平民只有服从才可以享受公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权利），他说：

就中国人民知识能力不及格来说，倘使为事实，则必是全国的人民都如此。决不能够一部分人民被训，另一部分人民能训。被训的人民因为没有毕业，所以必须被训；试问能训的人民又于何时毕业过呢？何以同一人民一入党籍便显分出能训与被训呢？可见训政之说真不值一驳。15

他不认为当政的国民党，仅仅因为军事征伐得手，就会出现质的变化。这是一个与"北洋"没什么两样的"特殊势力"--"军阀化、贪官化与坐地分赃土匪化"。他说自己是"向来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人"：

中国自辛亥以来始终未上政治轨道，并不是因为在人民方面有何不足，实在是只因为有了特殊的恶势力不愿意受宪法与法律的约束。……国民党在野时，我们未曾表示过同情，亦就是因为早见到他们一旦秉政

亦脱不了特殊势力的恶习。我们当时宁愿与国民党为敌，就只在于此。到了今天，社会上一班人，当恍然明白了罢。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16

这种直指痛处的抨击，既非出于私仇，也非出于党争--

老实说，我们党外的人，本来不能有所列论，并且亦不愿管此间事。无奈国民党与国家的关系太密切了，他的一举一动都足以使国家蒙极大的影响。我今天来说几句话，原是想使国家的损失，少因国民党而加重，人民痛苦少因国民党而延长，如此罢了。17

令他最为愤怒的，是作为国家公器的政府只知道自肥自利，"把军队作为自家的工具，把国库作为自家的私产，把人民当作奴隶。于是全国离心，已成分崩离析之象。"18

望读者注意，这些言论都是在北伐胜利、张学良输诚、共产党被肃清、当政的国民党正大权在握、意气飞扬的时候发出的。他没有噤口、对方也没有封杂志、派警察。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这一批评立刻为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和随后对"福建人民政府"的镇压所证实--为消灭异己，在当道眼里，民族大义是可以让路的。

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国公民被侵犯的，已经不仅是言论思想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冀察政务委员会"，包括对打了胜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镇压，对（后来也）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的围剿……，无论作为大学教授还是在野党领袖，张东荪更不能不发言了。

发在他们机关刊物《再生》创刊号上的那篇《我们所要说的话》，可看做忧心如焚的知识人对国事见解的公布。老实说，从技术上看，这篇文字真在不像一个党的纲领，只能算是一批在学养底色与知识源头而言，并不尽相同的独立思想者们针对执政党之独裁"所要说的话"。但七十年过去，这话即使放在今天，也令人感到直指时弊、掷地有声：

或有人以为思想与言论大开放了，势必导致国议纷纭，使政治不能顺利进行了。我们亦知国家的政治求其敏捷与效率高，只在于行政系统是否如身之使臂，臂之使腕。而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并无关系。并且社会上舆论愈发达，行政反可得其助力。因为既许可言论自由以后，反对政府的思想固然可以发表，而赞助政府的言论更可要以发表。因为真正民

治的政府，他的基础是坐在产生政府的大多数公民的同情上，其政治的设施又适合大多数人民生活实际的需要；所以言论愈自由，政府愈能得舆论的赞助 。

要知道赞助政府的言论，这决不是专靠政府自己所制造的宣传。倘使不许言论自由，而政府一味宣传，决不会生何等效力。所以从这一点上可见政治上效率的提高，与社会上自由的开放，不但无抵触与矛盾，并却正相助相成。

因为我们虽则很爱护政治的效率，但我们却更爱护思想的自由。以为无政治的效率，则行政失其意义：但倘无思想的自由，则国家失其灵魂。所以思想自由是人民的根本。纵使两者即有冲突，我们断乎不可牺牲自由而迁就效率。像俄国那样的办法，必须先经过一个阶级的专政，把人民所有的自由暂时牺牲，而以为将来或可有一个自由天国出现。

我们则以为国家是一个民族全体的公器，断不容哪一个阶级来据霸一时，而牺牲其他的自由。倘事实上有此，则宜努力打破。于理论上更不可认为应该。

所以我们主张为政治效率起见，针箍权力当然宜于集中，但集中的限度是以行政为界，断不容侵犯到社会上去，把人民的自由亦受管辖。19

作为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明确提出了"修正的民主政治"（又称"科学的民主政治"）：

我们对于政治，是把根据效率的科学与个性差别的科学，以与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于经济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于教育是把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调和为一；然后三方面再综合之，成一整个儿的。20

同时列举了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包括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九十八条政纲。非常突出的一点是：载明"不收现役军入为党员"--到了1945年9月，重庆谈判期间，蒋匀田还就此正式向毛泽东解说--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是单凭武力可以打出来。

以后的几年里，张东荪的政论，在《再生》、《自由评论》等刊物上不停地出现。与前期在《东方杂志》、《庸言》上刊发的文字相比

较，我们可以看出，他论说的目标，已经从宽泛的社会分析，转到剖析当政的独裁者，如《阶级问题》、《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民主与专政是不兼容的么？》、《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等。这最后一篇，发表于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直指一党专制和亲日案，火力异乎寻常地猛烈。

那年头的中国，仅就放言论政，包括具有针对性的努力，真可说是五色纷呈。而提着枪收税钠粮的政治势力：日本驻军、伪满政权和领地逐日缩小的国民政府，则各怀心思；在朝在野的各个党派（包括掌控了军队的和没有军队的），都各有盘算--没人知道哪种势力会在什么时候作用，也没人估量得出中国将如何前行。

就在这时候，世界政局出现了变化。

2 《八一宣言》与"一二·九"运动

1935年夏，德、意、日在东、西两线疯狂扩张。面临着法西斯的进攻，苏联告急。以保卫苏维埃联邦为宗旨的共产国际，政策发生根本转变。

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立即将这一新精神与国内华北事变的严重局势联系起来。团长王明（其时正在基斯洛沃斯克疗养）火速赶回莫斯科，与康生、吴玉章、林育英等代表团成员讨论之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书成，王明将其译成俄文，立即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得到赞许。

7月25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正式确定了各国共产党联手"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对中共代表团那份紧跟形势的宣言予以高度评价。

8月1日那天：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以神来之笔，给这份文件冠名为响亮上口的《八一宣言》，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发表。其实，所谓正式发表，也就是陆续在几份国际共运的刊物上刊登：俄文版《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机关刊物）；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还有一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中文）。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共产党员再"气冲'云霄"，也无法激励莫尔斯电码与活字排版。估计将原件传送、翻译，出版、发行等所需时间打进去，这份宣言面世，已经是秋末冬初了。

共产国际七大从7月25日开到8月20日，会还没散，因为事关重大，大家觉得必须将此新精神尽快向国内的同志们通报。代表团里边参加起草的林育英（林彪堂兄）主动请缨，将3500字的草案熟记于胸（真亏了这个曾受过日寇酷刑的"钢人"！），于7月底，也就是《八一宣言》这个响亮标题还没想出来的时候，绕中亚、穿新疆戈壁，骆驼不停蹄地往同志们身边赶。这一趟走了三个半月，到这年初冬，即11月中旬，终于赶到了陕西的瓦窑堡。

从本著者读书的五十年代起，中学历史课本和有关宣教材料，关于这一重大事件、历来有如此的表述：

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危日益严重，8月 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

《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指出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及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中共的任务是建立和领导抗日民族统—战线。为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21

从那时候到现在，不下五亿人口，均须背下这段话，以应付升级、升学考试和时事测验。直到2003年修订课本时，《八一宣言》发表者才被改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真实情况如何呢？

1935年初夏，法西斯在欧洲发飙的时候，红军正困在两河口；一、四方面军正为北上还是南下争论不休。共产国际七大开会的日子里（7月25日至8月20日），心神俱疲的周恩来（他是遵义会议后新"三人军事组"领头人）患了肝脓疡，已经不能主事，毛泽东开始独立负责军事。在《八一宣言》的最后一稿经共产国际书记处成员表决通过的那天（9月10日），毛泽东一派的中央红军，正以近乎奔命的方式逃脱张国焘的控制。而在林育英骑着骆驼往陕北赶的那段日子，红军打下了通渭县的榜罗镇（9月底），并且终于可以在差不多一年之后，再次看到报纸--他们这才第一次从《大公报》上得知日寇铁蹄对华北的践踏，得知原来自己正奔命前往的陕北，不仅有红军，还有一个苏区根据地！

这年10月，在"长征胜利结束"的吴起镇，毛泽东在党内的位置得到确认：负责军事。待到背负了两大任务（"传达国际新精神和调解一、四方面军关系"）的张浩（也就是林育英，这是他为这趟历史性的"浩然前行"特别给自己取的一个新名字）赶到陕西瓦窑堡的时候（11月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那时候毛泽东、张国焘斗法，互不承认，为避免僵局，只好采取没有中央军委这个变通方式）毛泽东正忙着打直罗镇（对方是东北军的牛元峰，并非日寇）。出面接待林育英的，是党的负责人洛甫、博古。

张浩同志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无论《八一宣言》这个响亮标题， 还是将其发布地改放到长征路上这样的主意，都还没想出来，但主持大局的张闻天已经敏感到事关重大，果断以"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工农红军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注意，并非由"中国共产党"发布。张闻天那时候多么明白。共产党宣教精英不知怎么愈活愈糊涂）发布了"苏维埃和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22至于这个宣言是如何发布的，通过了哪家

电台、报社，到目前为止，均未见披露23--可能根本就是一个草稿，或者哪位长官在什么会上唸唸了事，自然不会有任何历史影响。

只要比较一下两个文本：陕西发布的这个宣言与后来正式颁布的《八一宣言》，第一让我们惊叹的，是张浩同志惊人的记忆力；第二就是官方史家灵活闪烁外加相当无耻的身段。历史课本上那模棱两可、还特别扯上毛泽东的"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多么机巧，又多么不诚实啊。

然而，到了1935年秋末冬初，俄文、英文和中文的《八一宣言》，还是从不同渠道、辗转而艰难地传到了中国24--其速度和林育英穿戈壁差不多（虽然林育英找到了红军，但莫斯科接通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直到1936年6月中旬才完成--否则西安事变要重写了）。25

正"憋"在上海，只能动不动玩点儿牺牲巨大之"飞行集会"的周扬等零散党员（注意，中共后来对那时候革命力量的评价是"白区损失100%，红区损失90%"）兴奋莫名。26可惜由于获得信息的渠道的差异，对"精神"的领略难免各有千秋："国防文学派"，即周扬等"四条汉子"，他们获得宣言的渠道是《共产国际通讯》，心中的领袖是遥远的莫斯科。因为不曾离开过城市，对能与政府合作抗战（而不是拿命闹着玩儿），绝对"偷着乐"。而出自苏联作家之手的"国防文学"观念，对他们而言，不仅具有天生的亲和力，还特别给人壮胆儿。而到过苏区、参加了长征、这回接受特别派遣从陕西回到上海的冯雪峰就不同了。他代表的是瓦窑堡的中共中央，对白区还有多少人在干什么不甚了了--或许说，也不甚放在心上。他没有先联络"左联党团书记"周扬，而是登门拜望自己的"老师和战友"鲁迅，并在胡风的陪伴下，传达了具有瓦窑堡特色的《抗日救国宣言》。虽然那时"国防文学"的口号已经在周扬他们的推动下有了成绩，"左倾倾向"（或曰无产阶级情感）鲜明的胡风，即使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面，也觉得不舒服、不惬意--何况他根上看不起周扬等一干人。他们打出自己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并在鲁迅弥留之际，相当率直兼倔强地（冯雪峰和胡风的性情）将分歧公开。

现任党团书记的周扬和曾任书记、现任特派员的冯雪峰，谁都不服谁。大家在权力（"无产阶级文艺第一旗手"）上较劲，祭出来的却是冠冕堂皇的无产阶级大话。"两个口号"（"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从那时候一直争了半个世纪，把后世既热爱党又崇敬鲁迅的青年弄得一头雾水--直到大家都死掉，直到"第一旗手"的含金量逐日降低，直到毛泽东与鲁迅都不再是神。

口号本身没什么了不得，对抗日、对反法西斯也没有什么促进或者促退。从1936年到1945年，沈从文该写《湘西散记》还是写；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壮士》也是照谱照画；连郭沫若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直到今天听起来还挺像样子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军歌，也没因为这两个口号有任何影响。

如果这样的争执发生在别的领域、别的人群中间也就罢了。无奈文学与艺术最大的特色就是与公众见面--不仅作品，还有人物，更不要说解疙瘩的障碍还在毛本人。在对周、胡二人之经历与作风大致了然情况下，毛其实乐得髙高在上地看戏，有兴致的时候也下场挑拨一把。他本与鲁迅格格不入（即专制者与反专制斗士的格格不入），却不妨碍在他没登上专制宝座之前的某一时刻、某一局面和某种情绪下，对此人破格垂青（兼利用），根本不顾与他更近的当道一派（"四条汉子"〉的尴尬。

最为冯雪峰和胡风看不起的周扬，揣摩圣意的本领远在他们之上，更遑论攀附与网罗。对左翼文艺及其人士比较熟悉的好几代中国人，都清楚冯、胡党羽个个恃才傲物，而周扬的喽罗则成功霸住了几乎所有的关键岗位--这也是争执久拖不决的原因。

行文至此，著者禁不住说说半个世纪后的一桩同样把大家弄得一头雾水的公案。那是在文革之后思想解放发轫期（1983年），有所醒悟的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做了一个关于"异化"的报告--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恭奉马列为鼻祖之立场丝毫未变，只不过以前光捡一条胳膊，如今往前迈了一小步，说还有条腿哪。不料依旧自诩为意识形态总管的胡乔木立刻发难，逼周扬检讨，直把这名前总管逼到"抑郁而死"。官家及半官家思想宣传界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只有"两个口号之争"的当年亲历者夏衍把迷局一句话点明："这个报告让乔木去做，就什么事也没有了。"27

说到这里，著者再次禁不住向读者详述另一桩也是发生在1935 这一年，同样被教科书"忽悠"得莫衷一是的公案--"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先看我们耳熟能详的正统史家（共青团网）的叙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1935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9日，北平学生六千余人在中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抗日，促进了中华

民族新觉醒，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28

读者看出其中的要点了吧？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二，与《八一宣言》的关联；第三，"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具体到那个年代，最主要的当然是掌握了资源的国府；第四，"掀起高潮"。1937年之后的全民抗日，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似乎是功不可没。

事实果真如此么？先说共产党领导。

先说陕北。1936年6月，刚刚入党的黄华陪斯诺访问陕北，初次见到了毛泽东。毛高兴地感谢黄华赠送的从西安带来的托周恩来转交的载有鲁迅文章的杂志，他高度评价了一二九运动，称之为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运动后好久才知道。毛说：北京的年轻人干得好哇。29

可见与党中央的领导无关。地方呢？比如华北局、河北省委等。

1927年至1935年，白区组织处于低潮时期。当局的镇压和自身"路线错误"、使得在各种身份掩护下的共产党，有如星星之火，时燃时熄；零散的党员与组织的关系，也是时断时续。

1935年1月，中共河北省委派人到北平恢复党组织，建立"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四年前到北平读书（师大文学院）、日后成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和"彭德怀同党"的周小舟，在这年春天入党，并纳入该工委，担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负责人，任务是"把北平各大、中学已经垮掉了的学生会恢复起来"。30

1935年6月，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前来建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是王学明，成员有彭涛、冷楚、谷景生。31

10月，山东发大水，北平各校成立"水灾救济联合会"；11月18日，北平学联成立，女一中郭明秋为主席，清华大学姚依林为秘书，二人当时都还不是党员。但学联中有党员谷景生、周小舟等--周到月底就从学联撤出，转到北方局联络部。

11月19日，国民党举行五大，宗旨是"和平未到完全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北平各大学教授支持当局，抵制建立特殊政治机构的"自治运动"，3212月2日联合通电。

那么，有没有"地下党领导机构"呢？王凡在2003年特别撰写了将"（一 二九）历史真相逐渐廓清"的长文。据该文披露，谷景生等战斗在北平的"临时工委"，根据国际新精神，领导了这场运动：

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他们并没有直接得到来自党的上级机构的指示。他们只是通过各自的渠道，从外文报刊上看到了7、8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33

且不说这三名没有受足够教育就卷进革命大潮的青年，有怎样的外文水平。我们姑且认为他们对国际精神的领略比张闻天（他到了1936年1月才派出到北方贯彻这一精神的刘少奇）、周扬（这年12月中才召开解散文委的第一次会议）都早都快，在这里只问，发动学生上街抗议宋哲元当局，与国际新精神究竟相符还是相背？新机构"北平临时工委"又有多大的发动能力？

据王凡的文章，谷和彭都是曾经"受党派遣渗入同盟军，于兵败后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前中学生。到1935年12月，年龄最长的周小舟当时刚刚从北师大国文系毕业，34其他几位职业革命家的公开身份也都是学生。35

据临委书记谷景生说，他们听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将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开会，决定在12月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机构呢？它成立于1935年12月，是中国政府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抵制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之后，经双方谈判而最后组建、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的跨省行政机构。谷景生等青年爱国者最为愤恨的，当然是"日本军事压力"，但在"当此国难深重之际"，除了学生，还有国民政府，还有民间各界--他们也是爱国者，也在为民族未来尽着自己一份努力。清华大学理学院与物理系创建人叶企孙的弟子虞昊，直到近年，才在他的文章《"一二·九"运动与张申府》中，披露出教授们如何防止"奸人"在极其复杂的局面下浑水摸鱼：

1990年左右，笔者在叶企孙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叶企孙铅笔写的手迹，是"一二·九"游行的前几天，叶企孙、梅贻琦、陶孟和、胡适和张奚若等人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的通电，全文如下：

"连日报载通电，有谓河北时局紧张，要求'自治'甚至有谓'危机四伏'，提议自保者。同人等生长河北，深知各县并无此种情形，所谓自治

诸要求，全系奸人所播弄、雇员所制造，绝非民意。当此国难深重之际，用全国统一力量尚虞不能挽救，欲求一省之自保，岂可得乎，深望乡人切勿轻听谰言，受人愚弄，迫切陈词。"

很显然，这个全国通电的矛头直接针对当年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日寇头目土肥原指使下，在北平附近通县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36

他们那时没有估计到激情贲张的学生可能有所动作--姚依林等人联络的是张申府那样常在课堂上解说政治局势的导师，而非他们一干行动多受制于大脑而非肾上腺之辈。

现在回过头来说"一二　·九"。谷景生书记说：作出关键决定的会议是在他的住处召开的。与会者里边，有一名在后来所有的史书里都提到的关键人物、运动期间大家都看得见的"领袖"、"学联"主席：郭明秋--北平女一中高二学生。

"领袖"郭明秋在回亿录里断言"参加'-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并详述了自已十几岁的时候怎么一步步靠拢共产党：

一九三五年春（也可能是一九三四年秋），虽然北平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了，但并不等于从此就没有共产党的力量了。

从"九一八"到"塘沽协定"，特别是到"何梅协定"，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也是处于一个大动荡的时期，阶级关系有了重大变化。所以，大家都变得激进了。例如在我校（女一中）担任过校长的孙荪荃（她听过李大钊同志讲的课，我听说她加入过第三党，在抗日的问题上，她是左派），就因为她积极支持"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而被国民党排击掉了校长的职位。她是北平女师大毕业的，因为她有学问，在群众中有威望，所以好些人支持她，师大有些学生支持她，就连师大为谋职业--教书吃饭的人，也支持她。她被排挤后，改教高中语文和历史，是我的班主任，一九三五年的下半年，孙荪荃在我们班先后公开讲李大钊同志的生平、《纵与横》、《唯物史观》；据她讲，女一中的校址--北京北长街，就是李大钊同志找的，而且创办女一中，就是为了争女权、反对北洋封建军阀的统治。孙荪荃虽然没有进共产党，但她对共产党有过相当大的帮助，表现在对"九一八"以后和"一二·九"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方面。孙荪荃当时还明白地提到八一宣言，并且说"共产党要和我们合作了"。学校中的进步教师还有谭丕模、梁亦然（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了）

等。同学中也有党员，我就是一九三五年春由党员（同班同学）杨彤介绍入共青团的。同年"一二·九"前夕，河北省委批准我转党的。37

我们姑且忽略郭领袖叙述里边"阶级关系有了重大变化"、"孙荪荃当时还明白地提到八一宣言，并且说'共产党要和我们合作了'"、"大家都变得激进了"等逻辑混乱之处，从她的文稿中可以比较准确地获得的信息是，一批初中和高中的女孩子当时正充满景仰地追随着她们的班主任（前校长），一名激进的女革命家。

具体到"一二·九"，郭领袖说的是：

"一二·九"前几天在我的教室里开了一次会，讨论"一二·九"是否游行。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张兆尘的意见，他认为，是否游行，要统计（估计）一下人数，够八百人就上街游行。一种是彭涛的意见。他最为活跃，他认为不需要统计人教，只要我们估计一下当前的形势，是否需要农一个大行动就可以了。而且他估计能够超过八百人，办法是让那些力量大的学校先出来，然后再到那些力量较小的学校去呼口号，这样必有内应，八百人众，超过无疑。例如清华大学进城之后……我赞成了……"一二·九"这天只请愿，请愿不成就改为示威。

"一二·九"之前彭涛、姚克广（姚依林--著者按）等同志还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样，"一二·九"那天，学生就上街了。38

这里边没有书记谷景生。王凡六十年之后说的是：

决定于12月9日举行请愿活动的会议，他（即谷）告诉我们是在他的住处……运动期间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单线联系的郭明秋天天和他见面，她对外假扮为谷景生的爱人，而实际上她也正是他的第一位恋人。因此，她成为运动期间大家都看得见的"领袖"。这也就是为什么参加运动各校的党组织负责人，都不清楚上层机构的运筹情况，也不清楚运动的领导人是谁的另一重要原因。39

原来"党的领导"体现于由书记之恋人出头这一事实中。当时还不是党员的清华大学学生姚依林40怎么说呢？

那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同志。在一二九运动发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41

他好像根本不知道有北平学联党团（或"临时工委"）这么一回事。当

然也许后来做到副总理的姚依林远比他们聪明（也更诚实），清楚知道"一 二·九"奉行的是什么精神和"党"最终对它的扭转。

1935年5月正好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和北平中国大学教师的陈伯达（他在后来也一直被说成是"领袖之一"），则坚持"运动自发说"：

十二月九日当天的群众游行示威是……广大爱国学生自发举行的。其后，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一二·九"当天我在天津，第二天看了《大公报》才知道发生了抗日救亡大示威。当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爱国学生们冲破了国民党军警的阻挡，举行了如此英勇的示威游行，我心情很激动，大哭了一通，立即买车票赶到北平。在北平我接见了一些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如蒋南翔等，起草了宣传大纲，并参加组织第二步行动：一二·一六大示威。42

"其后，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后到多久？究竟什么时候党才开始根据《八一宣言》精神的切实领导？看来，最可信的，应该是刘少奇1937年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了：

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

至于革命局面为什么落到这样的地步，他的意见很明白：

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防御、退却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的影响，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是不可能的。43

但"一二·九"确实发生了，上街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有的说一千，有的说六千，有的说一万。一周之后，因为觉得"没参加上，要求学联再来一次"（郭明秋回忆），又接着发生了"一二·一六"。这回给的最多数目是三万，黄静和陆璀演讲的照片就是这次拍的（摄影师是斯诺）。再后一些，就是次年的"三·三一抬棺游行"了。至于抗议的对象，当然是"不抗日的华北当局"，具体说就是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和"卖国

贼宋哲元"（驻北平二十九军军长）。这能说是新的国际（以及瓦窑堡）精神吗？

其实，对于"一二·九"运动之领袖，还有另一个出自亲历者至亲之口的版本：

吾兄申府……和李大钊、陈独秀有较多联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曾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因参加"一二·九"运动任游行总指挥而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后由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44

言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这段话发表在他为其兄张申府的传记（作者为舒衡哲）所作的序言里。其实除了张教授的这段话，大凡提起张申府，往往说得更确凿：

"九一八"事变后，张申府参与领导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并因此被捕，在监狱中被关七十天。45

对此、张申府自己怎么看呢：

（12月9日）那天上午，我同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学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饮茶，算是组成了一个临时公开指挥部。我们看着游行队伍行进。队伍走过西单又往东走时，有一个姓陈的清华学生骑着自行车跟着队伍，并随时把游行的情况到楼上来告诉我们。46

四人临时指挥部！在追随者冒着大刀、棍棒游行的时候，两对男女在咖啡绾啜饮！

但这四个人怎么走到一起去了？原来作为姚依林就读的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与这活跃的进步青年往来密切：

12月9日的下午，我和其他三个人在喝咖啡，其中有姚依林。我自从有一次协助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拿一些钱给他后，便知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另外两人一个是郭明秋，她是新近成立的学生会的成员。还有一个是孙荪荃。孙和我那时已经关系非常密切，难舍难分：我们的爱情已是人所共知，一如我们的政治倾向一样。在"一二·九"学生大规模运动之前的几个星期，她已积极发动学生抗议政府。

她是一个十分十分独立的女人。我们在"一二·九"运动期间（1935年）变得亲密起来。47

原来如此。

据张本人叙述，这对革命情侣从相识到相爱，确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1930年秋季，张申府受聘编辑《大公报》副刊《世界知识》，并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着作《所书》。作为"标榜女权主义的风流人物"，作者收到一封署名"何必"的读者来信：

如果你是女子，你会怎么办？你会不会纡尊降贵下嫁一个头脑智慧皆不及你的人？你对像陆仙堡（Rosa　Luxemberg）这样的"狂野不羁"的女子有什么意见呢？

长于"从一个女人跳到另一个女人，从一个政治活动跳到另一个政治活动"的张申府，闻此叩问不啻天降纶音。他委婉又坦诚地回答道：

我确实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不是女性。我不能够也没有自称能够明白妇女的感觉。但我能够说的是，我十分欣赏陆仙堡那样的智勇双全的女性。

几个回合之后，虽然有清华校规、有刘清扬和两个绕膝幼女，张教授还是难于自抑，与投书人"何必"，也即前女师大豪杰、如今北京女一中校长、当代"陆仙堡"（也即五年后的12月9日，与他在西单联袂指挥运动的孙荪荃）倾情相与（虽然不过数年前的风潮中，张申府坚决拥戴的，是章教育总长）。

依张申府的见解，革命，包括建党，目的只为"促进个人内心的解放"，管你们什么理论、运动，他"只对性特别有兴趣"，坚信"革命、必须从最基本的男女关系开始"。

想来"政治上十分活跃，脾气也很反覆"的孙荪荃（张申府评语），那时正处于自己火一样的色欲恋情和革命激情中。喝着咖啡听汇报的两人都不曾想到不过一年之后的冷冷分手，也未曾预料女方随后成就的另一桩婚姻（嫁谭平山）。当然，更让所有认识他们、关心他们的朋友大惊失色的：是日后这位"智勇双全"的女性党派领袖（九三学社、1949年之后的国务院参事）竟死得那么凄凉惊怵。48而张申府、作为"情不向禁地随着自己的广泛兴趣走"的"浊世翩翩公子"（傅记作者舒衡哲语），会被共产党和刘清扬前后相跟各踹一脚，从此销声匿迹。

包括郭明秋在内的领袖都强调军警的残暴（"我和姚克广在西单挨了打。军警用枪把和皮鞭打了我们。"）。但"一二·九"运动之后，学生的抗日救亡过动一个接着一个，几与二十九军，包括学校当局，完全处于对立地位。

为防止进一步激化情绪，"一二·一六"后一周（1935年12月23 日），北大、清华等六所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告同学书--

连日报纸关于学生的消息，不大登载，以致谣言百出，大家都感到不明真相之苦。我们经过几天的实地调查，对于近数日来发生的事实，愿意与诸位同学说一下：

（一）九日北平学生游行，并无女生受伤致命之事……据协和医院王院长报告，九日有一女生头部受有微伤，经医治后即出院。市立医院，并无女生受伤死在该处；至于城内各校所传清华有学生伤亡之谣言，查明亦非事实。

（二）连日被捕学生，已完全释放。九日北平学生游行，因而被捕的，计北京大学三人，东北大学六人，北平大学二人，已由徐诵明校长子翌日保出……49

接着，"党"也不再是那几个学生了。瓦窑堡会议之后被派到华北的刘少奇不许北平的爱国学生再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而是派人劝大家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其结果是：

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二·九"运动以后，北平地下党员由五十余人增加到近五百人，天津地下党员由几十人增加到数百人，北平、天津两个市委很快就健全；河北省京东、津地、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都恢复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也先后成立起来；……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上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50

分析到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共党史学界和教科书编纂部门一个建议：如果认为1948年不将"一二·九运动"列入辞条的《辞海》编者，是出于反动的政治偏见；那么，在以上事实已经相当清楚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把"一二·九"这个"在共产党员参与下，由知识分子与学生出于爱国热情而自发的街头请愿示威"，定位为"1930年代初左倾关门主义、冒险

主义统治在北方白区活动的尾声"，而非大义凛然的"在《八一宣言》精神指导下，在中共组织领导下……促进了中华民族新觉醒，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至于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其他版本，比如1935年10月一个燕京新闻系学生怎么激愤难平地到了斯诺的家，他的妻子海伦怎么建议发起一场类似于五四运动那样的学生运动，包括怎么拟定计划、起草一系列要求……。最后夫妻二人并排走在游行队伍中间……；51又比如朱邵天（陈云前秘书，后任广东省外办主任）等十个燕京、清华学生，在斯诺的鼓动之下，作为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代表怎么去了延安，见了毛、朱等全体大人物……；52以及《八一宣言》英文本如何由陈翰伯藏在美籍教授夏仁德家地毯底下；林枫如何在那里与黄华、蒋南翔见面等等，正从另一面证明了这一场运动，实际上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至于"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即李葆华--著者按）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而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珩等同志"，只能看做是事后按照官职的拍马贴金，因为有的人当时根本不在北平，有的是"一二·九"运动后才入党。而那些拍马贴金的写手，对《八一宣言》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不说"懵嚓嚓"，只能归入宣传了。

写到这里，著者忍不住一定得跟读者说说那则已经成为"一二·九"招牌的口号、以及这则口号的发明人、在清华校长任上实在是太有"作为"的蒋南翔。据虞昊撰文：

1995年出版的《清华人物志三》上有一篇蒋南翔的传，传记的开端抄录了蒋南翔亲自写的一首自述诗，题目为《在"一二·九"运动中》，诗云："奋力为前驱，开路披棘荆。……星星地下火，曾为举火人。"这就是说，他才是"一二·九"运动真正策划发动人。

传记竭力描述蒋南翔诗的正确，其最重要事实是：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从城里赶回清华找蒋南翔……蒋南翔立即躲到清华一院大楼地下室的印刷车间……写出了著名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对唤起全国爱国学生奋起抗日救亡产生过重要作用……

可是，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校书史稿》和1991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均指出：这份《告全国民众书》是刊登在1935年12月10日出版的小报《怒吼吧》第一期

上，此时"一二·九"游行早已结束。可知这句名言只是"马后炮"，点燃不了12月9日几千北平学生游行的激情。53

就算这篇传记蒋本人没有读过，但在自撰的诗作里将自己奉为"前驱"、"披棘荆"、"举火"，又是什么意思呢？运动之后才入党这一事实，为什么不"老实向组织交代"？直到2001年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清华大学的领导方惠坚教授（曾任副校长和党委书记、《蒋南翔传》作者）对来访同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友会理事长解释为什么把蒋南翔称为"光明磊落举火人"时，还坚持说：

蒋南翔是中文系学生，也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在1935那一年，他在《一二·九宣言》中写下"华北之大，已经……"这个名句，震动了当时中国千万人心……54

算不算欺世盗名？如果一届届校长都这么做，怎么要求学生？但清华并非历来如此。

1936年春，当局开始大搜捕。学生里，边上了"黑名单"的领袖人物，一律受到并不主张他们如此行事的校长、教授尽力保护。张申府没有走脱，成了"一二·九"运动后唯一被捕的教授。他在牢房里关爱学生，"每天在狱中为这一群学生开讲唯物辩证法，结合牢狱之灾讲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人生观"。55大家出狱后，清华学生把其中四篇讲话汇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书名为《人生的意义》，深受"进步学生"的欢迎。

1936年5月，张申府由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正在他颇感自得之际，以张奚若为首的一批教授，联名要求清华大学当局停发张申府的新学年聘书。梅贻琦校长采纳了这个意见。

应该说，无论就学术水平、课堂发挥，还是受学生欢迎程度而言，张申府都是好教授；梅贻琦也是公认的惜才、公正、不畏权势的好校长。而且，二张〈张奚若、张申府）之间从无私仇。这类砸人饭碗之举，究竟出于何种目的？

无独有偶。与清华同步，1936年暑假，北大校长蒋梦麟也解聘了许德珩、马叙伦、尚仲衣三教授。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这件本应大书特书的事件，却一直无人论说：

清华为什么会对张申府采取这一决策，所有涉及校史的书几乎都对此未作解释，也未见张申府本人对此提出质疑。56

这是为什么？叶企孙的弟子虞昊认为：

这是张申府在"一二·九"运动的言行有违于老清华大学已形成的一种好传统，不为老清华的主流所容。

老清华大学的这一好传统的形成很不简单，是老清华大学创建时，以叶企孙为首的一批"少壮派"名师们团结奋战多年，终于形成稳定的"教授治校"体制之后建立起来的。首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被师生逐出清华园，与张申府之被停聘有些类似。在这一传统看，大学是专门培养青年人才的地方，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好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后以科学救国。校园里应保证充分的学术民主，但不能允许搞政治、破坏学校的学习环境，损害学生的成才。57

这传统，到了半壁江山已经沦亡的西南联大时期，或许已成绝响，更遑论纷乱的国共内战期间，和蒋南翔自己当上了校长的院校改革之后。

曾因为与左派同学打架而被记大过的何炳棣谈到1935-364清华的学生运动时说：

我当时毫无政党背景，绝对不是国民党或三青团员，亲老家衰，课外自修犹恐不及，何暇参加政治斗争。最后参加斗争是因为学生会越来越不择手段，不断地酝酿制造反政府游行示酸，鼓动风潮，罢课罢考。虽然事后反思我们当时看不清国家的命运，但三十年代的清华教授和多数学生却都认南京国民政府是唯一有组织的抗日力量，而学生会和北平学联等之一再暴露其居心和行动，正是为了削弱和颠覆这个力量。58

我们的主人公那时节全副精力集中于教学和撰述--因为有燕京那样的环境；因为有何炳棣那样的学生。1935年11月，孙道生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中对已见雏形之"八派"作出定义。59其中张东荪被认作"新唯心论"的代表：

中国新唯心论的领袖，无异议的当推张东荪先生。中国研究西洋哲学的人，不可谓不多，说到能有西洋哲学中引申出来新的意见，建设新的哲学，恐怕只有张东荪先生一人。……他的著作很多，总在120万言以上。如《新哲学论丛》、《人生观ABC》、《道德哲学》及《认识论》

等，都是近二十年中国哲学出版物中第一流的著作。就中以《认识论》一书是他的精心杰作。著者认为张先生在这部杰作中有三点最大的贡献：一是条理部分认识论；　二是名理绝对独立论；三是普泛架构主义。60

当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不会放弃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1935年4月，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在北平召开，他提交论文的题目即为《从我们所谓哲学看唯物辩证法》。之所以单单挑选这样一个题目，只为切实感到，面临某种可能到来的变革（革命），哲学不仅在它的发源地，在包括中国的亚洲，都出了问题。这篇论文是作为"发刊词"发表于《文史月刊》第1卷第1期（1935年10月10日）：

西洋哲学本以玄学（即形而上学）与名学为主干。在哲学本身上，第一发生问题的就是玄学。其问题是：玄学研究竟能不能成立？这个问题久在争论了的。但名学却始终未成问题。换言之，即名学究竟能不能成立却迄今尚未有人提出这个疑问。不幸的很，自从马克思主义侵入了哲学界以来，不消说玄学成了问题，即名学亦成了问题。于是整个儿的哲学都成了问题。

详言之，即在以前哲学是自足的。虽则科学从哲学分出来，抢了大部分哲学的题材，然而终承认科学有及不到的地方。这个及不到的地方便是哲学的领土　。科学出来，即自然科学发达了，我们可以说哲学的领域渐渐缩小，却不可以说因此把哲学的性质变化了。因为哲学虽缩小了，却未尝改易其性质。于是哲学与科学依然是对等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出来则不然。他不是把哲学缩小，从另一方面看，反可以说他把哲学扩大了。但他所扩大的却不就是我们所谓的哲学。因为他把哲学的性质从根本上改变了。虽则名称未改，而实质却与以前大不相同。这一点是一班讲马氏思想的人们所忽视的。

马氏的前提是社会组织决定人们思想。即人们的意识形态完全是社会的经济结构之反映。这样的唯物史观不但对于人们的具体意见从社会的阶级分野求其所以然之故，并且对于人们思维时所用的范畴亦从经济史来求其解释。最显著又最可笑的一个例，如陶希圣君说在人类没有货币以前，只是物与物交换的时期没有抽象的思想。好像是说抽象概念的名词是由货币而生。陶君是不是严格的马派，我不管。我于此不过因为此例太显明，所以举了出来而已。

总之，在以前哲学无论如何变化、而哲学自身终只是哲学。迨马派

一出，哲学却变为社会思想的产物了；变为代表社会上阶级利益的呼声了；变为经济的结构中自然而然所发出来的东西，好像膀胱分泌小便一样了。我们对于一个人的哲学思想不必看他的传授，但只须一查他在社会上居于何种阶级，便可推定其为何种主张。这便是以社会的"关系"决定哲学的内容。所以这样所谓哲学却与我们普通所谓哲学不同，即名同而实不同。因此我以为这乃是把哲学的性质大政变了。在以前哲学好像裁判官，不论他管辖的地方大小，他总可以坐在堂上对于其下的人们宣判。现在却一转为当事人，须得听从裁判官的判决。这个裁判官就是所谓社会学（或马克思式的社会学更较得当）。

所以以前哲学是自己至高无上，换言之，即是自主的，自己可以当家。现在哲学变了留声机器，人们唱什么他方得收进什么去。这个不同完全起于哲学本身。我实在不懂现在中国一班马迷还要高谈哲学，把哲学捧得高高儿的，而一班研究哲学的朋友亦因为他们重视哲学乃色然而喜。我自信我近来有一个发见：就是我发见马克思派所用的名词都与我们相同，而其意义都与我们不同。他们所谓哲学不是我们所谓哲学（亦许就正是打例我们的哲学）；他们所谓唯物论不是我们所谓的唯物论；他们所谓辩证法决不是我们所谓的辩证法；他们所谓逻辑不是我们的逻辑；他们所谓认识论亦不是我们及所说的认识论。我们来驳他们，他们来骂我们，实在都是无的放矢，非常可笑。

因此我个人以为马克思主义之突起于人类思想界是一件绝应注意的事。质言之，即等于一个关。若是不能渡过，则不仅哲学从此葬送，即其他高深思想（如高等数学一类）亦同受影响。所以哲学到了今天却是遇着了一个难关。

到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他又在新创刊的《自由评论》上发表《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猛烈抨击一党专政和亲日案：

各方面的消息似乎证明结束训政已成为"内定"的了。结束训政既成为内定，则不久的将来便可变为事实。但我们必须对于结束训政看一看其中有何种涵义。

在普通的涵义上来看，似乎可以说结束训政即是取消党治。

所谓取消党治就是取消一党专政。取消一党专政就是同时允许他党存在。这亦就是取消"党外无党"与"党高于一切"的标语。同时亦就是取

消"党国"二字。因为党国是"国为党所有"的意思。……

我以为国民党如果真心要结束训政，最好是在这一次的五全代会以后，即把党费由国库支出者完全停止，同时颁布一道命令声明所有民运必须的党部指导的法令亦一律停止其效力。如此便可算训政真正结束了。至于结束训政以后的开始宪政，恐怕尚需时日。

我们今天已经比较容易判断，究竟哪样对中国的现代化更具推进力，是"一二·九"、"一二·一六"这样的街头抗议，包括事后历七十多年而补缀不已的"伟大意义"，还是张教授这样的言论，以及两校长的处置原则。终其一生，张东荪没有提过他的燕京同事斯诺，也没对"一二·九"做过任何评说。

至于其他"陈年的垃圾"，61比如"一二·九"之前，北平学联党团怎么在国民党北平社会局备案，取得了"黄河水灾赈济会"这一组织的注册和公开活动的条件、却在事后不另备案，即将"赈济会"改为"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还将赈灾款用到"一二·九"运动等（郭明秋回忆）。这类为了革命而不惜违法的行为，想来不会受到孙荪荃、张申府、许德珩一类师长的阻拦，而张奚若、叶企孙等教授与校长们，也已无力追究。

此后，在革命的、享受党的阳光雨露的中国，随着"五四"、"三一八"、"一二·九"……等年复一年地坐享精神祀祭，群殴、焚烧、款项挪用、特权享受、率先逃命……只要"大方向正确，手段是可以不计的"--成了日后中国学运领袖在公德与私德领域我行我素之护符。

3 评共产党"转向"

1936年2月，几乎就在刘少奇衔命抵达大津的同时，一篇文章出现在《自由评论》第10期上：《评共产党宣言并论论全国大合作》，刊出时间为2月7日。

这是"清共"之后，国统区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不以"共匪"对待共产党的文字。

这么早就公开（而且基本正面）评论《八一宣言》、瓦窑堡的共产党没有可能做；京、沪、平、津刚刚死而后生的地下党尚没气力做；后来与共产党生死难分的左派人士队伍还没有集结成功；对"共产"、"革命"怀有无从化解之警惕与反感的自由派人不屑理会--但这篇文章出现了，而且出自对共产意识形态从无宽谅的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而这位教授，还是大家记忆犹新的与红色写家数次论争的中梳砥柱。

他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北方救国会？燕京同事斯诺或者林迈可？

国家政治经济结构如此，教育程度如此此，社会组织成熟程度如此，如何面对？拼命、造反、杀出一个新天地……激愤之情在人群中涌动。他其实早在"火烧赵家楼"之前就有议论："完全拒绝之，为势既不能；完全承诺之，其果亦不良。则舍调和外无他策矣。"

至于如何调和，只有：

当采纳其主义中之舍有至理者，……然后对其过激之谬说提起正确之舆论以宰制之，则其势必渐杀也。要之，一方面于经济制度社会组织先自改良，此为釜底抽薪。他方面于思想研究，致其精微明辨，则人民有反覆之思维，能自辨是非，则感情之论不足以动之也。易言之，即过激主义之稳健化。62

这回，共产党不再和当局抢地盘，而是要联合抗日，自然属于"其主义中之含有至理者"--至于究竟是主义中之至理，还是审时度势的策略，张教授已经难于沉下心细细辨析。因为那时日本南侵之野心，已经无人不晓，而刚刚开过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以580多票的多数，通过"委员长所提的亲日方案"，成为政府的"对日根本方针"--专权者又出此令人羞愤之下策，让他伤心不已。

他的愿望，或者说那时候有知识、有议政能力的人的共同愿望，是"把全国有政治能力与主张的人们一齐拉在同一战线下。倘能如此便是中国的一个大转机。中国已经错过了许多的机会，使我们一-般老百姓失望又失望"。

张教授素以不苟言笑闻名于师生间。文章平实理智，从没有过"哎呦呦"等兴叹。北上燕京任教之后，所感受的，是难得的读书人做学问的时光。课上课下，自信而自得。然而这回，《八一宣言》发表了。在张教授看来，该文不仅言辞至理至性，竟然出于整日叫嚷"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之"赤匪"之手--不能不令人动容。虽然没如濒临危境的洛甫、博古，哪怕周扬、夏衍那样，感到"如获至宝"、"就像一盏明灯"，63但作为爱国者，特别是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的批评者，张东荪受到深深的震撼--他们变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根子上变了：

一个向来主张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全世界革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以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64

似乎是，曾经有过的论争和论断变得不再重要。他正要以前论敌的身份，力排众议，向大家彰示，"全国大合作"抗击敌寇的局面太值得珍惜，而为这一局面作出"转向"的共产党，多么勇敢光明、意义重大：

我所以提出问题来讨论是因为这件事在思想界有相当的关系，亦可以说，我认为共产党的转向，是最近中国思想界上一件大事。但各报杂志上从无论到。这未免是一种卑劣心理的表现。我因为没有人来说话，所以才特别多说几句话。65

既然是"中国思想界上一件大事"，张教授为什么把它发表于梁实秋的《自由评论》，而没有作为自己党派的发言，发表于《再生》？如果我们对张教授了解得更多一些，估计就不会以常人之逻辑衡量他的作为了。交发该文，从张、梁二人之友情而言，是对创刊不久的《自由评论》的支持（"还稿债"），而没有看作是国社党一次重大的行动--从而也反证了该党的松散。或许，虽说被选做总务委员，张东荪本人对党务，

似乎并不十分"上心"。从根子上，他只是一名关注时势的学者，而非党人。

但这些，都不影响他径直说出自认为对局势最中肯的建言。不错，对于专制，他不仅有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感受，更有学理层面的警惕。在理论上，他认为"过激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或马列主义，是"产于俄，传于德，今则浸浸而播至英法日矣"，或称"西班牙伤风症，流行于全球也"，而"在中国勉强实行，将贻害无穷"。行至中国，比如北京爆发的所谓"首都革命"示威游行（1925年底的火烧晨报馆事件），"让群众运动演变成暴力事件，既是革命党人的主张，也是近代中国的宿命。透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宽容的风气，就会变得更加残忍，更加可怕。"

对他而言，随着整个自由世界的反省与探索，"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强国"则近于一个寄托了期待的模糊憧憬。虽然一批文人组党又发政论，他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来没有在行动上把自己当成政坛人物。于是，对政客"怎么有利于自己就怎么说"（并不一定做）这一常态，他居然没有丝毫警惕。这回也一样。东荪先生天真到无可救药地在评说中指斥"唯党是从"之要不得，并且死抓住人家共产党"不过说说而已"的东西不放：

所谓党团作用乃是随着共产党的潜伏运动而生的一件东西。即对于党外的人只讲利用，指认为工具。换言之，即对于党外无真诚只有诈伪。在我们看来这种党团作用实在是一个毁坏人类天真性情的东西。……

共产党必须声明在国难未度过时期中（至少十年内）放弃共产主义活动，以使一般怕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安心；共产党必须把其军队集中在一个区域，以便万一有事则可担当一面；共产党应在其统治区内实行"救灾安定民生"、"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加薪加饷"、"实行免费教育"等政策，承认只有一个中央政府，苏维埃政府应变为地方政府。……

我们历来不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而只反对一党专政，以为一切罪恶皆由此而生。现在共产党提议合作是显然放弃了专政，这真是一件最可庆幸的事了。66

他的一个重要思索（起码可以看成敝帚自珍的命题）--"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虽然要到1946年才郑重提出，但在此刻，从对共产党转向的赞

扬中，已可见端倪：

大家须知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以外，实在有很多的人们，是于经济赞成社会主义、于政治相信民主主义的，这一类人们虽尚未形成具体的大规模组织却是很有潜力。我相信有许多同情于共产党的人却其实只是这一类的信徒。67

他本意是对学界和公众发言，没有料到评论发出后，居然受到新到任的中共北方局书记（后来的共和国主席）的问应，刘少奇这封署名"陶尚行"的信，直接寄给了该文作者，即张东荪本人，还着重说明是"明白公开的答覆"，并希望"将这封信在贵刊上发表，并在贵刊上答覆我"--特别具有"凡事长于自作主张"的"少奇同志"特色。

然而，尽管明知（在内部也如是说）自己党过去没少犯"鲜血和性命为代价"的错误，但陶尚行的这封信，依据"党内党外有别"之原则，仍是一套官话，见不到丝毫的诚恳：

中国共产党向来没有主张过：在中国立即要废除私有财制度，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事不应由自己来解决、而应由他国人来解决，共产党与中国不应为中国民族自由独立与生存而战。共产党并没有主张过无论什么时候对于一切都不应妥协合作。

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曾经长期合作过。共产党历来就号召全国人民为中国的完全自由独立与领土完整而奋斗到底！素来就反对他国人对于中国民族内部的事情横加干涉。68

就算张教授对"国际"与中国支部几乎是"父子党"的关系知之不详，对"中国支部"拿人家钱，放弃国格、紧跟苏联的一次次良知丧尽之举，愿意暂时放在一边，但对这样"没理狡三分"、脸一抹即不认账的官腔，一定已经相当厌倦。用现时的话说，就叫做"太没劲了吧"！他把来信交给《自由评论》，表示本人"对于这个问题没什么话可说了"。

《自由评论》将转来的文字以《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致自由评论编者并转张东荪先生》为题刊于4月号，相当平实地加了一段"编者的话"：

陶尚行是什么人，我们不知道，很明显地他是在替共产党辩护，但是他是在用和平辩论的态度，不是一般共产党常用的谩骂诅咒的态度。

文章发表后，一名许姓读者又致信张东荪，对陶信提出批评。5月17

日，张东荪再提笔，先在《自由评论》上发表《关于陶许两封信的感想》，接着，也许对于共产国际的大会有了较多的了解，也许是对作者表现的"共产式的思维方式"深深惋惜，终于又提起笔，为自己的刊物《再生》写了《从教育的意义上欢迎共产党的转向》，69表达了对陶尚行站在本党之立场上所作"辩护"的感受：

我们在局外认为共产党转向了，而共产党的代言者偏要说是向来一贯的，不能不令人觉得这是一种怙恶。换言之，即这是由于一种"面子"作用在那里作祟。……

我们未尝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转向又何尝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自主的行为呢？依然只是受了世界共产党的转向之波及罢了。

因为他们是习惯于生活在指导之下，只知奉令承教。他们对于上级所发互相冲突的两个使命，只可一样去服从，不知其中有矛盾。即使知道有些相反，亦必只好加以强辩，帮助其可以联接。这是他们的职务，恐怕亦就是唯一的职务罢。因为不如此，则铁的纪律不能维持。70

行文到此，不得不佩服张东荪、梁实秋，以及那位许姓投书人之目光锐利。因为几乎半个世纪，三代中国人（无所谓共产党员抑或并非该党的人）都生活在"陶尚行"冠冕堂皇的模棱谎言里。直到毛、刘离世，到部分历史文档可供专门研究者调阅发表，我们才知道，在他们这场文字交"不过一年前，也就是1934年中期至1935年夏，翻检中共苏区的领导人与国际的请示与指导，还都是如何巩固根据地、如何保住红军实力。在反围剿的艰难环境下，脑子里基本没有'抗日'这一概念"，71在知识界、舆论界，共产党专注的，依旧是乡下的农民运动和城市的集会斗争。

可能太着重自己的专业了（方法论与认识论），张东荪觉得，共产党这个党，坏就坏在"思维方法不对头"。而思想界的责任，则是"从教育的意义上欢迎共产党的转向"，"反对共产党就只是专在于其思维方法的态度"。不知是否出于教师的职业习惯，对于共产党，他竟然郑重发出经历史证明、只可称之为"满拧"的呼吁："这个转向在政治上与结果上亦许不十分大，而在思想上与教育上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因此我觉得全国教育界对于共产党的这个转向应得重视。"72

如果从政治学原理出发，此番交手，其实属于他最关心的权力制衡：抗击专制的力量走上了正轨（民族圣战）。对此，他立即反应，表

示衷心欢迎。完全没有想到，他的"以正视听"的做法，正合了共产党统战的需要。

不知道刘少奇在他向中央的报告里怎么评说这几篇"鸡同鸭讲"式的你来我去。目前查到与此有关的，只有1936年8月5日中央致信河北省委电：

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转变。…… 能采取适当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成的刊物，努力扩大抗日战线，…… 73

胡服即刘少奇；最有权威的刊物，应是《自由评论》和《再生》。在丝毫不客气的批评面前，报以如此大度的回应，在共产党，特别是执政后的共产党，几可告阙如--而这回的这个态度，是因为自身依旧处于艰难中，还是少奇同志正要得到重用？

其他爱国者呢？据新中国正史，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都得知了这份《八一宣言》，他们"表示衷心拥护。在上海从事救国运动的各界人士相互秘密传阅，奔走相告，一致认为《宣言》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反映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第三党'根据《宣言》精神，重新起草了自己的党纲，制定了同共产党合作，实行联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74

张教授有关"政治上"和"教育上"的"意义"，错在哪里了？或者说，他的"满拧"，到底拧在了什么地方？

我们已经知道，由世界局势引发、国际政策调整而导致的中共这回的"转向"，在"政治上与结果上"效果鲜明：共产党从此摆脱"赤匪"之恶名，在全民族抗战中理直气壮地壮大崛起，终于拿下全国。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和洛川会议之后所走的几步毫无心肝却极具成效的棋，连周恩来、彭德怀一时都看不出来，更不要说教授们了。好在《自由评论》的编者除了点出"陶先生似乎把共产党说得太好了"之外，尚有下边一段论说，不知是不是指毛泽东亲自部署并亲临指挥的"红军抗日先锋军渡黄河东征"（1936年2月间）：

抗日救国的事业，必须以全国一致为先决条件。局部抗日，是于国家有害的，因为一部分闹出乱子之后必至还有一部分来签辱国条约。必需全国有力者都有死里求生的决心：谁都不准备苟安偷生，然后始可以

言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们以数万饥饿之众高揭抗日的旗帜渡河入晋，这样能否收抗日之实，谁都不免要怀疑的。恐怕事实上只能糜烂地方、惹起敌人加速进攻吧？

这一步棋（红军抗日先锋军渡黄河东征），正是瓦窑堡版《八一宣言》的具体落实。目标为"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联系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和主力红军"；具体步骤是"联络驻陕北绥德米脂的八十四师（高桂滋），攻打卖国贼阎锡山"。行动结果，有学者作了具体叙述：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又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样贫困的地方，一下来了这么多红军，当地农民根本无力供养。齐志丹也拿不出多少钱来支援中央。钱的问题真是叫人头疼。彭德怀、林彪电报告急。因为没有棉衣，没钱买柴火，战士都冻坏了。毛泽东意识到红军生存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1936年2月20日，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红军开始东渡黄河。三天的渡河很顺利，只遇到阎锡山部队的轻微抵抗。一进山西境内，红军就感到比陕北富裕得多。童小鸥随中央直属队到了石楼县的下堡镇，看到这个地方"虽然只二百余家，街上也不过几十间铺子，但是它的建筑，尤其是居民家中的布置，排场得很"。王平带着红十团在洪洞县东南的苏堡镇打土豪和筹款。一天，有个老长工报告，某地主家有个暗窖，里面藏了不少东西。红军找到暗窖，打开一看，先皮袄就一百多件，还有不少古董字画。有一个铜盆，用手在盆边摩擦就会飞起水花，据说价值十几万元。但是这些文物字画都不如现大洋对红军更有用处。仅在苏堡镇一地，红军就筹款上万元。

红军进了山西，阎锡山急忙调兵加强化太原以南的防御。谁知红军却掉头向南，晋南是山西的富裕地区，红军所到，并不主动找晋军作战，而是打土豪、筹款扩军。在山西边打边休整了两个多月，毛泽东认为东征目的已经达到，不与敌人决战，下令主动撤兵回陕北。在掩护红军渡河回陕北的战斗中，刘志丹军长不幸中弹牺牲了 。

红军东征取得了很大成功，短时期内红军就扩充八千人，筹款五十多万元（一说三十多万）。对于贫困的红军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75

其实：就算红军手里不是土造枪，而是大刀棍棒，石楼、洪洞那些富户也绝不是对手。出发之前，伟大领袖已经估计到这一绝不仅仅是五

十万元的胜利。他气势雄伟的《沁园春·雪》就在这年2月写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在"政治上与结果上"。东荪先生期待的"思想上与与教育上" 呢？著者倾向于不在这里浪费笔墨--我们每个人从自身经历都能知道，如果从那时候起就发生令教育界和学界感到欣喜的转变，还会有后来三十年从整风、抢救......直到文革，愈演愈烈的灾难么？

因为谈到本书主人公"从教育的意义上欢迎共产党的转向"，很难不向读者诸君介绍另一个很有人情味也很温馨的故事--也发生在教授间，也在那个时候：

1936年毛主席到达陕北后，周炳琳先生、许德珩先生、周夫人（新民学会早期会员魏壁女士）同许夫人（新民学会早期会员劳君展女士）一起商量给毛主席送些陕北急需的东西，并由魏壁女士和劳君展女士一起坐洋车（人力车）到东安市场选购了一批金华火腿、怀表（当时那种只有会移动的阿拉伯数字而没有时针和分针的怀表）和布鞋，用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等人的名义，委托在北京的中共地下党人徐冰教授和夫人张晓梅女士送到陕北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后，曾回信表示"衷心感谢"。76

毛的回信如下：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无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赶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936）十一月二号77

本节结束前，特别希望读者还记得共产党拿下天下之后的交椅分派。许姓作者不知何人；梁实秋已经遁走台湾；张东荪得到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许德珩得到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长；周炳琳辞北大法学院院长之职，专任经济系教授--但那是在1949年。到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里，周教授再也不能回到1936年时候的心情，即所谓表现"态度恶劣"是也。情况报上去。毛泽东怎么批示的呢：

彭真同志：

送来关于学习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78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79

周炳琳教授率直坦诚。他曾经真心喜欢的，是受专制欺压的、走上团结抗日道路的毛泽东；厌恶的，是扼杀自由的专制者（1946年制宪国大由国民党包办举行，周炳琳曾站在共产党一边，劝胡适不要出席，说："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除了1952年的"恶劣态度"，到反右期间，他更认为"纣之恶，不如斯之甚也！"

毛泽东放他一马，出于念旧，抑或留下个把真性情人以粉饰场面？

4 国民参政会

局面胶着。

"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这是国家元首蒋介石强虏当前"隐忍退让十年"（从济南惨案到卢沟桥事变）为自己立的口诀。但是，没有等他自己奋而迎战，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合作、联合抗战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事变中，斯大林的亲自介入搭救，使得"士官生＋青皮"出身的蒋介石，获得一种受到顶级强人青睐而生发的自我期许。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看来须暂时让位了，以回应朝野上下之一致呼声"全民携手、持久抗战"--这不仅仅是向给钱给枪的斯大林作出的姿态，更是赢得人心的基调。因"独裁"、"训政"而挨的骂……全可以暂不计较。除了富有道具效果的黑披风、白手套之外，蒋某还要在言辞、心胸上更像个元首、领袖。

"西安被难"惊魂初定，汪、蒋等人即定下了 7月中之后（在他们避暑的地方）"广泛听取各界知名人士意见"。当局打算邀请二百余人前来庐山，分三次举行"谈话会"，名单已经汪蒋亲定，不计对元首曾经有过的态度；不计政治底色；唯一的标准是议政能力。来宾包括"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但大家都以个人身份出席，连入座都按姓氏笔划，可见当局对"党外有党"的忌讳。更有甚于今日与共产党共同议政的各民主党派者，谈话会还有"一批国民党中央要员和政府各部门的高级官员作为陪客"，形影不离。

尽管如此，各党各派纷纷从秘密状态下浮出，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对日作战。以个人身份应邀出席的国社党张君劢、青年党左舜生，以及农民党、村治派的人，包括著名大学校长、实业巨头等，都在庐山慷慨陈词。

正在这当口，"七七事变"发生了。

经瓦窑堡会议、特别因西安事变而"挨了（苏联之）跐儿"的共产党，虽然一直与当局举行秘密谈判，而且周恩来等当时就在庐山，也没有受到邀请。尽管如此，在"七七"第二天，共产党还是发出"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的电报；身份依旧是"红军将领"的彭德怀、林彪等，也郑重表示"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

一死战！"

张东荪是庐山谈话会受邀者之一，也前往并佩戴了圆形白底蓝色"五老峰"会徽，80但几乎没有说话。与当时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和副主席蒋介石（这次谈话会主人），不仅毫无渊源，也没有好印象--尽管蒋的此次演说几乎立刻成了全体国人朗朗上口的誓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1

日本全面侵华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将中国的"第三势力"（张东荪在自己的文章中称之为建设民主国家的"新势力"，国社党自然包括在内）正式推到前台。张东荪没有被"一个领袖、一个国家……"迷住。对国共两党"曲不离口"的"总理三大政策"（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从被提出的二十年代中期，到共产党得到全国政权之后，张东荪无论是教学、演讲还是著述，从来没有提过。就算他在那时候对蒋介石的"抗战到底"之"底"有比较乐观的估计，但作为思想家，其心爱的命题依旧是对专权的制约：

没有一个专制国遇着了外患，而能够办到举国一致的。一个国家，政治愈专制，一旦有了外患，其政府想要举国一致去对付，因人民平日不信任的缘故，决不会有结果，……我敢郑重告诉大家说，以后的出路只看中国能不能有一个新势力，这个新势力出来必须把一切旧势力恶势力奋而廓清之。82

国民政府的咨询机构于8月组成，其前身是国民政府的国防参议会。第二年3月，国民党开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组织国民参政会案》（望读者注意此处我们实在太熟悉的"党说在先"与"唯党说了算"），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

南京沦陷。

国民党决定"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改在武汉举行，参政员当然由执政党（也就是国民党）"遴选"，人数也以他们本党党员居多。但共产党及其他当时最为活跃的党派和团体，都有人入选。比如共产党参政员的第一名就是毛泽东--虽然他一次会都没有参加过。后来大家联手反专制的民主政团联盟（以及民盟）的骨干人化，如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晏阳初、沈钧儒、章伯钧、张君劢、张东荪、曾琦、李璜、左舜生等，悉数入围。仅以当政者愿意倾听意见而言，不仅此前的国民党，就是当

下执政已然六十年的共产党，都不曾有过。

甚为有趣的是，大会之前，国民党决议恢复领袖制，推蒋中正为总裁--其誉望之隆，似已在当年孙中山之上。新任总裁再接再厉，推出"化多党为一党"计划--哪怕这一党的名称换成别的，不再叫"国民党"。雄心勃勃的中国青年党表示接受，老成的国社党仅答允"考虑"。曾经挺过1924年至1927年从热恋到断头整个过程的中共，给出的方案最老到，"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恳的态度，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奋斗"，并再度建议"各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仍自保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这不是老戏新演么？老蒋再以民族领袖自我期许，也不敢冒这个险了。只表示，大家的努力，"国民党愿推诚接纳"，只盼中共"履行诺言"。

1938年7月6日，战时最高民意机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张东荪作为国社党代表[83]参加。当时的舆论认为，参政会的形成，是"向着政府方式的民主化记录上一个真正的进步"；[84]当然也有人把它叫做"大规模的请客"，谁受到邀请，谁不在被邀之列，悉听主人尊便。细细考察当时诸位参议员的行止，只能说，哪怕到了同仇敌忾的"最危险的时候"，哪怕每个个体的学识、品德均属于一流，但距离现代社会议会民主、政党政治，实在还远得乐观不起来呢。

只看本书主人公1938年5月的那次武汉赴会之行。

从沦陷的北平出发，张教授不仅须冒遭拘押的风险，还要千里绕道香港。身体从来不曾强健、对种种名分也相当不在意的张东荪，为什么汲汲于这么一次聚会呢？原来他正为自已的一个梦想，或曰一个"设计"所迷，以为救中国于危亡，非此莫属：

当时正是南京陷落以后，政府迁到汉口，我在燕京大学教书。燕京虽然在陷落的北平开了学，我却潜赴汉口。我那时挟着满腔热血，希望将我所想到的这番意见直接向政府陈述。〔到武汉后〕我先把这个意见告诉友人，友人乃对我说，现在的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之上，这一番意见不见得会被采纳。我于是大扫兴而返。[85]

他想贡献予当道的"这番意见"是什么？在武汉见到的"友人"又是谁呢？

将张东荪前前后后的撰述加以比较，这"意见"，或许就是他反覆掂

掇、左思右想而设计出的"由新势力所推动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即"在政治方面比较上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而会面的友入，据已有证据推测，应是陈独秀。

据当时正在燕京读书，志愿为这趟跋涉担任教授助手的叶笃义86 记载，他们是在1938年5月，与另一名国社党人刘石荪（秘密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同去武汉的。张东荪曾在旅途中问叶笃义愿不愿意参加国社党，叶说不愿意，只愿意与他个人合作。抵达后，三人住在武昌的徐家棚，张和刘参加了国社党的会议。

在这前后，他们遇见了原燕大学生、"一二·九"前后非常活跃的共产党员陈矩孙87（或许事先即有约定，否则怎么会如此凑巧？，由这位前清帝师的嫡孙牵线，张东荪与托"共同抗战"之福刚刚获释的陈独秀见了面。据叶笃义回忆："约陈的信是我送去的，……事后张东荪对我说，他们的谈话没什么内容，不过彼此叙-叙近况，陈的情绪很低落等等。"88

怎么会没有内容的。张东荪一定把自己希望向政府及诸方政要陈述的那番意见郑重向老友解说了。这时候已经是1938年而非1919年和1924年，对自己所"创建"的党和前同志都有了更深了解的仲甫，则为他点破"现在的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之上"。

张、陈会面其实还有另一番意思。据陈矩孙1986年告诉著者，在他的怂恿下，经张东荪居中联络，已被开除出党的前总书记与共产党该届政治局常委、长江局书记之一周恩来见了面。著者当时对中共党史过于无知，竟然没有就此穷诘猛追。现在才知道，这次见面，不但已在康生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89 之后，也在陈独秀的朋友联名为他辩诬加上陈自己的辩白、90包括叶剑英等三人再替党张目的"覆函"91之后，更在张闻天和毛泽东愿意考虑陈独秀提出的"合作抗日三条"，而为处于托派清肃第一线、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王明严词拒绝（1937年8月）92之后。

即使这样，张、周、陈三位还是见面了。仅仅出于早年的情谊，还是为以后事情转圜留出余裕？不会因为周恩来已经得到指示，须特别敬重国社党诸位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对这一会见无只字记载。

还没等国民参政会开幕，陈独秀就离开武汉到四川去了。

会议期间，张东荪还正式与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见了面。当时，国社党台柱张君劢的《清明正本以救危亡》建议案，因"言论过于激烈"而未能提出。对党派政治失望之余，君劢曾与东荪商议，或许应着手文化改造？东荪后来回忆：

原来在南京陷落后，政府移到汉口的时候，我在汉口与君劢先生商谈，本有再办一个书院的计划。他托我到桂林去看地，以便造屋。迨我到了桂林，白鹏飞先生要请我在广西大学任课。我以为燕京大学如能存在，不如在沦陷区多照顾几个未能入内地的青年为宜，乃即潜归北平。93

写于1946年的这段话，完全没有提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据叶笃义记载，还在武汉准备启程北归的时候，张东荪就曾告诉他与周恩来的见面，以及"回到北平之后，同中共的地下人员继续合作"94--想来延安/长江局/华北局都已经知道了北平一批爱国教授的"救国会"。他自己也觉得，"参政会诸君，没有大作用，于是自己觉得还不如回燕京来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好。"

这年的12月，张君劢在民社党机关刊物《再生》杂志上，发表《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主张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知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强硬）路线"刚刚借"六六全会"确立，国民政府关于边区行政的所有意图，全被看作"意图侵吞边区"而立遭拒绝。更有甚者，张君劢的建议，居然越过有形之事务，涉及到形而上之领域：

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矣。

对这封信，虽然官方研究（如《毛泽东年谱（1893-1949）》，以不置一词表达了对它的蔑视，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确实提前十年确定了一生不曾碰过枪的这位作者，被毛泽东十分解恨地定为"一级战犯"（1949年）的命运--虽然在抗战胜利后短暂地用得着他那一段，毛还能表现出得体的克制与礼遇。

罗隆基曾表示，这封信不能代表国社党立场（当时罗还是该党总务委员）。张东荪在私下对老友也有规劝。95其实，从学理上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张东荪的言论并不在张君劢这封信之下。或许，救民族于危亡压倒了一切--张君劢在对"民族国家"（蒋中正往往以此自诩）的钟爱与信仰上，是超过张东荪的。

曾有传言，蒋中正为此给张君劢的书院拨了款：就算拨款属实，张君劢的这封信，也绝不是为这区区馈赠所发出的。96但是，二张分歧之"青萍之末"，终于在此时显现。

注释

1、陶菊隐：《蒋百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51-52。

2、其不一致之处不在理念而在做法。例如在封待共产党和毛泽东方面。1938年，张君劢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间信》；1946年，张东荪埋头《理性与民主》并演讲《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3、侯祥麟的描述："哲学教授张东荪有句话给我印象至深，他说学哲学如同吸鸦片，会上瘾，学了哲学就离不了，还想更深入地研究。当时我想，照他这么说，哲学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张东荪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他拒绝为日本人工作，一直从事抗日的社会。参见？《我与石油有缘--侯祥麟自述》（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

4、事情起源于1929年3月上海市教育局长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个议案《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提议对"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应不犹疑地予以严厉处置--法院不需审问，只凭党部的一张证明便可定罪处刑。胡适先给司法院长王宠惠写信，并抄送国闻通讯社（对方没敢登）。接着写了他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罗隆基（《论人权》）、粱实秋、王造时等紧随。当局以逼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拘留罗隆基、查禁《新月》杂志等手段予以对付，一场保卫人权战打响。令后世读史人不解的是，何以共产党在这场本应看做对自己声援的论战中所取的立场，比如大家已经十分熟悉的瞿秋白文章（以鲁迅名字发表）《王道诗话》，就对胡适百般挖苦。

5、智效民：《张奚若：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载《胡适和他的朋

友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页75。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页68。

7、牟宗三：《五十自迷》（台北：鹅湖出版社，1989），页64。

8、蒋介石1935年在国民党蓝衣社集会上演讲。

9、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10、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香港：友联出版社，1976），页74。

11、张东荪：《增产与革命--写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后》，《中建》半月刊，第3卷第4期，1948年7月。

12、杨亲华等主编：《中国民主党派词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页69-70，25-26。

13、见当时国社党驻民盟代表蒋匀田描述：这天是（1945年）9月25日，毛到重庆之后的一个月。在他的心目中，与国民党内政学系有相当渊源的二张（张君劢、张东荪）很有份量。毛泽东郑重向蒋匀田通报说："和国民党的谈判已经失败了"。蒋匀田问他失败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回答说： "与国民党相约彼此保守秘密，不过蒋先生既然代表一个有历史的政党，我不应当向你保守秘密，希望我们共同保守秘密。"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页2。

14、《自由评论》，第35-36期，1936年8月。

15、张东荪：《党的问题》，《再生》，第1卷第3期，1932年。

16、张东荪：《国民无罪--评国民党的宪政论》，《再生》，第1卷第8期，1932年。

17、张东荪：《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再生》，第1卷第6期，1932年。

18、同上注。

19、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

20、同上注。

21、参见高中历史课本《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核心知识点辅导材料（2006年版）。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491。

23、有野史记载，《八一宣言》（估计是莫斯科版而非张浩背下来的）为"张冲属下的'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收取，张"随即将电文抄送蒋介石和其他要员"，到1936年春夏，《申报》刊登了一条"寻找武伍豪启事"，要求被寻人于5月5日到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某房间，与落款者一晤。中共派出了潘汉年作为中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与张冲、陈立夫在上海、香港、南京多次磋商。潘于是年8月8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汇报并传达国际指示。三天后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将"抗日反蒋"口号放弃，此口号在9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中被改为"逼蒋抗日"。参见张云：《潘汉年传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4、准确的关键日期，有正式记载：《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1935年7月14日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一致通过。王明译成俄文后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8月2 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中明确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倡议"；9月10日，《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书记处成员表决通过并于9月24 日获得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会议批准。10月1日，《八一宣言》（中文版）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通讯》（英文版）刊登。1935年12月刊登于《共产国际》（俄文版）杂志第33-34期。

25、详见李永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26、周扬"真是兴奋得不得了"，用"如获至宝"来表达当时"无法形容"的"内心的兴奋"。夏衍也从史沫特莱那里看到了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这是他们和党失去联系后第一次得到党中央的指示，第一次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夏衍用"正像大旱遇到甘露"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参见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27、参见李锐2002年1月25日在北京大学知识分子问题研讨会上的讲话。

28、参见"一二·九运动"，载"中国共青团"网站。

29、黄华：《亲历与见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到了1939年，毛泽东说的是"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参见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256。

30、《周小舟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31、据1935年5月接替孔原、朱理治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的高文华回忆，北方局书记孔原，管辖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当时河北省委下辖北平、天津市委，及冀东、冀南、冀中、沧州、冀鲁豫边区、鲁西、石家庄等特委，因为与中央失去联系，经费困难到卖掉自己儿子的地步。高在1982年的文章中说："1935年底、1936年初，冀东二十二个县伪化，形势十分紧张。北平、天津的学生纷纷起来反对，还组织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队长是李昌（当时不是党员）。学生运动一直发展到后来的'一二·九运动'。我们北方局支持并领导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而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珩等同志。'一二·九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学生、教员、教授等知识分子。"参见《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32、大部分涌上街头的年轻人都没有看到日人策动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与国府决定成立的"翼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为委员长）之间的区别。当时"不战不降"的拒日局面由1933年长城战役的英雄忍辱负重地维持着。

33、王凡：《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真相是如何浮出水面的？》，《党史博采》，2003年8月。

34、周小舟1935年8月毕业，11月底即调往北方局联络部工作，没有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参见《周小舟传》。

35、2004年易柯撰文，披露谷景生当时曾任北平"左联"书记和"文化界的最高领导"、北平文化总同盟的书记。

36、虞昊：《"一二·九"运动与张申府》，《传记文学》，2005年3期。

37，郭明秋：《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载《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8、同上注。

39、王凡：《"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真相》，《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4日。

40、朱邵天（原广东省外办主任，延安时期和五十年陈云秘书）在2005年回答田炳信"什么时候入党"的提问时说：高中时就开始看英文版的《评论周报》，上面有关于红军的消息。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我就入党了，但当时北平党组织的关系和陕北延安是脱离的。……当时清华、燕京两所学校是一个党支部，蒋南翔、姚依林、黄华都是那时候入的党，入党时我们也要宣誓。

41、王凡：《"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真相》。

42、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修订版），（香港：阳先环珠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页40。

43、刘少奇：《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载《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4、舒衡哲著、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45、雷永生：《走近张申府》《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 8期。

46、张申府：《"一二·九"运动的点滴回忆》，载《一二九回忆录》，第一集，页21。

47、同注44。

48、"她在50年代初期上吊自杀。她死时全奇赤裸，旁边一张字条上

写着：'我这样来，便这样去。'"参见舒冲哲著，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页98。

49、《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707号，转引自虞吴：《"-二·九"运动张申府》。

50、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

51、李辉：《在历史现场：换一个角度的叙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52、《朱邵天：陈云三句真言伴百年》，《新快报》，2005年7月6日。

53、虞吴：《"一二·九"运动与张申府》。

54、同同注。

55、同上注。

56、同上注。据张申府晚年对传记作者舒衡哲说，他最介意的是"要被迫放弃在清华园优雅的屋子"。参见舒衡哲著，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

57、同上注 。

58、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页89。

59、八派为：实用主义--胡适；新实在论--金岳霖：新唯物论--张中府、叶青：新唯心论--张东荪：唯生论--陈立夫：新法相宗--梁漱溟、熊十力：新陆王派--梁漱溟：新程朱派--冯友兰。

60、《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1月。

61、引自已在美国安家立业的前天安门抗议学生领袖柴玲1999年质问《天安门有限公司》作者殷·布鲁马（Ian Buruma）的话："你干吗还提这些陈年的垃圾？"

62、张东荪：《世界共同之一问题》，《时事新报》，1919年1月15日。

63、连睥视一切的毛泽东这回都比较服气（或者见到商机）。他当时主管军事。国际代表张浩的到来（11月中），和随后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救国宣言》（11月底），他并没直接参与。直到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召开，听了洛甫他们关于党的政治路线的报告之后，一直忙着打仗筹款的他，对局势才有初步了解。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关于这次会议开头几天的情况，毛泽东在12月19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及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明后天讨论军事问题。'"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页497。

64、张东荪：《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自由评论》，第10期，1936年。

65、同上注。

66、同上注。

67、同上注。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49。

69、金岳霖在《晚年回忆》里说林宰平同他说过,"张东荪太爱变了，而且变动得可快"--不见上下文，也不见前因后果。本著者作为张东荪文本与行状的研究者，出于对林、张两位前辈学人的尊敬，在此提出：或许这里张东荪先说"没什么话可说"紧接着又撰文，还连撰两篇，即属此"爱变"作为？

70、张东荪：《从教育的意义上欢迎共产党的转向》，《再生》，第3卷第10、11期合刊。

71、具体见王新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共产国际与红军长征》，《光明日报》，2006年10月23日。

72、同注70。

73、《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转引自马辉之、李楚离：《回忆刘少奇同志在北方局》，《人民日报》，1980年5月14日。

74、参见"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75、转引自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76、张友仁：《周炳琳先生二三事》，《北大人》，2003年夏季号。

77、《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84。

78、指派周炳琳的老朋友，包括他的女儿去和他谈话话，做思想工作。同样办法，也用在了陆志韦等在共产党眼中类似的人身上。

79、毛泽东：《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简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页422。

80、参见徐炳昇：《1937年庐山谈话会见闻》，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81、以抗日大义号召国人的同时，在武汉论陷前两个月，蒋、何的代表，还曾专程到香港向日求和，意图回复"七七"之前状况。基础是"中日合作共同防共"--满洲与蒙古都可以商量。参见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67。

81、张东荪，1937年在青年会的演讲〈思想自由与文化〉，发表于《文史月刊》。

83、国家社会党提名参政员共七人：张嘉森（君劢）、胡汝麟（石青）、罗文干、张东荪、罗隆基、梁实秋、徐傅霖。

84、《中国为民主奋斗和目前政治危机》，《亚美杂志》，1943年10月。

85、张东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

86、这也是叶笃义（1909-1998）和张东荪订交的开始。从1938至1952，叶笃义多次以学生、助手、代表、盟内同志的身份，与张东荪保持密切往来，直到张以"叛国"定罪。在1952年的斗争、1968-1972年的审问与1994年出版的著作《虽九死其犹未悔》中，劫波渡尽且正在申请入党的叶，也一概遵循旨意，未对张的为学、为人与境遇说过一句有违政策的话。然而，在他得知本著者将以独立知识人的立场为东荪先生作传之后，终以病弱之躯，给予热诚的鼓励与切实的帮助。

87、陈矩孙（1913-1987），富家出身、学识丰富且执着于理想的共产主义者。他1935年在燕京读书时加入中共，任中共燕大支部书记和北平市委秘书。后因"越轨"及反抗组织对他情感生活的干涉而遭开除，旋即为第三国际接纳为直接党员。1938年这回，他正以似非而是的共产党员身份在武汉活动。陈矩孙1939年奔赴延安亲自向刘少奇诉冤再度入党，并接受派遣再回燕京大学读研究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逃离北平时，组织关系丢失。1946年重新入党。1949年后在福建师范学院任职，获选为省政协委员。

88、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页9。

89、该文刊于《解放周刊》（1938年），诬指陈于"九一八"接受日本侦探机关津贴。

90、《七人联名公开信》，《大公报》，1938年3月16日；《扫荡报》，1938年3月20日。

91、《解放日报》，1938年3月21日。

92、据研究陈独秀的学者表示：洛川会议（1937年8月22-25日）上，毛泽东和张闻天顺便提出陈独秀问题。毛泽东提出，中国托旅与苏联托派不能相提并论，认为可以与仲甫达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日。王明一听，便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我们可以和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和陈独秀合作，因为陈独秀是每月拿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当与会者表示疑义时，王明又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对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参见狳光寿：《陈独秀"汉奸"事件始末》，《党史纵横》，2007年第2期。

93、张东荪：《士的使命与理学》，《观察》，1946年。

94、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9。

95、许宝骙接受左玉河采访时说："张东荪看到此公开信复，曾让人转告张君劢：不要遇分批评共产党，不能倒向国民党怀抱。"参见左玉河：《张东荪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页338。本著者认为饱经磨难的许先生记忆有误。这不是张东荪的语言！

96、许纪霖：《无穷的困惑--近代中国两个知识者的历史旅程》（上海：三联书店，1988），页162。

二 沦陷北平

1 在沦陷区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和所有"被放到火上烤"的人一样，燕大教授张东荪也写了自己的"检讨"。其中有关抗战前后，也就是他正式与共产党联手、共赴国难的那段日子，教授作出如下交待：

抗战前，和张申府、许德珩一些人组织了一个救国座谈会，当时写了一篇文章，主张联共抗日（过几天，姓陶的写信赞成。解放后和刘少奇说起，他说是他），这是和中共关系的开始。

那时希望与中共取得联系，救国座谈会派了一位叫彭泽湘的去延安，回来带给我一封毛的亲笔信。

华北区派一个叫王伯高的（与我直接）联系。

先说"救国座谈会"。张申府记得的是：

"一二·九"运动开始于学生，轰动了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纷纷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各地的救国组织纷纷成立，北平成立了"救国联合会"。我记得有一些进步教授都参加了这一组织，其中有：吴觉先（武剑西）、潘怀素、程希孟、章友江、黄松龄、严景耀等（都已故），还有一些健在的，如杨秀峰、许德珩等和我；另外，一些进步的学生也积极参加了这一组织。我们几个教授经常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解放后改名为文化俱乐部）聚会，讨论当时的时局，研究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等问题。1

里边没有张东荪--是不是张东荪说的那个"救国座谈会"？许德珩怎么说呢？

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北平学联于（1936年）五月四日发表了争取师生合作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学联检讨了过去处理师生关系上的不当之处，……北平学联改组成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从而取得了广大师生的支持。一年多的时间里（权且估计为1936年2月至1937年7月--著者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了。由华北的一些进步团体发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2

这里的"北平学联改组成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指的应是1936年10月北平学联公开举行第一届成立大会。这次大会，"请许多教授参加：

有张申府（左派）、冯友兰、张东荪……"；3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不是张东荪他们的"座谈会"后来发展成的那个"北方救国会"呢？许德珩是一直自觉接受党领导的。张东荪呢？据他回忆：

抗战前，和张申府、许德珩一些人组织了一个救国座谈会，在北平成立"北方救国会"，有何其巩（当时中国大学校长）、汤芗铭、许宝骙、姚曾广等。同国民党、共产党都有联系。

而张申府说：

1936年我被释后，住学院胡同甲二号，专门从事救国会活动。那时经杨秀峰、徐冰介绍，认识了彭真，他化名"高先生"，常到我家去。同时还认识林铁、萧明，当时北平共产党的党部在南新华街附近，我曾去过那里。4

想来这个救国会，和何其巩、张东荪他们那个"北方救国会"，就算一开始曾经坐在一起，后来也分开活动了。张申府虽然人在北平，但他"专门从事"的"救国联合会"，应该是上海"七君子"的那一个--因为此后他一直以这个救国会领导人的身份活动，包括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考虑到五十年代中期之后，大家写文章都自觉不自觉地跟党套近乎，对于为党所不喜的人，比如张东荪教授，则与自己瓜葛愈少愈好--就算率直的张申府如实写出了，编辑恐怕也要严格把关。不过，考虑到共产党在"顾顺章事件"后所吸取的教训，"单线联络"在白区工作中几成铁律--可能确是不同的共产党联络不同的教授，哪怕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所学校。

张东荪他们的"北方救国会"，据赵乃基记载：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德、日、意轴心国日渐衰微。何其巩、张东荪、张懋德、许宝骙、王伯高等人组织的北方救国会已觉察到胜利的曙光，经常齐集在北池子何其巩寓所，讨论以后的局势。大家一致同意，今后仍必须佯同日伪拉拢 ，以便及时取得一些真实消息，防止其威胁。5

这时说的已经是四十年代初了。一直没断了"佯同日伪拉拢"--如果不是底气特别足，谁敢如此做并在日后如此说？堪称忠贞英勇楷模，并且为共产党得天下立下大功的潘汉年，性命不是就这么丢了么？

如此这般分析之后，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36年2月间，也即"一二·九"、"一二·一六"都已过去，"三三一"抬棺游行还没有发动，张申府、许德珩，包括张东荪等教授，还都处于激愤澎湃的时候，北平文教界的一批人曾在一起"座谈"过。不久，由于共产党的实际介入，大家分开各自活动起来。"七君子"一派成了中间阵营中响当当的左派（共产党最亲密的战友），活跃于战时首都重庆和有租界的上海。锋芒所向，多为共产党的死对头国民党当局。留在北平的"救国会"，则艰难地在日据的抗日一线辗转腾挪。他们与中国抗日的两股武装力量（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有联络。不见激昂言辞，不见街头溅血，只有拳拳忠贞和无法为外人道的良苦用心，6包括日后浓得化不开的几乎遍于全社会的深深误解。

再说由"救国座谈会派到延安"去联络的彭泽湘。

我们从第一章已经知道，这是个厉害角色，厉害到要毛泽东亲自出手闷杀。

作为1932年7为王明中央所开除的早期留苏党员，对《八一宣言》的领会，自是不同凡响。这一倾向，其实已经表现在他正活跃其间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的成立与新政纲的修订上。8

他是在1937年春，也就是华北局势相当紧迫的时候到达北平的。早年的同盟会员和共产党员李锡九（李后来也被挑选列名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为他接通了延安，得以在6月成行。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此行颇得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欢迎。他们没有强调他二、三十年代的经历，只把这名前同志当作"解委"领导人9在延安接待--他们或许不知、或许根本不大看重他与（也是前同志的）章伯钧的意见不和。待到这一"不和"已完全导致强大的共产党对他的离弃，已经是1946年至1949年章与共产党合作无间的时期。虽然张东荪他们在北平一直以"救国座谈会派遣"来形容岳渔先生之此行，对彭而言，为教授们带个讯儿，显然是顺手之劳。

对北平的这个"座谈会"（可能也包括国社党），毛那时候好像没怎么看重，否则怎么在给当时中共北方局头领下王世英还有潘汉年的信10里边，连提都没有提及。

至于毛亲笔给张东荪回信，据张家后人七拼八凑的回忆，是由彭本人或别的地下党员带到他们那时候借住的西郊王家花园的。他们记得，

那信曾经夹在一本线装书的双页间。到1941年12月张东荪被捕入狱，燕东园成为日本兵营，燕京教工被悉数清出。张家传人回忆，这封信可能是在迁往城里大觉胡同之前烧掉的。王家花园主人王世襄先生2008年3月11日告诉笔者，那花园不是借件，而是两位张教授（东荪和尔田先生）向他家租住的。陈梦家那时也住在那里。"尔田教授学问极好，正教我作词。我那时候什么都玩，太爱玩了，直到1939年从燕京毕业，母亲去世，给了我巨大震撼，才知道念书。"

估计原信已经在战乱中销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又未见提及，具体内容已无法知晓。据曾瞄过两眼的张家亲属说，那是一封遵循老派文人交往之惯例而作的礼貌回覆。著者再三追问，信里有没有提1919年作者与舒新城为《湖南教育月刊》联袂向张东荪、胡适等求援一节？有没有提到《时事新报》发表他的作品？有没有对两年前收信人率先呼出的"何等转向，何等光明"（包括与陶尚行的一番争论）作些评述？张家人说"绝对没有"。联想毛对于细节所具有的令人吃惊的记忆力，比如一见到黄炎培即说"当年听他演讲"（1945年在延安）；见到张申府就说"早年当北大图书馆员时候的八块钱薪水"（1948，西柏坡）；见到章士钊则表示绝对不忘赴法留学前的资助……为什么这次如此之不"念旧"？"七七"前后，毛与外界交往渐渐多了，就算是礼节性往还，其尺牍风采，虽然不可能像当月感谢赠笔、赠书的何香凝那样文情并茂，11总不致于不如给步兵学校教育长郭化若的那封吧。12致张东荪的这封信未能出现在1993年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里，最大的可能是没有征集到。而不以私藏伟人手迹自炫，大概也属于本书主人公不拘一格的风格。

虽然没有在1937年6月间接到延安的特别指示，待到抗战爆发，中共北方局还是派了当时正在北平特委工作（次年任特委书记）的王定南（即张东荪"检讨"中的华北区王伯高）正式出面与张东荪联系。

一直未能获得"安排"，晚年才做到全国政协委员的王同志，其实在1929年中学毕业前就已经加入共青团。而一进入北京大学，就担任了校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党团书记。立三路线时期，应该说，他还真正浪漫了一把，13不过很快又"回到党的正确路线"。在他波澜起伏的革命生涯里，王定南用过不少名字：王作宾、王泽南、王正化等，当时使用（也是张东荪唯一知道）的，是"王伯高"（有时为东荪先生写做"伯皋"）。

在五十年代初的政治运动中，张东荪曾经对这段往来作过回忆：

当时我们通过王君（残片原文在这里删去"伯高"两字--著者按）做了两件事情。一是送学生去解放区；一是送医药去。当时燕京有好多进步同学通过团契和我联系。其中替我奔走最多的就是燕京毕业生赵令瑜，现在他改名赵明，是公安部第一处长。

想来北平解放之后，赵明还曾拜望过他的前教授，否则张也不会知道他在新政权的任职。随后，到了五十年代初的运动滚运动，这名公安干部顺理成章地再也不露面了。

将沦陷区的学生送走，本是张东荪在武汉的时候决定回北平的原因之一（"多照顾几个沦陷区的学生"）。他观察到，出于对中国政局的判断，包括与蒋介石的友情，司徒校务长在"学生一层"，是有分别的。"凡是送到国民党的，大部分由学校办，送到八路区的，由我们自己办，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14前提当然是学生自己的选择。张宗烨记得，常常是一车年轻人到西山去郊游，回来时候少了几个--投奔八路去了。

由于不是英美系留学生，也不是基督徒，张东荪与司徒的关系其实相当疏远。司徒对他的倚重，显然出于他在知识界的人望和与中共的关系：

在抗战开始时才有往来，最初是他来找我。他说各党派应该联合抗日，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派在沦陷区的地下人物，他都要求见面。

我常与他往来，是由那里打听一些后方消息。我在燕京协助送学生送医药到抗日区去，他也知道。

至于"送医药"，张家除了把自己在王家花园和后来城里的房子给地下党的交通人员当落脚点，还有一位"燕京校医吴继文大夫。他自己办一个诊所"，张宗烨觉得他其实是"以此为掩护"为八路购置医药。只是无法断定，吴之所为，究竟出于同情，还是自己也是地下人员。15五十年代的斗争之后，吴大夫依旧是张家常客，显然不属于尊奉"铁的纪律"以自保或寻求进身者流。医药的受用者，在他眼里，一律为伤病患者，并非日后执政党骨干。这与具名给首领送手表，显然不一样。

曾在武汉作战略性穿针引线的陈矩孙，自1938年因不服北平那帮地方领导，直奔延安找刘少奇（刘1937年3月离开天津回延安的），并在协助他工作了近两年后，再度接受派遣，以回燕大读研究生的身份，"配

合北平特委负责人王定南"开展工作。很奇怪张东荪被迫检讨的时候，没有提到他。

有时候局面相当惊险。如后世研究者很少提及的"抗日杀奸团"（暗杀周作人即为他们所策动）。这是"七七"后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富家（包括汉奸）子弟为骨干的小队。1940年8月的一次大搜捕中，一名燕大成员李振英罹难，他的同志吴寿贞退回校园，最后在张东荪和侯仁之两教授的帮助下去了西山（吴后来在游击战斗中牺牲）。

这些，在我们后世读史人看来，全都属于高尚的人之常情，提不到周恩来在武汉对他期望的"回到沦陷区作用更大"那样的高度，更无法解释数年后毛泽东对他出乎寻常的倚重。

莫非张东荪教授还有些什么非同寻常之举？

对中共而言，最实际的期望自然是获得情报。16张东荪并不是唐生明，也绝非熊向晖。与北平伪政权王克敏、刘玉书之间的交情，应该说，只能算是北洋时期的熟人。恰如他在检讨中说的，"王是老朋友，常来看望"；而刘玉书，"是我出狱时的保证人。他当时是伪市长，我被日军判缓刑三年，他负责监视，所以时常来看我"。

对此，"中共地工"显然非常看重--绝对超过对张教授自己心爱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命题。虽然绝非个中里手，有心襄赞共产党抗战的张教授，还是勉为其难地作过一次"把蒋介石要与日寇媾和的条件交给中共地工人员"--引自张东荪"交代残片"。接受这一信息者，从时间讲应该是王伯高。这里说的"秘密媾和"，应该是从"七七事变"到汪精卫艳电之间的那一回。这桩"抗日战争期间最诡秘的事件"，直到二十一世纪才披露。17有趣的是，这么重大的一个隐情，不但中共的"白区工作总结"之类文件从来不提，共产党也没有用来攻击或要挟蒋介石。

因为与当道人物曾经有过的私交，估计有不少请托，从而也有大量误解。哪怕丝毫无伤气节，且众人受益--到了1952年，都成了必须交代的准罪行。比如与王克敏的"交情"。

"七七事变"后，经过艰难的抉择、司徒雷登决定，燕京大学不南迁、依旧留在日据的北平。可以想象，占领当局如何数度态度强硬地往派教官。在所有拒绝的借口都用光之后、司徒决定迪过哈佛燕京学社，聘任一名真正的日本学者。人类与考古学家鸟居龙藏（1870-1953）进人视

野。怎么才能让占领当局接受呢？想来想去，可行的便捷办法，是转请也还懂得尊重学问的王克敏向日军疏通。张东荪教授代替校长出面。在1952年的"检讨"中，他说：

关于王克敏。远在他做汉奸前我就认识他，也就是普通认识，并无往来。以后为什么在他做汉奸后反而有往来呢？当时因为日本人要送进日本教官教授数人到燕京来，破坏燕京抗日环境。司徒听吴雷川先生说我认识王，就请我去找他，设法阻止。这事后来成功了。

"成功"，即如笑蜀所描写：

鸟居龙藏不仅学问博大精深，而且宅心仁厚，一直坚定地反对侵华战争。到燕大后，他埋头治学，绝不与占领当局合作。而当燕大遭占领当局查封时，他竟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站在校门边，颤巍巍地向被捕的燕大师生深鞠一躬，似乎要代表有良知的日本人民向受害的中国人民致以沉痛歉意。18

到了度日艰难的1942年：

在北洋政府时代原来认识王克敏和刘玉书。我出狱时（原文在这里删去一句：是刘玉书出名保的），日军判令缓刑三年。因为刘认识我，他当时是伪市长。所以叫他保证我不离开本市，而且负责监视、汇报我活动情况。因此，他常来我处。并不是我与他有什么把兄弟的关系。这事蓝公武先生可以证明。我只替他做过一件事情，当时北京市府有些存粮，老玉米豆，准备散放给教育界人士，燕京方面，他托我替他通知，我不得不替他做了。（检讨残片）

就在张东荪等沦陷区教授一边教书、写作，一边保护学生、运送物资--兼及相当外行地搜集情报、拉拢关系的时候，撤退到大后方的知识分子们，也正在此国事维艰的时刻，为国运筹划。

1939年9月，政府在重庆大学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不开会则已，开会就得让人说话。中国民主立宪运动由此发轫。共产党虽然也在会上提出议案，19当权的国民党虽然也表现得"容纳虚怀"，意图经由宪政而从"武力夺权"变为合法执政，只因为手里都握有军队，虽然强虏当前依旧摩擦不断。20读书人焦急之余，不觉走到一起，成立了一个互相激励、互相声援、俱乐部性质的"统一建国同志会"，竭力两边劝和，梁漱溟还曾带《信约》见蒋介石--无奈成效甚微。

后来，局势发展愈发不堪：放着日寇不打，"同室操戈"愈见热衷。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梁漱溟四人商量来商量去，觉得与其求人，不如求己：加强中间派的组织，以自己的实力来争民主、求团结。这批绞尽脑汁的参政员，有的已有自己的政党（国社党、青年党和第三党）；有的虽然不叫"党"，也建成了影响力相当大的组织（职教社、乡建派、救国会）；还有的本人就已经是一面旗帜（张澜、章乃器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秘密诞生。

虽然既不在重庆，也不在香港，张东荪在沦陷区之燕京大学小环境里实践着的，恰是他二十年前向同侪所许诺--"兄等为社会活动，弟则以教育为助"。

四部真正在哲学的意义上属于现代中国、并贡献于肩千年之重负且屡试碌踬的现代化进程的著作陆续推出：《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是在深切的国学根基和到位的西学领悟力的基础上，对可称之为"中国哲学"的扎实贡献。著者回答了"以哲学为代表的理论知识与有社会性的实际生活之关系究竟如何"：

一个文化要有自身的活力以从事于自身改造，则必在其内部常如火山一样，能自己发火。这个火，就是其活力，而代表这一活力的就是这个民族中（或这个文化中）的理想家，于此所谓理想家也就是哲学家。倘使哲学家而不能以理想提供于国家，则便失其为哲学家了。21

可惜，在那样的年代，时代要求于学人的，已不仅仅做学问。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虽然有足够的学理支撑，他们却难于拒绝与一个幽灵，一个突起于二十世纪、具有中国千年"造反/坐龙庭"底色、却撑着无产阶级大旗的"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联手。

在对《知识与文化》做编前改定时，作者对自己抗战初起（1937年）在青年会的演讲（《思想自由与文化》〉作了大量删节。不能说在这年（1941年），他对自由的见解已与1937年不同，只因大家共同抗日，过分刺激的话就不再重复。

比如"异说奇论"该不该提出和需要不需要禁止。演说当场，他曾举"欧洲的例子"--"著书立说反对神权君权"，他说这在十八世纪会遭焚毁，但到了十九世纪就已被目为当然。接着举出"今天俄国"：

苏联的出版物，一切书籍杂志，以及戏院音乐会的秩序单，都要黏贴总检查局所颁布的印花票。总检查局归教育委员会管辖，不但监视苏联作家的出版品不带"危险思想"，而且要阻止诱惑的见解由外国侵入。……至于音乐戏剧，另受脚本委员会节制。本国与外国的名作，有许多因为含有宗教意味，则被认为思想不健全而禁止公演。

如果我们认定十八世纪对于民权思想的禁止为不应当，则我们便应该同样认为今天对于宗教思想的禁止亦是不应当的。十八世纪教廷的荒谬固然应该攻击，难道红色政权如此荒谬就不应该揭穿么？

在谈到教育时，他认为主办者为了"适合造作者的目的"，就"随便把人当作软膏来捏"，不仅不该，也没那么容易--"俄国总算是一个大试验场。试验的结果知道有若干人性，还是不能一蹴而去掉的"--这些，在《知识与文化》定稿中，都删去了。

在第五节，他曾着力讲解"共产党主张必通过无产阶级专政阶段达到经济平等之不通"，举出"两件最有力的事实以证明其妄"，即意识是由于阶级利害所形成的；有产阶级对于经济革命一定全然不赞成，也即一定是反革命。他先举俄国的遭到清洗的革命领袖，请问他们是无产阶级还是反革命；他又举法西斯，"德意法西斯并不完全由有产阶级组成，无产阶级反居大多数：这两国中有产阶级而爱自由的却反不赞成此种举动。"他的结论是："则谓有产阶级必全属反动，只有恃无产阶级专政以镇压之，岂非白昼见鬼之说耶？"

他接着以一名独立学人的批判精神，指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22

马克思为伟大的思想家，则独因此论，则因屡次企图革命未成，由激愤而发，乃只是一时情感的冲动，并不含理性在内。最可怜的是一班马氏徒党，只知笃守其说，不敢变易一字一句，而俄国数千百万生命遂断送于此一言之中。

他那时并不知道，不过十五至二十年之后，中国留在自己家园（此时已是共产党治下）的有产者，为了不成为反革命，已干净彻底地志愿接受"剥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革命遂顺利完成。"。而半个世纪之后，权力/资本转换在红旗的遮掩下发生：在崛起的中国，新的"有产者"，多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队员之资格，与马导师当时所说，已然满拧。

那回，张东荪还删掉了一段，即"尝说：共产主义在经济方面是进步的而其在政治方面却是退步的。"他当时给出的根据是，据他的观察，共产党"在经济方面求自由，所以是进步的；政治方面反而毁坏自由，所以是退步的"。1941年，他觉得共产党最接受不了的，可能是他的这个看法："以退步的政治方法而求进步的经济状态必是增加许多麻烦。浦君认为现在欧洲的法西斯狂潮是共产党所激起的，这一点也与我所见相同。"张教授在这里，真是以学究之心度泥脚杆之腹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从二十年代以来，共产党之所以成为最后赢家，实在是打着经济平等的招晃而求权力厮杀之全胜。至于"经济方面求自由，所以是进步的"，所有经历（或者研究）过各色土改、统购统销、大跃进、公社化、超英赶美的中国人，都大概掂得出这谬误的份量吧。

著者坚信在那时，并没有三审把关，也没有来自日据当局或者国民党中宣部的电话通知。作出上述删改，是张东荪自己之所为。这是不是说，即使将言论的自由与独立看得如性命一般，在某种局面下，也须主动妥协？

燕大再好（弦歌不辍的世外桃源），终不过小环境。引一段当时故事一现一心"多照顾几个学生"的沦陷区教授们所处环境：

1940年冬，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冯树功骑自行车行经西直门外白石桥时，被一辆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轧死。燕京大学当即向占领当局提出书面抗议，并在贝公楼礼堂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追悼会由陆志韦主持，他缓缓走上讲台，面色沉郁。礼堂一片静寂，使与会者倍感压抑！突然，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我讲不出话！因为我这里，"这时他以拳捶胸，"我这里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23

半个世纪后，当"子弟兵"的坦克，并非仅仅"横冲直撞"，而是在距离当今衙门数百米的六部口，有意碾压正在撤退的抗议学生的时候，北大校长的反应--这无疑应当作为不可忘记的耻辱而列入北大校史--是：主动将"涉嫌动乱"的助教，押送公安局。

2 监禁

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

张东荪得到消息是在那天凌晨--他接到林嘉通（燕大教务主任，他的甥婿）的电话，说林迈可半夜从收音机里听到……。就在这位林赛爵士踩着脚踏车（有一说是开着司徒雷登的汽车）直奔西山（随后成为八路军无线电专家）的时候，张东荪赶到教授们通常议事的燕京哈佛学社--日本宪兵队已将"敌产"燕大校园包围。

当晚，燕大中国籍教学及行政骨干十六人，包括陆志韦、赵紫宸、邓之诚、洪煨莲、张东荪、侯仁之等，以"抗日"罪名遭逮捕，先押往西苑日本宪兵队，随即转到沙滩北大红楼宪兵总队部。美日终于开战！大家总的感受，"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无不十二万分的高兴，想到个人却都又知道有极大的危险在面前"。24张东荪想得更多些。他认为此次逮捕"虽在太平洋战事发作的那一天，却已早在九一八事变即就决定了的"，这恰与日本宪兵所公开扬言，要跟他们算"四五年来之账"，"乘机作一总决算"相符。其实，早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大学商讨时局的"紧急会议"上，张东荪就主张不要等正式开战，学校先行解散，根据个人志向，或到后方或向"八路军区"疏散，目的是"避免到那时的逮捕"--不幸说归说，谁都没动。待到已经给圈在红楼，他倒也没特别后悔，"无论我离开燕大与否，日本宪兵早把我的行为记录下来了。他们注意我恐怕有二三年之久"，未曾间断地与国府及中共的合作，"要想作漏网之鱼，那是决无可能的"。虽然这回属于一揽子兜捕，他的身份并非如其他同事般仅是"日本敌对国之大学的教授"。"我所做的事却只是一个人的，并不与他人相共"、"关键还在于他们究竟知道多少"。

一同关在"柙"（教授们见到监室木栅门所想到）中的，是赵院长紫宸。三周后第一次提审时，发现张东荪竟然是上了日本人编的《中国现代名人大辞典》之"有名人物"。审讯之准尉原先薰天气焰陡变，开始对他使用敬称"阿拿大"（您）而非"奥麻伊"（你小子）。提审的第一个问题即是"讲一讲和陈独秀组织共产党的情形"。可惜他们依据的关于渔阳里组党的那份杂志里，参加者还有个周佛海，遂无法据此入罪。在后来问到"燕京大学送毕业生到重庆"的时候，张东荪承认"道理上赞成、行动上协助"--宪兵队即认为已"取得足以判罪根据"。紧接着想让张答应与汪政府合作。东荪答以：本人一向反对国民党，因汪精卫是该党，所以不能合作。宪

兵还曾让他"劝诱"、"感化"一同关在狱中的共产党。他答以："你们日本军何必来管中国的事，因为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问题。"

两个月之后，日本宪兵作为原告，对他们提起诉讼，移送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教授获冠513号，并立即上铐：两人一铐，与他共一双的，是洪煨莲。这回关的是十一人的大监房，与陆志韦、林嘉通等人又到了一起。大家原已郑重互相嘱咐"不卑不亢、避重就轻"，"日本人的话没有一句靠得住的"，但正式的审讯不仅毫无内容，十一人中只传讯了张、林，就再无下文。不审理，却将合押改为单独关押："忽然把我们十一人分为每人在一间小房内，这便真正入了地狱"，原先的凶狠、凌辱、寒冷、饥饿、秽臭……似都可忍，"移到每人一间，那才是真苦到极点，非人所能堪的了"。由此经验，张东荪悟到，人原是社会动物，使一个人孤立起来，就成一种精神上的罚，久而久之会使人发疯。他望着墙壁上隐约可见的用血画的人像和签名，听着间壁撕心裂肺的号叫，觉得象是"入以鬼的世界"。

因为身体素弱，摆脱不掉的念头是，拿来枪毙也就罢了，最可怕的是长期禁锢--精神上发疯、身体上生病。拿个体感受与全体民生做比，他切感"恰如长期内战：如果在短期内，国民党把共产党剿平了，老百姓总可忍受；同样，共产党如能很快把国民党推翻，我们亦决不反对。解决总是好的，不拘哪一途。"

他想到"受够了苦痛与磨折，身心都经不住，最后还是不外乎一死"，开始筹思在监内了断的各种可能的方法。他坚信，以拘禁把人弄得不死不活，无一刻不在受罪，乃是掌控他人命运者"最残忍最下流最卑劣的心理"，于是，以一死而逃脱，使其计划失败，不失为一种抵抗：虽死而得胜。

想至此十分高兴，此时心中没有丝毫的悲观。并且我更想到，一个哲学家对于人世的看法自与常人不同。哲学家不但不以死为可怕或可厌，必定还乐于一尝这个滋味：苏格拉底就有topractice dying之说。

狱方既以折磨囚犯为职志，能令你轻易抵抗成功么？张东荪尝试了吊颈、绝食、以手铐击头、塞息、撞铁钉等等办法--直弄得"皮肤撞烂，流血如注。满身都是血，……地下亦有三四滩血"……狱方终于让步，答应除去手铐，并叫一名燕京同难到房间陪伴，以"无论如何不再自杀"为交换。虽则如此，淤积于胸中之怒气仍是愈积愈烈。他曾与关押对骂乃至对打，结果当然是被掼到地下且加倍受罚。

我同守兵吵闹，不止这一次。所以我很感激洪煨莲。有一次在一个大澡池，大家洗澡时，他低声劝我千万不要和他们闹，不久必可出去。而赵紫宸劝我尤多。揭出八个字，是：在此忍耐，出后贡献。他以为国家民族乃至于世界文化都待于我们作贡献，万不可轻生。

我自己知道性格偏于急躁，对于忍耐一层最不如人。不过我对于生死的观念向来以为儒家最好。所谓大哉死也，小人休焉，君子息焉。又如张横渠说：生，吾顺事；殁，吾宁也。

"如是苦耐，直到天气已大热。…-…室内青蝇已成百成千……古人云死后青蝇为吊客，我对赵紫寝说，吊客已来，我辈其死矣乎？"教授们果然都感染赤痢：高烧不退、腹泻不止。或许监狱当局已有察觉，发病翌日即送日本军部，举行军事会审，在刑囚的病人们已然不能站立的情形下宣判，获徒刑一年或一年半（张东荪、蔡一谔），一律缓刑三年。卸下刑具，带到会客室，在惊、惧、忧、喜无听适从的亲人面前，张东荪的感觉是，因为身体难过已极，精神上竟无一丝高兴，"只是希望早些到家可以卧下"。

六个月零十天，诸苦备尝，"在死生的边缘上往返打了几个转身"。他最深的感受是：

监狱制度万万要不得，必须废除。因为坐监决不能改变人们的性格，而只有反把人性激成偏狭。世上有许多革命家都是坐过牢的，他们的性格反而比常人来得激烈。我愿意把自己作一个有力的证明。我的性格本来是急躁与倔强。但经过了这样牢狱生活六个月以后，我确自知我的性格有相当的变化。却不是由急躁变为温和，由倔强变为随便；乃是更急躁更倔强，更是率性而行。平素对于不愿看见的人尚能敷衍一下，现在不行了；平素对于不愿意听的话能忍受一下，现在亦不行了。因为在真理之前，不容有作伪，不能有屈服。于是我发见坐过监牢的人自会有"革命性"。

这番话，他是在1947年5月间说的。他不会料到，在不过两年之后漫漫二十年的岁月里，他的急躁、倔强与率性，要经受怎样的磨砺；而不作伪、不屈服这类士之常行，将因为无人付得起的代价，在广漠的中华大地上，几告阙如。

3 黎明之前

燕京大学教授们遭逮捕后，校园也作为"敌产"被日军霸占--员工家属一律限期出校。驻兵强占的，不仅燕京校园，王家花园也落入敌手。老老小小一家人往哪里去呢？张尔田忧愤交加，病势愈加沉重。

这时，我家里毫无办法，城里房子很难找。我太太去找梁秋水先生，他就说有个旧国社党员刘敬尧，在山东作伪道尹，在北京有一所房子，他太太也在山东，房子空了。于是，梁秋水就介绍我太大去住。而我出狱后，因为没有钱，也就没有搬家。（张东荪检讨残片）

张宗烨还记得那住处：

爸爸被抓走，我们就全都躲到城里去了，住在大觉胡同。那本是汉奸刘敬尧的房子，住在他的一个小跨院，里边有好几个三间房，大伯父就是在那里去世的（1945年1月）。

到1942年6月，遭抓捕的教授们一一宣判，张东荪获"徒刑一年半，缓刑三年"。作保的是他在北洋政府时代的老相识刘玉书，时任北平市长；不许离开本市，对"不法行动"监视、汇报。

除了刘玉书，缓刑执行期间，日本宪兵队的安达也不断来诱说，动员张东荪出任教育督办。结果当然是遭"峻拒"。以"士"自我期许的本书主人公，自律过苛，除了薪水和校方提供的住处，无任何资产。但日子总要过下去：

在太平洋战争后，我一无收入，生活主要靠卖东西过日子。卖掉一个汉玉璧和一幅戴文节公的中堂以及其他皮货等，将换来的钱买了一些货，如袜子等，以求保值，随吃随卖，这样才过了几年。25

张凯慈也听家里大人说过：

家里原来有地，还不只一点，由二地主管的一大片，后来爷爷坚决主张卖掉。奶奶说，"大爷爷事事都听爷爷的"，地就这么卖了。……日本人来的时候，住在王家花园。听奶奶说，那时候过日子靠卖东西。地卖了之后，换了点美元，还买了点股票--后来彻底光了。

这情景张宗烨也记得：

抗战时候，爸爸没有收入了，就靠这些美元和一点首饰什么的贴着过日子。有好几年呢。妈妈说，她本来不想动那点美元，打算以后分成四份给我们兄妹，后来差不多贴光了，一再说很对不起我们。我想幸亏没了，否则还不定说我们什么呢。没有了倒消停。量不大，不过千把块的样子。

邓云乡在他的晚年回忆里，给出黎明之前古都学人处境：

中国大学在何其巩氏主持之下，靠学生学费维持，因为人多，虽然困难，也维持下去了。有不少不愿到日伪学校任教，又一时去不了抗战大后方的名教师，都到中国大学来教书了。俞平伯先生原在清华，沦陷时，担任了中国大学中文系主任。待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封门，有些名教授也到了中国大学，如著名的张东荪先生、历史学家齐思和先生，还有邓以蛰（邓稼先之父）、孙人和先生等位，一时都往来于二龙坑路上了。26

即使如此，张东荪与共产党的联系并未间断：

我出狱后，中共地工随即与我联系。他底意思想要利用王克敏准备为将来接收华北做布置。我介绍他看过两次王克敏。我个人与王克敏并没有什么来往。不久王伯高被捕，供出了许多材料。日军宪兵部来我家搜查，好在没发现什么。（检讨残片）

简直与潘汉年案如出一辙！只是不知这个"他"是谁。

读者一定记得潘汉年案件的要害：在法西斯败局已见端倪的1942至1943年，不仅准备"下山摘桃子"（毛泽东语）的正规抗日武力，就连汉奸们也在找靠山、想退路。南京几大汉奸，周佛海投靠了军统，李士群一直明里暗里给共产党、新四军帮忙。口气最硬（他自己才是领袖）的汪精卫，遂成周、李争夺、拉拢的对象--都想把他拉到自己一边，不仅增了实力，"后台老板"面前也光彩。这就是正、野两域史家所谓"1943年（潘汉年）被汪伪特务李士群做了手脚， 一步步挟持着潘汉年与汪精卫见了面"的背景。

1955年，"大上海一线管家"潘汉年，仅为此节，就突然从饭店给抓进监狱，一关二十二年，直关到生命终结，根本不顾第一知情者李克农有力的辩解与质问。毛泽东死后，潘案一步步获得"平反"--以他的大功、以他的高位、以他对他的事业的忠贞，抓起来关到死，其实就在毛泽东

一句话："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正式公布的，只有对他的判词，未见他的答辩。流传出来的，只有他在"假释"的有限自由境况下对"二流堂"友人说的一句话"我是冤枉的。杨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回到1942、43年的北平。

两次见王克敏，应属北平地区地下党的重大活动吧？有没有向延安报告？可曾犯过谁的忌讳？所有这些，至今未见官方披露，但也未见有谁如潘汉年般遭诬陷--可见潘案要害不在见不见汪精卫。至于被捕的王伯高"供出许多材料"，显然是后来不知哪位"地工"对他说的。张教授不仅当时（1943年）笃信不疑，还一直信到逼他交代的1952年。

出狱后即离开北平的王定南本人，对此没作出辩解--估计也没有人就"党组织"已将他列入另册一节正面告知，因为到了内战初兴（1945年9月），他还曾以共党身份成功地策动了高树勋起义。令读史人难于索解的是，从1929年就在北大闹革命、1938年即代表党与沦陷区头面人物联络的王同志，在党得到政权之后，只落得一个中央内务部秘书之职。由此，我们或可窥见那只无所不能地操作他人命运的无形的手--中共组织与档案系统。

不过，被日本宪兵逮捕之前，王伯高还是非常自信而活跃的。仅就与张东荪的交往，他就曾把张的助手叶笃义，安排到唐山开滦矿务局，还在自己被捕后火速通知叶笃义撤出。在那起著名的、将周作人牵扯进"抵制死硬汉奸"的运作中，王也扮演了一定角色：

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病死，这个职位出了缺。我当时在伪组织的高层政治团中活动，消息比较灵通，得知一些情况。有缪斌者，当时在日方一派力量的牵线支持下，钻营此缺甚力，颇有相当呼声。另一方面，在伪政权中也有人（如王揖唐）属意于周作人，这当是出于日方另一派力量的授意。在我们的一次"三人碰头会"上（那时，王定南同志和我还有张东荪约每半月总要聚会一次，多数在弘通观四号我的家里，汇集情报，研究工作），我报告了这些情况，提出问题并商讨如何运用如何应付的对策。我们认为，缪斌这个国民党党棍、现新民会混混儿，若任其抓住华北教育肆行奴化，那毒害青年真不知伊于胡底，所以应该把他排掉，不能让他得逞。27

在北京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许宝骙为这个问题给自己扣的帽子是"曲线救国"。周作人为此而获的"汉奸"罪，已是众所周知。

当代读者对西南联大师生所经历的艰难、困窘比较熟悉，而在沦陷区，因为半个世纪来话语的主动权一直在国共旗帜下的抗日斗士手中，不骂他们"腆颜留内地苟活"已经够客气了。28他们的情形更为复杂微妙，而不甘为奴者的努力，更是异常艰难。起码，"坚守学术本位"29与效劳敌酋，就显得界限模糊。拘禁期间，邓文如曾有诗，其中一句：

岂料貔貅三百万，

居然重视几书生。30

张东荪在他的《狱中生活简记》里也说：

关于出狱后做事一层，我们在狱中时已早虑到。所最怕的是日本人将强迫我们教书。当时我有一个意念，就是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因为王定南已将路径全早告诉我了。孰知出狱时正大病，一病就有一个月之久。以后却不见日本人来十分强迫去做事，所以也就无须如此了。

本著者在这里特别援引一段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的铿锵论述。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描述在1952年批斗中受着煎熬的张东荪：

张东荪不得不承认他历史上是反共的，但他认为自己至少是爱国的，并举出在太平洋战争后，曾一度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所逮捕以为佐证。他说抗战期间他所以没有去大后方，是由于自己留恋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怕吃苦。但燕大学生立刻有人揭发张东荪在沦陷时期与敌伪勾结的事实。原来敌伪把张东荪逮捕后要他出来当华北教育督办（即周作人当过的脚色），张东荪自己不出面，却推荐了国社党党员王谟任华北伪组织的教育督办。为了酬劳张东荪的推荐，王每月叫儿子送米运煤给他，有时送晚了，还要挨张东荪的骂。这是王的儿子揭发的。王谟于日本投降后已经被中央法办了　，这都是上张东荪的当。于是张东荪爱国抗日的假面目也揭穿了。原来张东荪不仅历史上一贯反共，还当过汉奸，不过自己不出面，做汉奸的幕后牵线人而已。31

被网民敬冠以"终生愤青"的"千老"32究竟是不知，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放入权势者"欲加之罪"的讨伐大军，不问当时一个处于地下、松散的国社党组织，其权限究竟有多么大。张东荪只是几年前当选的总委，那时候既无专款、也无办事机构。他充其量能做到，只是不许党员以党

的名义出任。至于以个人身份接受伪职（如杨毓洵、王谟之所为33），连蒋介石也无法阻止（如汪精卫"附逆"）。

现在回过头来讲1942年。张东荪被保释不久，王伯高也出来了。34虽然称自己依旧代表组织，张东荪却是不敢尽信。他找到政团同盟代表，可信的、"为朋友两肋插刀"35的张云川，联络到一名"确实的"共产党地下交通姚继民（1949年后建工部部长助理），希望由他证实王定南"是否依旧代表共产党组织"。姚说这事非同小可，但他答应设法为他们联络十八集团军总部。36

这里其实存在着一个疑问：请东荪先生出面联络见王克敏（而布置接收华北）的"中共地工"，此时到哪里去了？考虑到敌后工作极为机密的频繁调动，或许只有专业研究人员才有能力准确追踪了。

但姚继民从此与张家有了走动。据当时读小学的张饴慈记忆，还有一个姚大嫂，一直留在北平，直到光复、直到"解放"。张饴慈说，姚大嫂在米市大街大华电影院旁，开了一家"群众书店"，匾额竟然出自爹地（张宗炳）之手笔--可能"群众书店"这名号也是他们一起商量的。张家当时住外交部街，离书店很近。他们兄弟还去买过小人书。到后来听说，这书店是公安系统的37--那位姚大嫂应该也是一名地工吧？张饴慈还记得店里一名姓李的员工，还曾到张宗颎家帮佣--是否属于侦缉工作，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从前线拐着弯儿找党，或许不是一件易事。过了一年，到1943　年6月，北平这边才得到"已接上头"确讯。张东荪立即派叶笃义做代表前往。出发前，张对叶说，"此行的目的除了打听王定南的关系而外，还希望如有可能，要问中共建立一个（共同抗日）协定形式的书面关系。"38如此机密（甚至可能掉脑袋）之情事，张东荪并未死死瞒住，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不仅知情甚至参与其中。何校长也写了一封信托叶笃义带交--可见处于日据下的知识人对抗日武装力量的期待。

叶由北平坐火车出发，从邯郸进入了解放区（当然须有小姚一路关照）。先经过129师刘伯承驻地，然后到达左权县，即当时十八集团军总部所在地。在那里，他见到了彭德怀司今员和滕代远参谋长。估计彭大将军此时已经通过延安与北方局取得了联系。他明确告诉叶笃义：王伯高的关系已断，中共将派另一人同张东荪接头；至于教授所提出的"以书面形式确定合作关系"，十八集团军很以为是。总部派朱早观（后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和李绮（全国政协委员）与叶笃义共同拟定了一份"抗日

建国同盟互助协定"，内容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只有原则性的三点意见：

1）在抗日战争中，十八集团军方面努力向日军进攻。

2）在抗日战争中，张东荪方面努力做好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工作。

3）在抗战胜利后，双方合作争取和平民主建国。

7月7日，彭德怀和"叶茂荪"（由叶笃义代表的张东荪）在一式两份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叶笃义注意到，彭用的是刻有"卫立煌赠"的自来水笔。至于何其巩校长，彭老总也托他带回一封感谢信。

据叶笃义记载，这份协议书是写在极薄的复写纸上，装在牙传筒里带回来的。39此节，无论八路军军史，还是彭总的传记，以及讨戏剧性细节文物本应感到兴趣的军事博物馆，都没有提及，虽然《彭德怀年谱》中有"7月4日，中央书记处覆电指示：可与张东荪代表成立口头约定，不立书面条约"。40

很快，一位名叫殷之钺（1949年后任海关总署副署长）的上海青年开始频频登门。当时正读小学的张宗烨记得：

抗战的时候就有地下党来，叫小殷，他跟崔月犁有接触。我家那时借住在大觉胡同别人家的跨院里，有好几层，都是很破的小房，三间三间的，靠一个小过道连着。日本鬼子也经常来，名叫安达。爸爸放出来之后，常来看看你在家干什么。所以，如果小殷或是什么人在我们家，我们得特别注意。有人拉铃，要先从门缝里看：如果是日本鬼来了，就赶快让他们到另一层去。至于他们来商量什麽，我不知道，估计运药品什么的。……　也有不少人从北平往解放区送。小殷刚解放时来过一次，后来就没有再来。

"第三方面"的青年党也派林可玑到北平活动。林先生几十年后回忆他抵平后的情景：

……立即驰访张东荪，见面时，张什么话还没说，先告诉我，前一天有日本特务机关工作人员访他，谓青年党有一重要人物，这两天要到北京来，渠答称不知道，故渠认为日本方面既已知道，此后我的行踪不如公开，秘密反而不妥。41

林随后即在北平的日本温和派中公开活动。想来除了殷（共产

党）、林（青年党）之外，张东荪与重庆"同盟"中其他党还有另外的联系。林的回忆里有："一日，东荪告诉我，左舜生、罗隆基二人因金钱小事闹翻，甚不以为然。"

可见，在梁漱溟赴香港创办《光明报》的前后，民主政团同盟沦陷区支部已经成立并活动起来。作为沦陷区支部主委的张教授，据重庆方面的估计，"暗中发展还顺利"。

国府方面和他们也有联络。张卓然（当时化名张维平）本是抗战开始那年陈立夫派到天津的地工，任"天津战区教育督导员"。到抗战后期，还开始兼负北平工作。张卓然在北平的活动，主要是通过袁贤能。1943年4月间，袁曾带他分别到陆志韦、张东荪、蓝公武家拜望，其时也有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对此，叶笃义也有记录，不过是以不屑的口气。

除了已有记载的各种抗日力量，一些零星个体人物也出现了。

1941年12月那次燕京兜捕，张的学生，一直与他有联络的地下党员姚克般也未能免，难友中一人名王志奇。姚克般出狱后即将王志奇介绍给自己的老师--此人在我们后边要讲到的故事里，将扮演重头角色。

1942年4月，身在病中的张东荪"偶然在《大公报·史地周刊》"读到一篇"借题发挥，颇具弦外之音"的文章（素痴：《梁任公辛亥以前的政论与现在中国》）。作者从梁任公"毕生恶俄"及"晚年过分怕红"说起，谈到梁"淋漓精核"的政论，联系到中国社会三十年似无进步，最后慨叹"盖世雄文浪掷"。

张东荪几乎立即着手答素痴（"病中拉杂写此"）。与其说为离世十多年的老友作辩护，毋宁更近于夫子自道：

我敢说梁任公当其下笔为文的时候，他脑子里直不知道什么叫"失望"，更不知道什么叫"左右夹攻"，更更不知道什么叫"浪掷"。他只知道当时的热情使他不得不如此说。他说了以后就心里很安。他若因为顾虑失望而不说，他的内心反而更痛苦。他为免除当下的痛苦，所以他不计|将来的如何。即所谓行其心之所安是也。

因为梁任公这个人不是一个工心计的人。他有丰富的知识，但他更有充满的热情。他的知识（即理智）是随着他的热情而前冲的，不像那些冷静的思想家以理智来左右感情。素痴先生太息他的盖世雄文的浪掷，而在他却不知道浪掷是怎样一回事。

对于发了言论而未能左右历史，张东荪认为：

就历史来看与就道德来看，便很有不同的观点。就历史来说，诚然是一个失败，不必讳言。然就道德来说，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正是人格的表现。未可因其不济事而短之。

假使梁任公预知革命之不能免，不作双方劝告，而专向一方烧冷灶，则他即变为投机分子，不成其为梁任公了。42

"梁启超研究"车载斗量。以著者之有限见识，对任公的理解，没有超过他老友的这段叙述。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北方救国会诸位已然觉察胜利的曙光，北池子何其巩寓所成了大家经常聚会之地。大家都愿为这或迟或早、但必然到来的新局面作贡献--当然也不同程度地瞻顾自己在这局面中的位置，尤其觉着自己"身上或许有污点"者。

1943夏秋间，当时正在汪精卫家担任家庭教师的龙沐勋，43专门到北平找张东荪，为伪淮海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郝鹏举传话：有意在时局变化时"带起队伍（当时有两万人），打出民主政团同盟的旗号，由民主政团同盟作保，归民主政团同盟领导"。

天上掉馅饼？

军队，在近现代中国，简直就是一切。维新的皇上拧不过太后，不就因为她调得动的军队比他多？孙中山为什么将总统位置让出？国民党、共产党怎么绝处逢生的？以及，不论国家遭逢多大危难，有枪才能说话--固然是国家民族最大的灾难，但身临其境，很难不让有心问政的人怦然心动。

国共怎么发愤建黄埔、怎么策动南昌暴动，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以二勃（朝气蓬勃，野心勃勃）闻名于党派间的青年党，自二十年代就努力在军中建立支部，七七事变后曾有"野战抗日"的口号。

长袍先生占主流的政团同盟呢？张澜只以个人学问品德保持职业军人中之人望，自己从不沾手军队。黄炎培、梁漱溟诸公也程度不同地如此。他们不沾，并不意味着所有盟员都"避庖厨远腥膻"。而当他们偶然有所沾，并不知已临深渊。据叶笃义文，他三哥之经历，就是明证。

农业专家叶笃庄，是早期的民盟中委。1946年，当国军高树勋部在晋冀鲁豫地区起义之际，民盟44动念，想学国、共、青的样子，在这支部队里建立支部。正好有一美国记者要到晋冀鲁豫采访，民盟以介绍翻译的名义，派叶笃庄到高树勋部去建立民盟支部（是否成功，未见披露）。叶氏兄弟没有说清楚的是，为此事，民盟当时曾向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徐冰请示，并承蒙他给刘伯承、邓小平发电报的时候，不仅说了"做翻译"，还不见外地提到了"到军中建支部"。立志农学的叶笃庄毫无问政兴趣，只因为自己组织所信赖，又不幸能说几句英文，竟为此"插手武装"，两次坐牢共十五年（1957至1961年；1968至1978年）。

有志（并且特别有资格）于现代政党政治的章伯钧，对类似情事难于忘情，见其女儿所述：

父亲早在二十年代就跟随邓演达先生搞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即使四十年代在民盟中央主持工作期间，他一方面明显靠拢中共，另一方面也仍暗中坚持搞军事活动。45

直接将"武力"上升到哲学层面（将军队与生存状况联系起来）的，非毛泽东莫属：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46

还不要说一个现今已经不大为人提起的"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从1941年成立之时，就毫不隐讳其明确的策动军队意图 。

根据所能得到的记载，对龙榆生冒着性命危险所给出的建议，张东荪当时的态度是："民主政团同盟根本不搞武装。搞上郝的这点军队，反而是个负担；而且到时候也保障不了他的安全。"但馅饼总是诱入的。当时，一同见面的许宝骙（"小民革"成员许宝騄的兄弟），按照组织意图（也许是中共，或许就是乃兄）提出建议："劝告他再往前多走一步，到时起义，干干脆脆投靠中共武装力量，只要不打仗、少杀人、想来张教授都没意见。只是他没有深想，中共武力的迅速扩大，意味着什么前景。

二人商定之后，由许宝骙在这年深秋到郝部谈妥。郝请许齐骙"回去后向东荪先生深深致意"，并希望有一代表常驻，以便打通各方面关系。

回到北平，许宝骙"向东荪先生报告了前情，都很高兴"。本拟派许宝骙担任常驻，但就在这时，上文说过的张云川从重庆潜入北平。他带来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的纲领》，并在燕京校长吴雷川家落脚。张云川曾经就读黄埔军校，以热情爽朗播名于友朋间。他本意原是拜望燕大校长，但倾谈之后，觉得同盟一定要邀请东荪先生--当时两种议论流行：一曰"张先生混迹于左派人士中"；二曰左派人士把他作为大牌人物撑门面"。对这些，张东荪历来如秋风过耳，只要宗旨相同就不拒绝。这回当然是慨允。

许宝骙几十年后撰文回忆：张东荪（在他从郝处回来后）高兴地对他说："告诉你一件事，太巧了，盟里派了一个人名叫张云川--他说在香港见过你--来搞盟里的事。他是徐州人，看上去很老练，又熟悉那里的情况，派到郝那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已经对他说了 ，他也欣然同意。"

张云川此后即"往返奔走于城乡，出入于日寇及蒋帮特务之间，是备极艰辛，也每历危险"。当局的通缉，使他在徐州借住的一所药店遭敲诈而告破产。在此前后，郝鹏举曾有一封短信给张教授，有"决心一定，死生以之"之类的誓词。民盟诸书生都很兴奋。

顺利完成这一策动之后，用许宝骏的话说：我们的"野心"有点发展了。正在这时，一名本党（国社党）同志杨琪山想活动山东伪省长。张、许决定顺水推舟，促成此事。许遂出面向王克敏举荐，杨如愿以偿。按照张东荪、许宝骙的设想，杨到任之后抓紧练兵，掌握实力；时机一到即率部起义投归八路军。他们甚至在心里还勾画出一幅军事地图：郝在徐州、杨在济南，两方同时起义，连成一片，协助共军阻挡蒋军北上。

事实上，1945年日寇投降时，郝确曾履践诺言，起义投共。47但在收了蒋的大钱之后，又叛了过去，最后被新四军灭掉。杨琪山到任之后，也练了小小一支队伍。光复后，他选择了投蒋，结果还是被逮捕，最后病死狱中。48

梳拢军队，这是学人应当（包括放胆）涉及的领域么？出于道义、更出于友朋之怂恿，张东荪违背自己关于现代社会军队组织之理念（军

队国家化，绝对不属于党派与个人），做出越出专业领域的第一件事--未见严重后果，也就没有从中取得教训，从而没能阻止他第二次再犯……这就是我们后边要讲的重头故事了。

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称"民主同盟"，召开一大。张东荪以民社党代表身份自动成为民盟中常委。年底，民盟中委周鲸文抵达北平，"随即同张东荪、曾琦等人着手筹建民盟组织"。[49]民盟华北总支部于1945年春末夏初在北平成立，张东荪任主委，曾琦、林可玑负责组织；周鲸文、叶笃义主管宣传。日军投降前后，开始发展组织。由于曾、林的关系，新盟员大多为青年党员。

在张东荪的"交待"残片里，有一段没有为后世研究者所注意的话：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殷先生叫我联络当时北平的一些民主人士布置帮助中共受降。但等到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时，国民党即赶快令日军保护北京，而使整个计划全部失败。

这其实是毛泽东当时对世界总体局势"情况不明、头脑发热"而策动的一个未能付诸实施之大举动的北平部分。[50]平心而论，因胜利在望激动万分而头脑发热的，并非毛泽东一人。中共中央北方局动员张东荪开展活动，以敦促北平的日本人直接向中共投降，比延安更早一步。

张东荪当时曾尽力配合。蓝英年告诉著者，当时正读中学的他，就曾听到张先生来到家中，与他的父亲（蓝公武）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他只零星记得"汉奸"、"你还要不要命"等话语。

在这样的危难与动荡之中，张东荪居然迎来自己学术生涯的巅峰期。

1931到1941年，即日寇铁蹄践踏东北、华北，也即他从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的这十年，虽然以极大精神痛苦，面对国家破碎山河，张东荪自身却有幸托庇于星条旗下，作为燕京大学教授，推出一本本基于讲义的哲学著述：《现代哲学》、《哲学》、《西洋哲学ABC》、《认识论》、《价值哲学》，以及《近代西洋哲学史纲要》，《唯物辩证法论战》。并一再就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党派息争是建设之先决问题》、《中国之过去和将来》、《知识分子与文化自由》等。

他最重要的四部著作：《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

与民主》、《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也在黎明之前陆续截稿。张东荪那年五十八岁，德行学问，都正处于人生最高峰。

注释

1、张申府：《"一二九"运动的点滴回忆》，载《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21。

2、许德珩：《"一二九"的片断回忆》，载《一 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页218-219。

3、何礼：《我对"一二九"运动的回顾》，载《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页80。

4、转引至章立凡：《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载《君子之交如水》（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5、赵乃基：《何其巩与中国大学》，"福田丛书网络版"。

6、刘清扬的回忆或许可以作为以上分析的补充："少数文化界座谈会后来发展扩大改名为文化界救国会。先后参加文化界救国会的知识分子，就记忆所及有以下比较知名的人：北京大学：许德珩、尚仲依。北京法商学院：白麟飞、程希孟。私立中国大学：齐燕铭、管桐（张致祥）。燕京大学：张东荪、雷洁琼。北京师范大学：杨秀峰（兼天津法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张申府、刘清扬（当时我已不是学生，所以参加座谈会）。报界：张友渔（可能是《世界日报》）、罗隆基（天津《益世报》主编。此外还有个东北人卢广义（不是固定参加的），实验中学（中山公园旁）梁实秋（是张东荪介绍来的，并不固定参加座谈）。以后由于许德珩和程希孟的关系，我们得以认识邢西萍（徐冰）。据他说，他因在青岛被捕受刑，腿被用杠子压伤正在家养伤，并且已无党的组织关系。因此，他不完全出面参加座谈。"当时还有一个"南京救国会"，那是1936 年千家驹愤然从北平跑到南京，和友人成立的，并立即与沈钧儒、史良、章乃器他们的"上海救国会"取得联系。"南救"曾应聘在京城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上课，讲"中国的财政问题"。

7、这是中共历史上最不堪的、给共产国际当尾巴的时期。王实味妻到刘莹（北大学生党员、捐出嫁妆做党的活动经费）对此所作之非官方

阐述最为生动。已经接上关系的刘萤，当时不时接到命令去参加的"飞行集会"， 实在给吓坏了。她并不怕死。对死，早在1926年入党的时候就有了思想准备。她怕灵魂玷污--她亲眼见到三名女同学，熊宗瑛、刘敏和刘中一，无一幸免地在"飞行集会"时被捕，继而遭奸污，终于当了警官或特务的小老婆。她以为党是可以暂时离开一下的，待斗争策略改变之后再回来。谁知一离就是半个世纪，刘莹从此再也没能进入共产党的大门。参见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载《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

8、为团结更多人一致抗日反蒋，对第三党原来党纲进行修订，突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删除其中批评中共的全部内容。彭泽湘承担修订党的《临时行动纲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该党的指导思想；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同共产党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把党的名称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

9、彭在1935年11月香港召开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组织委员会书记。1937年6月，"解委"组织委员会书记彭泽湘应中共中央之邀赴延安。毛泽东与彭泽湘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长谈，广泛交换了意见。这次谈话使两党之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解委"完全赞同中共关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方针和政策。这次会谈保证了两党在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中，实行密切合作。1937年6月15日，彭泽民代表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致全国各界领袖书》。参见杨晓娟：《浅析第三党的历史演变过程》，《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

10、1937年6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已与彭泽湘在延安谈好我们同第三党合作问题，他已同意我们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党同我们合作。"当日毛泽东还致电潘汉年："第三党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他明日离延安经北平约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680。

11、同上注，页682-683。

12、同上注，页679。

13、1930年7月，中共发表宣言，决定11月7日（苏联国庆节）召开全国苏维埃大会，成立全国苏维埃政府。9月21日，北平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代表们一致要求尽快建立北平苏维埃政权，想为中国工农群众在国民党统治下再无法生活，只有直接革命，武装暴动，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王作宾（王定南）作为中共北平市委的代表，负责宣传。

14、摘自张东荪"检讨"。

15、据原燕京大学地下党部分党员：《未名湖畔的风云--记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燕京大学地下党的斗争》（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十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及沈启无回忆：吴继文与黄家驷等本为协和医预科同学，前三年在燕大，后来都在协和医院做大夫，吴继文曾在燕大本校做校医。他们都曾参加校内地下党外围活动。吴解放后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于1980年3月病故。

16、由于"共产主义"对心灵单纯、衣食无忧、有劲没地方使的富家子弟的诱惑，成功攫取敌方情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所做的贡献，占到比官家历史述说大得多的比例，如红军的脱逃，如辽沈战役的胜利。中共以"阶级路线"，成功打压了这批烈士与功臣--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不能不说的故事。

17、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载《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大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18、笑蜀：《北中国的自由"孤岛"--燕京大学抗战写实》，《南方周末》，2005年9月29日。

19、如陈绍禹、江恒源、张申府等领衔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具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等。

20、1939年1月，国民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随即接连发生博山、平江、竹沟等一系列惨案。

21、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22、毛泽东语。文革期间入"语录歌"，童叟男女无人不晓。

23、同注18。

24、本节引号中文字，均引自张东荪：《狱中生活简记》，《观察》，1947年7月。

25、张东荪1952年的检讨，载《新燕京》，1952年6月3日。

26、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北京：中华书局，1995）。

27、许宝骙：《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团结报》，1986年11月29日。

28、需要以此进行整肃的时候，更是随手拿来就用。以民盟中央1952年10月《关于张东荪叛国罪行的报告》为例："张东荪不仅是供给美帝情报的特务分子，在解放前，早已甘心做了亲日的卖国汉奸。他在日寇占领北京的期间，领取汪逆伪组织津贴，策动所谓'全面和平'（即汪、日、蒋合流共同反共），并与国社党、汉奸头子共提卖国提案。这一段事实由于当时敞战区和大后方地域的阻隔及张东荪一贯躲在幕后的作风，使民盟组织对他做汉奸的事实完全无知。但张东荪对此种丑恶事贵只字不向组.织上坦白交代。"

29、许纪霖语，参见许纪霖：《暧昧的怀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30、转引自张东荪：《狱中生活简记》。

31、千家驹：《杂谈历史人物（二）》，《传记文学》（台湾），1990年第2期。

32、千家驹1989年7月赴美而后定居洛杉机，11月皈依佛门。在以后几年，《去国忧思录》、《海外游子声》、《杂谈历史人物》、《逝者如斯夫》、《夕阳昏语》等相继问世。九十岁前后再回中国，居深圳。逝世后新华社发电称："千家驹晚年曾多次致函中共中央领导，对邓小平理论表示坚决拥护，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表示由衷敬佩，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此段经历或可帮助读者理解他对本书主人公所作的回忆。

33、对于王谟案，由于其子一再"揭发"，以期将附逆罪责归于国社党及其领袖。张东荪在接受斗争审查的1952年一再说"有人可以证明"，

无奈民盟七人小组没有就此严格取证：毛泽东对此则大而化之，致使此情至今未见权威机构定论。

34、查王伯高本人公诸于世的传记与自述，均未提到此节。

35、张东荪语。张云川是梁漱溟的学生，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中委，当时与张东荪同属"民主政团同盟"。他性情耿直，爱说怪话。1957年被打成右派，致死未获摘帽。

36、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页10-11。

37、该传言属实。据群众出版社网站称：该社是新中国公安文化事业的摇篮，它的前身是解放前中共党组织为在北平开展秘密工作而开设的群众书店，1956年9月根据公安文化建设的需要改建成群众出版社。参见"群众出版社"。

38、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11。

39、同上注，页11-12。

40、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283-284。

41、林可玑：《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到"中国民主同盟"的一段回忆》，《传记文学》（台湾），1984年第5期。

42、张东荪：《计论道德根本问题答素痴先生》，《再生》，1943年。

43、龙沐勋（1902-1966），字榆生，词家。1940-1945年，历任汪伪立法院委员、陈公博私人秘书等职，1956年上海市政协委员，离世时为改正右派、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44、当时同盟秘书长李璜，组织部长章伯钧。

45、章诒和：《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载《顺长江·水流残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页180。

4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载《毛泽东选集》

（第二版），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1072-1073。

47、具体时间为1946年1月8日。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称："驻苏鲁交界之新编第六路军总指挥郝鹏举，自称民主联军总司令，叛归共军（郝原为淮海省长，投降后曾受勒索）。"7月20日，苏北共军（伪军郝鹏举部） 围攻东海。参见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页451、544。

48、以上叙述参见许宝骙：《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一幕军事活动》，《盟讯》，1981年3月号。

49、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17。

50、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放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在延安公开号召："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同时批准了一项华中局报来的"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在这项计划里，他提议"发动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策应，并调派新四军部队入城援助"。不仅如此，他还发电报到华北，要他们效仿华中局的作法，"迅速布置（北平、天津等）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配合军队夺取这些大城市--而当时美国正帮助国民党运兵、运武器，打算抢先占领。

三 民族解放事业

1 同志会 政团同盟 民主同盟

说起1944年秋天秘密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不能不说它的前身、更秘密地于1941年春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若要了解更为清晰的历史轨迹，还须追述到更早一些，追到几具"俱乐部"性质的"统一建国同志会"。

"俱乐部"--在那样的年代？

1939年9月，国民政府在重庆召集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当时退到大后方的参政员们，相当一批众目瞩望的人物已经有了自己的政党，比如几乎死而后生的共产党（毛泽东），国社党（张君劢、张东荪），青年党（小曾左李）和第三党〈李济深、章伯钧）。有的虽然不称"党"，也已形成影响力相当大的组织，如职教社（黄炎培）、乡建派（梁漱溟）、救国会（沈钧儒）；还有的本人就已经是一面旗帜，比如张澜、章乃器等。

参政员们踊跃提案。众人最关注的，依旧是危难中国家尽早走上法制民主之途。《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共产党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青年党左舜生、第三党章伯钧等人）......全部在政府相当头疼的"党治"、"宪政"上做文章。那时候的辩论可不像1949 年之后，如果有谁邀宠输忠，立遭千夫之所指。在道义与舆论压力下，会议最后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蒋介石手里没有可以摆弄的大花瓶，不敢不指定黄炎培、张君劢等十九名真正有人望的参政员（后又增加章伯钧等六人）组成"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

张君劢那篇《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就是在上年12月发表的（《再生》）。罗隆基认为该信"不能代表国社党立场"的鲜明表态，一定给中共留下深刻印象。他那时已从天津南下，脱去报人身份，受聘为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教授。在这回的国民参政会上，他风头甚健，也受选为"宪政期成会"委员。

1940年4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草成，由黄炎培、张君劢、罗隆基等提交到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蒋介石指示办理。办理归办理，当局有钱有枪，军政、训政的派头并未稍假收敛。

"宪政期成"诸君"感到势单力孤"，感到"无力促使国民党实施宪政"，而国家的局面又弄得他们寝食难安。到10月间，黄炎培、梁漱溟连连开会，觉得必得做点事，而且顶好大家合在一块儿做。当时国共对立火星四迸，用梁漱溟的话说，"若是两大党融洽无间，则形势又自不同，亦许没有此第三者之出现。反之，他们的尖锐对立， 恰便……"1--国共以外的有志之士，以"中间派"使命自赋，夹到了汉阳造和马克西姆中间，力图在"强虏当前、兄弟阋于墙"的政治中，表达第三者的立场。

他们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出台。应该说很像样子。如果今天哪位志士（无论海峡对岸或大洋彼处）也想玩一把，简直可以拿过来就用--除了多半个世纪来党八股对汉文字的荼毒，当然也拜专权依旧之赐。那次，咱们中国志士之间最要命的交椅，一点不成问题。同志会规定了"设常务干事五至七人，轮流当选"的原则。

这俱乐部式的同志会还没达到预期之效，又出大事了：一是在1940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布，原定本年11月12日召集的国民大会，因故（"交通不便"）改期--不仅今天读史人，就是在当时，"同志会"对此也看得一清二楚：在当局眼里，什么国民大会，不就给你们搭起骂人的台子，不让我痛快？

到了10月，杜重远被逮捕；马寅初遭拘留；邹韬奋的生活书店给查封2……宪政团体的活动太不惬意了。12月，在公布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名单时，沈钧儒、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等奋勇帮助中共的左派均被除名，里边居然还捎带着一个罗隆基。罗遂以他的率真性情，为我们留下一句至今尚堪玩味的名句："不要我做参议员（原文如此，应为参政员，下同--著者按），这并不稀奇，但也该换些比我好的。现在这些衮衮参政，算什么呢？如果参议员是考选的，我考也考得上头三、四十名。"3

到第二年（1941），光是捂住嘴、赶下台已经不够，兵大爷（此处的"爷"须读第二声）的手段用上了--"皖南事变"。这一事件，除了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种种说项之外，对"第三力量"的形成，共产党的说法是：

蒋（本来）认为围击新四军、屠杀新四军的指战人员、并取消新四军的番号，打击了中共，其他党派必然会低头跟他走；而各个中间党派却认为，蒋既然敢打击强有力的中共，那么，小党派只有团结起来，才不会被蒋介石吞吃。在皖南事变以前，不少民主党派是站在中间，有时甚至倾向国民党的；皖南事变以后，不少民主党派感到国民党的横暴，

感到自己生存的危机，它们虽然站在中间，但逐步同我党靠拢。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面临着重开内战的危机。各党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对中共所持立场深表同情。4

鸡们告猴不要吃"儆"。横暴面前，大家不能引颈就戳。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他们起初只是想在国共之间劝和，制止双方的冲突。后来"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梁漱溟等四人会商，决定加强中间的组织。因为想来想去，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5"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始秘密酝酿。

左舜生说得更为具体--依旧是道德判断而非程序合理，其实已经蕴含了日后的分手：

它是一九四一年发动的，其直接的动机，是由于政府将若干不必除名的参议员一律除名了。大家觉得与抗战宗旨不合，与推进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发起这样一个团体，以表示抗议。6

为突出共产党的领导，官方正史如此描述：

1941年2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聚谈，各党派"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经过反覆讨论，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7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特园秘密诞生。那是张澜的学生鲜特生宅邸。毛泽东后来特别为该园题词："民主之家"。与会十三人--自然成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读者诸君一定已经注意到，此时的着重点，已经由（大敌当前的）"统一"移到（意在分权的）"民主"。争"民主"么，第一须有声音；第二须有组织。据后世记载，"曾琦、张君劢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民主政团同盟，首先决定两件事"：创办言论阵地《光明报》，在沦陷区成立支部。

第一件，梁漱溟自告奋勇到香港。而第二项，曾琦嘱咐，"沦陷区民主政团同盟支部事，宜推张东荪主持"。

另有一项不便大书特书的决定，是大家情合理顺的担心：别一上来就给灭掉。为求得委员长的谅解，须佯装跟共产党保持距离。他们于是敦请本属"建国同志会"、但"太过左倾"的救国会暂时别露面，并且选择在

境外发表宣言，以期事实既成之后，争取回来取得介法地位。5月，梁漱溟衔命赴港。5月20日到达后，即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及救国会海外组织的具体帮助下，开始筹备出版报纸。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9月18日正式出版，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对时局的主张。《十大纲领》出于罗隆基之手，就是今天读来，也很难不动容。可惜不仅筹办费是中共出的（五千元，经范长江交社长梁漱溟），总经理（萨空了）也是奉周恩来之命前往的。

中共那时对这批先生们相当客气（乃至倚重）。至于私底下，自诩为"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就没那么客气了。包括处于联络第一线的李维汉都曾有过这样轻佻的论说："民社党党员一共二十四个人，张君劢，张排长。青年党党员不出一百人。"8但周恩来肯定清楚，这个新政团虽然只有数千成员，大多数是各界颇有能量的头面人物，在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影响力非同小可。9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始以独立姿态，就重大国是发言，并实际切入国家政治生活。它要求当政的国民党结束党治，实现政治民主化，保障人民的自由；在主张军队国家化的同时，反对共产党"武力割据"，要求其将军队交给政府。"政团同盟"对两党都进行了批评，也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体现了秉公持中的"第三者"中间政治立场。《光明报》社论（就其文白参半的行文风格看，很像梁先生亲笔）写道：

大家都没有武力作其政治要求的后盾。此为联合内的各成员（各党派或个人）之一共同点，而以与联合外的两个方面相较，则此为其一重大之不同点。他们的前途，只能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

国府那边拿不出办法，只是一味地压。比如孙科等鱼脑子要员，就坚决否认"民主政团同盟"存在之合法。这不是时势造英雄么？政团同盟中央常委遂郑重决定公开自己的组织。1941年11月16　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借大家都聚集重庆之机，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一本正经在俄国餐厅举行茶会，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员出席。左舜生报告了成立经过，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第二天，参政会开幕。民主政团同盟发出重炮，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联署）：10

立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成立抗战时期正式民意机关；

政府一切机关不得政视无党和异党分子；

不得强迫公务人员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党费不得由国库开支；

保证人民各项自由，停止特务组织对内的一切活动；

严禁官吏垄断企靠，投机倒把。

公开之后，他们依旧没能认识实业界和商界的重要，不知如何保护其切实利益。能做的，充其量也就是开大会、发号召，影响舆论。比如张澜纪念"九一八"的文章《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创办《宪政》、《民宪》、《中华论坛》等杂志，以及分别在不同城市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民主宪政座谈会"、"宪政研究会"等民意机构。还好除了比较原则的老生常谈"切实实行民主、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和人身之自由、思想信仰及一切集会结社之自由"等，已经明确提出"给予各级民意机关以必要的权力；切实改革征兵、征粮、征税之弊端；严惩贪污，杜绝中饱：革除苛扰，以减轻人民痛苦：以及实施全国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

所有张澜、左舜生等在前台之作为，都有共产党暗中支撑与公开敲边鼓。而共产党有了什么为难之处，他们当然义不容辞。如1941　年4月中旬，何应钦在西安召集军事会议，定计突袭延安。周将得到的情报遍告第三方面，大家立即往谒蒋介石。11

形势发展太快，快到"政团同盟"若是再怕犯忌，而将"救国会"诸人排除在外，已经违背时代精神。更何况两年来，读书人都要为国家尽力，个人盟员的数目不仅大大超过了党派数目，战斗意识更是无比旺盛。

"政团同盟"已经显得帽子小脑袋大。曾经对盟务最具实际操作能力的青年党左舜生记下了当时的勉为其难：

……因为救国会分子沈钧儒、张申府、史良、刘清扬、邓初民等人的加入，而成都、昆明的支部又先后成立，活动范围加广，盟员也逐渐

加多，好奇者投机者，纷至沓来，盟员也一天天复杂，中共想利用民盟作为工具的要求，也逐步的趟于明显。这时主持昆明支部的为罗隆基、闻一多、李公朴诸人，他们觉得以同盟而冠以"政团"两字，对于以个人资格参加者颇感不便，因提议取消"政团"两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后来民青两党退出后，民盟也就命定的只好"一边倒"……12

李璜也一步步看出，在重庆陪都时，第三势力之集结成形，表面上是梁漱溟和左舜生，而骨子里出计划策，且用力最甚者，乃是黄炎培和罗隆基。后来由罗"勾结救国会"把第三势力的民主同盟，引到倾向中共，于国民党的损失甚大--也是黄罗两人始终经手的。13

不管怎么说，到1944年秋天，成立一个新的、更具代表意义的组织（民盟）已成定论。

不见有文字考证，那个抢着在9月19日召开的民盟全国代表会议（也即成立大会），与9月15日林伯渠在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的那个报告，有没有直接联系。

在这个报告里，在野方面已不仅仅只客气地提提建议、要求参政等等，而是再度捡起放凉了的"联合政府"的旗号：

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14

随后，中共又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在野力量改变了过去仅仅贡献主张的姿态，决心具体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参与政治决策。

为迎接这一新的历史使命，民盟成立大会在上清寺"特园"召开。虽然会议地点不过私邸，参加者不过五十四位，就其以救民族于水火之大任的自我期许而言，实在比得上五十年代以来任何一届金碧辉煌之大会。

两项议程，第一项改组（去掉"政团"二字）。几年前藏着掖着的左派救国会，终于登堂入室；无党派代表也大量涌入--这都使得"第三势力"相当明显地向左（或者换句话说，向在野的共产党那边）摆。会议选出的领导机构，三十三名中央委员里边有了共产党员（周新民）；十三名常委里边有了救国会领导人（终生左派、"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的沈钧儒）。青年党抓住了最具"显性实权"的秘书长一职（左舜生）；而最具"隐性实

权"的组织委员，落到名义上第三党、实际上的前共产党员和现共产党密切合作者（章伯钧）手里。真正元老--虽然那时已脱离国社党--罗隆基得了个响动大、实权小的宣传委员。梁漱溟和张君劢分别为国内关系委员会和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主任--需要主持人具有德望的辅助性位置。青年党依旧雄心勃勃，不仅大量发展本党民盟成员，对进入中央委员会决不礼让（三十三名中占九名）。可怜民盟新成立，一无经费、二无办公地点，日常工作全由青年党中央代办。

后世议者多强调此次会议组织上的成就：由民主政团同盟而民主同盟，却往往忽略奋斗目标的变更。应该说，"联合政府"的提出，对在野党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向当局叫板！权力再分配的制度性政治要求！

这一口号的提出并不简单。它源于对外部形势变化十分敏感的毛泽东。该年8月17日，毛在董必武请示周恩来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四字七七事变以来第一次出现；半年后，登上（共产党内）权力颠峰之际，又由他本人将其做成气派雄伟、横贯整个内战、收拢国统区人心之大局：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当时没有人对该报告字面上传递的信息有过怀疑，直到2008年李锐在《炎黄春秋》撰文，才提到他1947年初由冀热辽分局迁到林西时，听分局负责人欧阳钦（杨清）所作的一个报告。那时、第三方面斡旋国共已然失败，两边正准备大打，欧阳钦告诉与会者，原来在"七大"时，毛泽东的口头报告里就有这样的话：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15

综观二十世纪在中土风诡云谲之政治角斗，真正称得上毛泽东"你知我知"对手的，不过几人。"联合政府"的旗号，李济深直到彻底投降（从香港到东北参加新政协筹备）前夕还在用（建议傅作义成立国、共与他们的三家联合政府）；章伯钧则在圣人、学究们依旧大谈自由、民主、民意的时候，一再强调"实行联合政府"！16至于蒋介石，直到他留在大陆的最后一天，对这一叫板，也不曾有过丝毫苟且。他的信条是："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17

因为会期定在学校上课的日子，张东荪教授指派叶笃义作为自己的代表赴重庆。作为国社党元老，张东荪自动成为盟员，并列名十三人常委。那时，他以知识论为根基的第四本着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经结稿。他托叶笃义将自己的心爱命题带到重庆，由张君劢作序之后交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出版；同时有签名的稿本送周恩来、张闻天。

对张东荪在北平与中共的联手，张君劢很表赞成，说自己在重庆"同中共的关系也搞得很好"，"美国人对蒋介石很不满意"，"将来可能成立联合政府"。会后，叶笃义奉派回北平成立"民盟华北总支部"，委托张东荪任主委。18

抗战胜利前夕，醉心于"民主体制下的社会主义"之诸君，没有人对"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新民主主义制度"怀抱丝毫警惕，也不知道"新民主主义制度"这一"期间"，能在一党独大的体系下延续多久。他们都觉得，毛公的讲话，多么真率、多么气势磅礴啊--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覆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19

何谓"合作"？何谓"敌对"？第三方面诸君，还有没有人记得1913年底知识界那场关于"对抗论"的辨析。张东荪那时在《庸言》、《正谊》连连发文，直指专制者的这一"偏好"："国家社会之进步，在调剂，不在统一；在竞争，不在专制；在活动，不在一程而不变也。"20

到1949年秋天，各党派、各人物虽然相互间斗得相当丢面子，但在与中共的合作上，都没有采取"敌对的态度"。议论国名的时候，大家一致同意"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没有人计较什么联合不联合。官方也周到地对此作出说明：

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尽管不叫"联合政府"，但比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的"联合政府"，代表性更为广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工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是一次"准人民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产生的"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具有更大范围的民主性。21

六十年来，这"更大范围的民主性"如何在中国体现，想来读者有自己

的判断。

2 老政协

（1）之前

1945年8月6日，美军投放原子弹。两大后，本该在2月就出兵，却迟迟不肯动作的苏联，终于对日宣战，百万部队挥师中国东北，直如饿虎扑食。

毛泽东这回不认为他的"笔杆子"们（胡乔木等）是在"夸大原子弹的作用"了。在与朱德联名发电祝贺并热烈表态[22]的同时，极为高兴地对他的班底（全体中央委员）说：苏联参战了，这就使抗日战争进入到最后阶段。与苏联红军配合作战，这太痛快了。原来以为要与美国配合，那才是麻烦呢。

他说这话的时候，宋子文还没有赶到莫斯科去签约；《雅尔塔协议》也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弱国保密--料事如神如毛泽东者，也不可能知道在以后的半年里，拜两条约所赐，与为了自己实际利益而翻云覆雨的苏军"配合作战"，多么痛快不起来。

朱德不失时机地连续两天（8月10日、11日）对各解放区发布反攻命令，"中国抗日力量"[23]开始在东北与苏军并肩作战--虽然美国全面支持国府，令日本不得向中共投降；蒋介石明令中共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毛才不管这些，他在延安公开号召："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8月13日）--勇往直前（虽然头脑略逊）的"先锋官"曾克林正往山海关赶呢。

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24]苏军保证将东北交给国府。得到美苏两大强权全面支持，蒋介石自该日连连发电，邀请润之先生到重庆会谈。对此，中共中央例行通告党内："完全是欺骗"。不料苏联开口了。一封发自"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而非如以前亲切署名）的电报，要求毛泽东接受邀请前往，救世主般严峻又冷淡："如果发生内战的话，中华民族将有毁灭的危险。"[25]

怎么办？打下牙往肚里咽……这也不是第一回了。8月23日，一肚子委屈的中共领导审时度势，决定顺势"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当然，与法共不同，中共是不交枪的。毛的垫底主意："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

第三势力当时能做的，也就是在重庆有声势、带感情地开会庆祝了。对那两件最关紧要的事：国共军队到处发生冲突；政府决定对日宽大，不索分文赔偿；26大家虽然内心焦急万分，也是一筹莫展。

3月28日下午，毛抵达重庆，"整个山城为之欢腾"。虽然来自绝域穷边，帽子手表全是临时抓来，但毛神采飞扬，举止得体。一首十年前旧作（"江山如此多娇"），以狂草笔势书就之行草，把一大片良相特色尚未褪尽的新政治家一揽子拿下。

但萦绕在他心头的，究竟是什么？

一下飞机，欢迎人群中，毛一步跨过去热情拉手的，是民盟主席张澜。虽说属于列宁式底层暴动、"农村包围城市"创建人、毛深谙私兵制在中华本土叶茂根深。这一历史性拉手，与其说为将来民盟与共产党之珠联璧合垫底，27不如说格外看好表老在地方军人中的声望。

除了礼仪性的应酬，从8月底到10月初，中共"仅与国民党领袖们多日秘商谈，28没有会见在野党，也没有向社会公开商谈内容--唯张澜除外。据后人记载，此期间毛不止一次专门登门拜望。29有所求的毛话不多，张澜反倒指点江山不已，即毛回到延安之才后所说："民主同盟说我们调子低。这样，我们就开始攻势。"30

小民革诸君（他们个人身份多为国民党高层）不宜怠慢（抵渝第三天即见，紧随国民党当权派和"国母"之后）。对民盟实权人物青年党左舜生，则只有过两次礼节性宴请。比较不寻常的、倒是国社党。当时，张君劢、张东荪都不在重庆，毛竟然特别请徐冰将蒋匀田31（张君劢秘书、民盟中委）等几名国社党干部约到自己在重庆下榻之处（桂园，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家）。近三十年后，蒋匀田依据自己的笔记，对这次谈话做了详细披露。

毛告诉蒋匀田，与国民党"商谈了近二十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蒋匀田问僵在哪里，毛回答说："一个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个是我们管理的地区自治问题。"

蒋匀田当时不过是无钱无枪、在野党的一名中级干部。受到了别的大佬不曾有的待遇，居然没像我们所熟悉的民主人士那样唯唯诺诺、感激涕零。他当时即直言：

你们所商谈的问题失败了，甚可惋惜！可是从人民的眼光看，即使

如此商谈成功了，那乃真的是失败。……假使毛先生同国民党的领袖讨论此类问题，应让其他少数党领袖参与会谈，不宜仅限于责党及国民党。

毛没有觉得冒犯，反倒补充说：

刚才在飞机上，赫尔利大使亦曾向我建议说："既然实质的问题谈不通，最好再从民主政治的原则商谈。"假使同国民党商谈此类问题，我们共产党的代表一定主张邀请其他党派参加。

据蒋匀田记载，毛泽东还对他说：

此次来访重庆，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见到张君劢先生。我少年时候，即拜读张先生的大作甚多，所以已经久仰了。张先生多年来不计艰险，为民主政治奋斗的精神，亦至令人敬佩。他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你亦必阅过，在那封信里，他主张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若教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先生个人，更不可解。

对于百姓供养的军队应掌控在谁人手中，毛虽然有过"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等等不容置疑的宏论，32但在当时，对蒋匀田说的是：

最近蒋先生曾对周恩来同志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我异日拜晤蒋先生，当面对他说，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

老实说：当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苦斗，甫抵延安之时，人只有一万多，枪只有八千余。蒋若再派一师兵追击，则我当时的处境，诚难设想。幸他派张学良、杨虎城率兵围攻，可说给我们大的帮助。因此演变，乃克逼成对日抗战，而有今日的胜利。不知君劢先生发表那封信时，想到这个问题没有？我想君劢先生是没有机会练兵。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

蒋匀田答，对于（张君劢）那封信，他、梁、沈都有不同看法。但是关于练兵一节，则追问毛有否看过国社党创建时政纲，里边明确载有："不收现役军人为党员"；"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是单凭武力可以打出来的。……不愿以武力为建立

民主政治的有效工具，而只有由政党的组织行动，不计个人牺牲，反对一党专政，启发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与信心，渐渐趋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了。"

至于"几十万条破枪"，蒋匀田也有"任人宰割"的同感。但他问毛："假使有一天我们认为不需要枪杆护卫，可以自由活动，如欧美的民主国家一样，用自由竞选的方式取得政权，毛先生，你愿否放弃所有的枪杆呢？"

毛很技巧地说：

在未答复你的问题以前，我先请你答复我的问题：你相信或不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政党之下呢？……你既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政党之下，则你已答复你所提的问题一半了。你想，假使我能凭政治斗争技术，以取得政权，我为什么要负养数十万大军的重担呢？不过还须请你注意一点，军队国家化固好，所有特务人员，更须国家化。不然，我们在前头走，特工人员在后面跟踪，这样威胁，那我们又如何受得了呢？

蒋匀田记载，毛先生讲到特工跟踪时，即站起来，以行动表现，左右转头向后看，使在座的人为之惊笑不已。其实当时随他一同见毛的三名随行国社党员里边，一位孙姓者，就是"国民党指'派渗入贵党的情报人员"--这是尽职尽责的民盟组织部长章伯钧，在审查参加"制宪国大"民社党代表名单时候明告的。章的这条报告，直到1964年才从侧面得到证实。那年，蒋匀田到香港，港大教授刘伯闵对他说：你当年与毛的畅谈，经由随行特工写出报告，说"毛坦然表示，只要能有政治竞争的自由而取得政权，他不愿意负养兵的重担。"--真是一名学问良知俱佳的特工！但为什么这一情报没能使国民党相信中共在当时确实已经准备以在野身份加人政府了呢？"彼疑此谲，此疑彼诈"--中国千年政治文化传统？33

不管怎么样，到10月10日，虽然在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上，谁都不做丝毫让步，但蒋还是第一次以共产党为平等对手，签订并公开发表了《双十协议》。签字当天，比谁都想得早一步的毛，登门拜会苏联大使，打探：如果美国出兵，苏联怎么办。彼得罗夫仅以官话应付。

《双十协议》公布当天，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抵达重庆，"建议"国民政府尽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各党合议的方式，调解国共两党直接的冲突。特使身后就是美援，国府会违拗么？召开政协的日子立刻定下

来：就在下月，11月12日。

在这条战线上，共产党也有相当准备，立即提出"民盟须作为政协会议单位之一"。

回到延安的当天（10月11日），毛即对中央政治局做了汇报。如果从日后中国人自己再度自相残杀凡四年看，这次的两对头会面，只能算是留了些历史遗痕，并无任何实质上（哪怕意念上）的进步--如果非说有，也只是负面：在一片讚许、欢呼声中，历史为毛泽东搭建了一个舞台，由他从劣势起手，以开明、谦和之姿，玩弄民主高调以安抚舆论，同时忽悠有钱有枪的美国盟友，以争取时间，完成"全赢"的军事部署。

我们且不评说他在重庆怎么力争"言论、集会、出版自由"，怎么建议"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不说他如何向产业界人士许诺"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前途"，这些，敬请读者自己对照他得到政权之后的作为。这里只说他如何观察、周旋于本书主人公所属的"第三方面"的勋绩。

在那四十多天里，他发现"民主同盟的调子"（或称代表民意的在野党对专制当局的要价），比共产党还高，由此激发了他的灵感，开创出共产党夺权取胜的"三大法宝"之一：统战。34那年秋天，毛泽东愈来愈明晰，拿下国统区，绝不仅攻城略地一招。借"民主人士"之力，实现自己最后胜利--多么现成！他和他心领神会的属下，立刻捉住战机。用他报告中的话说，就是"这样，我们就开始攻势。恩来十天之内向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小党派、国民党民主派各界活动"。35

"被统战者"那时候并不十分明确自己给共产党捧为座上客的由来--像日后共产党已大权在握，且"统战工作"已经玩得相当圆熟的时候。他们那时还以为，大家正凭着良知为国家携手奋斗。令他们百思而不得其解、而且谁都没有办法的是，礼遇归礼遇，说到唇焦舌敝，两边该打还是照打。

10月13日，蒋介石再次下颁"剿匪密令"--"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不幸国军在上党、平汉线连连失败，中间还夹了个高树勋起义。共产党这边，则已改变意图，做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新战略决策，从各解放区抽调十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干部赶往美丽富饶、有铁路港口、有钢铁矿山的东北。毛泽东说得再直接没有了：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

都丢了 ，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36

但民众渴望和平，反战运动如火如荼，停战已刻不容缓。怎么停？只有两途：外边强人出面调停。外边人又有国外国内之分。苏联坚决拒绝介入；"停战调处执行部"由美、国、共三方组成。同时，各党派和最具威望人士集合的"政治协商会议"开场--这时已是1946年1月13日。

（2）开场

在1945年10月上旬，民盟抓紧时机，正式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东荪获选为共有十三人的民盟中委常委之一。

会后，张澜主席和左舜生秘书长接到张东荪发自北平的电报，要求在将来的政协会议上占一席--这或许出于国社党攻略，但也符合我们主人公"就重大国是发言"之本意。11月底，张教授向燕京大学请假一年，抵达重庆。征尘未洗，"陈立夫先生在其官邸设宴款待，我亦被邀作陪。"（蒋匀田回忆）接着出席12月9日"昆明'一二一'反战殉难烈士举行追悼会"，与张澜、梁漱溟合献花圈。献辞为："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试思中国之命运，能勿忧心。"这无疑出于他们之本心，但确已纳入共产党之统战。

12月15日，马歇尔接受任命，衔"美国驻华特使"，接替蒋最爱而毛最恨的赫尔利。白宫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力主"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中共政协代表团第二天即抵达重庆，全面同意美国意见之外，特别强调：一旦政府改组，即交出军队。

更有意思的是，马特使在上海会过蒋介石、飞抵依旧是陪都的重庆的时候，飞机舷梯旁恭候的，竟是两名帅呆酷毙的戎装共产党将军：周恩来和叶剑英--宋子文等国府高官还没赶到。马帅吃一小惊，因为根据协议，美国立即向中国提供的三十九个师及八个空军大队的装备，国府是唯一受者，共产党一粒子弹都分不到......忙问临时代办是不是大使馆通知错了，罗伯逊也一头雾水--其实哪里用得着大使馆？马帅甫抵上海，中共外事组已经从驻重庆美军总部得到他的准确行程。

这批武器曾经深深刺伤中共。唯其深刺，更激起志在必得的斗志。美国朝野一直在质问："制定这一政策的人，是否了解这些枪炮将派在什么用场？""蒋介石为什么荣膺'运输大队长'之雅称？"杜鲁门也说过："装备

国民党，一个胜仗没打；共军缴获之后，北平、西北几天就打下来了。"37

本来一个多月前就应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因为名额拉锯一拖再拖。最后，有"统战"在胸的共产党，以其包容、大度及高超的政治智慧，终使各方达成妥协。

为什么国府在捱延一个多月之后终于同意了？为什么共产党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如此识大局、顾大体，令人感动地一次次让步？表面看，是马帅抵华、三国外长一致表态，以及国内高涨的反战运动；更深的原因是，从光复（8月中旬）到年底，国军场面上气势虽凶，实际攻城略地没占到多少便宜；而共军在这四个半月，地盘与兵力（特别在东北）的扩充，已达自建党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如果非言和不可，当然要在便宜占得最大的时候--更何况局面是以"政协"之名目加以维持的。

望读者诸君一定记住这个日期："全面停战生效的1月13日"。38这是光复之后约半年间，两边靠着自己的名头、实力与士气，分别从日军、伪军手上拿下地盘之截止期。此日之后，在美苏两强权或光明或卑劣染指下所发生的一波接一波局面变更，再也没有被两边同时认可过。

毛泽东那时正累得一病不起。在延安主持全局的，似乎是枭雄霸主之心略逊的刘少奇。战场之外，政协会议遂成国共角斗场。第三方面的政协代表，一时间身价陡升，成为两边着意拉拢的对象。

政协会议正式代表三十八位，39由各党派协商产生。不能说已将顶尖人物尽数网罗，但代表们在德望、参政议政能力上，尚得到整个社会的推许。至于倾向，总的说来，青年党倾向国府已勿庸置疑；共产党则拉住了民盟左派；立场持中的国社党，显得特别起来。罗隆基说：

在政协进行期间，国社党的张君劢、张东荪，居然成了宾客满门、接应不暇的红人。国民党除经常派人个别地和他们保持接触外，1月12日，蒋介石特别设宴款待二张。1月22日，张群、吴铁城又设宴款待民社党这两个巨头。据当时报纸报道，在这两次宴会上，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张君劢、张东荪两人在此以前并不是政治上的红人，特别是张君劢，抗战前在上海的时候，是被国民党特务绑过票的。到了现在，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主席的身份，居然躬亲其事地设宴招待，岂是毫无目的的应酬吗？40

目的归目的，二张那么容易入彀么？席上谈话，幸亏有零星记载留下。蒋匀田一年后对张群说：

胜利后初到重庆，蒋主席宴请你们三位张先生，（按即东荪先生，君劢先生，及岳军先生），畅谈国事。（东荪先生）曾建议不必划东北为九省，增加将来管制的复杂。同时最后派张学良回到东北，本过去的关系，较易收揽人心。万一不能信任张学良，即派首义抗日的东北名将马占山回去主管接收，或易为丧失多年的东北同胞所信托。此一远见上策，当时不幸未蒙采纳。可是现因东北局势变乱，据闻已有悔不当初之意。41

政协会议在国府大礼堂正式开幕，是1946年1月10日。出席人三十六名（莫德惠、张君劢因参加制定联合国宪章尚未返渝）。这是真正能展开讨论的人数，而非动辄上千的光彩包装表决机器。蒋介石作为"唯一主席"高调开场。42接下来的周恩来的致辞，曾琦、沈钧儒、无党派的发言，都得体漂亮。用当时亲聆者的话说："上下中外欣喜若狂"。

在当天的会上，孙科以"政协协议之执行班底"身份发言，给出了政府的打算：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扩大基础，确立"国府委员会"为决策机关，国民大会如期召开（制宪而不行宪）。这一天也是联合国首届大会开幕的日子：严正警告世界不得再有战争。

多么重大的一天。然而，半个世纪过去，无论政协还是联合国，对强人和强权究竟有多么大的约束力，我辈纳税平民实在乐观不起来--政协期间，东北已经开打；本书截稿的2008年，伊拉克正血肉横飞。

接下来的三天（1月11至13日）是大会。在张群和周恩来分别报告了国共商谈停战和恢复交通等事宜之后，停战令颁布；调处执行部投入实际运作。

接着讨论政府组织（即俗话交椅分配）：国民党坚持共产党先把军队交给政府，再逐步走上民主。共产党则说没有政治民主化，什么都你说了算，我怎敢交军队？中间势力力主军队立即脱离党派而归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统一（漂亮空话）。争到最后，在纸面上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离、军民分治等原则。

虽然主动要求参加政协会议，并且被推为最要命的军事组主持人，张东荪此时的态度，据他一年后回忆：

著者在政协会中除为人民争自由外很少发言，后来亦非万不得已不说话，不外乎总想不要因为个人言论而致民盟在国共桥梁的地位受影响。43

所谓"万不得已"，第一次，是在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政府改组的时候。方案强调"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及主席否决权"。中央社当时报道：

主席方面宣布开始讨论，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忽然把问题扯过，说了一番"条件"的理论："必要条件非足够条件"！他说："光讨论政府组织是不够的，必以先实施保障人民自由法令为条件。"

用中央让记者的话说，"政府不是已经宣布要这样做了吗？但他（张东荪代表）的条件来得厉害"，几近"要挟"：

不行，政府一定要在三五日内做到，并报告实施情况。

据当时在场的蒋匀田所做的记录，张东荪发言的要点是：

在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之时，单谈改组政府不够。因为由一党政府变为多党政府，而不谈人民自由，一般人民对多党亦将失望。假如没有人民自由，即使各党加入政府，亦将无所施为。开幕时当局所宣布之四项保障人民办法，在讨论改组政府以前应先做到。那么进行政府改组时，才有很大的帮助。

如何做到保障人民的自由？照议事日程五天交换意见的结果，希望于星期六会议，政府即对此有具体的报告：何种条文已明令作废？政治犯已释放若干？有些法规，经立法院通过者，须经立法院废除；而有经国民政府、中宣部、社会部颁布者，一天内即可予以麼止。政治犯可分批释放，特务机关即可明令裁撤。政府对以上应有明白报告。即使不能做到百分之百，也应做到百分之九十或八十。44

对张教授的立场，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明白：安全地陪着当局言辞漂亮地玩开会，外加丰厚薪酬，就像二十世纪中国自有"共和"以来，林林总总的光鲜人物们之所为，为他所不取。有他挑头儿，同道者即跟上。据当时记载，张东荪话音刚落，梁漱溟即发言支持这一质询，追问政府的诺言：请先告诉我们你们做了什么？如得不到报告，不愿谈其他问题。

青年党代表觉得"这样打岔实在不好"；政府方面认为"国民党为第一

大党，应有其特殊地位"；"先要政治休战，方能保障人民自由"。国民党代表陈布雷认为他们以"条件"来对政府说话是不对的：

本人非为执政党辩护，政府近年法律与文告，确已向保障人民自由方向之路努力。事情必须慢慢来，如此催促紧急，以中国之大，将不能做到确实与彻底。

陈布雷与张东荪同为世纪初留日生，个人的道德操守也都无可挑剔。他们在这里所表达的不同的政治理念，在我们后世读史人，或可理解为：转型期，张东荪较接近西方意识形态；陈布雷更具中国传统文人风格。

据蒋匀田记载，对陈氏的"慢慢来"，不苟言笑的张东荪此时很动了感情--说到精神桎梏甚于身体刑拘：

"饱汉不知饿汉饥。"我坐过牢狱，我知道犯人的心理，一点钟就等于一年。故对人民自由之保障，愈快愈好：而对政治事件，倒不妨慢慢的商量。

这番话，激动了周恩来，想到1936年底东北军、西北军义救共产党于濒死那一幕，他说自己"受着政治、道义、良心的责备，要求政府回答一句话"，能否尽先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

九年前为着挽救国家危机，他们虽然鲁莽了一点；但这却是惊天动地的事业，安慰了全国人民。蒋主席也应允要政府释放。就是以法津来说，也已过期。希望政府不念旧恶，以慰东北、西北的父老。

所有的人都知道，当时身处重庆而对张、杨获释最为关注的，可说有二人：周恩来和周鲸文。前者是政治考量：后者是乡谊。蒋匀田记录了事情的缘由始末：

政协之前，……我曾在张标芳先生寓所的凉亭中，与周恩来先生谈及此事。他当时对我说：现在国共和谈演成僵局，假若此时提出释放张的问题，恐怕不但无效，可能更加有损他的安全。时隔未久，周恩来先生在政协大会中，如彼慷慨发言，要求释放张、杨，前后设想迴殊。所以我说系受东荪先生那段释放政治犯言论的激动。

蒋匀田认为，周恩来的放人，只有道义和政冶运作的考虑，这就是为什么在他执政的时候，不曾对"反革命宣传"等限制思想自由的法令提出

过异议。周算是现代中国第一大政治家了。在此就看出他们的局限。只有张东荪主要出于政治理念，做法也是最根本的：废除法令。

"无党派贤达"郭沫若当场发言支待民盟立场。在提到政府可以"就容易的先作"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如新聞检查制度"为什么不废除？这本不错。但他又说，"重庆的电影戏剧检查，尚未废除。假如邵立子、陈布雷来审查，将受益无穷；而偏偏审查的都是文字不通的人。"

怎么能不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崎岖漫长哀叹：郭当时是九位贤达之一，后来又担任共党政权文化头目凡二十年，在思想言论自由这一观念上，竟发表如此外行之见。他本人，还胡乔水，若嫌不够再加上日后荣任社科院副院长的"一代才于"钱钟书，都可算文字大通了吧，于转型期中国之思想言论自由的制度性变革，有何建树呢？

"慢慢来"--有些基础建制或许须细磨深雕，但废除明显褫夺民众权利的法令，也须"慢慢"么？其实，对于"军政"、"训政"结束无时，张东荪他们早在十多年前已有了堪称"对当政者充分体谅"的评述：

或有人以为思想与言论太开放了，势必导致国议纷纭，使政治不能顺利进行了。我们亦知国家的政治求其敏捷与效率高，只在于行政系统是否如身之使臂，臂之使腕。而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并无关系。并且社会上舆论愈发达，行政反可得其助力。因为既许可言论自由以后，反对政府的思想固然可以发表，而赞助政府的言论更可以发表。

因为真正民治的政府，他的基础是坐在产生政府的大多数公民的同情上，其政治的设施又适合大多数人民生活实际的需要：所以言论愈自由，政府愈能得舆论的赞助。要在"赞助政府的言论"决不是专靠政府自己所制造的宣传。倘使不许言论自由，而政府一味宣传，决不会生何等效力。所以从这一点上可见政治上效率的提高，与社会上自由的开放，不但无抵触与矛盾，并却正相助相成。

因为我们虽则很爱护政治的效率，但我们却更爱护思想的自由。以为无政治的效率则行政失其意义；但倘无思想的自由，则国家失其灵魂。所以思想自由是人民的根本。纵使两者即有冲突，我们断乎不可牺牲自由而迁就效率。像俄国那样的办法，必须先经过一个阶级的专政，把人民所有的自由暂时牺牲，而以为将来或可有一个自由天国出现。

我们则以为国家是一个民族全体的公器，断不容哪一个阶级来据霸

一时，而牺牲其他的自由。倘事实上有此，则宜努力打破。于理论上更不可认为应该。

所以我们主张为政治效率起见，针箍权力当然宜于集中，但集中的限度是以行政为界，断不客侵犯到社会上去，把人民的自白亦受管辖。45

与会代表们再度强烈表述，邵立子终于给出略有实质内容的回答："国防委员会已通知有关机关在十天内检讨诸项有关人民自由法令"。

留学英国大才子罗隆基对当局的"七点质询"，最为一言中的：

（一）如何使一人政治走到民主政治？

（二）如何使一党政府走到举国一致的政府？

（三）如何使缺乏行政效率之制度走向现代化政治之制度？……

这时已是全场一片肃穆。罗之疾言厉色，蒋匀田曾对友人做过如下解释：

自罗隆基声明脱离国社党后，我们已甚少交往。不过自张东荪先生来渝后，又常晤谈了。因此得悉他脱离国家社会党时系受国民党的朋友劝诱。他对东荪先生曾说：他自昆明来渝，当时国民党的大将张道藩先生请他吃饭，约有清华同学孙立人、吴国桢、浦薛凤等作陪。席间张道藩用奖誉的方式，劝他脱离国社党。奖誉他为不可多得的人才，尤其精通国际实况。若非有国社党的身份，至少可被任为外交部次长，俾能多有贡献于国家。同时又说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先生已被软禁，国社党前途已渺茫了。罗在既奖又胁的诱导后，乃声明脱党，因此招致许多知识分子之白眼，可是外交部次长的许诺，终于石沉大海。这段插曲，当然成为罗隆基心中难忘的隐恨，所以乘此机会略予发泄。此即所谓逼友成敌之结果。46

到五十年代，罗本人曾有一篇忆旧的文字发表，对此节只字未提。其实，就算是在老政协那样的气氛下，换了别人，这样的经历，一般也是千般委屈万股怨，只闷在肚子里。罗大才子对东荪的坦言，反映出他们两人不同之性格特色：努生的急功近利与胸无城府；东荪的容谅与无是非。至于当权者的这类拉拢与丢弃，反倒是政客常态。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被认为态度最温和的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就政府改制所发表的"三同八异"。其中第八条为："在训政过渡到宪政时期，党的费用不能由政府开支。"读史人都知道这里的"党"，特指那时执政的国民党。话音犹在耳，待到他的党掌权（并且郑重制定了宪法）之后，只因毛主席一句话，这一原则即完全扔到脑后。直到八十年代，才有企业揣揣提出"公司能否不再为职工订阅党报？"到2004年，共产党自称宪政立国已经五十年，且正值人大就人权修宪，还不见一人提出"党的费用不能由政府开支"。直到本文完成的2008年，执政党，包括八个与它肝胆相照的小兄弟的费用--每年至少千亿吧--还是天经地义地由纳税人支付（政府拨款）。

1月13日，停战协议生效。政协休会一天。也是在这一天，蒋经国自莫斯科返抵重庆，带回来斯大林正告：美国如有一兵到中国，东北问题即难解决。美国如不在东北取得利益，俄可作必要让步，并盼蒋主席访俄。

1月14日之后，会议开始由大会转入分专题会，连接开了六次，"争论甚多，经过相当困难"（蒋匀田语）。会员分为四类五组，每组有各方推荐一至二人。张东荪被推为军事组召集人。

中国当时局势，没有比军事更紧要的了。蒋介石的既定政策是"政治放宽，军事从严"。47毛泽东的底线是"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政协军事组召集人，竟然是一个对军事无论述、与军队无瓜葛的哲学家--现在想来，当时数方协调，可能正在于他的哪边都不是，才获选定。如此弱势的召集人，自然一筹莫展。张饴慈记得祖父后来对他说起当时会议情形：

当时作为"第三力量"，每次找蒋谈话之前，都先要征求共产党意见。周恩来什么主意都不拿，全是毛决定。在旧政协军事组，本已谈好的事，怎么第二天全变了。后来才知道是延安来了电报，周作不了主。

16日，民盟九名代表联名（青年党附议）提出军事问题提案，核心是"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要求"现役军人脱离党籍"--军党从此分离。国民党代表提出"是否仿照国联，将过于艰巨的问题不讨论，放到将来的国民大会去；两党间的问题也不在此讨论，由两党自己去解决"。张东荪立即反对："国共两方的问题，不能只两方谈，不能只顾到两方的利益，而不顾他方乃至全国的利益。"

对此议，梁漱溟、张申府赞同，别人未置可否。既是共产党又是国民党元老的邵力子就此发了等于没发的言--不知属于大奸还是大憨：

大家强调军队要脱离党，我们已把军队党部取消了，当然也有人会说，国民党中委里将领很多……他们虽有党籍而不做党的活动。我们对整编中共军队，第一步也并非要中共党员都脱党。

最后，两项原则"军党分离"和"军政分离"获得通过：军人可以有党籍，但在军内不得有党团组织和党派活动；军队在驻地不与当地政治发生任何关系，只能进行训练，不负责地方防务。军队供给由中央统一筹划。

当天，依照惯例，张东荪、郭沫若到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第四次夜会对会议情况作报告。他不是官员，没有说废话套话的训练。对刚刚完成的协议，这位军事组召集人万分感慨：

人民太苦了。抗战结束了，要这些军队干什么，我们要大裁军，全国军队同时公平整编，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

话还没有完，"台下忽然跳出了十几条壮汉"，齐声抗辩："政府军队是国军，不是党军。"张先生当时肯定气糊涂了，竟跟这帮人争辩起来："是国民党的党军，不是国军。"……据《新华日报》，由于"国民党特务的挑衅和有计划的捣乱破坏"，报告会在混乱中结束。这次夜会，是在杨沧白纪念堂举行的。后来类似"捣乱破坏"又发生过几次，统称"沧白堂事件"，和我们后边还要细说的"较场口事件"可称同曲同工。

1月17日，该讨论国大问题了：政府认为原来的代表有效，民盟认为无效。中共的态度反而比较缓和。张东荪此时大概又到"万不得已"。据重庆媒体记载，"他站起身，发挥一番议论，主张国大代表重选"，说"重选以后国民党仍占多数，也是甘心的"；"他忽然提到了前天群众大会的事，大概有什么触犯了他，他竟提高了他的声音，对着新闻记者席愤怒起来：'真理是真理，我要警告新闻记者，听着，你们不要来破坏了我们会议的和谐空气。'骂得记者们个个莫名其妙，不知前天出了什么事。但他认为，从1927年起，已没有了新闻自由。喉舌们所为，当然如此。"

终其一生，张东荪对两边（特别中共方）气焰薰天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propaganda"），从未有过一丝好感。终其一生，不曾有过一个以"宣传"为职志的朋友。

1月19日讨论宪法草案。因为张君劢的威望，协商顺利。周恩来一分钟都没有耽搁，立即告蒋匀田恳请张君劢，将来宪法正式起草，一定担任执笔人。周认为，若由国民党掌控，一定偏于一私。碰巧在第二天，王世杰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若由国民党执笔，共产党一定逐字推敲，肯定难于通过。

张东荪和梁漱溟对此都没有很大热情。1947年10月张东荪回忆道：

梁先生的结论似乎是中国不能走上英美式宪政之路，因而亦就不必勉强去走。所以在政协开会时对于宪法的修改最不感兴趣。不过当时我亦是一个对宪法不感兴趣的人。我早明白历史决不会因一纸宪法而翻身，宪法的讨论近于白废光阴。48

宪草条款已经没有问题，贯彻政协协议悬到"国府委员名额确定"。原先"国民政府委员会"，谁都知道，是一批"有薪可领无事可做"的"党国元老"。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这回提出"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案"："增加委员名额，选任党外人士，为政治最高指导机关。得讨论立法、施政、军政、财政，并得建议。主席得为紧急权宜措施。行政院置政务委员。"

罗隆基和王若飞看到了机会。他们拟定的计划是：第一，转变职能--接受王世杰的"扩大"计划，但一定要使国府成为"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最高国务机关"，即委员制的集体政府，具有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各部长官的任免权；决算预算、施政方案、军事大计，都必须经过该委员会讨论决定。第二，以"三分之一否决权"（即四十名中的十四名）遏制专制，即"国民政府主席对政府委员会之决议，如认为执行有困难时，得提交复议。复议时，如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仍主张维持原案，该案应予执行"。

罗、王在"老政协政府改组组"的合作，一直传为美谈。试想罗的一生，曾经倾服过何人么？但那时节，人前人后，王若飞在他口中成了"王司令官"。他们没有料到，这则富于创意（从而也可称之踩了专制者痛脚）的计划，后来竟引发出国府委员名额分配的僵局，最后使得政协理想全部归于失败。

国民党怎么那么死心眼？难道这点自信都没有：十四席里边，不会个个都跟着共产党指挥棒转吧--起码国社党的两位张先生，外加乡村建设的梁先生。

1月26日，签定协议似乎成定局。周准备回延安汇报之后回来签字，

临行前，特到民盟总部看望，表示马上要改组政府，希望大家一道努力。不料两位张先生和梁漱溟都表示，"努力可告一段落，不愿参加政府。"49

（3）闭幕

1月31日下午政协闭幕。国民党的蒋总裁再度致辞：

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来，经过十余天热烈的讨论，已经完成其应有的任务，今天宣告闭会了。……今后无谓的政争，必可彻底化除；和平建国的目的，必可迅速达成；对于未来宪政实施的前途，也必能因此而愈显光明。

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和四项"立即实施"，就等着三个月之后（5 月5日）召开国大了：

五项协议：

《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

《和平建国纲领》

《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

《关于宪章问题的协议》

《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

四项政府决定立即实施的事项：

一、保证人民自由；

二、各政党一律平等；

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

四、释放政治犯。

2月1日，因"神经疲劳"而"一病数月"的毛泽东"修改审定"了一则发到全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50

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等八人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51周恩来等四人参加行政院，力争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及一个不管部部长。中共中央机关准备迁至江苏淮阴地区，以靠近南京。当地解放区已着手安排中央机关的住房。

同一天，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军队国家化的指示。从2月1日到7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赞扬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政协的态度，对"在蒋主席领导下"，国民党能够实行政协决议寄予希望，提出各党派长期合作，民主协商解决中国问题。

我们后世读史人不能不说，这是在中国国运关键时刻，在全世界（特别是民主阵营堡垒美国）的关注乃至亲手下场操作下，就中国最急需的问题，由社会公认最受信赖的人物出场，经过论争、理解、让步，而达成的协议。

不可否认，整个过程中，确有由国、共分别代表的美、苏战略利益的较量，但在战胜法西斯之后世界民主大潮中，在战后民不聊生、百废待举的中国，不可能有比实行政协协议更好的选择了。

可惜不能光看会上。会下，在两党理性稳健派身后，全有"（独大）立场"十分坚定的本党同志。52他们没有立即闹起来，只为等待最好的时机--厮杀而后的全赢！

对北洋时期国民党与研究系势同水火记忆犹新，张东荪对中国政坛与政客之痼疾--全输全赢的"党争"，有足够认识，却也一筹莫展：

例袁的时候，我以为这是化除政争的好机会。因为到了那时，无论缓进激进，无论集权分权，无论总统制内阁制，而共同的敌人只是帝制。既有共同的敌人，必须有联合的战线。联合战线一经组成，则党争便可化除。久而久之，养成一种联合的习惯或同盟的习惯。不料例袁以后，各方面所得的教训正是一个反面。他们不但不认与人合作为必要，却反而以为以前的排斥人家没有彻底。于是大家都想来一个彻底的排

斥。53

到1952年被逼检讨，再度提及：

我要回头来说一说旧政协开始，直到民盟解散总部为止……。这一时期内，我……始终认为只有国共和谈是中国的出路。谈判断了几次，我还希望能够恢复。对于中共，尤其……以为他可能变为像战后法国共产党一样，在议会中做斗争，所以以为必须由谈判来解决。但国民党方面不肯让步……，应要求姜国去压他。我在这时期做了几篇文章，全是为此。……54

但梁漱溟还是写了《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先在闭幕宴会上交周恩来、张群、张东荪看，第二天即交《大公报》发表，决定"不在现实政治上努力，要站远一步来说话"。他当时无论如何没有料到，在接着的半年里，他这位民盟秘书长根本没有可能站远一步，而是俯身前沿、殚精竭虑。无奈所做努力，竟然招致几乎终生的羞辱，和当时曾审读该文、并且在他之后接任民盟秘书长的张东荪一样，在曾经亲密合作过的共产党认为他们已不堪再用的时候。不用自己"站"，都给远远摔出--想说话么？说吧，只告诉你，看看头顶上飘着什么旗子，你那套老经文，没有人听了吧。

不管怎么样，这是中国文化人以独立的姿态、全新的观念，第一次出现在转型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当时，司徒雷登也在重庆。校长找到他的哲学系主任，说自己即将出任大使，55并说美国的政策是要调停中国内战--想来在那一阶段，张东荪和第三方面诸位，不能不切切感到，国共之外，还正受着调停者美国的格外看重呢。

（4）较场口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桩影响到日后全局、乃至中国百年命运的大事--虽然那时候几乎无人做出这样的揣度。

我们知道，太平洋战争之后，苏联一直迟迟不发兵--直到原子弹爆炸、到他们的出兵已经有百分之百胜算的时候。8月9日，苏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势不可挡之势，长驱直入。

国民政府担心共产党借势抢占地盘，争分夺秒地派出宋子文，与苏联签订了出让蒙古的《中苏友好条约》，以换取受降后全部交付国府。

还有，比方说，我们已经知道的逼毛赴重庆谈判。

从苏联出兵到政协会议闭幕这半年间，中国新政治格局即将和平地完成，苏联是个什么姿态呢？第一，它一直接受"友好条约"约束，尽量不让中共依仗"大家都是镰刀斧头"而得到东北地盘；第二，签约的时候可能没料到东北如此富庶，但开眼之后，贪欲之心难于抑制，于是在《雅尔塔协议》、《中苏友好条约》之外，同意（一时赶不到东北实施换防的）国府之要求延缓撤退。在帮他们接管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和辽北、松江、嫩江各省行政之后，开始以当然的态度继续向国府要价，声称日本在东北的资产（重工业设备）为苏军战利品；还想得到铁路、矿产等等更多利益。驻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已直接提出"中俄东北经济合作问题"，望双方以军事风格迅速解决--不愿第三者插足。至于谁是第三者，中共？美国？东北人民代表？没提。

就在这当口，1946年2月10日，政协闭幕不过数日，在重庆发生了一个简直如庄子所云"有数存焉于其间"的"较场口事件"。因为这次事件的发动者，万万没有想到，尔后生发出来的一系列情事，与始作俑者的初始本意，已然偏谬到超乎任何政客想象（罔论设计）的地步。

时至1946年2月，对日作战早已结束，占领已届期满（规定拿下之后三个月）的俄军，却是怎么也不撤出。而两周前政府派往东北的调查人员张莘夫蹊跷遭杀害，更令人对迷雾重重的东北局势，再添忧惧。

事情起源于2月4日国府代表张公权和蒋经国回重庆的报告：接收全面受阻，原因是俄方"参加东北所有煤矿和铁矿股本"之要求，　没有得到答覆。紧随他们之后的，是苏联驻军总司令一通接一通的电报，催促张、蒋速回东北，口气已近于威胁："拒签将后悔不及"。斯大林也出面了，三次电邀蒋介石到莫斯科面谈。

"后悔"什么，这些，不能说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即中统）完全不明细，但当时让他们更觉得有如芒刺在心头的，是担心一旦政协成功，其老对头政学系将在党内占上峰。但闹事总要有个由头。正好，苏联在东北劣行为他们创下机会：发动较场口事件--"反对苏俄插足东北经济建设"，打击"亲苏"的政学系。

更为凑巧（或许有意为之）的是，"较场口事件"第二天，2月11 日，美、英、苏三国披露了一年前为换取苏联东线出兵而秘密签订的《雅尔塔协议》，终极目的不言而喻，但直接导致了席卷全国各大城市（重

庆、上海、南昌、北平、南京、青岛、汉口、杭州等）的反俄示威大游行，要求"赤色帝国主义"如约撤军（本应在11月15日）。

周恩来一眼就看出门道。在驻地邀请民盟人士的晚宴上，他神情凄闷。因为他得到报告，昨日的游行，警察、宪兵皆未干涉，因为陈立夫坐在社会部内亲自指挥。他对来宾说：

昨天特工装学生在较场口的游行示威，口号虽反对苏俄，其实对国民党内部言，则系反对政学系；而真正的目的，则想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后虽不变更立场，但对政协的各项决议，很难持有乐观的想象了。56

当晚，蒋匀田、罗隆基曾作彻夜长谈。他们敏感到当前局面比"国府委员僵局"更为严峻。一直明确表态不介入中国事务（两党之争） 的苏联，将立即转变态度，而苏联对中国转变态度，直接影响美国对中共的态度。国民党一定乘机以"反苏"来"亲美"，因一席国府委员之不让已经开罪马歇尔的蒋介石，将不再以"民主化"讨好美国。

2月22日，重庆七千学生再度游行反苏--阻止张、蒋与苏签订"合作"，彻底破坏国府与苏联的关系。第二天，23日，又举行第二次游行。这回是《新华日报》和《民主报》员工遭殴打、门市被捣毁。周恩来自此不再出席政协后续的宪草研讨会--陈立夫目的达成：借学生之手实现国共彻底破裂。

这两个破裂，最直接的影响是东北战局。或者可以说，较场口事件游行反苏，导致中共军队在东北迅速发展。

（5）宗炳册页

这期间还有一个小花絮：东荪先生长子张宗炳（字蔚原）的册页。

十年前（1936），二十岁的宗炳以燕京硕士资格考取美庚款，赴康乃尔大学。两年后获授生物学博士，旋即归国，先在东南大学，接着到西迁的燕京任教。张家近年翻检旧物，发现他的一个册页，很象是政协会议开始前后，在他到重庆民盟驻地探望父亲的时候，请诸位参会"父执辈"（其实罗隆基不过长他十六岁，周鲸文长六岁）的题字--虽然寥寥数语，有的还是旧作，但大家当时的性情心绪，如DNA般跃然纸上。

张澜的表达最显"圣人"历来风格：

仁者爱人

义者宜人

居仁由义

大人之事而士之所志也

蔚原先生

张澜

沈钧儒题写的是他最擅长的七律，虽然他的一生并非如诗中所述。不过，诗言的是"志向"，与具体大酱缸里的人生，是不该同日而语的：

半生不羡沐猴冠

数载赁庑趣自欢

发案茶香留舌本

绕簷岚翠压眉端

笑谈时具宾朋乐

俯仰深知宇宙宽

举世嚣嚣我适静

棕床趺坐作心观

蔚原吾兄嘱示近作

钧儒（印章）

梁漱溟当时激荡胸中的，自是会议中之白身角色：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

善则千里之外应之。

况其迩者乎？

出其言不善，

则千里之外违之。

况其迩者乎？

蔚原兄索书

卅五年 梁漱溟

东荪本人的"示儿"，字面平淡，意境……什么意境呢？也正如他历来身在此而心思已漫游八荒的特色：

夕阳冥色来天地

人语鸡声共一邱。

游灌县蹄途忽忆宋人句辄为

炳儿书之

东荪（印章）

彭一湖：

善继人之志

善迷人之事

于张子勉之

蔚原世兄勒书

彭一湖 三十五年一月十二日

与民国同年的周鲸文，已颇具"办报办学人生、半文半白为文"之特色：

古人所谓智仁勇

以今语言之则为认清目标以乐观态度勇敢作去

本此旨作人立业，庶几有成。

蔚原兄嘱书

周鲸文 卅五年一月十四

章伯钧则是一贯的抱负远大、道貌岸然：

意气百年内

平生一寸心

欲交天下士

把晤自虚襟

君子重名义

直道冠衣簪

风云行可托

怀抱自然深

蔚原世兄嘱书

章伯钧 卅五年一月十四

罗隆基那时正是会上纵横驰骋、会下风光无限。不仅与共产党代表珠联璧合，陪都第一大美人王右家也正追求到手。联想到日后与异性间最私密之隐情都任曝光、任糟践、成为定罪证据，读到这名率性而为之大才子在此地的轻飘道白，只倍觉凄凉：

自由是位美丽的小姐，想得到他，就要努力追逐、侍奉、温存、争取，还要随时防备被人夺了去。

蔚原世兄

罗隆基一九四六·一·十五

张伯驹和黄炎培的题诗是后来补入的：

□□蜀魂路难行，

解喻伯劳处吾情，

东□流人归不得，

年年新筱为谁生。

谢稚柳君寓蜀种新竹一丛，饲伯劳一只，写图为咏。潘伯鹰兄携来索题率赋二诗，录其一以应

蔚原世仁兄雅命

已丑夏张伯驹（印章）

待到任之先生补题，好似已经换了天地：

莫道阴霾冻不开，

天心终盼一阳回。

闭门忍□千家哭，

袖手何曾万念灰。

只□投鞭平黑水，

坐愁抱蔓到□□。

邻翁走告军符急，

夜半搜床里正来。

蔚原老兄 哂正

黄炎培写二年前旧稿

一九四九年三月北平

时北平解放甫逾两月 此诗巧作于国共和谈破裂之时

（6）离渝

4月1日，张东荪应邀到成都，在南迁的燕大分校发表演讲：谈时局，谈民主政治。当时正读四年级主修新闻副修历史的唐振常，在1993年，"怀着极为复杂感情"，写了一篇"语焉不详"的"记微"， 谈到张教授"丝毫没有讲哲学，也没有发挥他研究有素的民主学说"，只"分析中国出路何在，中心不外反内战、争取民主"，其"踌躇满志昂扬奋发之气，我们学生听了，深受鼓舞"。57

出面作邀请的燕大学生自治会，按照当时习俗，献上一册以毛笔书写献辞、有师生众人亲笔签名的册子《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欢迎张东荪先生莅蓉大会纪念册》：

我们热烈欢迎着你--张东荪先生，我们虔诚地崇敬着你--张东荪先生。无论作为你的学生的学生，或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我们都应献出无比的热情来接待你，像迎接太阳神阿波罗一样。

因为你曾耗去了和中华民国一样长的岁月在为民主奔走；因为你曾为中国思想界立下民主哲学的根基；因为你曾独具慧眼地看出抗战就是争取民主这一条路线；因为你曾经领导着无数青年走上抗击法西斯统治者的路途……而更因为你曾夜以继日地呼吁国内民主和平，使政协会有着莫大的成就，把中国引上了一条和平建设的大道。

当有一天法西斯残余完全被消灭的时候，在我们念起奔走民主和平的战士的名字时，第一个我们就要念起你。但我们从来不敢推委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永远和你走在一起。你献身民主，奋斗三十五年，我们要和你一起延续下去，直到民主的大门为中国人民大大地打开。

我们和先生一样地从不惧怕任何的污蔑，我们也有着追求真理的反抗精神，我们绝不受谣言阴谋的欺骗，我们只知道要争取学术的自由，也就是要争取中国的民主。……我们用着这一些誓词来欢迎你--张东荪先生。你的言行都是我们的示范，你老当益壮为民主的努力，使我们比以前更加振奋。因此，我们要和你紧紧拉在一起。

三十五年四月成都燕大

（唐振常等二百多名学生及教师签名）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一日 成都燕京大学大礼堂

几乎就在这前后，3月15日的延安，毛泽东以大病初愈之体，58出席政治局会议，为后世留下了《政治局会议上的四条分析》一文。在这篇分析中，出现一个历史寿命颇为短暂的新概念"和苏和共派"--不知是他自创还是从"远方"趸来。其中第三条：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内有两部分民主势力，就是广大的人民及资产阶级内部的和苏和共派。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广大的人民极大地提高了觉悟，能够积极地反对反苏反共的反革命活动和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英、美、法、中的资产阶级和德、意、日的资产阶级正分裂为两大集团，今后还要继续分裂，成为反苏反共与和苏和共两大派。过去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曾经是打倒法西斯主力军的重要条件（如果只有张伯伦没有丘吉尔，只有汪精卫没有蒋介石，就打倒不了法西斯），现在的继续分裂必将起着新的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促进他们的这种分裂。

资产阶级和苏和共派又包括两部分人：资产阶级的中派和左派，如蒋介石就是中派。他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是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是如果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而左派则和蒋介石不同，如张东荪等人。

这则讲话 ，引自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对上文中之粗体部分已尽行删去。在政协闭幕不久的1946年春，蒋中正荣获"中派"，张东荪则给派为"左派"--不提沈钧儒，不提谈黄炎培，只提他一个人。这或许可视为两年与四年后本书主人公大起大落命运之序曲？

但张东荪究竟做了什么，使得毛有这样的讲话？联系唐振常所记忆的东荪先生"热得很"；"慷慨激烈，多豪爽之语、满斗争之词"--估计是政协前后、内战开打之际，他对专制政府的不假辞色和实际战斗力，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毛当时并不在重庆，此印象，应是出于时时向延安报告的与会共产党代表，具体说，就是周恩来。望读者记住这一被历来研究者所忽视的细节，并对照总理周公到了1953年和1973年对张东

荪的"关照"（这我们在后边要讲到）。政治家的多重人格和他们内心的痛苦，或可瞥见一二。

如果将此与光未然光复之后回到北平的记忆对照着读，几可为毛的短命新概念作注脚：

我一见到徐冰，就说："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了，我是直奔解放区的，你赶快派我到张家口去。"他说："我可不能当家，你是归恩来同志管的（1940年以来，我的组织关系一直与恩来联系。）"然后他马上打电话给在重庆的周恩来。

第二天他来找我说："不行，恩来同志说北平正缺人来打开局面，让你就留在这里。"当时北平有张东荪、张申府、吴晗、曾昭抡、张恨水、马彦祥、盛家伦等一批党外人士，但徐冰的身份不宜跟他们多接触（他是中美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与美方、蒋方代表同住北京饭店），我对文化界熟悉，正好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这样我在北平就留下来了。59

快成自己同志了！作为后世读史人，我们已经清楚，到此刻，毛看得很准。可惜他看到的，只是我们的主人公对专制的愤恨和斗争，而没有悟出（或者说在政客层次上无由悟出），这愤恨实出于法理，并不看那专制属于袁记、蒋记抑或毛记--当然也低估了这名抗专斗士对名利的抵御力。

3 制宪国大

"制宪国大"--这一中国走出军政、训政，开始踏上宪政之途的标志性成果，本应在政协闭幕的三个月后（1946年春）即召开，却是一推再推，直推到深秋（1946年11月）。开虽开了，却为共产党和民盟冠以"伪"而峻拒。而我们今天可以看清楚的是，所有台面上的讨债还债、成功失败，全是战局发展的反映。

从光复到再度大规模开打，国共间战局大致经过了这么几个阶段：

"8·15"至"1·13"（光复至停战协议生效）

此阶段，政府在道义和协议〈雅尔塔、中苏）上占优势，共产党则依仗地利，抢占了东北和华北不少地盘。

"1·13"至"3·12"（停战至苏军撤离沈阳）

大面上停战，美军介入调处。

获得美国装备的国军，被运送到东北。

"3·12"至"10·11"（苏军撤离沈阳至国军攻下张家口）

苏联在"反苏"声浪中撤军；将日军物资留给共军，允许并鼓励它大打。

美援和军事装备到手。国军一路进攻、全面收复。

看出来了吧？这就是全世界都在恢复，唯中国之内战能以空前规模大打三年的秘密所在--处于同一时代，与这两强完全相反的，则是王云五的"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60

前两个阶段，张东荪都在重庆协商的第一线。到两边分别获得美苏支持，以必得之心再度大打之时，他已经回到北平--日后"第三方面"在南京、上海的努力与挣扎，他没有参与。

张家此时已经迁回燕大燕东园。因为民盟属于"过了明路"，华北总组主委张东荪在北平与中共人士的交往，已经不必通过"地工"。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华北总支部委员叶笃义回忆，一次民盟几个人在一个地方开

会，徐冰走了进去。张东荪把所有的人一一介绍给他。首席代表叶剑英也抓住时机，宴请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专家、知识分子，场上"气氛热烈"。61

政府那边也没闲着。与1949年以后当政者对"人大"的操作相类，那时候政府对国大代表的控制62也不手软。4月中旬，北平市组成"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连续举行"北平市国大代表选举问题座谈会"，会员们分头执函家访，把社会名流聘为顾问。张东荪自然难逃网罗。63

10月11日，国军拿下张家口，也即我们后世熟知的、出自梁漱溟之口的"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国府随即决定"如期召开"国大（即一个月后的11月12日），共产党和民盟合起来究竟占十三席还是十四席，依旧僵在那里。

这局面，早在政协刚刚闭幕的时候，确曾打算参加政府的共产党不仅料到，而且已经下手策应。据蒋匀田记载，2月初，陶行知请蒋匀田到他公馆午饭。到达时，主人迎到门口说：周恩来、董必武两先生有事与你面商，他们早已到了。周恩来对蒋匀田说：

政协前日已算圆满闭幕，证明只要我们合作，总可闯过难关，以建国利民。现余问题，为起草宪法，已由君劢先生执笔，我们两方面每晚在民盟总部商妥，次日提交宪草审议会，谅无多大问题。其余为改组政府问题、国府委员人数问题，尚待与国民党协商。唯对于我们两方面言，人选问题，最为重要。我们两方须多选敢言之人为国府委员。不然，对蒋主席不能当面直言、明辨是非利害，唯有一味奉承，有何用处呢？希望君劢先生与东荪先生都能参加国府委员会。两位张先生都可说是能言敢言之人，在蒋主席领导的国府委员会中，需要他们一同担任国府委员。

蒋匀田感谢"恩来兄"的好意，"但恐敝党摊不到两席国府委员。"周恩来立即回答说："假使两位张先生均愿意担任国府委员，贵党如分不到两席，我们让一席给你们。"

蒋匀田表示谢意，答允竭诚奉劝两张，并问："毛先生是否参加国府委员会呢？"周答："只要君勋先生参加，他一定参加。"蒋问："毛先生在延安，如何每周到南京出席会议呢？"周答："待国府改组成功，毛先生即迁移住于扬州。该城为新四军总部所在地，距南京甚近，开会即乘汽车赴会，会罢即返回扬州，想无不便。"蒋匀田接着问："阁下与董必老参加

国府否？"周说，董必老可能参加国府，他个人拟参加改组后的行政院，兼任农林部长。并劝蒋匀田最好也参加行政院，向国民党索取教育部，因为据周估计，它是绝对不肯将教育部让给共产党人担任的。

蒋匀田当时的感觉：中共不但决心参加改组后的政府，而且已定出深思远虑的计划，以除却一党训政，造成多党平衡的力量，走上和平民主建国的途径。64

蒋匀田日后撰文说：

此一秘密，我当时除告之东荪先生外，未向任何人言之。君劢先生之得任国府委员，似可预定，所以我也未向他报告周之建议与允诺。65

到3月间，周恩来与张澜商定，十四个席位，民盟要几个都可以商量，我们共产党没有问题，民盟的团结要紧。最后，经过讨论，民盟提出国府委员七名：张澜、黄炎培、张君劢、沈钧儒、张东荪、梁漱溟、章伯钧。

然而不到半年，局势已然大变。

武器和钱全部到手，地盘占得愈来愈多，再用不着对动辄"民主"的老美陪小心--国府态度愈见强硬，"设十四席"绝无商量余地，"一党包办"（中共中央发言人廖承志语）的制宪国大也不再延期：11月12日召开。

共产党当然"坚决不参加"，但一直留在南京联络"第三方面"、谨防最坏的、也即国民党最期望的局面发生：把别人都招过去、场外头就剩共产党一家。

这都是面上的，暗地里，也可说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密电来密电去的战场指挥。半年来丢了不少地盘、暂时处于劣势的共产党正闷使劲："只要能大量歼敌，先打九十四军或五十三军再打十六军也好，你们应争取每月歼敌两个旅左右，三至四个月歼敌六个旅左右不是不可能的。……"66另一边呢？蒋介石已经制定了总兵力十五万、飞机九十四架，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的作战计划。胡宗南和他的校长确信，区区延安指日可下--确实"下"了、一座空城而已。到胡长官贴身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的故事可以公开讲述，已是十多年之后。

美籍学者林毓生曾有过一个论断：中国现代两个大独裁者虽然仅十

多岁之差，文化底色与行事手段尚有区别。一属极右集权，一是极左极权。前者手段有限，没有能力如共产党那样鼓动理想与正义，只要有所需，任什么组织、什么党、都鼓弄得出来，比如民建、民促、九三、小民革之类--用人家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领导下，在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作下产生、成长和发展起来的"。67为避免美英等最反感的"一党独裁"局面，同时混个"舆论支持"，国府也在努力拉拢政协参政党派。无奈交易所出身的委员长除送钱、许官以外，不大在行其他。1946年底这关键时刻，面对着民间一流角色，派不上用场。

11月中旬，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召开记者招待会，为和平作出最后建议：他认为为达此目标所存最后的希望，是组建一个对国共双方均有约束力的"八人委员会"。他提出一个他自认为立论比较公正的人的名单：共产党里边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国民党中的张群和邵力子；而张东荪、张伯纯、李璜、莫德惠代表第三方面。68可惜此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根本原因，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别说在南京、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难道有对"国共双方"（更确切地说是蒋毛二人）有约束力的什么机构或者人物吗？

本来，青年党与民社党都曾表示与民盟一致行动，不料一封由李璜、张君劢牵头争取国大召开再延期（一个月）以换得政府改组、最后大家（起码第三方面）都参加（而且郑重签了名）的"进呈蒋委员长"信，引起中共坚决反弹（未曾与之商议在先）。周恩来已然不顾言辞技巧："现在国民党要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用心是把中共踢开。现在有人要去跳火坑、进'国大'。我们愿意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69与周公走得最近的沈、章、张（申府）立刻抹掉自己署在信上的名字。70左舜生对此嗤之以鼻："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反促他断然宣布："我们青年党参加（国大），我自己也参加。"

虽然因为涂抹而没有正式进呈，蒋介石答应延期"三天"（而非一个月）。

民盟在南京的诸位举棋不定。共产党再度动作，暂代梁漱溟为秘书长的周新民（中共党员）请张澜从四川打来长途："参加不得呀！""政协议程全部完成之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民盟遂作出决断："国大开会前应完成政协各项手续，未完成前，绝不参加。"

虽然愈来愈看不惯民盟事事与共产党商量，对参加与否，张君劢仍说须待民社党内部讨论之后。而讨论，谁都知道，是努力劝说北方诸"大佬"。

此情，当时即有人论说：

国共两党的争衡，是棋逢对手不相上下。可是在他们争衡的天平以外，依然堆着一堆大大小小的砝码，即所谓第三方面，待他们争取与运用。这一堆砝码，愈拿愈小，而价值也愈大，最后最小的缺码，必定是一个决定的砝码。71

10月底，在民社党参加与否的关键时刻，张东荪、梁秋水曾飞上海，力阻刚刚完成（国社、民宪两党）合并的民社党参加。主要理由是，对专制者的制衡，不在一纸宪法，而在社会对抗力量的存在。据蒋匀田回忆，张东荪先生听完他叙述君劢先生所面临艰难后，甚慨然地说：

你所叙述的往事，我都知道，所以我对君劢现在所存之复杂心理设想，虽不敢苟同，然确能予以原谅。不过事关国家前途，不应只因困于个人成败心理，以定最后之计。

蒋匀田又提起蒋介石已经认识到1945年底在重庆宴请他们三位张先生时，对张东荪智慧的建议未予理会，而铸成今日局面。他或许愿意在这样关头再听听意见。蒋匀田说："老师若肯赴宁与蒋面谈，恳劝他缓开国大，因那节往事，或可幸邀其考虑，甚至接受，也未可知。"

这建议得到张东荪首肯。张君劢也促他一定前去。蒋匀田立刻赴南京请雷震安排，又返回上海陪同张东荪一同前往。历史的巧合--或日不巧--当他们到达时，原先安排好的"个人面谈"变成了"茶话招待"。据蒋匀田等回忆：蒋主席虽亲到现场与东荪先生握话，并劝东荪先生不必回北平，说将要改组政府，希望张能参加。张东荪则表示：那样一来，就要失去介入和谈的身份，一再劝蒋"不忙改组政府，先恢复和谈"。蒋匀田认为，"在会众人多的场面，商谈政事的机会实无，使东荪先生甚为失意"72--他难道没有参悟透，战场上之全赢在即，蒋介石会听人劝和么？

张东荪从南京直接回到北平，没有再回上海。

11月15日，国大开幕（预备会议。第一次正式会议要到十天之后）。青年党交出了参会一百人名单--就剩下民社党了。

张君劢做出最后努力，派孙宝刚（民社党中常委）专程带信到北平，力促张东荪到南京，召开民社党会议，最后定盘。此情为周恩来得悉。他立刻通知同为民社党的叶笃义。叶日后回忆周当时对他说：

你为什么不去呢？假如你不去，叫孙宝刚一个人去，张东荪就非常有可能来南京。张君劢的民社党参加国大是肯定的了，何必再拖一个张东荪下水呢？你去北平可以作一点张东荪的工作嘛。

叶笃义当时虽为二张所在之民盟盟员，但心已经另有所属。他回忆道：

我听了这个话之后马上去找张君劢，表示愿意前往。张君劢非常高兴，以为我转变了立场，而没有料到我去拆他的台。临行前，蒋匀田对我说："东荪先生对参加政府作教育部长可能有兴趣吧？"

叶、孙二人乘同一架机到北平，约定第二天一道去燕京大学见张东荪。降落后，孙搭乘民航汽车进城，叶枉称到附近看亲戚，实则一个人先到了燕大。据叶披露，"我对他介绍了南京的局势，叫他万万不能去南京"。叶笃义说：就这样，我和孙宝刚第二天去见张东荪的时候，张即表示不能去南京，并写了一封回信叫我带交张君劢。

在叶到北平的第二天，看到蒋介石直接打给张东荪的一封电报，再约他往南京参加国大。张东荪覆电推说有病不能离开，待到燕大放寒假可能到京沪去看他。据叶记载，覆电最后本有一句，说假如国大能通过一部比较民主的宪法，中共虽不参加亦必拥护。叶笃义提醒他绝不能这样讲，因为无论通过什么，都是由"非法的、违反政协决议"的大会做出的。张东荪恍然，马上叫儿子乘汽车到电报局，把最后一句删掉了。73 如果此段记忆属实，只说明在那时节，张东荪对双方了解之浅--也可以看出，在许多场合，属于人性之悲剧的"理性对情感让步"。因为以他一贯的观点，党治之下行宪，原理逻辑上是说不通的。74

这局面，当时的燕大学生陈尉有如下记载：

……政府索性全盘露骨地破坏政协而在是年12月里，召开请客式的国民大会了。在这个大会里，青年党当然是很乐意参加的，但民社党却不能这样，因为有许多有眼先、有骨气的人在，张东荪先生便是一个。当时民社党在党魁张君劢主持之下通过了《政府保证通过张君劢所体民主宪章》而有条件地参加"国大"的议决案后，就派孙宝刚专机去说动该党

的北方领袖张东荪和梁秋水诸先生（因为他们实际还不知道民社党已在张君劢主持下通过了有条件参加国大的议案这件事），要求他们亲自出席"国大"，一方面蒋主席也在半夜里打了一个电报给张先生等催驾，并且还派了专机去接他们。

对于这，是张先生立身处世得到北方青年的信仰的第二次的大考验了。在一天早晨，张先生的房门口来了十几个燕大的学生，他们特地来探问张先生要不要参加"国大"，他就给了他们这个肯定的回答："你们放心，我绝不会使你们青年人失望的，我绝不参加'国大'，我很忙，有功夫再谈吧。"

这时候，在这个哲学家的房里正坐着民社党派来的磋商出席"国大"的大员。而对于蒋主席的电催，他也给了"燕京课忙，不克分身"的电报回绝。75

化名陈尉的作者如果属于北平地下党学委系统，对亲负恩来先生之托的叶笃义之行，显然不知情。同样，"得到北方青年同情与支持"的张东荪也不知道，他对民生的关注、对专制的反抗，已然纳入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战略策划之中。毛泽东在评价国统区学生运动时断言：

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76

对此，《中共中央关于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针的指示》说得就更清楚了：

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从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77

事实上，第三天，叶笃义已经带着东荪交君劢的信回南京。信里有这样决绝的话："民社党交出名单之日，即我事实上脱离民社党之时。"据叶笃义记载，张还写了一封信直接寄给张公权，提到"君劢四十年声名不易得，望友以全之"。78

在这前后，回燕京过圣诞节的司徒雷登也是一下飞机就找张东荪，说国大就要开了，要他参加。以司徒识人之本领，对他亲自聘任的这位

系主任，应该说有相当了解。他很诧异为什么民盟会同共产党这么近；更替他的朋友蒋介石惋惜，认为蒋不懂得怎么尊敬和联络这批人。

张家后人对这一时期的回忆要简单得多：决定不出席国大后，曾有人在家里的门上画了一支手枪。

陈尉的文章写到张教授的感受：

现在张东荪先生仍旧以私人的资格参加在民主同盟里，并且还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他将不断地为着中国的民主奋斗，一直到中国实现了他的希望为止。那时候，他也许就会再回到书房里去研究他的哲学和以全副精力负起教育青年的责任。因为他曾经说过："今后士大夫的出路必须大改，我以为只有两途。其一是教育为终身职业……另一个是与农打成一片……"（《理性与民主》）

他以后一定更全力以赴地走第一条路，因为他就是现在也还是不肯完全脱离燕大的教书工作。在学校里，他与学生和同事们都相处的很好，但司徒雷登校长常说："张东荪什么都好，教书教得好，同事间处得好，只是反对政府这一点有点……"。是的，谁叫这个国家弄得这个样子的呢？否则张先生也许根本就不会走出书房一步的。79

大局已定。决定19日返回延安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最后在梅园新村招待民盟战友（11月16日）。到场诸位共誓："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共进共退"--有如易水之畔的诀别。回到延安之后，周做了一个《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之报告（12月18日）：

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民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人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80

就在这天（11月19日），蒋介石在官邸设晚宴款待民社党主席张君劢。君劢先生面带倦容，杯盏之中，向蒋交出民社党参加"制宪国大"的人员名单（共四十人，没有他本人），以及一封"民主社会党组织委员会主席张君劢致书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信，恳劝"彻底实行停战命令，实现政协决议之精神"。据记载，蒋介石喜不自禁，命令立即交由各大报纸发表。蒋总裁也在第二天函覆民社党主席张君劢：中共问题以政治方法解决，政协宪草各方应负责通过。

对此，据蒋匀田回忆，张东荪认为：

中共不参加，纵能照政协宪草通过，未有制衡的政党力量，亦未必能实行所通过之宪法，而有补于和平建国。况政协闭幕时，蒋主席对政协宪草之采仿内阁制，及对无形国大选举总统之规定，皆极表不满，此更不应忘怀。综其过去往事，不知有多少诺言，皆未实行，一封交换保证信，81即可据以为凭吗？未免太天真了！82

当时张东荪先生这番争论，无人可以据理反驳。

进入12月，张公权还曾亲赴北平，苦劝张东荪、胡海门、梁秋水等。到此时，坚持不可参加的，只剩下张教授一人。

有趣的是，对这一大家起哄、纷纷下场拉人的局面，与张东荪共同见识者，居然只剩下政府阵营里的张群—人。他曾经问范朴斋：

"民社党在民盟里有多少人？"

"只有二十个人，但很可能有一半人因为不同意参加国大而退出。"

"使得第三者都入混水，将来连一个转圆的人都没有，这是呆笨牛的做法。"83

"中间势力"分别倒向极右与极左两大集权集团。12月24日，对参加国大的民社党，民盟发布"难碍在盟内继续合作"；民社党遂于第二天宣布退出，张东荪以个人资格留在民盟。订交四十年、情同兄弟的二张从此分道扬标，直到流寓海外的君劢，在七十九岁时，伏案书写《东荪先生八十寿序》。

"民盟跟着共产党走"局面已成，东荪历史地厕身其间。欣欣然，愤愤然，抑或凄凄然？作为"最后的砝码"，张东荪的决定，更加深了他在毛心目中的定位："资产阶级和苏和共左派"--形势逼人，一线权势人物只要行动。至于行动背后之哲理，或许不重要；或许到时候再说。

从此，在共产党与民盟的话语里，民国成来以来第一次有点样子的国民大会，变成"伪国大"、"伪宪法"。民、青两党和执政的国民党，则在骂声和质疑声，外加华北、淮北不曾断过的枪炮声中，"一读"、"二读"、"三读"，切磋制宪。

平心而论，传统专制千年的中国要么别提宪法，若立志以宪法规范行为，这还真是历来最好的一部--即使以今天的标准看。比如第八十条规定："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以及第二十八条："官吏不得当选为国大代表。"（后经蒋主席提请，修改为："现任官吏不得在所在选举区当选为国大代表。"）

但是，中国的事，一旦运行起来，不仅宪法莫奈何，新政府面对老权贵，也无法运转。比如张群派蒋匀田查究"抗战胜利后，国库存有九亿多美元，何以宋子文长行政院不过一年，交卸时只剩下一亿挂零"--用到哪里去了？政府接收十七万栋"敌产房屋"，落到哪些人手里？民众不满爆发的时候，当局拿出的办法，也只是镇压--台湾"二二八惨案"（枪杀平民上万人）就是在这时候发生的。

与当局决裂的共产党，这阶段也没闲着。除了继续扩大地盘，12月，延安决定"彻底复查土地改革"，将地主的田地、房舍、财产等，分给"贫雇农"。接着颁布《土地法大纲》--扩军运动开始。否则，四平保卫战这类仗可怎么打？84

在近乎入格侮辱的"八上庐山"之后，马歇尔宣布退出国共调处，返国接任国务卿新任。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已不抱希望：让其"自生自灭"吧--除非能按它自己的办法解决共产党。

什么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么？蒋介石告诉马歇尔：共军将在八至十个月内被歼。共产党则宣布：已在各处前线先发制人，六个月内粉碎政府军事攻势，武力恢复1月13日的地位--最为可耻复可悲的国人相残阴云，笼罩着饱受战争摧残、等待喘息的大地。

民盟怎么办？

张东荪、施复亮诸人坚持主张中国应有一个"第三方面力量"，包括所有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而"民盟应成为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协力推动民主运动的公共组织"，"居于国共之间"，"取得举足轻重的独立地位。"85

但马叙伦认为，不应该再出现什么"第三方面"："争取民主的眼前阶段上、只有民主和反民主两方面，不容许有第三方面"；"止前反民主的正

在用巧妙的手段或硬或软地欺骗或强制来和缓民主斗争、以维护独裁政权。我们该坚定立场，明白没有调停两可的余地……"；第三方面"或者是被人利用的，或者是帮助反民主的忙的奸细，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愿意再有这种事实出现，而且不愿意在民主斗争里再听到这个名词"。86马叙伦日后荣任"新中国"教育部、高教部部长（读者应记得这是国共两边多么看重的位置），背书复背书，连走台阶都曾荣经毛泽东搀扶，就很不偶然了。

年底，本着主人公从北平南下抵沪。1947年1月6日，大家聚到章伯钧寓所，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召开，作出左倾反蒋的重大决定（虽则语言仍是"坚持政协路线，调解国共冲突，恢复和谈"），张东荪当选为民盟中央秘书处主任（即秘书长）。

刚过去的、几乎将处于一线之第三方面诸位的智慧、情感与精力用尽的"调停"，张东荪并未亲尝。也就是说，在如此不堪之僵局下，还有胆气再度领衔卷进和谈的，也就剩他了。或许这就是"知其不可为为之"？半年前，就在他的诸老友几近受辱般地苦旋于国共两造间，他回想起一桩往事：

国民党北伐以前的二三年，我曾访梁任公于协和医院。彼时他正要施行手术。我向之进言谓文化运动未有不含政治改革者，故仅文化运动是不够的。他告诉我，他之所以不愿再谈政治就是对于民主完全提不起信仰来了。我听了只好唯唯而退。到了今天回想起来，实在不能不引为中国之一大损失。

中国之始终未能走上民主轨道，可以说就因为没有人肯作民主主义之殉道者。必须有人和迷信财神与送子观音那样，不恤徒步登山，数夜不睡，以迷信于民主主义，则民主方会发生力量。环顾海内，这个天赋的天命应该降在梁先生身上，他竟未曾担起，岂不可惜。87

作为新晋的民盟秘书处主任，不得不与各方接纳。他曾在上海见共产党留下的代表董必武；又接受张君劢建议到南京去见蒋介石（作为国大之前那次推病拒绝邀请的回答）。他的这次南京行由张群安排，叶笃义陪同前往。

据叶笃义回忆，在与蒋的会面中，蒋告诉张教授说将要改组政府，希望张能参加。张东荪回答说那样一来，他就失去了参加和谈的身份，并劝蒋不忙改组而是首先恢复和谈。蒋介石没有同意。也是这次，已经

在南京大使位置上的司徒雷登曾邀请张东荪午饭，叶笃义陪同前往。张首先向司徒介绍了与蒋见面的情况，并说在离开北平之前曾同北平的中共领导人见过面，已告诉他们将要到南京见蒋并尽力恢复和谈。他说中共方面同意这样，同时劝司徒也对蒋介石做同样的劝告。司徒唯唯否否，说劝蒋不先改组政府而恢复和谈，恐怕不大可能。说将来和谈的时候，希望张再来南京继续合作。88

南京勾留三四天后，东荪回到上海，住在永嘉路集益里八号张澜公馆。即使在那样的动荡中，还有由何公敢发起，张东荪领衔创办《展望》之举。参加的人除张何二位，还有章乃器、施复亮、张云川、罗涵先、叶笃义等。章氏称他们的立场为"左不盲从，右不落水"。该刊只出了两期，因经费无着而停刊。

离南京前，沈钧儒赠诗一首：

春光惨淡旧京城，

桃李无言鴃舌鸣，

千百莘莘其仰首，

九天云感见先生。

如此烟尘拨不开，

满街缇骑向人埋，

有怀诸友多珍重，

清议今朝在草莱。

东荪先生将返平索书赋赠三十六年二月钧儒

回到北平，因为和谈即将破裂，调处执行部北京小组也决定撤离了。叶剑英、徐冰请民盟人员参加"座谈会"（孟用潜语），谈局势，和告别酒会。张东荪参加并讲话。89

这年7月，在魏德迈到中国"调查"的时候，他第三次南下赴宁，见这人见那人，斡旋这、呼吁那，在近乎绝望之下，竭力避免可耻的国人自相残杀。这局面，张教授自己回忆说：

即在政协失败以后，我一个人还奔走宁沪几次，想谋挽回，不外乎想忠告国民党把这个幻想收起来吧，拿出真正的良心来以谋合作，因为破裂的结果，我们早知道国民党并不能得到便宜。几次谈话的结果使我知道他们永远不会有觉悟，于是我乃认定中国非经过一个最悲惨的时期不可了。90

他没有提到在这前后还曾卷进过一场可谓空耗精神的无谓之争：遭民社党开除，被革新派怂恿另组独立民社党之类。虽然作为民社党顾问，他也说过诸如"应把握政治路线，不能见异思迁，投机取巧。……此时代之诱惑性大，尤须注意。党员应对党尽义务，而不能希望由党而猎取地位。应避免党内有派，此乃政党扩大常有之病象，应慎之于始创立民主作风"等等，91但总显得十分隔膜，乃至痛苦。

这境况，也部分反映在民盟遭政府查禁而被迫宣布自动解散之时。尽管北平盟员讨论对策的会是在张家开的，他却怎么都打不起精神。振衣投袂的吴晗坚决反对解散，责无旁贷地领导北平委员会转入了地下，还通过徐冰撤离之前提供的收听机，收听解放区广播、油印散发。

局势如此，人们心底尚存的一息热气总难消逝殆尽。从春到夏，作为当时"无人不识"的"革命学者"东荪先生，频频撰文，并一次次受平、津、沪学生邀请，谈南行见闻，谈世界政局，谈哲学家职实，论政治斗争，谈中国民族的良心。

这期间，曾有一名军人带来一幅图卷《林屋山民送米图》到燕东园拜望并索题。来人即是图卷所述故事主角太湖林屋山暴方子之孙暴春霆。那图卷么，则不仅有清末俞樾、吴昌硕等题咏，更有今人胡适、俞平伯、冯友兰、徐悲鸿等题记（包括重绘）。据其时正服役于傅作义部队暴春霆君本人对他这次的往访记述：

张在全国解放前是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华北的负责人。他当时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孤行，残酷压榨，因而招致蒋在北平的特务组织的迫害。特务曾数次纠集人众到燕京大学附近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张东荪"口号。有一次在游行时把张先生住宅的玻璃全砸破了。

我对张先生能站在民众立场与强权斗争的精神异常钦佩，于是带着这卷《送米图》前往燕京大学，请他题词。和他见了面，才知道他是位五十多岁的瘦弱学者。我到了他的会客室，他让我坐在沙发上和他谈话。室内还有几把沙发他偏不坐，却双手拿着《送米图》坐在地下，倚

着墙壁，仔细观看。他的夫人也不坐沙发，偏坐在楼梯的最上层，拿着一杆水烟袋，吸得咕噜咕噜，还能从鼻孔内冒烟。此情此景好似一幅幽默图画。

当时《送来图》中还夹着俞曲园在我祖父撤职后给他的一封信，其中有"今之官场无是非可言"。这句话引起了张先生大发议论。他拿起笔来就写：

暴君春霆以友人朱孟实之介，访余于燕园，出示秦散之所绘馈米图嘱题。馈米图者，纪春霆先人暴方子先生却职甪头巡检后，贫不能举炊，村民集米馈赠之事也。余既不能诗，频年以来又习为语体文，顾春霆盛意则亦不敢却，不得已书读后感，固知不足以当跋也。

方子先生在吴县甪头时，常与曲园老人往还。其去官后犹得曲园函札，谓今之官场无是非可言。其时距清之亡不过十余年，然即此一语已足证清之必亡矣。窃尝读史，每当革命之起，其前必有一黑暗时期，无是非，无赏罚，固不仅贪婪无能而已。方子先生清廉自守，宜其被劾。语云："礼失求诸野。"黑暗时代，是非美恶之辨，只在人民。故一人倡议馈米，各村皆起应之，是公理犹在人心也。此馈米图在春霆本以表彰先人品德，而吾以为大有历史价值。即此一事亦已足证清室之必亡。盖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辨，实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也。

春霆以是图遍索人题，余披览之余，感慨或与人不同。当清末季，岌岌可危，士大夫犹欲竭智荩忠以谋挽救，顾终无济，岂非以病已深入骨肓耶？则今日读此图，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廿七日，张东荪92

"窃尝读史，每当革命之起，其前必有一黑暗时期，无是非，无赏罚，固不仅贪婪无能而已。……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辨，赏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也。"书于1948年，似已预言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当钟叔河再度发掘并出版此送米图卷子，已是2002年，难道俞樾在辛卯（1891）、东荪在戊子（1948）所感慨之国势危殆，又见端倪？

此时已是1948年暮春。

注释

1、《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596。

2、"当时无统一检查机关，各自为战。宪兵、警察、图书检查会、市党部、便衣密探等都可以突然检查。"参见王大煜：《生活书店见闻》，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2期。

3、转引自温梓川：《"世人皆欲杀"的罗隆基》，载《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123。

4、孙晓华文编：《中国民主党派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5、同注1，页598。

6、原载《蕉风》（马来西亚），1967年第174期，转引自温梓川：《"世人皆欲杀"的罗隆基》，页123。

7、孙晓华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页137。

8、《中国社会团体与政治党派的调查与分析》，1938。

9、冯崇义：《第三道路世纪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回顾》，《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10月号，总第7期。

10、由于国军接防陕甘宁边区，中共本以作出"七参政员不出席"的决定。顷接国际（崔可夫）电报，希望中共出席，遂形成两个在渝参政员参会的局面。

11、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香港：友联出版社，1976），页83。

12、同注6。

13、李璜：《谈王造时与罗隆基》（下），《传记文学》，1981年，第39卷第3 期。

14、引自《解放日报》，1944年9月22日。转引自王渔：《林伯渠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

15、李锐：《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16、孙晓华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页383。

17、转引自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360。

18、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页16-17。

19、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我《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1061-1062。

20、张东荪：《中国之将来与近世文明国立国之原则》，《正谊》，第1卷第7号，1915年2月。

21、张树桐：《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央政府为什么叫人民政府，而不叫"联合政府"》，《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1期，页24-26。

22、电文："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这一意思，公开公布的，是《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文（8月9日）："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面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页1119。

23、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国共两军形势：国军远在千里之外，中共与东北地区的武装力量则近在咫尺。从1941年即拉到苏联整训（间或回来游击一番）的原东北抗联，此时也随苏军进入。关内的中共军队，准确知道的，是1945年8月14日"分三路急进东北"（翼热辽军区的三个军分区： 十四、十五、十六军分区）。据青石：20日，毛根据苏军进展情况，决定从华北各根据地抽调九个团，连同已在热河边境的几个团，配化相当数量的地方工作干部，限期开赴东北，并明确宣布部队的任务是："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中央甚至批准了华中局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并提议组织各大城市武装起义。毛泽东当天接连数电华中局，要求他们坚决彻底地执行起义方针，除发动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以外，还应迅速调派新四军有力部

队入城援助。他并且电示华北各区局，要他们效仿华中局的作法，到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也"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参见青石：《东北决战幕后》，《百年湖》，1998年4期。

24、1945年8月14日，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托洛夫在莫斯科签署。苏联保证在出兵三个月内将东北归还国民政府。代价是蒙古独立、中长铁路和大连港。

25、此即后来有名的"不许革命"："一九四五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说如果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参见青石：《斯大林"不许革命"！？》，《百年潮》，1998年第3期--而不过数月后，它已经从物质到精神，一个劲鼓动共产党大打：原来发现国民党已经一心投靠美国，已经不再似签约前那样低声下气的时候。

26、"时隔三日，国民政府宣布对日宽大，不索分文赔偿。如此要事，事前未与任何在野党领袖商议，未免使人惊异。"参见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页1。

27、8月30日民盟即发布与中共配合无间的《紧急呼吁》："由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包括产生在宪法政府成立以前的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

28、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页1。

29、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载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页444。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33。

31、蒋匀田，民盟"一大"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担任大会联络秘书。到台湾后，依旧任民社党领袖。七十年代在香港《中华月报》发表一系列参与国共和谈的文章，后由香港友联出版社结集成书，名为《中国近代史转折点》。书中对当时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梁漱溟、黄炎培、毛泽东、周恩来、孙科等，以亲历者身份描述。

同为亲历者的叶剑英读后，嘱人传话蒋匀田，谓该书："所言皆真"。1979年，"总统府国策顾问"、民社党主席蒋匀田和夫人到北京访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会见时表示欢迎他们回大陆探亲和参观访问。蒋回台湾后被民社党开除党籍、解除职务，史称"蒋匀田事件"。

32、参见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页541-557。

33、以上蒋匀田的回忆，引自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页2-5。

34、"统战"这一观念正式进入毛泽东运筹帷幄之八卦阵，正是始于这时。在共产党二十多年挣扎存活的历史中，与敌对者及中间地带力量的联合，开始于1935至1937年的"联蒋抗日"。在毛泽东取得党内绝对胜利之前，这一方面（包括城市工作--其实早期统战部与城工部没什么区别，1948年9月24日和2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电，"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一直由王明、刘少奇、周恩来掌控。正宗党史曾将"军队、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列为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

3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33。

36、毛泽东：《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年6月10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426。

37、引自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页6。

38、双方同时下达停战令，并规定至迟在13日午夜，双方军队要在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39、国民党八人（九减一），中共七人（九减二），青年党五人，民主同盟九人（无党派二人，民社党二人，救国会二人，职教社一人，村治派一人，第三党一人）；其他无党派代表（社会贤达）九人--由两党推选。

40、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页193。

41、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

42、蒋介石致开幕词：三原则（真诚坦白，树立民主楷模；大公无我，顾全国家利益；高瞻远瞩，正视国家前途）、四诺言（给人民自由权利；各党派平等合法；推行地方自治；释放政治犯）。

43、张东荪：《和平何以会死了》，《时与文》，第3期，1947年3月。

44、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页19-20。

45、此段引自国社党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此宣言为集体讨论，张东荪执笔，刊于《再生》创刊号，1932年。

46、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页23。

47、也即"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似乎体现在他对思想与言论的容纳，否则国民政府时期就不会有有理论、有著作而无行动的学者。但他所谓"政治"似乎并不包括"集会结社自由"。1946年政协国民党代表雷震，到台湾之后，办《自由中国》是可以的，但是，当雷先生"有意与台籍政治人物联合组织反对党的时候，蒋氏政权便立刻以执行戒严的手法把他抓起来，以叛乱罪处刑"。参见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台北：远流出版社，1984）。

48、张东荪：《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观察》，第3卷第7期，1947年10月。

49、见马勇：《梁漱溟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页296。该著述接着写到被中共政权定为敌人的二张："张君劢、张东荪二人只是口头说说，作个姿态而已......"--不知该书作者作此断语的依据。

5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页62-63。

51、这就是在后来几个月里争论不休，最后成为爆发点的"交不交（国府委员党派任选）名单"。四十天后，毛通知重庆中共代表团协调民盟，一致"不交名单"--如果蒋介石"执意修改宪法原则"。

52、3月7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检讨孙科之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发言热烈，反对"宪草修改原则"：认为国民大会权力不应受到约束；

还有主张惩处国民党八代表者。散会后一小时，就在距离会场仅一里之遥的党部办公地，国民党中央立即开会，开了三个小时。会上数人大哭，说政协协议（接受张君劢设计的内阁责任制），使国民党"什么都没了"。蒋介石说："姑且让它通过，将来（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

53、张东荪：《党的问题》，《再生》，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

54、这里"……"为属于自辱的检讨套话。事实上，在1952年，六十七岁的检讨者自己已经没有能力跟上新时代步伐写出套话。那些麻木自辱，原本就是他的子女为应付过关而替老父亲填上的（见手稿，以及著者对传主亲属的采访）。

55、此时是1946年2月。但正式"应马歇尔之请"出任，是在过完生日（6月24日）之后的十天。之前连傅泾波都不知道。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第二章。

56、转引自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页66。

57、唐振常：《张东荪先生记微》，载《半拙斋古今谈》（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页199。

58、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1945年"11月中旬—12月中旬因疲劳过度，患病住院。"1月7日，毛岸英与两名苏联医生抵达延安；1月28日复信柳亚子："一病数月……"；3月14日复洪禹信："……我这几个月来都在病中"。

59、张光年：《光未然脱险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60、《纽约时报》报道王云五访美标题，转引自王云五著，王学哲编：《岫庐八十自述（节录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页2。

61、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27。

62、"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控制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给他们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盖上合法的印章，他们就在蒋管区各地大搞一党包办的国大代表选举。同时强制推行其'公民宣誓'。北平的六十名国大代表候选人，就

是由社会局召集十六个区的区长开会派定的。他们并派出敌伪时期强令老百姓向敌人献铜献铁、尅扣配给物品，压迫人民的坊长们，拿着名册到处督催市民去履行'公民宣誓'。"参见沈勃等：《中山公园音乐堂事件的前前后后》，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十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页306。

63、此外还有曾昭抡、周鲸文、胡海门、何其巩等共十人：参见沈勃等：《中山公园音乐堂事件的前前后后》，页310。

64、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页50-51。

65、蒋匀田：《张君劢先生一生大事记》，《传记文学》（台湾），1969年第4期。

66、毛泽东1946年11月9日对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的指示。参见《毛法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149。

67、廖叶隆：《序言》，载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8、转引自艾恺著，郑大华等译：《梁漱溟传》（长沙：湖南出版社，1988），页330。

6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文献出版社、中央人民出版社，1990），页722。

70、张申府对此举的解释是："签名之后我们三人去见周恩来，他不同意这一举动，因而我们转回来把名字涂掉。"参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39。

71、《记民社党南北内讧》，载林天行编：《中国政治内幕》，第一辑（上海：南华出版社，1948），页33。

72、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页170。

73、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41-42。

74、张东荪：《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自由评论》，第1期，1935年11月。

75、陈尉：《革命学者张东荪》，《现代新闻》，1947年6月，第5期。

76、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224-1225。

77、《中央关于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针的指示》（1947年5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页454。

78、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41-42。

79、同注75。

8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710。

81、指张君劢与蒋介石互换保证信。为之奋斗多年，且亲自起草，张君劢、伍宪子等实在不愿失去这部宪法获得通过之大好机会，更不希望民社党就此分裂。张君劢为此与蒋介石交换"必令其通过"之私人信件，前者保证民社党出席国大；后者保证张"顿挫草成"的宪法获得通过。

82、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页169。

83、同注71。

84、参见张正隆：《雪白血红》（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85、《所望第三方面者》；《第三方面的组织问题》，《文汇报》。

86、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马叙伦政论文选》（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页299-301。

87、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88、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43。对此，张东荪在检讨时候说的与叶略有不同：在南京时，司徒请我去美国大使馆吃了一次饭。司徒告诉我说，美方态度，还是坚持和谈。当时我就不大相信。我在南京住了两天就回上海了。

89、《北京盟讯》，1981年第3期。

90　、张东荪：《日本投降三周年感言》，《中建》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48年9月。

91、转引自左玉河：《张东荪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页374。

92、《暴方子和林屋山民送米图》，《文史资料选辑》，总121辑。

第四章 猎猎红旗下

猎猎红旗下

草间做人语

如来佛掌中

鹃血变湖烟

一 翻脸

究竟为什么，在建政初始，在治安、市政、民生……都还没有走入正轨的时候，毛泽东就急不及待地发动文艺批判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这几项运动，比如院校改革跟抗美援朝；历史电影《武训传》跟大学教授的思想；还有涉及的完全是另一人群的"三反"、"五反"之间，又有什么交错、纠结的关系？

最早起步的是院校改革。这一决定，在毛泽东1950年初匆匆赴苏，为"繁荣强大的新中国"寻求支援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他怀着同志间的至诚，向斯大林汇报说：

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人占主要地位。……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我们已取得完全的成功。至于文化和经济，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摆脱外国的影响。1

既然经济制度全盘学习苏联，新的"社会主义大厦"所需的零件，当然也得按苏联模式车铣，即"按行业、按单一学科，大规模组建学院、培养人才，适应计划经济的要求"。2以此为目标，北京十多所名声卓著的综合大学开始一锅烩：北大和燕大的工科并入清华；清华和燕大的文、法、理及辅仁、浙大的人文学科并入北大；北大迁入燕京校园，成立文理科综合大学，清华变成多科系的工学院；辅仁、人大和燕京的教育专业并入北师大，辅仁大学取消……真乃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气派！能不如此么--从今以后，在贯彻中央决策的流水线上，效率与服从已经无障碍地摆到了第一位。3至于人文精神和突破思想窠臼的创新能力--这种让组织为难、给领导添乱的自由化行为，将毫不留情地丢进阴沟！

在这人心无日不怦怦然的1950年年初，张东荪怎么想呢？为适应经济形势而改革教育，他认为势在必行。早在1948年，他就曾力排众议，阐扬他对"计划经济"的期许--包括准备做出的奉献与牺牲：

中国为了增产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尤其必须采取进步的计划经济。但经济方面一有计划，势必不能让其他方面仍留为无政府状态的绝对自由。就中以教育一项而论，就不能不大加改变以与计划相配合。政治经济教育等全体如有了计划性，则我们今天放任惯了的人必会感到很不便。这一点恐怕我们在心理上应得准备自愿牺牲一些不入格的自由方

好。……须知在计划社会中，政治经济等是没有绝对自由了，但我们还不能不要绝对的自由。这个绝对的自由应该在文化与思想方面。如果社会因具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边。4

我们在后边会看到，统筹全部资财的政府，包括重新装配的大学，以及其教程、教材、党委和党支部，再加上随时派下的工作组甚至工宣队、军宣队……等等，留给期望文化自由的人，什么样"活泼的田地"。

就是这时候，1950年6月，"心比天高"的金日成，以其手中仅有的三个勉强拼凑的步兵师，挥戈南下，解放"被压迫同胞"。他的后盾斯大林在自己的冷战部署之下，为"避免苏联直接与美国冲突"，自然把"中国同志"推到前边。

6月以来，中苏之间、中共高层之间的紧急磋商，虽然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东荪却没有可能与闻。他依旧住在燕东园三十四号那座小楼里--这不是因为他任职政府而得的赏赐，从1937年燕东园教授区兴建，依照燕大当时的规定，他即以教授、系主任的资格入住。

毕竟没有了战火。春天，熊十力应邀"北上议事"，"到京后联络了一些老朋友，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在后人为他作的传里，列举了十多人，其中并无张东荪。5该书成于八十年代，可能作者还把"张东荪"三个字当作禁忌。当然也可能张家在西郊，有点儿远。著者不相信此时熊十力已经世故到故意不与自己撰写《新唯识论》时候的知交见面。这种"识时务"的政治姿态要到1957年之后才流行起来--一直流行到今天。更况且，在1950年，当东荪先生的瘦嫂尔田夫人仙逝时，对政坛人事最敏锐的郭沫若还曾登门吊唁。

暮春，张东荪投稿最多的《观察》杂志，兴冲冲地在"新中国"复刊之后，办到第十三期，不得不收刊了。在这十三期里，没有他一篇文字--而不过一两年前，在1947、1948年，他曾多么活跃！作为政论家、独立立场的民间发言人，虽然列居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高位，他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言论阵地。

当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等着他们的稿子，只不过没有了当初储安平将他列为特约撰稿人时候的倚重。这年头的发言，作者写的都是光荣地以喉舌自诩的报纸所需要的稿件，比如朱光潜的《自我检讨》（1949年11月27日）；费孝通的《我这一年》（1950年1月3

日）；冯友兰的《一年学习的总结》（1950年1月22日）……。张东荪一个字没有。

1950年夏天，金日成气冲牛斗，发布"八月底将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的命令。中国也在边境"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刚从连续十二年战祸中喘过一口气的中国，又要把自己的子弟往战场上送了--只为了老大哥心仪的"冷战"（我们现在已经清楚知道，这场战争，斯大林是非打不可，而且非由别人出面打不可）。

据叶笃义记忆，6月底美国刚一介入，梁漱溟就对他说："东荪先生准备面见毛主席，在外交上有所进言。"叶觉得事关重大，连忙跑去问，张说："我现在还不准备去见他，等到打一个时期打不下去的时候，我才去说。"6 --想来他们"英美自由主义背景"一批人，还不大知道自己在"打了天下"的老革命眼中的可憎地位。而对重大国策之制定，更没把共产党品透，还想着有可能据实力争，以说服当局放弃灾难性的"一面倒"。

他们没有看到这场战争所具有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为了"主义"，为了"大家庭"团结，区区平民百姓，军装一裹，发到战壕里，算什么？而更深的、不可明言、却实实在在起着作用的那层意思，则是"自己家里"（也就是"新中国"国内）的博弈：政务院委员十五名--民主人士九名，占60%；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九十三名--民主人士四十二名，占45%。好嘛。但谁当家？谁说了算？谁左右民意（即如今所谓的"掌握话语权"）？是你英美背景的资产阶级，还是我们人民大众？

9月初，匪夷所思的"炮轰天安门案件"侦破，在"美帝发动侵朝战争的严重形势"面前，曾经吃美国饭、与美国交好的大教授、大买办、大名流，随着民族战争的圣火升腾，再没了往日的神气。"美国"二字，从此从汉语里消失。提起太平洋对岸那个大国，无人不用"美帝"--而美国究竟有没有殖民地、有几个、占据了多久、其间有过多么大的争论和掂量，没人问，也没人敢问。

到了10月，要不要为苏联火中取栗，已经摆到每个为中国命运之决策"说得上话"的人的面前。在1950年10月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吃惊地发现，几乎所有的领导人--他的前袍泽与战友--都对立刻出兵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军方一致表示"对美作战没有把握"。此后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了：彭德怀被紧急从西北召回，在北京饭店的席梦思床（后来转到地毯）上辗转反侧一夜，最后"同意了老毛"。靠着他"不计战场伤亡"的一贯气魄，大度地承担起北方那个冷战主策划本该承担的责

任。

五十多年后，杨奎松在他扎实研究的基础上，点到了这一决策之要害：

1950年6月（在镇反问题上--著者按）毛泽东还极力劝告党内同志不要急躁，切忌四面出击。然而，几个月后，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人民军很快失利，中国方面不得不准备出兵，他马上就改变了此前对镇压反革命问题不甚积极的态度。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因此，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他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7

这是他登基前屡屡提及的"打扫房子"--抓住最有利时机，收拾内部"敌人"，虽然仅只"敌人"中的一部分。

这步棋，有几个人能看得出来？

我们的主人公在这前后专门见了一次周恩来。

为避免卷入这场战祸，从一开始，共和国大管家即艰难地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或阻止、或权变，对此，张东荪在尚许他们参加的会上，或许有所察觉。当然也可能仅凭直觉：一个明智的政治家此时应该有的最基本的判断。

周恩来最后的努力是在10月10日。当时赶往莫斯科的周报告毛，苏联不可能提供空军，只能提供飞机。周为此决定放弃直接出兵援助北朝鲜，仅接纳金日成到东北来成立流亡政府。不过三天后（10月13、14日）毛从北京电周，同意参战。"斯大林感去吧得掉下了眼泪。"8

10月21、23日两天，按照官方记载，周"邀谐郭沫若、马叙伦、章伯钧、王昆仑座谈抗美援朝问题，听取意见、问答问题。"记录明确说总理"指出一部分人中存在着亲美、崇美、恐美和对中朝两国力量占计不足的错误思想"。9多么微妙娴熟的运作！最期望"直谏"的"一部分人"不仅未蒙受邀，还明白地在党的好朋友面前获冠"错误思想"。想来周将这几位请来指出决策者最为讨嫌的张东荪一干人的"错误"，恐怕不仅仅依据中共历来习惯，以"听取意见"而实施"通报"。他须明确给出自己姿态，拉开与有美国背景的人的距离。为消解毛对自己的忌讳，还须如何在别的地方找补--比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东荪先生有十多年交往（如果从1938年

武汉面算起）的周公，从此刻（包括后来）表现得超乎寻常的峻刻外加鲜有的轻飘（这我们在后边将细细道来），与他历来为人有悖。暴露出的，正是他机敏政客而非诚朴学人的品质。

1950年秋天，随着百万中华男儿（"最可爱的人"）投入战场，"将美军赶回三八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年底公布了"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以及"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决定"，燕京大学已然不保。这些"决定"所涉及的人群，那些曾在燕园享受了自由的学术空气，以及优裕的生活待遇，包括对司徒校长及其办学方针由衷感佩的前师生员工立即"致电总理、发表宣言"，表态"坚决拥护支持"。10

张东荪应该已经察觉，此时的燕园，已经不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大学。前地下党员一一冒出地面，担任种种要职……当然已经不是当年怀着信赖与托付，与他秘密联络的那批团契青年。有理想而不谙权谋的一批人，到此刻使命已经完结，该有新面孔接手了。时值朝鲜战争，政府要求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对此，有人跟得上，有人跟不上。张东荪倒要看看，政府指令，能否把过去岁月全部印记，一瞬间抹去。

此时，外籍教授正一家一家地撤走，包括司徒曾经倚为左右手的爱将，包括那些以全部热诚支援、掩护进步学生的教授们。夏仁德是在1950年8月离开的--背负着"特嫌"的恶名。

不仅图书馆再不购进乔特的《复返于哲学》（C.E.M.Joad,Returu to Philosophy）等大部图书，张教授也已经没有可能自己订阅英国的《哲学季刊》（Philosophy）。中国对西方前沿学科的了解，到他的孙辈读书时，只限于《伟大的自然改造者米丘林》和《李森科的故事》了。现代西方哲学从此进入封冻期，进入人为的"强迫遗忘"。11到了九十年代中，大陆哲学专业的学生惊奇地发现，原来他们的太老师辈，早在二十年代就知道了柏格森、詹姆斯，还有倭伊铿、杜里舒。

1951年春天，电影《武训传》上映。

这是一部策划于战乱的四十年代，完成于建国之始的左翼电影。虽说编导和主演都来自国统区，但对共产党绝对衷心佩服。到制作的后期，政权已经易主。接到诸如"片尾须贴革命口号"之类命令，也勉为其难地顺从了。不料公演之后，如潮之好评还没推到高峰，毛泽东已经生气

了--生了很大的气。

他亲自动笔写社论：这是"歌颂"么？看"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12社论下面，赫然开列着"有问题"文章和作者名号--黑压压的一片。江青憋了那么多年，终于乘此大好形势走出居室，为英明领袖已经作出的结论前往一线证据。《武训历史调查记》经主席删定后公开发表，在"中国革命究竟靠武装斗争还是靠知识文化"这样重大的课题上，做出了不容置辩的结论。

这又为什么--不过一部电影嘛！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毛对这个问题给出回答："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13

张东荪不怎么看电影。对这场讨论，他可能相当不以为然。这帮"骂人党"在干什么？就算是一部坏电影，一部具有恶劣的思想倾向的作品，也有它或生或灭的权利。因为他坚信：

没有一个学说或思想不可以忍容。只要言之成理都应得加以承认；只讲正统派的思想而置其他思想于不顾，这不是文化的自由主义之精神。14

在文化自由上，根本无所谓"邪说"，亦不能有"一尊"，这都是属于常识范围的东西，也是他们经常在著述、在课堂、在讲演里边公开发布的观点。《武训传》究竟有多么荒谬与反动，是否如胡绳所说--《武训传》作者及其歌颂者，不过是借《武训传》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即与"武装起义的群众"争功，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的群众并驾齐驱的位置上"，15也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当然已经不可能著文细细驳析。但他没有感到什么吗，比如对打下了天下的共产党人？以前将他们仅仅看作奉"共产"为一种主义的民族战士，是不是过于乐观了？要知道，共产党如今摆出的这样一副面孔，以前大家一起反独裁、反内战的时候，可是不曾有过。那么，毛公究竟什么意思呢--嫌知识人对中共归附得不够彻底？

到了5月，梁漱溟顶不住了，写了一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全文十五节，对于自己1938年与毛的争论，作了一个检讨性结

语。完稿之后请林伯渠转毛指教。毛6月5日在文章底稿的末页写道：

此文最大缺点即在自己今天批判的话，还没有自己讲明过去如何用心思的话多。属文之时未尝不一再删节，而删节下来犹且如是，可见胸中求为人知之念，多于其自惭自悔之念。惭悔之心不切，检讨文字是不可能写得好的，容当另写一文发表，此稿只留存备查。16

没通过！不知这霸道的、一点面子不留的重磅批语，有没有在他们老朋友之间传阅。可惜梁漱溟不是冯友兰，也不是曹禺。毛再不满意，他自有他的原则："不能向不通处变"；不能"自昧其所知而从他人"--这样的态度，可能就是两年后那场著名公案的前奏了。

张东荪还是一个字不写。不仅检讨与"自斥"不写，赞扬伟大时代（如1951年7月党的三十周年大庆）的好话也一句没有，还说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叶笃义着急了，"怕他消极态度惹起党的不满"：批《武训传》，假装不懂电影也罢了，别的表态文章怎么也得有些吧？经不住"自己人"一再苦劝，17张东荪终于为"党的生日""随便凑了一首（类似打油诗的）七绝交差"--依旧留着尾巴，不肯作出令权势者满意的低眉顺眼：

卅年艰苦忆长征，抗暴援邻举世惊。

今日万方齐颂祷，献词我亦为苍生。18

翻检张家旧纸片，应该说，也不是一篇自我批判都没有：

写过一文……请周恩来、李维汉两同志看过。他们大概认为还可以，也许认为这是我学习上的一个进步，所以交给《光明日报》发表。发表以后，随即有人提出批评，我才感到自己真是不行了。19

出面批评他的是黎澍，说他"从本质上看改良主义"云云，说这是"调和阶级"、"软化阶级斗争"。黎澍先生已经离世，无法向他求证，此文究竟是有人特别布置（甚至代笔），还是前战斗的《文萃》主编那时候确实对他的唯心主义看不惯。

在被迫做检讨的时候，张东荪还"暴露"过自己的"一件事实"："有一次看《参考消息》时，看见美帝的舆论在批评毛主席的人民民主专政，说民主就不能专政，专政就不能民主。我当时竟然觉得很有道理。"他还深挖了自己"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不积极"之根源，"感到言论不自由，感到学术不自由，而不认识反动的书籍及学说，加害革命的严重性。"20

《武训传》批判，声势虽大，但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都已经看出：这实在是压服而非人人心悦诚服。而"愿服，就是压而不服"--对此，毛知道得比谁都清楚，自然不肯罢手。而曾被看作《武训传》后台、对毛的心思又比谁都摸得透的周恩来，也看到了这一层。再加上他与国统区文化人，特别是大知识分子们的渊源--毛对他们，敬欤？忌欤？惮欤？没人说得清--当总理的（他的政务院里，60%的副职和49%的部长属非党髙干），不得不有所表示了。

这边厢《武训传》批判刚落幕，1951年9月，周恩来应马寅初之请，亲手启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敢不如此么？要知道，毛打算收拾的人，哪怕功比天高（如潘汉年），哪怕情深意笃（如孙维世），周从来没敢护过。至于马寅初此时突发的一唱一合，怕不是因为"老天真"不谙政坛招式吧？只看他为造势而开口请的"教师"--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多么明细！而胆敢如此放胆点名，难道不是已然看透共产党对这场即将到来的运动，多么重视？21

这封信由周立刻直接转毛。毛也立刻转批："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22

周随后亲自部署，并在定下"防止无限扩大"的戒条之后亲自登台。9月底，一场足令秦始皇（他只知道坑儒）蒙羞的灵魂攫获在北大开场。他的表率作用，他的温和恳切，他将国家民族置于一切之上的无私无畏，着实感动了一屋子的听讲者。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由此全面铺开。一个月后，在毛的表扬和鼓励下，文艺界跟了上来，科学界、学术界、民主党派（依旧民建打头、民盟紧跟）......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集体贬责"、"集体自辱"。23

前往北大听周恩来五个小时报告的达1700多人。张东荪去了么？当他听到周的讲话之要害，即知识分子须通过改造，逐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有没有感觉？对此，从理论上讲，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虽然在那时，对于"入民"、"工人阶级"等等，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用到何等匪夷所思的地步，还没有充分的估计。

运动持续了没多久，三反、五反插了进来--别光忏悔、认罪，逗知识分子们玩儿了。仗已经打了一年、还一天天捱着，怎么支撑？打仗就是烧钱，这谁都知道。从百万志愿军赴朝，局面就没有缓解过。穷啊，中

国。这是农民连干饭都吃不上的五十年代初啊。24钱从哪里来？中国没有殖民地，也不像今天这样能大把大把找洋人资款，只有勒紧裤带一着：增产节约。这一勒不要紧，毛泽东发现，他忠实的部下--那些爬山涉水、最后进城迎战"糖弹"的干部们，竟如此奢侈、挥霍，还无师自通地立刻就学会了损公肥私。"增产节约运动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三反三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对经济无法像对军事那样无师自通的老毛，能不发狠么？党员干部老虎，杀了一批。接着，顺藤摸瓜，很快又发现了腐蚀他们的奸商：逃税、行贿……总之"资本家、工商业者"身上大有油水，于是开始了五反。

三反、五反，就理念而言，张东荪不会有抵触。他一直反对"经济方面的放任"，而且以"替人民诉苦"为职志，对奢糜贪赎向来深恶痛绝。虽然两年前受邀到西柏坡，对"解放区"有非常好的印象，但有幼年在县衙"实地考察"、观摩"打板子"的经历，加上长于思索而短于激情澎湃的学人特色，对登上庙堂的"泥脚杆子"（共产党基层人员），张教授早有估量：

不过中国还有一个特别情形：即除上述两种人（官僚资本和地主，张东荪认为他们是妨碍"增产"的主因--著者按）以外尚有一种人，即流氓是也。普通所谓无产者是指无财产而从事于生产之人，如佃农与雇工之类。中国的流氓确是无产者，25但却不从事于生产，以敲诈为生。这些人只要求在享用上得平等，其实正是封建社会的产物。26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本打算清理政权内部贪污分子的斗争，并未有效地控制在财经纪律领域--如担任上海常务副市长兼财经委主任的潘汉年所做的那样--却在法律与制度缺失的局面下，以毛泽东心爱的群众运动方式，演成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发端于1932年的清肃AB团、1943年延安"抢救"……种种手法，这回再度显灵。逼供、诱供、宁左勿右、车轮战、达标、挑唆"狗咬狗"、肉刑和变相肉刑……直至"将斗争开展到家庭，瓦解最后精神堡垒"。这一整套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当权者宝典，开了无需实证、无需司法程序，任何"单位"、"街道"或"工作组"，只要有党的号令，即可拘捕并刑讯公民之先河。该手段此后一次次发威，知识分子改造、反右、反右倾、四清……直到他老人家伟大事业之巅峰--文革。

1952年2月7日，统战部召开座谈会，为五反造势。据章乃器日记，张东荪出席并第一个发言，说"商人到社会主义都要发财。……非有彻底

觉悟，资产阶级即不够朋友"--言语间透着无能为力的讥讽，对共产党发动运动之初衷有没有看透？而实业救国航运巨子卢作孚已于第二天自杀。27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燕大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场。

与北大、清华和所有当时的高校不同，领导燕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的，不是"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马叙伦为主任委员），而是市委派的工作组。组长蒋南翔、副组长张大中28，负责联系文、法学院的，是燕京大学当时的党总支统战委员兼教职工支部书记张世龙29；协助他的，是市委统战部另派的一名干部，原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地下党员）王志诚。从时间上，也比各大学（以及文艺、学术机构）稍稍滞后。

看张世龙回忆：

对不沾经济的大学教师，无法用三反、五反的帽子扣下，于是就借其名搞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大运动，具体作法是按系划分，由青年助教开始，逐渐上升到老教授，人人"洗澡"。就是每人讲自己的基本经历和思想历程，并作自我批判。被称为"自我教育"。同时还有学生参加，帮助分析，其实就是批判。直到大家没有多少意见，算是"通过"了：事实上一切"帮助"批判都已由单位领导事先安排好了。对于进步教师或民主人士的帮助实以表扬为主，很快就过关。而对"落后"者则"组织火力"大加鞭笞，并且总"不满意"，多方刁难，不予"通适"。直至最后还可以"挂起来"。

但如何界定"进步教师、民主人士"和"落后者"呢？有没有法律的、或者类似《战时动员令》之类的依据，哪怕自己制定但对听有人一律看待的标准？若从毛泽东起家的"抢救运动"看，结论是绝对没有，因为那场运动最要肃清的"叛徒"和"自首者"，江青真凭实据俱在，而执掌大权的康生，直到三十多年后他自己快死的时候，才以只有他才想得出来的暧昧方式，辗转向毛泽东揭发。30那么，打击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只能说，从后来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中，我们"被动动"的中国人，确切但显然不够精确地品出的，怕只有一条，就是"对党组织"（而非共产主义理想）的热爱和忠诚程度。且看张世龙回忆：

一般说，当时法学院教授多为民主人士、进步分子，如严景耀、雷洁琼夫妇、赵承信教授、林耀华教授、郑林庄教授等。文学院新闻系蒋荫恩教授，中文系林庚教授等是进步分子，而中文系主任高名凯教授以

及教育系廖秦初、胡梦玉夫妇属中间。文学院重点是历史系聂崇岐、齐思和二教授，他们曾参加1946年《华北日报》公开发表的所谓十八教授的反共声明，聂还是发起人之一。因此在运动中经工作组批准（以三五反委员会名义）都曾被隔离写检查。心理系沈迺璋教授受因被人检举，骂过共产党，所以也被短期隔离写检查。

这些都属于运动初起，为"造声势"而作的"排队"。真正的目标，工作组早已得到上头指令：

这次运动真正要"整"的对象却是著名学者、校长陆志韦教授和著名民主人士（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哲学系张东荪教授。

参照另一位台面上的运动领导人张大中和别人的回忆，应该是三人，即"重点批判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为什么单选他们三人？是不是针对燕京普遍的"崇美、亲美、恐美"思想，从而针锋相对地搞"抗美、反美、蔑美"？是不是因为抗美援朝，"战士们在前线作战，我们要把后方搞得干净一点"，必须把"所有跟美国有关系的人都清理了一遍"？31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是面上的宣传。至于真正的目标--

"批倒、批臭"陆怓长和张东荪教授，是由工作组组长蒋南翔传达的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只是听了传达，按工作组提的要求组织实施。（张世龙）

党中央！

蒋南翔当时是青年团系统的人（筹委会副主任、团中央书记处副书记）。此人是左倾学生出身，曾就读清华中文系，是"一二·九"时候的骨干，亲历过延安的整风与抢救，还极为可贵地直接上书，从马列主义信仰者的角度，对这一方式提出质疑。32目前尚不清楚那次"上书"给了他什么样的经验或教训，总之到了1951年，他作为直接接收中央指令的工作组组长给派到重镇燕京（注意，并非他的母校清华），忠实执行与"抢救"没什么本质区别的逼供。从最好的方面估计，"上头"向他交代任务的时候，曾有惊心动魄的敌情陈述，使得这名年届三十九岁的前左倾青年，硬生生地当了回"枪"；但更大的可能是谁都不必明说的事成之后的重赏--运动刚一结束（1952年11　月），他就得到了清华大学校长兼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的任命，接着创下毫不留情地整肃钱伟长、黄万里、袁永熙等真正有资格担任清华校长的优良人才之赫然纪录--这已是另外的故事了。33

接着看张世龙回忆，看看为把这场战斗打得起伏跌宕，"进步教授"怎么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

为了形成"对比"，组织全校师生大会听取某些教授的典型"自我思想检查"。先有著名民主教授雷洁琼（民进中委）、翁独健教授，以及1949年由英国回国的侯仁之教授作"检查"。这些发言事先都由工作组帮助，主要是王志诚同志和我直接与他们谈话。我们并与学生干部联系，让他们在大会期间组织学生向大会主持人传递"表扬"、"满意"的纸条，由主持会者宣读。在一片掌声中结束大会。

这类串演，雷洁琼等知道么？知道而心甘情愿为之，是出于对党的忠诚，抑或恐惧？他们有没有想过，也许日后某一天，当专权者的罪孽被清算时，他们算是"受了蒙蔽"，还是"参与共谋"？如果学历如雷洁琼、赵承信这样的法学家都被蒙蔽了，师范生毛泽东欺蒙智者的手段，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但对陆校长和张东荪教授却完全是另一景象。事先由王志诚和我分别向学生干部报告"批判"他们的要点，其实是组织学生（主要是党、团员）向大会主持人传递"不满意"、"不通过"的纸条，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质问"。最后"轰"下台来不予"通过"，挂了起来。

主持者张大中目前正平静地安享晚年。他的回忆远不如张世龙诚实，但也披露了一些实情：

当时很多燕京人说我："大中，燕京也是你上学的地方，你怎么不理解这些人？"这些人过去都做过我的老师，老师们的为人我都是知道的，但是在政治上怎么样，我心里也没有底。34

什么叫"政治上"？是不是上面说的"对党的热爱与忠诚"？但作为非党的共和国公民，凭什么要对一个党输诚--只为它握有生杀予夺大权？

让张东荪"作第一次自我批判"，是在1952年2月8日，在小文学院师生大会上。这时候，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在他眼里，张大中、张世龙这些青年，不过是如今多担负些行政责任的老燕京学生。政治大流如此，他们，包括他都不得不跟着走。张教授就三方面作出自己的检讨：一是哲学系没有办好〈有做客思想）；第二是对校务不太关心（开会不到；对"骂人团"让他们闹，想看他们自己翻船。对此他上纲为"卑鄙下流"〉；接着，用刚学的新名词，给自己定位为"文人型的小资产阶级"（急公好

义、好打不平）；属于"改良主义者"（没来燕京前，就已经受到了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是赞成多元论的"唯心主义的俘虏"，虽然"喜欢马克思，但反对辩证法"。

共产党眼里的检讨不能是这样的吧？看看别人，别的"可挽救者"--人家还没有"被党中央列入'不予通过'名单"呢：

当时冯友兰在清华文学院范围内做思想俭查，几次下来，群众"反映很好"，领导认为"问题严重"、"不老实交代"。一天，金岳霖去看他，安慰鼓励之后突然很激动地对冯先生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接着说："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金先生上前几步，抱住冯先生，两颗白发苍苍的老人的头紧紧地偎依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下午，冯继绩检查，文学院全体参加，燕京大学有些教师也来"取经"。冯先生刚开始说话，就泣不成声。以后约两个小时的检查都是在极其沉痛的情绪下做出的。这次检查，获得全场多次热烈的掌声。35

做戏么？通观冯、金二人一生的为学与为人，应该不是，只能说，制造这场面的共产党，实在太厉害了。

虽然张东荪的检讨不像样子，掌握着火候的领导还是很沉得住气：让他充分表演，且听他的"自我批判"--为什么如此，我们将在下边说到。

当然还是不通过。一周后，2月15日，终于到了张世龙说的"组织火力，大加鞭笞，总不满意，多方刁难"时候。小文学院"揭穿（他检讨的）欺骗性"，劝他"洗澡"。贾淑英、翦伯赞上场。36吴伟东（学生）拿出《观察》文章批他"亲美反共"。几天后是小文学院的第二次检讨会。二个学生上阵，吴小美发言"揭穿"他；林振民专批"第三种力量"；王元敬干脆点出他"不拥护政府"。

你们今天还在吗，吴伟东、吴小美、林振民、王元敬？当时情景和自己的发言，都还记得么？待到后来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再掀起，特别是文革时候，你们有没有受过同样磨难，或者从此就成了光荣的党玩动动的骨干？

有了党中央"批倒、批臭"原则，燕京师生不可能不认为他们三人"检讨不老实"、"对群众的批评置之不顾"。但老在小义学院容易疲沓，燕大遂再以"节约检查委员会"（注意，这就挟了三五反之威）的名义，举行全

校师生员工批评张东荪大会（2月29日）。这回是算总账，讨论他的三次捡讨--大会长达五个小时，共有二十五人发言。

根据工作组"事先向学生干部交待的要点"，这次会上，要重点清算历史。据章诒和文章：

在这个大会上，有两个人的发言引人注目。一是担任燕大教务长的无党派人士翁独健，……另一个就是已经调到历史系并有权代表历史系教师发言的翦伯赞。37

这时，进步教授们已经洗净了自己，跃过龙门，站到了人民一边，从运动的对象转变为运动的动力了。翁独健是燕京台柱洪煨莲先生高足，学问人品，在校有口皆碑。由他开炮，威力不问而知。但不知是工作组没交待清楚，还是这大才子阳奉阴逢，总之：

这个哈佛毕业的大蒙古史专家的发言，太令官方失望。总共不到二百字，讲了不足五分钟，只是希望张东荪"真诚向人民低头认罪"。38

翦伯赞呢，这名后来被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的北伐战士 、共产党员？他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啥过一年多经济学（1924年），回国后有感于革命失败，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历史"，写过一些战斗檄文和贻笑大方的史论文字（如《杜甫研究》）。以这样的资历得以出长燕大（其实就是北大）历史系，不是因为他的学养、著述，而是他和当权者的关系，这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对此，机警如翦伯赞者，能不心知肚明么？好，看不起是不是，那就让你们看看。据章诒和文：

他的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所谓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张东荪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言行，是他发言的中心主题。为此，翦怕赞列举了以下事实作例证：

1）张东荪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就说"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就会饿死。"又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

2）在1934年出版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里，张东荪说"马克思派的企图不但不会成功，其结果只弄成既非科学又非哲学的东西，终谓四不像象而已。"

3）1946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一书里，张东荪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39

除此以外，翦伯赞还揭发了张东荪私下里讲"解放三年来一直觉得不自由"等言论。

翦伯赞的发言，为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下了"四反"基调--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随着这样系统、有力的揭批，会场上不断响起"彻底肃清反动亲美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的口号。幸好当时还不盛行革命群众"气炸了肺"，跳上台挥拳头。张东荪静静地呆在他的座位上，没什么大触动。不错，这些他都说过，而且至今观点不变。翦先生如果不同意，尽管撰文为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正名，更况且，历史将证明……。

工作组觉得火候已到，该把批判推向高潮了：　　一名揭发者40走上前，向与会群众当场出示了一本小册子：1934年版《唯物辩证法论战》（张东荪编辑）。在这本小书的封面上，赫然有一行编者的亲笔题辞：

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抢毙与绞刑。

与工作组的预计丝毫不爽，一颗重磅炸弹在会场上空开爆：全场哗然！广大师生无不义愤填膺！连张东荪也忍不住朝那边看了一眼。十几年了啊！对，他想起来了……。

其实这段话不是他的发明，本出自英国政治理论家柯亨。当然他绝不想就此作任何申辩。引用了，就是同意，就是钟爱……。他记起把这本书赠给那人的时候，怎么顺手将这两句涌现在脑际的话题到上边。

对柯亨的这句话，他可能并不十分欣赏，因为在《唯物辩证法论战》出版的1934年，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美好理想，唯不敢深信"阶段；罗素的《苏联访问记》和奥维尔的《1984》那时候也还没有出版。就是在批判大会的1952年，苏共的内部清肃、中共的镇反、肃反和大饥荒，以及柬共的异己灭绝，有的没有充分揭露，有的还没有发生。但无论柯亨的述说，还是他的引用，都属于思想和言论，而思想言论，无论其多么荒诞不经，不仅谈不到罪与非罪，甚至无所谓对错。他可能相当后悔被"请"到这里来"接受思想改造"。思想是能改造的么，遑论以这种方式？更况且，《唯物辩证法论战》是一本对战斗的、政治化的马克

思主义（左右两派，托洛斯基派和斯大林派）加以揭露和批驳的结集，有他自己的文章，也有旁人的。他根本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属于哲学，而是政治运动失败后，马克思"为坚其党徒之迷信计，不得不擅作预言，谓资本制度将自行溃灭。而为证明此预言计，又不得不创有此种史观"。其实论战到后来，当他发现人家拿来作为斗争工具的马列主义，和他力图捍卫的纯粹哲学并没什么关系，对这场论争巳经没什么兴趣了：

我自信我近来有一个发见，就是我发见马克思派所用的名词都与我们相同，而其意义都与我们不同。……我们来驳他们，他们来骂我们，实在都是无的放矢，非常可笑。

3月6日，《新燕京》第二期"张东荪专号"出版，共八版。军管会登记证"新字第七八号不准转载"。"专号"没有说到这"十恶不赦的引语"被揭发出来之后，张东荪的惊恐或懊悔。事实上，当天回到家里，家人问起的时候，他只平静地述说了原委，连这位接受赠书的友人是谁都没提。至于这本书怎么到了大会会场，也未见记者对持有者（揭发者）的采访：觉悟有所提高？熬不住了？卖友求显、求荣或仅求自保？

但是，不过两三年呀。这些学生，他们怎么了？1996年，张东荪的小女儿张宗烨告诉著者，1948、1949年，解放前夕，她正上高中--

那时候闹学生运动，我们家天天开会。进步学生，燕京的、清华的……，有时候用我们家地方他们自己开，有时候是爸爸跟着他们开，几乎没空过。前不久，燕京当时学生会主席、地下党员陈树朴找到我，41还来看了我一次，送我一本《无影子文集》，跟我说了半天，态度挺友好，就是特别正统。说起父亲，"是好人啊，你也得理解，我们那个时候不敢来看他。"春节前他还打电话来，让我给他寄一套书。说他还是信奉共产主义的，但同时又信奉康德，所以叫康奉。

当时（1952年）怕我惹事，（父亲挨斗等）不让我知道。所以解放后很长一股时间，我的思想总是转不遇来。因为当时那些进步学生若是不靠着进步教授、包括美国教授的话，都让国民党给宰了--他们都是藏在美国教授家里呀，一位叫夏仁德·Dr.Celer，真的是就藏在他家，从他家化了装一个一个逃走的。后来说这是文化侵略，都是特务，老天爷，吓死我们了。现在当然又好了，把人家请回来了。可当时大会上谁要是说Dr.Celer帮助过进步学生，那可就完蛋了。

对燕京的另外两个重点对象的轰击，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范兴国

写道：

赵紫宸被迫在学生群众大会上，自我否定燕大过去的校史，并对司徒雷登加以辱骂，斥司徒是美国的间谍，为一反共、反苏、反华的反动派，为中国人民的死敌，并且是一粒裹着糖衣的毒药，也是裹着棉花的一把刺刀，这就是所谓美国对华传统友谊的象征。他自称是一年迈的老人，愿意改造思想，学习前进，不愿落后，虽不能如野马奔驰，但能像骆驼一样步步前进。这是赵紫宸在中共极权下的悲哀，他业已丢弃了他昔日最然受的基督世界主义的理想价值。

陆志韦更是一再的被中共洗脑，检讨过去的思想，不断举行会议，否定司徒雷登过去创校建校的价值，向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看齐，一如他们盲目检讨其过去的校长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的错换。最令陆志韦难堪的，是中共唆使他的亲生女儿陆瑶华，帮助她的父亲进行"思想改造"。一再的坦白悔过，还是无济于事。最后还要陆瑶华出面控诉陆志韦的罪恶，说他是帝国主义的爪牙，一个对共党无政治同情心的基督徒，毒害青年，为人民唾弃，长期潜伏亲美意识，渴望美帝国主义重返北平，重温燕大校长旧梦。42

翁独健在批判大会上，第二次作出让历史难于忘记的表现：

有一次燕京开批判会，批判校长陆志韦，陆先生急得要撞墙，被翁独健一把抱住了。

如何处置张东荪呢？大会之后，造声势的工作组交差，民盟接手组织处理--它此时已接到命令，由基层提出申请，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解决。我们今天已经能比较清楚地看出此中门道：对一些注定要载入史册的糗事，有时候共产党不愿意沾手--既然有那些或吓破了胆、或品出玄机的民盟头目们正一旁伺候着"为党分忧"。

3月4日，中国民主同盟燕京大学分部全体盟员，报请北京市支部，"要求撤消张东荪民盟内外一切职务"，市支部接到文件后，立即函给了中央章秘书长。

沈钧儒此时正式介入。从他的回忆里，我们简直如临其境--盟里出了大事，大佬们如热锅上之蚂蚁：

昨天看到有封信给张主席，昨天下午我在政务院会上黄任老给我—个条子，这件事情是十分严重。（4月）5号我（沈）和章到表老家，东

莽也去了，李徐两部长也去了， 一道谈。李部长与张谈，张表示深自悔悟，他说燕大发表的也有不是事实，如单独见魏德迈。其余是对的。李部长同意我的意见，要他回家请假反省。我说，张再作一次反省。李部长说，多反省一下是好的。张即退出。43

虽然在盟内分属两派，沈钧儒这时候没有落井下石。同样摸不着头脑的他劝东荪"不妨不动，请假反省"，张接受了。

到了4月，毛出场。看过"猴戏"之后，他找到了下手点。4月21日，毛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的信上批示：

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44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4月22日，周炳琳教授在民主广场举行的全校大会上作思想总结和检讨，终获通过。朱光潜也随着过了关。

5月1日，马寅初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庆祝伟大的五一节》。他在文章中写道："在运动中批判了违反共同纲领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反动思想，全校空前大团结，-片新气象。今年的五一节是北京大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圣旨"中成了不宜帮助过关的"个别的人"，我们主人公的"假"不能无限期请下去。从6月到8月，新一轮的盟内斗争开始。从民盟的文件里，我们读到这一次次的"检讨"--所幸"自辱"高潮已过，我们的主人公做的，主要是"事实交待"--虽然读着也难免令人心酸。

后来，张家后代翻检遗物，发现了这一次次"检讨"的手稿--原来多出于子女之手。张宗烨这时候才想起来，当时还不到十九岁的她，虽然没有像陆瑶华那样在组织的软硬兼施下，跳到台上划清界限，但她和她的大哥（生物学家张宗炳）确实比父亲"活络"些，觉得不就是检讨么，谁躲得过？况且，大家不都写了么？他们开始代父捉刀代笔：

那时我在城里念高中，住大哥家（外交部街），一周回家一次（朗润园）。我的印象是，一回家就让我帮着抄检查。父亲很乱地写在草稿上，改来改去。每过一段时间都要交一回。

当时读小学的张饴慈也记得一些：

手稿里边一部分是姑姑抄的，一部分是爹抄（宗炳）的，也有他自己的，还有不认识是谁的。爹的告诉他怎么写。还有的是姑姑帮着写，反地来爷爷抄的。他们那时候年轻，嫌他写的不好，给他改两句，即所谓"认识不上去帮着认识"。

虽然有真心爱他的亲人的蔟拥，从精神生命而言，自由主义者东荪已如行尸走肉，因为他背叛了自己的原则--"必须说自己的话，也只能说自己的话"：

所谓说自己的话就是自己觉得非如此说不可。这是由于自己对真理有切实感，因对于真理愈切实，则对于言论便愈尊严。于是觉得污辱言论即等于自堕人格。所以读书人之人格就看其对于本人的言论自己有无尊严的保持。45

不过话说回来，和翁独健、周炳琳比--这两位的"态度"也都不及格，只因为没在毛那里挂号，侥幸被放过了--张东荪此时只剩下半条命。

夏天到了，运动已近尾声。

如果说运动之初，大家看在总理面子上，有节制、有尊严地勉力投人，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以后世研究者的眼光，官方认为：

1952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基本结束。经过这次学习运动，广大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时事政治和社会发展史，通过参观或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本上划清了敌我界线，《共同纲领》成为大家思想认识和行动的准则。46

"帝国主义"怎么看呢？《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这样写道：

1951至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镇反、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著者按），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这三个运动的总的结果是使这些成分就范。47

就总体而言，说得不错。但里边更深的机锋，恐怕不是大洋那边的学者所能品得出来的了--或者说，在阴风嗖嗖的1952年，大洋这边的也一样。

别的学校、机关都在"收"了，对东荪先生，上边究竟什么意思？ 民盟中央一直得不到个准话儿。问统战部、问李维汉，全都不得要领。

毛泽东究竟要干什么--八十岁的张澜不得不亲自出场了。张宗烨记得那天，妈妈对她说，张澜来过电话了，约妈妈在颐和园见面……。

注释

1、转引自沈志华：《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俄国档案文献》，《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

2、院系调整以培养工业人才和师资为重点，组建专门学院。如北大法律和清华政治系等组建了北京政法学院，清华石油系发展为北京石油学院，通讯专业汇总发展为邮电学院，冶金钢铁专业组建为钢铁学院……北京有名的八大学院，即从那时发展起来。

3、清华大学新任校长蒋南翔（对毕业生讲话）名言：今后要想上进，就两条，一是听话：二是出活。

4、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4卷第1期，1948年2月。

5、宋志明：《熊十力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1935年，张东荪在《十年来之哲学界》中说："以我所见，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不失为近来的一部奇书。书内所主张亦许为我们所不赞同，然而其为好学深思的结果，则不容否认。"

6、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页82-83。

7、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8、青石：《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朝》，《百年潮》，1997年第2期。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87-88。

10、"特别感到高兴。因为他们觉得不但从此肃清了美帝对我的文化侵略，丢掉了'司徒雷登'这个大包袱，并且学校可以从此由中国人自办了。"参见《燕大师生一致拥护政务院决定》，《人民日报》，1951年1月15日。

11、钱理群：《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读书》，1998年第8期。

12、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载《毛滗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46-47。原载《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13、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33。

14、同注4。

15、转引自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

16、李渊庭、阎秉华编：《梁漱溟年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页204。据查此说另有评述，引文为梁漱溟为其检讨《我的努力与反省》所写跋语。

17、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83。

18、《光明日报》，1951年6月26日。

19、张东荪：《检讨残片》。

20、同上注。

21、运动开始后，马寅初以口头和书面形式，代表北大"有新思想"的教授，正式邀请中共中央领导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

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参见李扬：《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院系调整研究之一》，《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448。

23、同注15。

24、参见张爱玲：《秧歌》（台北：皇冠出版社，1968）。

25、张东荪撰文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流氓从发跡时候，就是毛泽东主要依靠的社会力量。余英时认为，实际上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认识。但这里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参见余英时：《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一生的三部曲》，载《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页43-62。

26、同注4。

27、章立凡：《腐败成因难探讨--章乃器与梁漱溟往事之一·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

28、张大中，1920年生于河北景县。1938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入学不久即发生太平洋战争，随后进入晋察翼地区进行地下党活动。1946年重新返回燕京，领导燕京以及北京各学校的学生运动。后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秘书长、北京日报社社长、市委党校校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9、张世龙应该是燕京工学院的学生，中国计算机开创者之一。1958年，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教授，王选和许卓群都曾是他的学生，设计研制了数字电子计算机"北京一号"（交付空军使用）和"红旗"。只不知为什么他在当时会担任"中共党总支专职委员及政治大课讲员"。本书有关他的文字，均出自《燕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纪实》，载张世化：《燕园絮语》（北京：华龄出版社，2005）。

30、章立凡：《解读乔冠华晚年际遇的一封信》，《文史博览》，2007年6期。

31、张大中语，转引自陈远：《燕京大学地下党与工作队负责人回忆与反思燕大"思想改造运动"》，《新京报》，2005年6月9日。

32、韦君宜："直到1988年，我们又经过了无数冤苦，我才蒋南翔临终的遗稿上，知道他早在当年（就在经历过执行错政策之后）就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而且此意见刘少奇知道。但是这个反对抢救的意见送到了 毛泽表手里，结果却是'留中不发'，并且给提意见者以批判，认为错误。"参见韦君宜：《思痛录》（香港：尺地图书、2000），页24。

33、钱伟长是反右运动受害人，但1979年获得改正后，因告密"反右三十周年纪念会"（可能还有支持三峡工程）而获重用，并光荣入住新街口外大街甲15号（部级待遇）。

34、同注31。

35、周礼全：《怀念金岳霖师》，《人物》，1995年第6期。

36、翦伯赞难道出场两次？如果张世龙记忆无误，这回定是稍稍示威，却引而未发。

37、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载章立凡主编：《记忆--往事未付红尘》（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8、同上注。

39、同上注。

40、《新燕京》或当时工作队办的《燕京快报》的人。这份报纸的主编是彭珮云，编辑吴玉宁。

41、即康奉，五十年代后任职北京市科委。

42、范典国：《燕京大学与中美文化关系》，《传记文学》（台湾），第35卷第6期，1979年12月。

43、摘自沈钧儒在民盟中央1952年批张会议上的发言。

4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页422。

45、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结论。

46、参见"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47、费正清等著，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页92。

二 落幕：如来佛手掌中

……张夫人吴绍鸿神色不宁地从颐和园回来。张东荪终于知道，"检讨"一次次通不过，原来"上头"认为有一个"重大情节"他还没有交代：王志奇，美国间谍王志奇，以及他与这个间谍的全部往来。

这是个什么人呢？

王志奇，又名王正伯，估计是东北或京津一带的人，大约出生在1910年间。半个世纪过去，关于他的出身、经历、事业、社会交往，除了在"张东荪案"中断续出现，未见任何文字记载。

他是共产党么？

张东荪与共产党确有组织上的联系，开端于《八一宣言》之后的三十年代中期：他在北平与诸位教授一起，发起成立"北方救国会"，托前往延安的彭泽湘向毛泽东致意，并收到了毛的亲笔回信。

王志奇与此无关。

王的出现，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后。与他结识，确是出于共产党员--不过不是共产党组织。

"七七事变"之后，中共华北局派了王伯高（又名王定南）和他直接联系；燕京大学的地下党同时派学生姚克殷做张教授和司徒雷登之间的联络尺。

所谓"联络"，当时还是小姑娘的张宗烨并不十分了解。在她的印象里，"常有教授带着学生到西郊郊游，去时四、五人，回来二、三个--革命去了。"1941年12月那次燕京兜捕，姚克殷也未能幸免。与他同坐宪兵队监狱的，就有这个王志奇。他告诉姚克殷，自己是因为和沈阳苏联领事关系不一般，才被日寇逮捕的。估计除此之外还说了一大通别的，比如有钱、有人脉之类，这才有了出狱之后，姚克殷将这个"不凡之材"介绍给自己的老师、"进步教授"张东荪之举。姚当时对张教授说的是"可以与他合作"。

从这里可看出王志奇好吹并且能吹的特性，也看出张教授对"进步学

生"--特别如果还是共产党员--的信赖。

不过这王某人确实是个人物。光复后，张东荪与姚克殷决定在北平发起出版一张小型报纸《正报》，由许宝骙1出任主编。王志奇闻风而动，不仅慷慨解囊，还担任副社长兼经理。张东荪为这张报纸写了《发刊词》和《一个提供大家参考的建国方案》。叶笃义也拿起笔来写社论，谈到中共应该有受降的同等权利。不幸几个月后因经费不继而关门了。张随后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

这里可以看出王志奇资财投向的不稳定性--不像有根基、重然诺的实业家，倒颇有些"说干就干，不成拉倒"的江湖人物特色。

政协会议之后，国内局势不仅没有缓和，反倒紧张起来。王现身北平，前往张府拜望东荪教授。据他说，自己本来只和苏联方面有联络，现在经他妻弟的介绍，与美国也取得了"关系"。为什么要这样？他的解释是"出于安全"--因为国民党要捉他。

这样的解释，张东荪居然相信了！面子如许了得的"妻弟"是什么人，张教授竟然没有深问。国民党要捉的人，美国官方肯去保么？就算想保，保得了么？罗隆基给软禁在虹桥医院的时候，美国领馆的人也只能送点药、送点花，张东荪这点判断都没有么？

1948年，王再度登门，说自己仍觉得不安全，想逃到石家庄去，请张介绍中共方面的朋友。虽然张教授那时候正得到毛泽东非同寻常的信赖，毕竟这回守住底线，郑重拒绝了他。后来，有传言说，王志奇自己想办法"逃"了过去了。估计就是这次，他于苏、美之外（如果有的话），又搭上了中共的关系，比方说，答应做公安的"朋友"--即那种不在编的非正式特工。他们的服务是"志愿"的，只通过特别渠道与"组织"保持联络。"组织"则以其掌控的特权，在生意、出入境特许、以及权力所能触及到的诸方面给以照顾。被延揽为"朋友"的，有的出于理想，有的出于实际利益，也有的是给"拿住小辫子"不得不干。他们的身份也大异：有名声赫赫的闻人，也有底层人渣。

再见到王志奇，已是1949年。他回到解放不久的北平，四处走动。没过多久 ，有一个姓鲍的找到张家，说王突然被捕，托他恳请张教授和刘清扬设法保释（可知除了张东荪，他还混迹于别的文化名人之中）。张当时种种事务缠身，还没来得及和刘清扬商量，王志奇已经放出来了--没有解释被抓的原因，估计是1949年7月军委公安部成立之始的那次大

动作。

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率领公安队伍在首都，并指导全国开展荡涤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的那場斗争。正史对此的描述是：

在北京，他直接领导对全市反动党团的登记工作，严密组织对警、宪、特等敌伪人员的查处。到1949年9月底，共清查登记敌特、反动党团骨干七千余人，缴获各类枪械近一百枝，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潜伏在北平的反动力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2

行文到此，著者不得不引入一则刊布于《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史学界特别注意的短文：《张东荪出卖情报案》。3

该文作者朱振才供职于北京市公安局，属于文坛与学术界为数甚微的有一定渠道、得以阅读一般人不得接触的公安档案的研究人员。不仅研究，朱先生还有文章得以在本单位的网站发表，有专著在市面上发行。4在这篇短文里，作者明确提出"美国间谍王正伯"（即王志奇）：

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举报，说张东荪有电台一部，正谋求和美国通报。

1950年9月，又发现张东荪出卖情报的第二件线索，即张东荪为付梓出版数十万字的反动手稿给某人的一封信，信中对其反动观点大加赞赏，并对美国大加吹捧。

这两件线索反映了张东荪与美国的关系可疑。侦讯处1949 年初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时，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进一步证实了张东荪出卖情报的事实。

第一段，让人立刻联想起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崔月犁所撰那篇《文革风雨磨练》（回忆他秦城经历）。在这篇文字里，1949年初受组织指派，与张东荪有相当密切往来的"同仁医院李大夫"写到1950年秋天的一个场面：

当时北京市委在德国使馆。我当时任彭真同志的政治秘书，罗瑞卿兼北京公安局局长。有一次我们正在打台球，罗瑞卿一拉我的胳膊："老

崔，张东荪有个电台，他说是你让他安的。"

"你去调查好了，调查是，就是我安的，调查不是，就不是我安的。"

我不知道张东荪有电台，那跟美国人有关系。他一说是我给他安的，等于是共产党让他安的，为自己开脱罪责，可是却把我牵扯进去了，我连知道都不知道。

他们把这件事提出来，又突击审讯了两次，六天六夜。5

这与朱文所说，应该是同一件事。那么，到底有没有这部电台？属于何人？是否正在某个案件里起着作用？对此，无论是罗瑞卿、崔月犁还是撰文的朱振才，都言之不详--只不明不白地存在于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中。

其实，"电台"于张家，是一个老故事了。

如果1941年"姑父林嘉通"用来"通内地的无线电台"6不算，这里说的或许就是老三张宗颎那台了。那是他的法国老板1949年底离开北平的时候留下的--究竟做什么用？谁都说不清。有人说不过—台普通收音机；有人说那东西没人敢碰，一直埋在院子里。一个笃定的事实是，在公安局前往查抄当口，张宗颎家的女佣人居然悬梁自尽了--无论父母还是兄嫂都弄不清怎么回事，只知道目睹这一场面的孩子（老三的儿子继慈，时年七岁）精神受到极大创伤。

生于1920年的张家老三，聪明机敏，处置事情却常常出于情绪而非冷静的权衡。1937年刚入燕京大学，就差点跟进占北平的日本人拼命。做父亲的觉得太危险，遂托潘光旦把他带到昆明去读联大，并在那里被吴文藻看中，跟着研究社会学。去昆明的路上，张宗颎结识了一个小美人儿，不到二十岁就结婚了。后来这张家老三也曾考上留美奖学金，只因为已经有了家小，就没有去。但维持一个家不容易，幸亏人机灵外语又"来得"，毕业后回北平找了四份工，包括法国通讯社、开滦煤矿等。当婆母的张夫人认为"全怪他的老婆，总嫌他挣钱少"。从此家里立了规矩：第一只许学自然科学；第二不许早结婚。

1949年法国人离开时，将原住所后椅子胡同一号的房子包括其中不便搬动的设施、狗等等都留给了他。所谓"电台"、"法国情报机关"等等，1949年10月间，已在一定范围传开。也就是说，阿三这事，已然严重地、政治性地、并且不顾事实地按到父亲头上。比如与张东荪关系最亲

密的叶笃义已经吓得失态：

当年春天，报上登出在他儿子张宗颍天津的家里搜出美国遗留下来的电台，我当着罗隆基的面问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内幕。他坚决否认同这件事情有任何关系。我当时引用了一句美国人在法庭作证时常用到话追问他。我说："你敢赌咒你说的句句是实话，并且除了实话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吗？"他当时回答说："我敢。"我叫他在报上或者在盟的会上公开表示一下态度。他拒绝了。他这样说："反正共产党是知道我的。至于盟里的人怀疑不怀疑由他们去好了。"事后罗隆基对我说，我当时逼张东荪太过分了。7

我们已经知道叶笃义这则晚年所述事实错乱的程度，如并未登过报，电台不是美国人的，也根本不在天津等。叶之不问情由向长辈发威，席卷社会之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已历历在目。张东荪遂亲自带了儿子到公安部，直接见罗瑞卿。做父亲的当天就回家了，张宗颍在那里给留了一个星期。

没有人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后来，张宗颍给安置到天津，在文化用品采购站任文书，用英文写一些出口产品说明等。每月工资区区几十元，却事事都要直接向市委一级的官员汇报。也有一说他被逼做了线人。但家里人觉得这与他的精神状态不合：线人怎么会在采购站那种与重大社情不沾边的地方工作？而且多年来一直那么沉寂？六十年代初，陈毅向科学大会代表脱帽致歉，做学问的人松了一口气。在北大任职的大哥（生物系教授张宗炳）曾动念把三弟调到北大英语系当讲师，最后没办成。妹妹张宗烨还记得当年的情景：三哥那时不过二十多岁，从此换了个人，不常来北京，跟家里几乎断了来往--与作为国家贵宾归来的二哥无法相比。

现在回过头来看朱文。在分析该文第二段之前，先对已知细节作一撮述：

1949年初，公安部门捉到过一个在北平四处走动、到过石家庄、自称认识不少名人、跟苏联、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人。在他大量的交代里，有一条后来被归纳为"张东荪向司徒雷登出卖情况"。这人虽然随后就给放了，但他的案子看来没有结案归档、束之高阁，而是又给翻检出来，推动了"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随后"一年多的侦察"，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王所供述的）张东荪出卖情报的事实"。

为了什么给翻检出来？在什么时候？

让我们看朱文的第三段：

"1949年初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时，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如此案情重大，犯人怎么说放就放？更遑论已经有证据捏在公安部门手里的出卖情报的罪犯张东荪），还能参加新政协，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为此，著者倾向认为这里的定性用语，属于事后追加。这就是，1949年初，在王正伯（王志奇）的供词里边，确实有他认识或拜望过的"张东荪"、"司徒雷登"等"交代"，但"出卖情报"一节，如果不是审案者后来有目的放进去的，恐怕就是朱振才撰写这篇短文时候自己的创作了。

到1949年10月，"电台举报"线索出现。朱文明确标出的是，电台的主人"正谋求和美国通报"--如此重大罪行，本应立即逮捕才是，但公安局没有动。是不是罗瑞卿问了崔月犁、并且见过了张氏父子之后，觉得电台一节"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就放过了？读者注意，张东荪此时在罗眼里，还是经毛主席挑选，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好人"--直到又一新的"出卖情报"线索出现，即文中所说：1950年9月，"张东荪为付梓出版数十万字的反动手稿给某人的一封信"。

这就是说，"王正伯/张东荪出卖情报案"自1949年初立案后，不结案、不实施逮捕，"电台"的事也放过，直等到1950年9月"第二件线索"（反动书稿）出现。难道一部书稿，就算"观点反动，并对美国大加吹捧"，在公安人员眼中，比出卖情报还重？还不要说已经干着出卖情报勾当，干吗要付梓出版反动书稿张扬暴露自己？

让我们接着细读朱文，看作者如何给出他的分析，以及案件的后续进展：

张东荪在民国时期曾供职南京政府内政部任秘书，后任北京政府元老院秘书长。1934年任燕京大学教授、主任等职，与当时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关系甚密。鉴于张东荪为和平解放北平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解放后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职。

但张东荪从来不是共产党的真正朋友，却喜欢西方的所谓的"文明"，他屈从于司徒雷登的压力，竟不顾人格国格，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

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派人送到香港，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此案发生后，党中央很重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这起案件。

本来，张东荪罪行严重，证据确凿，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惩处，但是，党中央、毛主席没有这么办，而是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即对其教育，通过这起案件不但教育张东荪本人，而且也教育其他人。尤其知识界一些崇美思想严重的人。

精彩啊！

考虑到该文作者"自1970年代从部队转业到公安部门以来，一直从事党史、公安史的征集和研究工作，特别侧重于对北京反间谍斗争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对于绝对看不到公安源始档案、却特别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的我辈写书人，怎么能不将此文字斟句酌、认真考证呢？

先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1949年初到1950年中），"情报"的买主（司徒雷登）与卖主（张东荪）的身份处境。

按照朱文所说，在王犯交待出卖情报的1949年初，应是这名燕京大学教授从西柏坡回来，住在校园，偶尔也到城里办事、会友，包括多次与司徒雷登书信来往，并会见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的那段时间。

那段日子，我们知道，正是黄华给派到南京，司徙和傅泾波也正急切地与学校各方人物联系，希望促成老校长返北平"过生日"，谋求与新政权的领导人见面的几个月。对于包括张东荪在内的燕京（及民盟）一干人，与曾为旧友、上司，而眼下正在驻华大使任上的外交官的直接联络，无论决策中心西柏坡，还是处于外交与统战前沿的周恩来，不仅清楚，还有意"倚重"，似乎没有（也根本用不着）一个不通英文的王志奇侧身其间。

或许有读者说，这都是大面上的活动，你怎么知道私底下没有情报买卖交易？好，就算有，卖什么呢？

据朱文披露，是"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派人送到香港，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司徒大使1949年8月归国之后，正逢美国国内麦卡锡运动猖獗，他处境艰难，领取赖以存活大使薪酬之局面几不保。

在对华关系上，早已不具任何影响力--这情形一直没缓和过，直到他1962年去世。8如果我们暂时不去计较处境已到如此地步的司徒前大使还要买情报，只说卖给他的"抗美援朝核心机密"：不知朱作家说的是金日成突破三八线（1950年6月），周恩来召开历次会议〈1950年7至8月），还是志愿军开过鸭绿江（1950年9月）。但这三个重大关头，不仅张东荪绝无消息来源，也都发生在将王逮捕（1949年初）乃至"经过一年多的侦察"之后--难道王志奇又跑回侦缉处作了补充供述？

著者在这里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朱文（或者说公安局文件）下边给出的这个十分重要的信息：

1950年9月，又发现张东荪出卖情报的第二件线索（对美国大加吹捧的反动书稿）……这两件线索反映了张东荪与美国的关系可疑。

"数十万字的反动手稿"，不知是张东荪向出版社推荐的他人作品，还是就是他本人的。事实上，1949年至1950年，作为新政协筹备会议成员、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张东荪不仅没有时间撰写数十万字的书，对自己的作品能否出版，已完全不抱希望--除了两篇发表在燕京校刊上关于佛学研究的旧作。估计这封"为付梓"而发出的关于"反动手稿"的信，写于1948年或更早，只是到了1950年秋中美已成交战国那凛凛的大气候下，9持稿人胆战心惊地或自己上交，或遭他人揭发。

虽说"反动观点"与"出卖情报"没什么相干，然而，在1950年秋，当"张东荪"三个字突然出现于新的揭发中，一定让办案人员兴奋不已。"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捡起旧案：王志奇的交待里，书稿主人张东荪直接联着司徒雷登--这可是毛主席重点抨击的敌人呀。

这里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张东荪"三字，在此时，即1949年秋到1950年秋，已经极不寻常地进入公安局的视野，否则不会有这样的联想--这我们在后边要说到。

让我们回过头看看王志奇在这阶段的行动。

没等张东荪、刘清扬等想办法捞他，美国间谍王正伯"不久又出狱了（估计此时是1949年夏），说决心从此专做买卖，随后即在天津成立了一间进出口公司。

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公安、安全部门招揽，而最终成为其"朋友"的常态：突然被捕、突然获释、突然之间有了钱，并且经当局安排，

毫不费事地注册了便于和外界往来的公司。

张东荪记得，1949年的一天，王从天津来，到张府拜望，说自己因为要作"特货"，也就是禁运品进出口的买资，又和美国发生了关系。他还告诉东荪先生，自己常和公安局二处狄处长往来，而他的"特货"，也是由经济保卫局直接批准的。

"特货"是一般人说做就做的吗？他凭什么拿到这种好处？但王也不是全在胡吹："狄处"，狄飞是也；"公安局二处"指的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侦查处（或预审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冯基平、狄飞。至于"经济保卫局"为了各种需要，特别是政治需要，为其"朋友"特批"特货"，就算我们认为霍英东等人的发迹史过于遥远，近年高瞻、陈文英等案件，都可引为此等手法的注脚。10

张记得，这以后，王跑北京的时间多了起来。1949年秋冬的一天，他对张东荪说，美国已有布置，决心打第三次大战，麦克阿瑟总部已在那里计划。他还说，张过去的朋友包观澄，还有孙连仲、张念清都去了。这件事，触到张东荪心上一直紧绷着的那根弦。据教授对二战后局势的分析：最怕的就是中国成为两大阵营冷战的牺牲品。但那时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世界已无交往，而准确分析局势是要资讯的。张教授于是告诉王志奇，如有重大的消息，请他—定前来告知。

后来，王志奇一次次与忧心忡忡的教授见面，大谈形势，似乎大战的前景更为紧迫：美国正在加紧准备，半年后随时可以发动。不知道王志奇有多么大的游说本事，总之听他一说，使得中美断交之后对自己祖国既灰心又担心的张东荪，对这人愈来愈信任，乃至觉得或许在一定程度--从聊胜于无的角度--可以倚重。

也就在这前后，张将他带到民盟总部见了张澜（叶笃义在座）。这时新中国已经宣告成立。

当时，张东荪对王志奇已信赖至此，居然和他商量：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即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美国应该把蒋匪阻住，不要它进来，留着中国，且看将来。

那时候，王每次求见，张都答应。并一再问他，他的那个意见，究竟传达过去没有。王发誓都已经传达了，但他不肯说传达到了美国的哪家--国务院？还是别的机构。张东荪居然也不深究。

只要读过张东荪的作品，没有人会把这名苦学深思的哲学家归到"弱智"一流。对他这时候明显属于弱智的表现，只能说，通往外界的大门砰地关上，对那些将信息当作空气、当作水一样不可离之须臾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说给憋傻了，也真给逼急了。

接着，王志奇把话题转到当时最为敏感，也是美国、中共和所谓民主人士正在较劲的"中间路线"，特别是"第三势力"上。王主动问张，下一步会是个什么局面呀？民主有没有可能恢复？以及，比方说，民主人士里，都有谁和他一样想法呀？

真是句句打到张教授痛处。

张东荪也真愿意给他交底。他告诉王志奇，自己现在和他们很少谈话，不过将来情形一变，共产党是现实的，民主人士必有见重的地方，张接着拿出一个政协名单，把其中若干人用笔勾出。据当时负责整理资料，从而见过这张纸片的千家驹后来揭秘说，"有双圈"、"有单圈"，说将来可以找他们谈合作。11

这时，已经是1950年深秋。当上了委员、部长的民主人士们，已经咂摸出什么叫"寄人篱下"、"有职无权"，什么叫戴着脚缭跳舞；不知究竟迫于什么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其实已经进行了将近一年。而公安部门对他们的监督摸底，按照我们已然知道的共产党行事准则，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有一次，他们谈到国家建设发展，张告诉他：在国家预算的收入总数中，工商税所占不过百分之三十几，你们商业还有前途（估计指的是王志奇与美国之间的商贸往来，但也可能是美国人直接到中国经商赚钱）。农业税占了百分之四十几，可见国营企业还不行。对此，王听了以后还细问了两次。张于是把收入总数与商、农两笔收入转成大略的小米斤数告诉了他。此外未提起其他项数字。

王志奇是不是在套他的话，张东荪一点都没有察觉么？也并不是。可惜，第一，他太希望王志奇传达出去的"意见"和信息有可能打动对方（美国）了；第二，尽管这些数字来自他参加的一些政府会议，但依照一般民主国家的标准，张教授并不觉得属于国家机密。

何雨文在《中共财政解剖》中提到：

关于财政泄密：国家预算和决算，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本来民主

制中的代议制，源出于限制征税。所以一般国家，把预、决算的权力放在民意机构。……薄一波的报告，公开了预、决算数字，但除了1953年还公布了一个财政收支的数字外，此外就只有一、二个竭尽平衡或盈余的百分比数字。此外我们就没有见到公布的决算。12

萧济容在《中共的财政收支》说：

必须着重指出，中共所公开发表的财政收入支出数字及百分比，绝非完全真确的。中共铁幕深垂，普通小消息也动辄列为"国家机密"，绝不肯如民主国家一样，坦然据实公布，让全国人民检讨。13

杨奎松的研究更告诉我们，当时中国的"经济机密"，根本谈不到所谓"为敌人所掌握"：

与此前的报告相比，情报局的这份报告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状况。但情报局由于无法获取重要的情报信息，因而其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同样不可能很具体准确。经过了将近两年时间，它对从1952年就已经开始实施的中共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内容却无从了解，它所知道的仅仅是五年计划完成后，1957年国家经济生产的总量将超过1952年的20%至25%。对几乎有关中国经济状况及其到1957年计划完成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等等，报告都是凭借这一极其粗略的数字推导和分析出来的。虽然其分析有一定的逻辑力量，并在总体上不失正确，但是，如同情报局此前的其他报告一样，这时的报告在许多问题上还是含混其辞、模棱两可的，它们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方面似乎还是起不到重要的参考作用。14

至于此时在王的身上、或者在他们谈话的房子里，有没有公安特别放置的技术器材，则直到二十一世纪直接办案人回忆录发表，才有可能窥见一二 。这我们到后边还要具体说。

再回到王志奇的故事。

在这前后，张申府突然收到王志奇一封信，说他因为欠款被押在法院，必须于若干日交出款项，才能放出。张东荪立即叫长子张宗炳出面做保，王遂获自由（北京市局在背后有没有什么动作？）。这时候，张东荪已经有些不安，担心王会以自己叫他转达意见而要挟。

不久，王志奇前来致谢，还给张家送上四吨煤。刚刚获释，气氛比较轻松，王说起他是天主教徒，虽然与辅仁并无关系，但还是希望辅仁

大学保持私立，问张能不能从旁帮忙。当时张正打算从符定一之请，考虑挂名担任辅仁大学的董事--且即将到教育部讨论此事。送王出门的时候，教授忽见这个自称与辅仁没关系的人，坐的却是该大学的汽车。张警觉起来。天主教、美国政府、情治系统--这里边有太多他们这般文人无能力把握的东西。张东荪找到潘光旦，两人商定，辅仁的事情不能管了。

辅仁大学的去留是当时教育部接管中最敏感的一桩，几乎到了中共所谓"敌我矛盾"边缘。这，从1950年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给政务院的报告即可见一斑。马叙伦的报告指出，天主教驻北京私立辅仁大学代表将该校作为反动据点，6月策动反对我国教育政策事件；7月又提出五项要求，声称"不照办将减少、停发经费"；到8月真的决定停发，并扬言将学校迁到菲律宾。9月，谈判破裂，教育部建议对辅仁大学收回自办。15

如果当时王志奇是奉公安局之命前来，看起来很象是打算再给张多加一个罪名--"勾结反动的天主教会"。

1950年秋天，中国政府决定出兵朝鲜。张从会上得知，各党派将于11月3 日发表宣言，支持政府抗美援朝。2日晚上，他主动约见王志奇，劝他赶快离开北京，因为中美即将成为交战国，没有了私下传达信息、交流意见的可能。张鼓励他继续在政治方面（而非情报方面）努力，设法使美国不把中国看作敌人。王志奇一点不紧张，他对东荪，在前几个礼拜，他还曾派人到东北暗中查探有没有这一军事行动呢。临别时，王还对张东荪说，他将邀张申府同走。

此后一段时间王果然没有露面。张夫人一次在东安市场遇到他家仆人，才知王家已经阖宅迁往香港。

这前后王志奇曾希望张替他找一个人，能在香港帮他翻译文件。后来张将上海的朱高融--他当时正在求职，也想到香港看看--介绍给他。后来朱到北京，对张说，与王在上海见面之后，他就去了香港。到任后王不给他待遇，只叫他翻译情报。他说他不愿作这种下流工作，并且断定王是一个到处骗钱的流氓。他告诉东荪先生，因无法在香港另谋生活，所以回来了--这时应是1950年底了。

没想到的是，1951年春，王又出现在北京。他说刚从香港来，住在张申府家里，接洽某种货品出口--也是得到党的特许。张东荪松了一口气，以为他又专做买卖了。没想到几句话后，就开始探询张对朝鲜战争

的看法。似乎是，他仍有关系把民主人士的意见转达到正想结束这场战争的美国。张东荪此时对他已经有所警惕，觉得这人可能根本就是个骗子，只敷衍几句，即催他快走--这是他们最后一面。

这次，王志奇是不是没有走成就再次落入公安之手，从此没再出来？两个张家（张东荪、张申府）都再没有得到消息。著者倾向认为：他这次特地从香港回来登门打问朝鲜战争事，是带有公安局的任务的。

这就是张东荪"出卖情报案"全部"叛国罪行"了。16

本著者在这里，就案情提出以下疑点：

"出卖"一节，全部通过"美国间谍"王志奇。王志奇做间谍，除了他自己的口供，办案人（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负责人彭真，以及1978年进行复审的人员）有没有掌握可以出具的证据，证明他已列入美方情报三大系统（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中任何一个部门之名册上--哪怕其下属或分支机构？

如果美方名册因拼写等技术原因有可能出现纰漏，从这三大机构已然解密的报告，包括美国、中国的专家对此段历史的研究中，有没有哪一条、哪一款，可以证明"张东荪情报"已经经由王志奇做了转交？

说张东荪"出卖"，办案人能否出具卖方获得利益的证据？如果为不留痕迹而没有保留证据，办案人能否出示对卖者当时窘迫经济状况的分析，以给出"出卖行为"事出有因的旁证？

细究张东荪对王志奇所说的"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民主人士里谁、谁、谁将来必有见重的地方"、"国家预算收入和商、农所占比例"，以及张得知"各党派将于11月3日发宣言，支持抗美援朝"从而劝这个与交战国有联系的朋友赶快离开北京，究竟哪一条超出了文人议政、亲朋间交流时局信息的范围而属于叛国？况且到了此时，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占领了平壤；志愿军已经过江，第一次战役已经打过，还有什么情报可出卖？

而所有这些，终生为国运焦心的张东荪从来没有打算隐瞒。与此相反，他最担心的反倒是自己的意见或不能发表，或为决策者所忽视。不仅对自称有能力"传达意见"的王志奇，在新政权建立的前后几年，他对公众、对共产党、对同侪（如罗隆基、梁漱溟）、对美国外交官（领事柯乐伯），差不多说了同样的话。17

这些观点与活动，包括他与美国驻华大使及驻北平总领事的交往，共产党（统战部）知道得一清二楚--无论在挑选北平和平解放"解钮人"的时候、在带人到西柏坡面见毛主席的时候、在为政协挑选民盟正式代表，以及最后郑重确定中央政府的委员的时候。怎么到了1950年收到一封关于书稿的"反动信"，就决定立案侦查了？更为令人不解的是，这封至关重要的"反动信"，在1952年大会小会逼他交待，以至最后民盟中央形成"处理文件"的时候，竟然都忘了提。事实上，在1949年夏天和深秋，张东荪等人与尚未从北平撤离的美国总领馆，一直有处于当局掌控下的、无须隐瞒的接触。仅引当时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报告：

7月17日，柯受邀请到张宗炳（Joseph，民盟成员）家。在座的有张东荪、罗隆基、周鲸文。谈了很多，很直率（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认识；对马歇尔使命的评价；对中美未来关系的考虑）。柯乐博认为此次会面毛泽东是事先知情的，并立即向华府报告。

司徒离南京返美遇到一些手续上的麻烦。柯乐博在此聚会上要求张向当局转达。7月18日再向宗炳送备忘录，宗炳说其父会转达--柯就此向国务卿报告。

7月29日，司徒致电国务院："今晨上海总领馆被一些前海军雇员所闯入，……我建议你尽快与张宗炳或他的父亲联系，请求他将此肆无忌惮之事态向周或毛报告。"

11月23日和张东荪见面时，他说原计划之函件，已于"数天之前"送交周恩来。张没有给我函件之文本。我告诉张目前（美国）对沈阳之谴责以及表达我对他给与的帮助的赞赏。

11月23日和张东荪进行交谈过程中，张表达了对最近政治局势的严重关注。我说看来目前经济问题可能更为迫切，张同意近来经济形势之严重性，但回到政治方面时，他表示恐怕国际政治问题在某种情况下，会对中国的领导人构成沉重的国内问题。……他说最重要之问题是中国究竟是自己解决问题和处理事务，抑或仅仅听从外面的指挥。

12月1日与张东荪见面，他说他在11月30日的会议上见到周恩来。周告知已收到函件（沈阳领馆），但没有提及沈阳事件。张仍未收到对该函件的回覆。张对沈阳事件感兴趣，认为问题的解决会有进展。18

这些公安机关一定清楚知道的事，在猛烈批判张东荪的时候（大学

和民盟），也没有人提。

最后，也是最有意思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叛国案，竟是"根据他自己已经供认的材料"而"撮述"的。至于结案--大造声势的批判之后，是由民盟（而非法院或检察院）的审查小组（而非专业人员）进行"审查"最后定夺。19为公民量刑定罪的公，检、法机关，居然自始至终没露面--虽然审查小组中有一位现职司法部长。

审查小组第一成员章伯钧一直随着党中央的部署行事，直到当了右派之后，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个事情一定非常复杂。我看民盟中央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

第二成员罗隆基为此而叫屈："不知道真相，可一直受他牵连"。

都说我和张东荪是一个小集团的人，可是，他的叛国案子出来，连我都吓了一跳。49年的他，还在游说傅作义放下武器，让共产党兵不血刃占领紫禁城。到了50年底，他就乐意让美国人收拾毛泽东？这从逻辑上就讲不通嘛！他和我都不希望中共外交倒向苏联、去做斯大林的附庸。但我决不相信张东荪为了这样一个政治见解，就甘愿充当什么特务或间谍，尽管他和美国领事有些往来。我和他在一起经常议论国事，比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看法有时一致，有时也不一致。难道这就是集团性质的秘密活动？什么叫共和国的公民？毛公知道不知道？20

对于"共和国的公民"，自诩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公或许不屑于理论，但张东荪"这个事情"，显然没人比他更清楚了。为讲清他怎么知道，先要说说背景。

从上边的讲述，我们已经清楚王志奇阖家迁到香港后，又于1951年春末在北京露了个面（住在张申府家21）--做生意的同时，继续打探政坛大事。这时候，如果按照朱文，他的"间谍"罪名，经"一年多的侦察"（即1950年9月至1951年秋冬），已经得到"证实"。

从这时候到1952年2月的燕京大学批斗三巨头大会，大约有三四个月的时间。由工作组张世龙的回忆文章，我们知道，在那时候，"党中央"已经通过北京市委和蒋南翔，向他们处于一线的共产党员"通气、透底"：

但真正的"新账"，也就是真正批他的根据，却是"向美帝国主义提供情报"。传达他曾拜访了还滞留在天津的美国驻津领事，向美方介绍了中

央政府刚通过的国家预算案和外交政策的讨论和抗美援朝的情报（因为张的英文口语不佳，故捎其子为译员，后来又听到不同版本的说法，这里只记当时传达，是否真情则不得而知）。但此事严格保密，不谈出卖国家机密，只是组织学生"轰"了三次，"挂了起来"。22

也就是说，到这时候，"党中央"已经定案，并做了批斗部署，只是案情中要害的"叛国与出卖情报"，对外还须严格保密。

1952年4月，在怀着义愤的"民盟北京市支部、燕京大学区分部全体盟员"，已经奉命将检讨通不过的张东荪上缴到民盟中央的时候，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还不知"底"在哪里。李维汉和徐冰或许已经知道，但对他们（包括对张东荪本人），还坚持打太极拳。到揉搓、耍弄知识人的"思想改造运动"大获全胜、运动接近尾声、彭真正式向当道报告的时候，毛泽东才正式给出他的意见，就是那则有名的饶了周炳琳但不饶张东荪的批示（4月21日）。注意此时毛的用语：张属于"个别人"，虽然已经归到"严重的敌特分子"一类，帽子还没有正式按到他的头上。

此批示之后，"学习思想检讨"运动推向对"敌"斗争的新阶段。究竟什么情况出现，使得毛泽东下了登上新台阶的决心？

2007年，当时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之秘书邢俊生回忆录发表，终于将重重帷幕拨开一角。邢在回忆了毛对徐副部长做过第一次批示后，不无骄傲地谈到又有的一次：

毛主席给徐子荣的第二次批示也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抓阶级斗争的时期，由公安部某局负责侦控的一个政治案件，通过采用技术手段，查获了被侦察对象的一些可疑活动。因为该对象是个社会名人，须及时向中央报告，又要注意保密。案件的进展情况公安部只报周总理和毛主席。上报材料不打印，由专人手抄一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签名后，以绝密件件报周总理办公室。几天后，原件退回，上面有毛主席亲笔批示："在如来佛手掌之中。"23

"只报周总理和毛主席"，正合朱振才文章《张东荪出卖情报案》所说"党中央很重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这起案件"。作者邢俊生没有提那位"社会名人"的名字。但如此郑重其事，圈子也就相当小了。读者或许记得张东荪在检讨中所叙述的与王志奇一次次交往，特别是1951年春他从香港再回北京，频频探询张对朝鲜战争看法那次，或许"技术手段"此时已然登台？眼下知道的，处于类似"社会名人"档次，而

确实给装了窃听器的，是黄炎培家。但黄之失宠于毛，要到1953年秋冬的统购统销之后。更何况，在1950年10月立案以前，并不见任何值得毛、周如此郑重对待的社会名人胆敢与当局斗法。

1952年6月6日，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批处于前台，被党派出去和资产阶级"交朋友"的统战干部，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究竟是否仍旧属于'中间阶级'"这一要害问题上，接受了毛泽东的"纠错"--阶级斗争升温：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24

周恩来也指出：

当着我们反对三大敌人的时候，说民族资产阶级跟小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那是恰当的，但是，现在不能再这样说了。25

两个月后，1952年8月，我们从上文已经知道，张东荪在民盟总部做了第四次检查。不敢不秉承统战部旨意的盟领导，和燕京斗争会时候的张世龙一样，须继续维持"通不过"。张澜不得不问个究竟了。他约上李维汉、徐冰，一同去见毛泽东。这回，毛说的是：

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

张澜做最后努力，说：

东荪先生的问题，还是从缓处理为是。

李维汉代毛泽东讲出要害：

我们不能和这样的坏人合作。他出卖了国家情报。26

读者注意，张东荪这时候还没有在民盟的会上作"供认"，而结论已由李维汉给出。

想来张澜大吃一惊之余，一定又请李维汉做了具体帮助。据张家家人回忆，就在炎炎夏日，在怎么检讨都通不过的时候，一天，接到表老的电话，邀东荪的夫人到颐和园一晤（本节开头）。张宗烨记得母亲回来之后家中阴云密布的气氛。父亲没对家人说什么，只开始准备新一轮

的检讨。

张东荪这时候已经相当清楚，批判等等都是面子上的事，不放过他的，就是毛本人。他想到了什么--早年的学术论辩？西柏坡时候的"一面倒"？新政协筹备会议的缺席（执意不去东北）？抑或1949年9月30日的那次投票？但对别的人，包括亲近的朋友和家人，他什么都没说。

梁漱溟说他本人"曾受张东荪之托"，在9月间（即张在民盟总部做出第五次检讨，"交代"了与王志奇往来之后）与毛有一次谈话：

临末，在承认张已经犯了叛国罪的前提下，（梁）说自己对张"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毛回答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会要向我们作检讨的，且看他的捡讨如何吧！"27

"秀才文人造反"--什么意思？梁漱溟那时候无论如何想不到，不过十个月之后，在毛的口中，他自己已经被作了如此归类，还扯上了我们的主人公：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棒。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28

张东荪的检讨一直持续到12月底。民盟左右两派联手组成审查小组，"审查"了张东荪的叛国罪，作出最后结论--张被开除盟籍。审查组建议"提请政府依法办理"，未见卜文。帷幕重重的历史，只为后世留下了始作俑者（毛泽东）的定案结语：

辞职，既往不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29

从9月到12月，当年切磋学问、抗击日寇、反对独裁的老相识大家齐上阵，友情、自尊、容谅、揖让……遥远得象是另一个世界。张东荪怎么熬过的？1937年刚刚与共产党联手时候所着之文，有没有时时萦绕耳边：

……所以我说独裁国家不是人格者的集团，乃是奴录的集团。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只有独裁的首脑是有独立的人格，能自由发挥其意志，得运用自己的判断，其余一切人民只能奉令承旨， 亦步亦趟，人云亦云而已。30

到最后，调整新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性格和生存状态"的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必须由他们这批人曾经最心仪、最信赖，并且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总理抛出。而在对"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作战"这样的大是大非中，周某人是不能不有自己明确的态度的。

1953年3月1日，在招待民革三中全会代表的时候，周恩来说起"民主党派的工作"如何"同国家的中心任务相配合"。他特别提到"分清敌我"：

我们的敌人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不是孤立的，是同国内的敌人有联系的。我们不应麻痹，要互相提醒，以先觉觉后觉。……（此间插了些历史上大家都曾麻痹上当的例子--著者按）公开的战争，志愿军在朝鲜打得很好；隐蔽的战争，要大家来打，不参加这个战争就不是爱国分子，不是革命党员。

民盟出了个张东荪，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任潮先生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严办，这是正气。张东荪在解放前与美、日、蒋、共四方面都有联系，有人说他是"押四宝"。

过去的事情以一九四九年为限，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就不追究了，以后仍在搞这些活动就不可饶恕了。说毛主席厚道，共产党宽大，这是对好人、对能改过自新的人而言的，如果对敌人宽大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张东荪事件应引起严重注意。31

毛泽东大获全胜。

周在这里没有提起民盟中央在其《关于张东荪叛国罪行的报告》里郑重放到第一位的"汉奸历史"，特别强调"以1949年为限"。他当然要划出这条"界限"。毛同意他如此划"限"，也是对他所持态度的奖赏。

张东荪与延安（1935）、长江局（1938）、北方局（1935-1941）、十八集团军总部（1943）、南方局（1945-1946）、调处执行部（1946）、北平地下党（1931-1949，不同时段不同部分）、老政协中共代表团（1946）、中共中央统战部（1946-）、西柏坡中央局（1948）等等中共机构，直接联络、共同战斗凡十八年。一个

受了十八年倚重与尊敬的人，有可能突然间"叛国"、"出卖情报"、"打算造反"么？

但他必须是坏人。那么，是个什么样的坏人呢？谁在这中间担关系？

伴君如伴虎。难啊。掂来掂去，十八年间，只有一个1949年之后的王志奇，是跟大家都没有瓜葛的。

非将张东荪定为"美国间谍"（或别的什么坏人）不可，还有一个插曲，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美籍间谍案"当中的"李克、李又安"（Allyn & Adele Ricketts）案。

这对青年夫妇于1948年10月从美国来到北平，在燕京大学进修古代思想史与文学。1951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突然将他们逮捕，经过十多天斗智斗勇、软硬兼施的突击审讯，李克终于承认受美国情报部门的派遣，极力搜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政治、文化情报，而且还有一个特殊使命，那就是在中国国内寻找和培植"第三势力"，妄图待时机成熟后，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推下台；并特别交代了"北京一所大学的张教授，已经和我联系过，他自称是'第三势力'的代表。他原来是司徒雷登的密友"。32

这位"北京一所大学的张教授"，是朱作家笔下，这对"美国间谍"全部交代里边提到的唯一一个名字。其实这对夫妻当时交往的，远不止张东荪教授一人。作为渡洋求学的青年学子，他们虽然拿到一笔奖学金，仍须教教英文以补充生活不足--更何况有机会直接聆教于泰斗级文化人。二人于是周旋于北平/北京教授、文人圈。从后来周一良、钱钟书等人的回忆文字里，都能寻出这两个青年与这批人的往来。对此，李克自己当时也一一"交代"了。只因为对突击抓他的公安局而言，一时没用，就一直睡在档案里，直到文革时候该整肃周一良"特务间谍"了，才再度由红卫兵小将淘出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在1951年夏天，在反覆讯问之下，在他已经供出的教授中，有了张东荪--可以结案了。

有趣的是，罗瑞卿、彭真（也许还有周恩来和毛泽东本人）出于什么考虑，竟未将机智的预审员好不容易"挤"出来的真正美国人的"间谍事实"，加进张东荪案，也就是说，在燕大和民盟中央逼他检讨时，并没布置人将他向这里引。不知因为实在说不过去，33还是觉得有一个王志奇已经够了。

更有趣的是，被突击审讯了一周，接着又经历了几桩只有好莱坞电影里才有的惊险（遭投毒、强奸，接着又都获救），这对倾慕中国文化的年轻夫妻被释放之后，直到写书、并再度回中国做生意，直到他们最后的日子，都把自己定位为欣然接受洗脑的典型，做梦都没有想到当局踌躇再三的本想由他们担负、最后又放弃了的陷罪于张东荪的打算。

东荪先生本人呢？在盟内的检讨之外……

从张家亲属的述说里，包括零星文章提及，似乎到了最后（民盟"帮助"阶段），他先是给张澜、沈钧儒写了信，34最后终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据叶笃义生前告诉著者）。这种写于"黑云压城"政治气氛中的东西，采信程度大大降低，但也不失为研究那个时代的珍贵证据。比如张东荪对抗美援朝的总评价，虽然用的是自我批判的口吻，但几乎已经透视当时的政治交易，并预见了几十年之后的事态发展：

……正值朝鲜事情发生，我当时很荒谬，误认为此事是北朝鲜先发动，并且推测是苏联事前同意的。我认为这样做就把朝鲜给牺牲掉了，恐怕第二个牺牲者将要是中国（对美国必胜的估计）。我就焦急起来，这是资产阶级狭小的民族观点在我身上作祟。同时又因为我迷恋原子弹一类武器，以至害怕起来。

遗憾的是，这几封信，都没能在毛泽东研究、民盟中央的档案夹、或者同时代人的回忆录里见到。但民盟中央、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共中央档案馆一定有。我们等着普通研究者可以依法调阅的那一天。

关于此案，所能得到的最后的公开定案文字，除了徐子荣的秘书所忆"在如来佛手掌之中"，就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对"北京高等学校三反简报的批语"所做的注解了：

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35

1978年，因为"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服过十年后获得平反的张家二孙（张宗颎的长子张佑慈），在天津通过和平区人民法院，对张家三代一系列冤案错案，包括祖父张东荪的"叛国"案，向当局提出申述。

法院很快就收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的答覆（1979年1月4

日）：

我部关于从宽处理张东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对张东荪问题的结论部分如下：

张东荪是特务分子，叛国罪证确凿，罪行严重。但对他的问题，1951年中央已经作了处理，即"不予法律处分，养起来"，此后并未发现其有特务活动。他的两本反动作品，没有公开散布，属于思想反动。现张本人已死，为使其子孙后代免背政治包袱，建议仍照中央1951年原对他的处理， 按人民内部矛盾，不给戴特务反革命帽子。以上意见，已经邓副主席批示同意。

1951年！怎么会是1951年？而且作出处理的，是"中央"--在中国，无人会误会这是除了"中共中央"以外的别的"中央"。但此前，无论是张家，还是民盟，以至整个对张东荪案关注的学术文化界（包括耄耋之年还著文言之凿凿的千家驹），都认为定性结论（至今唯一一份公诸于众的结案文字）是在1952年12月由民盟中央作出的呀！

如果早在1951年就已经结案并处理了，燕大和民盟中央1952年一本正经地开斗争会、成立审查组、撤销职务、开除盟籍、提请政府依法处置等等，又算什么？是不是这个"罪证确凿、罪行严重"的叛国案，"处理"权本在执政党，但须脏别人的手，须由一个听招呼的在野党去顶杠，担起制造这档本来应提起公诉并且由法院宣判的叛国案？

1951年！难道"处理"之后可以不向当事人和他的家属宣布？

王志奇是在1951年春末再度回北京之后消失的，在1950年1月"又发现张东荪出卖情报的第二件线索"之后的几个月，这件1949年10月还在罗瑞卿手里的"叛国"案，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考虑，移交到彭真手上了？一部早年的"反动书稿"，算不上什么"第二件线索"吧，怎么竟然惊动了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党组书记，作为"重大敌情"直接向周、毛报告？这是不是我们前边说的，张东荪在那时候，已然先被看成"坏人"、"敌人"，彭真的政法委要做的，不过是为这个新名头收集证据。

但--为什么？也就是说，到底凭什么，突然让从毛到周到彭真到李维汉到罗瑞卿到徐子荣，一下子把这名与共产党有着几十年渊源，曾在一个个关键时刻为抗日的、反抗专制的、爱惜百姓的共产党顺利得到政权

出过大力的哲学教授当坏人了？

不知道读者还记不记得，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曾经引用过的一名前中宣部干部、后来在科学院尖端科学研究所负责党的工作的何祚庥的那句话："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敌人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了。"

他们没想到什么？或者说，"敌人"究竟干下了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大恶？用何同志的话说，那就是，居然在1949年，就"会有人投（毛主席）反对票"。

1982年，在全国上下挣脱"凡是"桎梏、反思历史功过的大潮中，张东荪长子、北京大学教授张宗炳直接致信邓小平，历数父亲劳迹，要求对他的一生做详细的调查，给出一个公正的评定--不见答覆。他只好不停地致信白纸黑字地制造了这起案件的民盟大小领导，最后直接写信给当时的公安部长。三年后，得到公安部回覆：

张宗炳同志：

你于今年九月写给阮崇武部长的信已收悉。关于你父亲张东荪的问题，我们查阅了历史档案，作了认真地研究，认为公安部一九七八年十月进行复查后，36决定仍维持一九五一年结论，即"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特务、反革命帽子"，是正确的。既尊重了历史事实，又体现了党的宽大政策，希望你能多够正确对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原来，1979年法院和统战部答覆张佑慈的时候，用的是公安部的复查结论，不过没有明确告知而已。

专政机关终于正式出面。

回覆中关键的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特务、反革命帽子"。如果说在1951年（或民盟中央定案的1952年），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尚未制定，权且如此定论；到公安部1978年"复查"和1985年"认真的研究"，审查对象究竟是不是"特务、反革命"，总该有法律依据（包括规定）了吧？

在这则答覆中，涉案公民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比如知情权、名誉权、复议与上诉权、行政诉讼权等）都不见出示，只让子女"正确对待"。

正确对待什么？对待一个从未向本人宣判过的"特务、反革命"案么？对待给一个公民、一个家庭、几代成员造成长达数十年的没人说得清、也没人敢问的政治案件么？是不是到了今天，还要共和国公民不问条款、不问程序，只一味遵循专制古国驯民良臣的规矩--体恤上意？

读者一定已经注意到公安部批复的时间：1985年12月。这是"新中国"少有的开明时光，是当政的共产党第一次对自己错误做有限反思、力主平反冤假错案的年代，总书记胡耀邦并以此非同寻常地大得民心。不仅当年一同被逼着承认"美国特务"的陆志韦校长在三年前就获得"彻底平反"，几十年众人噤若寒蝉的"汪伪奸细"潘汉年案，也在重新评价全部历史案卷后于1982年见了天日--这可是毛、康昧着良心栽赃自己出生入死战友最为骇人听闻冤案！更不要说五十五万右派，以及著名的三大党内文化人（胡风、冯雪峰、丁玲），连时间更为久远的王实味案，和涉及苦主不那么赫赫的《武训传》案、俞平伯案、张志新案……，都有执掌大权的人在过问--出头见天，指日可待。就连当初处置"张东荪叛国案"的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崔月犁、北京市公安局的冯基平、邢相生、狄飞、齐超……，　　以及民盟的诸位（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叶笃义），都已在政治上恢复了名誉。

张佑慈、张宗炳这时候怎么能不写信申诉呢37--向他们认为有头脑、有良知、有历史见识的权势人物？而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答覆，不仅张家人万难料到，就是费孝通、叶笃义和后来注意到张东荪的学术地位、从而介绍他的观念、研究他哲学的一代又一代学人，也弄不懂吧？

著者再次在这里作出推测，就教于五十年代的定案人员、公安部1978年和1985年对原案作出复查和研究的人员、彭真和李维汉的传记作者，以及就复查研究结果作出"维持原结论"的决策人（比方说，阮崇武前部长，邓小平前军委主席）。

在1985年那样的大背景下，对一个从表面看，不过经大批判（燕京批斗）哄起，靠一级准行政机关（民盟）审查，最后由毛泽东口头定罪的案子，三十二年之后，在改革、平反与加强法制建设的热潮中，经专业人员复查、邓小平批准而依旧"维持原结论"，实在太特别了。那缘由，是不是只有一个，就是如今还在台上，并且努力维持毛泽东光辉形象的共产党，特别不愿提起这个案子。而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此案，并不是第一回，1957年就曾有过。当时，民盟正在大造革命声势，大杀"章罗联盟"右派威风，面对强词夺理、拒不认错的罗隆基--

民盟中央吸取教训，秣马厉兵整十日。这其间于（1957年）8月28日下午三时，在沈钧儒家中，举行了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会上，史良报告：（一）罗隆基交代与张东荪的关系问题的这部分，因涉及张东荪叛国案，《人民日报》未予发表。这是中共全面考虑问题，是正确的。……38

中共全面考虑的是什么--哪怕牺牲批判的力度，也不要再提这案子？读者切记这是在1957年和1985年。那时候，中共最讨厌的国际特赦组织的名单里并没有张东荪，世界银行也不会以此在贷款上要挟。

那么，究竟为什么呢？

1949年9月30日开箱唱票之后，还有第二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一个地唸着十六名中央政府委员的名字的时候，承受着全部光荣的毛泽东心襄总像梗着一块什么东西：对投了自己一票，他是知道的。那么，那唯一的反对票是谁投的呢--所有代表都经过精心挑选啊！就算这一票对他当选主席、对他接受献祭、对他日后发动镇反肃反、大跃进文革、包括清肃自己前战友……都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这么大一个国家都拿下来了，这时候跳出来找别扭……谁呢？他感到某种潜在的挑战，感到专制者精神征服的不惬意、不圆满--太想知道这人是谁了。

其实，在9月30日政协大会选举之前，周恩来、林伯渠还曾发出《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党组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党员代表负责保证选举获得成功，特别要保证投党外人士的票。毛泽东特意提醒党内：我们要有精神准备，即使有几十票不选我们，也一点不要难过，不要表示不满，而要看作是全体代表中真实情况的反映。39

真实情况几小时后浮出：不是几十票而是只有一票。他高兴抑或不高兴？

我们知道的是，到1999年，在何祚庥与其部下（张宗烨）私下谈话之外，又一名前公安部办公厅干部写出了自己和同志们对这一票的见识：

还有一件意外的事。会议最后，全体代表投票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我负责选举全过程。在选出的监票人监督下，打开票箱计票，突然发现毛泽东少了一票。再反覆计算，仍然是少了一票。大出我们的意外，大家认为选举毛泽东做新中国主席，不仅是全体代表，也是

全国军民众望所归，绝对一致的。缺一票，太不应该，大遗憾了。于是我去报告周恩来同志，并反映选举工作人员意见，这一票可能是写票人一时疏忽，可作为废票处理。周恩来马上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从容地说，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 要尊重事实。这项表决结果就这样记入史册。它反映的不是缺一票的遗憾，而是反映了毛泽东尊重事实的态度。这是极其珍贵的时刻，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仅如释重负，而且为之感动，留下了深刻的回忆。40

奇怪的是，怎么周恩来和文章作者王仲方在当时都不认为可能是毛泽东没有投自己的票？而毛从容地说的那番话，代表他的本意么？对此作出回答，绝不是王仲方辈可望可及。更何况，那时候，他们做梦都想不到毛多年后，会借"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对自己有如此招供式的描述："我是不看话剧的，因为我天天都在演话剧。"41

还有他那一套又一套生动、形象、令人难忘的台词：

人人都犯错误，只有高岗除外。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原则"于他，总是随着形势、随着对象、包括随着他自己的心境，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对此，周恩来了解最透。否则、这则报给他的"少一票"本属常识的事，还须马上向毛泽东报告？

况且，就算毛1949年"十一"前后表现得不怎么在意，一年后呢？美帝逞凶狂、资产阶级翘尾巴42的1950年呢？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从所有可以收集到的资料，在这宗"叛国"案中，毛泽东从来没亲口说过"叛国"、"间谍"等有实质内容的定性之语--对王实味他还说过"叛徒、内奸、托派"--对张东荪，他只说"坏人"、"再不要见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

毛泽东作恶不少。眼下世人所知，多数属于秦始皇、张献忠者流所造之大恶。如此狭隘刻毒、睚眦必报，非但不能令专制者增加威势，只显示其心理阴暗--还是不提也罢。

毛从来没有服膺过谁，对他而言，不管你强盗、和尚、教授、戏

子，对于只问"谁主沉浮"的强虏大枭，此时彼时、"有用""没用"而已。就算看上了什么人，也极少慷慨施恩；而获得点滴甘霖者，无不感激零涕。给一个人那么大的恩惠（读者还记得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军委来电"么？〉，不肝脑涂地而反咬的，非张某舍其谁？捂不热么，那你就等着……（读者在这里或许记得毛泽东当年说"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给他回信，说改成"唯我英勇红军"为好。此时距1959年庐山会议有二十多年呢！）但这事怎么看怎么有点下作。虽然出了气，很容易让人瞧不起。所以，在硬撑着共产法统的尴尬时代，事情干过，人也灭了，顶好不要再提。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在1978年至1985年间，有一位当年直接插手者，不仅在世，还绝对不可无视地"在位"--彭真。是不是邓办、阮崇武等，或问到、或用不着问，就已经周到地顾及到了这一点。

但是，就算那些围在毛的身边，以窥探"当今"心思为自己终生职志的佞徒，能把检过的不记名票再检个遍，他们又怎么知道这张不可饶恕的叛逆之票出自谁人之手？

让我们试着想像当时的情景：

票箱开出来了，票数统计出来了，点票的人惊慌发现，五百多投票者里有"谁"（仅一人）不拥戴毛--经上报，大家接受了"情况正常，不去管它"的处置。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仗还在打，土改、镇反、肃反、工商业调整……毛多么忙啊，但这个"谁"，有如芒刺，不时在他心上不轻不重地刺一下。

他观察着他们，近臣、僚属、马屁客、得意的和失意的……五百多人哪！

1950年是否入朝作战，那么多老战友不同意他。带兵打仗、筹备粮草的也就罢了，竟然还有人想翻老账：翻出已经成为过去的"一面倒"--梁漱溟、李维汉、周恩来当中的谁，还告诉他，东荪先生意有所进言。他的不快加甚……他搜寻那根芒刺的范围在缩小……

1950年，1951年，向他输忠，多少机会啊，该有"态度"的都有了。他倒要看看这"打算进言的"有什么要说。当年华北政府请他请不到；东北政协筹备会也不去；"和平解放"那么大荣誉单给了他；一次次问他职务安

排……几个人攀得上？政府委员/政协委员双待遇，他居然让出去一个……好嘛。

估计就在这时候，他发下话--可能在谈笑中，可能在会议上，也可能只有身边人在场……，总之，一定是他本人而绝对不会是第二个人--让同志们注意一下那个曾经跟咱们走得很近，但与美、蒋有太深渊源的燕京教授。他可能只淡淡地说，甚至笑着说，　　但跟了他几十年的听者什么人？非要发文件才掂得出斤两？罗瑞卿开始动作，让他的手下"翻翻旧箱子底"；当然新线索也别放过。划拉一阵之后，得到了张某在1949年初和一个混混的往来；那年秋天的电台就算没挂上，到1950年9月，又来了一份"反动书稿"。不大够份量。这人和美国北平领馆往来频繁，要不然像沈阳领馆案那样来一下子？估计这主意一定为周恩来所坚决反对。那么折衷一下，把曾经往他家里跑的美国人李克抓起来？

罗瑞卿如何敬业、如何忠于毛，只要领袖发了话绝不问为什么，望读者参阅杨奎松关于镇反的研究。罗的夫人郝治平1966年3月间（文革前罗突然遭拘捕的"三月会议"）曾说过一段话："最让瑞卿受不了的是说他反对毛主席……说得多么刺耳，他还是听，还是每天都去。而且坚持不能说的话就是不说。有一个公安方面的事情就更不能说了。"43　　--这桩"特务叛国"案属不属于她说的不能说的"公安方面的事情"？

问题是，那张选票的事，毛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么告诉他们的。或许就在他得知"东荪先生意有所进言"之后？

终其一生，关于这张选票，张东荪没说过一个字，无论对他的挚友、儿孙、他以沫相濡的老妻，以及在最后时刻到颐和园向他"交底"的"圣人"张澜。他不说，因为投票，这是属于他个人的神圣权利；他不说，是因为突然明白，原来这样一件普通的事情里，竟蕴含着毁灭性危险--他不想给他已经挣扎在生活边缘的亲人再增加无以抒解的惊惧；他不说，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层：不就是投票么、怎么了？他自己还丢了几十、上百张呢（张东荪是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获选委员中得票倒数第二者）。他是一个思维缜密但心地单纯的学者，没有能力揣度当了皇上的农民，对"冒犯"怀有的切齿之恨。

毛呢，他说不说？从白纸黑字的资料看，他也没正式说。但是，且慢，他不说，自有他的喽啰替他说。不仅叙事性地说，还要上纲上线地说；不仅私下里说，还要堂堂正正地、充满阶级感情地说；不仅小范围说，还要让同志们都知道，从此提高革命警惕，巩固无产阶级大好江山--

这就是我们在本书开篇的时候提到的那个党内传达：从中央直到地方，直到支部书记，就党和它的领袖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发出的层层告诫，同仇敌忾力剿那个划了十恶不赦的"×"人（或者没有划"∨"的人）。

我们知道，何祚庥对张宗烨谈起，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他作为党的基层干部得到传达，估计是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报告）、匈牙利事件和八届二中全会那段时间。44想来正是在那样的"大气候"下，高瞻远瞩者作出决策，将反对毛主席这一"现行"（"那么早，在那么小的范围内"）提供给同志们，以证明阶级敌人就在身边。

老共产党员、中宣部优秀干员、中国科学院和工程学院双院士、反"伪科学"与"伪环保"的坚强斗士何祚庥，就是这一毛式"大说"真心诚意的接受者和拥戴者。虽然对他颇能干活的下属（张宗烨）心存爱护，但对"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的敌人，绝不能有丝毫怜悯。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欲加之罪"已经成了层层权势者常规杀具。李维汉在1957年夏天如何布局，江青和叶群如何帮对方灭掉仇人，已经是大家熟知的史实。张东荪案呢，灭掉他一个，大家就平安了么？

1968年4月4日，叶笃义被投入秦城监狱，接受当时最高当局中央专案小组审查，凡四年四个月。最后结论十条，三条涉及司徒雷登，七条关联张东荪，包括：1938年同张东荪一道去汉口，阴谋向蒋介石建议割让东三省，承认满洲国同日本媾和；1943年代表与王克敏早有勾结的张东荪，到解放区同十八集团军领导人签订"七七协定"；1946年由张东荪介绍认识徐冰，将徐冰交给他的情报报告张东荪和司徒雷登；1948年伙同张东荪介绍彭泽湘给司徒雷登，阴谋搞"二李合作"，阻挠解放军攻势；1947至1948年，接受张东荪按月接济；1949年与张东荪一同见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伯；1951年得知张东荪见过傅泾波派来接他老婆的朋友姓陶的，却隐瞒未报（全部十条，均于1984年9月8日的中央统战部致民盟中央的覆函中获彻底平反）。

恐怕没人认为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专案组，在文革期间会有调阅不到的资料。但在叶笃义间谍案中，少了一则重大定罪证据：王志奇。1952年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定罪的特务王志奇（"与美帝英帝都有联系、把国家重要机密供给美帝"），到审问叶笃义的时候，什么都能硬编，连"姓陶的"、"刘进忠"（叶从未听说）、"卢广声"（仅知他常到民盟闲谈）都问到，唯独这个与他曾有正式交往的王志奇（1945年王为《正报》社长，张、叶为撰述人），反倒一字不提。负责叶案（以及张东荪

案）的一拨又一拨"解放军"提审人，不可能忽略这份最现成、也最扎眼的案卷。究竟是谁，又为了什么阻拦他们使用？彭真、罗瑞卿当时已成阶下囚。莫非周恩来、乃至毛亲自过问的这一栽赃，已如封住的粪缸，再去翻它反添恶心？

诸位想知道进入"和平解放"了的五代国都，从双清别墅移驾中南海之后，无产阶级战士毛泽东如何看待自己么--在1950年五一节口号里，本没有"毛主席万岁"，后来大家振臂高呼，而且从此高呼了几十年的这句紧随"大清皇帝万岁 万岁 万万岁"之后的谀词，是他自己亲手加上！45

也许有读者会说，这张选票或许有，但未必出自张东荪。毛，还有彭真、周恩来他们猜错了。有可能。这样，我们上边讲的故事，就是一个被错疑了的人的惨烈经历--这样的人和事，在中共和苏共历史上，还少么？

我们等着这一天：公安部1951年定案、1978年复查的卷宗对公众开放。

张家从此再也没有给当局写信。张东荪，与他的老友章伯钧、罗隆基，还有主持《观察》、发表他文章的储安平等人一道，成了为维持毛泽东的伟大、光荣、正确的祭品。所幸共产党已经不能一手遮天--神坛不再，将祭品撤下，还原成活生生的、不肯驯顺地匍匐在专制者脚底下的人的一天，已经到来。

至于王志奇，如果没有毛泽东经手的张东荪"叛国案"，这个小商人、小说客，以及公安小朋友，可能像其他成千上万这类人一样，早就给赶到国外，或发配到什么地方去了。不幸牵涉到这样重大的政治策划中，估计只有瘐死狱中一个结局了。

他可能到死都没参透自己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扮演的角色。他的后人呢，他们在哪里？

在一个继承了《资治通鉴》、《三国》和《水浒》全部政治智慧，在一个以"大同"、"共产"、"民族复兴"为招晃而诱骗理想者，在一个依靠强夺农民、工人、商人和职员的膏血而张起来的"如来佛手掌"里，无人得以逃遁--可惜，这命题只彰显于最终以"斗战胜佛"而修成正果的孙猴子身上。

专制者剿杀思想者独立精神的战役中，"如来佛手掌"或许没那么神力

无边，因为肉体可以蹂躏，精神与理念却是无形的。对宪法、公民等等，毛公或许不屑一顾，但他难道忘记，在中华民族精神遗产中，还有所谓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与富贵不淫……，更何况，随技术进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正逐日里享受着现代社会的淘洗？

注释

1、许宝骙，1909年生，1932年燕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广州、北京多所大学任教，"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发起人之一。1949年后任民革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至1966年，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负责审稿工作，后任《团结报》总编辑、社长等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著者1995年就东荪先生生平事迹上门叩问的时候，除了一句"不同意君劢先生那样写呀"（指《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当年叱咤风云的许先生已不能思索。

2、于长治：《共和国的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四川党史》，1999年第4期。

3、自九十年代中、晚期以来，有关张东荪的著述，生平研究时有出版，凡涉及主人公的"叛国案"，或言辞闪烁，或讳莫如深。这则短文，可看做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张东荪案"信息提供最具体，描述也最为"板上钉钉"的一篇--而且出自内部专业人士之手。

4、朱振才，河北景县人。现供职于北京市公安局，从事党史、公安史的征集和研究工作，侧重于对北京反间谍斗争史料的征集和研究。1984年开始发表文章、纪实文学。《保密局等待的第215次发报》、《张阴梧案件》、《一起惊动了李克农将军的特务案》等引起关注。史料专题《北京解放初期的反间谍斗争》荣获1994年北京市第二届党史征研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担任《北京技防工作室》一书的副主编，并亲自撰写了该书的重要篇章。《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纪实》（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是一本颇有影响的文集，共收录二十一个案例，包括多年前（网上发表）旧作《张东荪出卖情报案》。

5、徐书麟主编：《月犁--崔月犁自述及纪念文章》（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页66。

6、语出张鹤慈。林嘉通，1940年代燕京大学教务主任，张东荪之甥婿，林巧稚之侄。那台无线电台，参见张东荪：《狱中生活简记》，

《观察》，1947年7月。

7、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页83。

8、司徒雷登1949年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返回美国，随行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司徒雷登当时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麦卡锡分子盯上了他。五十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像有名的中国通费正清都受到围攻。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当然也不能例外。国务院中国处的人专门向司徒雷登传口风：不要乱说话。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刚回美国后，采纳了傅泾波的主意，没有辞去大使职务。当时他们有两个考虑，一是担心美国派新的大使去台湾，给美中关系造成麻烦；二是从现实着想，不辞职就可以继续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千多美元。但两三年后，美国国务院还是从多方面施加影响，司徒雷登不得不辞职。辞职后就没了薪水，美国的一家慈善性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每月给司徒雷登六百多美元的生活费。参见王如君：《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环球时报》，2002年8月12日。

9、1950年7月中旬，全国开展了以仇视、鄙视、蔑视美帝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同时组成东北边防军。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10、霍英东一直谦虚地表示：抗美援朝联合国禁运期间作特货，并不缘于政治觉悟特高，而是"一盘生意，一百万货品可获利二十万"。高瞻"2001　年接受台湾间谍组织的任务，为其收集情报，犯间谍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经美国和国际人权组织出面抗议，中国政府在宣判之后就把她驱逐出境。后来美国发现她在出售给中国的商品中含有禁售给中国的军事物资，又反过来将她当作中国间谍抓起来。涉及双重间谍案的美籍华人陈文英，曾于2005年12月就两项罪名与联邦检方达成协议，获判缓刑三年，另加一百个小时社区服务。

11、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86），页213。

12、何雨文：《中共财政解剖》（香港：亚洲出版社，1953），页

26。

13、萧济容：《中共的财政收支》（香港：友联出版社，1954），页8。

14、杨奎松：《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六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预测》，《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

15、马永顺：《周恩来组建与管理政府实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页5。

16、以上对张、王交往过程的叙述，全部来自张东荪1952年9月至12月在民盟中央的扩大会议上所做的《第五次检讨》、《补充检讨》、《补充检讨再补充》、《补充检讨事实部分再补充交代一个事实》。民盟就此案的调查并定性，源于同一批资料。有兴趣的研究者可前往调阅。

17、张东荪在民盟会议检讨：一、陈锦坤去延安的时候，曾有信给毛主席，希望对美态度缓和。二、我曾在《观察》杂志上发表数篇文章，指出我希望中共与美帝缓和的思想，目的是给美帝看的，使美帝不偏面援蒋。三、民盟约魏德迈谈话后，又在南京民盟总部由罗、黄、章和我四人，邀他的随员司布劳司来谈。我们主张美帝使用压力使蒋下野，使战争早停，恢愎谈判，并且希望美帝不与中共对立。四、我在重庆时候也曾将这样的缓和美帝与共产党的、与民盟和中共的想法与小民盟的一些朋友谈过。

18、柯乐博致电国务卿，转引自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页168-175。

19、审查小组由章伯钧、罗隆基、史良、胡愈之、许广平、曾昭抡、吴晗七同志组成。盟内右左两派领袖人物张澜和沈钧儒未列名。他们审查唯一的依据是被整肃者的"口供"（或曰"检讨"）。同案犯王志奇的供词既没在会上，也没在结论中提到。参见民盟中央"关于张东荪叛国罪行的报告"。

20、转引自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页333-334。

21、就友朋间交往而言，王志奇与张申府、刘清扬的关系并不在张

东荪之下。但如此一桩间谍案，既没有要求他们出面作证，对如何安置他们， 也看不出任何直接影响（张申府到北京图书馆；刘清扬到全国政协）。

22、张世龙：《燕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纪实》，载《燕园絮语》（北京：华龄出版社，2005）。

23、邢华俊生：《我给徐子荣当秘书》《2007年1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网站。

24、毛泽东：《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页65。

2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6、以上对话，见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香港：时代批评社，1959），页232。

27、李渊庭、阎秉华编：《梁漱溟年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206。

28、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年9月16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107。

29、周鲸文：《风暴十年》。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东荪有一份薪水，随时可以要车。结论一出，这两项停了，仍享受教授待遇，直到反右运动。

30、张东荪：《思想自由问题》，《文哲月刊》，第1卷第10期，1937年。

31、周恩来：《民主党派的工作要同国家的中心任务相配合》，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页242。

31、朱振才：《新中国"大墙"内的一对美国间谍》，载《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纪实》，页162。

33、这个案子也是只有口供而无旁证。间谍李克的派出机构、联络人、经费、情报去处……无一落实，案件的"成功破获"，只有罪犯本人的"认罪态度"--那时节已经好到成了"红色中国宣传家"。和张东荪案一

样，李克、李又安案件，在美国外交、情报部门公布的档案里，至今未见令人信服的记载。

34、同注11，页214。

3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页422。

36、即上文1978年东荪二孙（第三子张宗颎之子）在天津通过和平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述，转到北京后，公安部的复查工作。最后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于1979年1月4日函覆天津和平区人民法院。

37、张家孙辈张佑慈1979年申诉后，子辈张宗炳1985年2月直接就父亲张东荪案致信邓小平。不见回覆。3月，他将原信转致当时的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不见回覆。4月，再写信给民盟秘书长高天（共产党员〉；月底再致信与父亲有将近五十年交情的民盟副主席叶笃义。终于，到了6月底，一名名叫金若年的民盟中央工作人员，"到北大找了"盟员张宗炳，再次传达统战部给他的侄子的复信，并强调"邓副主席的批示"。本来在劝说下答应不再申诉的张宗炳，想想实在气愤难平，又在9月间直接致信公安部长，于是有了文中12月13日的回复。

38、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页349。

39、郝在今：《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页356-357。

40、王仲方：《我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人民公安》，1999年第1期。

41、1962年陈毅在广州文艺工作会议上的传达。

42、望读者注意笑蜀著作中对毛心目中"资产阶级"的界定：经济层面、思想层面与政治层面。此时最让他不快、也最具挑战性的，应是思想层面的资产阶级。参见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

43、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页206。

44、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认定，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23。

45、朱德秘书告诉李锐。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ECP出版社，2004），页45。

三 囚人·思想者

大会斗争、小会批判、呼口号、流眼泪……终于留在了1952 年。1953春天，党觉得"虚"已经"务"得足够，该"落实到组织上"了。

这年春天，民主人士们--他们对"如来佛掌心"这一概念还不大明细，但终于从"功臣心态"中觉醒，开始懂得什么叫"夹起尾巴"--纷纷开会，向共产党亮出自己的新姿态。共产党则一一抚慰，指明前程。

周恩来对张东荪案正式发表意见（"押四宝"），就是在这年的3 月1日。

总理讲话是在民革做的，但民盟能没有个"态度"么？6月，民盟一届七中全会（扩大）会议闭幕，主题就是对张东荪的揭露和处理。虽然沈钧儒在报告的时候，纲上得很吓人，诸如"一贯仇视马克思主义、仇视苏联、仇视共产党的思想，出卖祖国、勾结帝国主义……，中国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派在我们新中国的特务"等等，但最后落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倒也还注意到自己的权限："开除盟籍，提请政府依法处理。"

"政府"是谁--公安部门还是检察部门？宣判应由谁和通过怎样的程序作出？而且，一个在野政党（权且认为得到正式注册），有没有权力和资格对自己成员的"叛国罪"（而非"叛盟行为"）作组织审查？审查之后，究竟应依照哪部法律的哪些条款，通过怎样的程序予以举报？所有这些，恐怕不仅当时的报告人、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不知道，审查小组成员、司法部长史良也"懵嚓嚓"。或者说，他们什么都清楚，1但更清楚的，则是怎样在共产党手下行事说话。就当时和后来公开的文字证据，2似乎是，对于这桩"叛国案"，到民盟的会议开完，主角张东荪的盟籍被开除掉，广大盟员受足了警戒与惊吓，就没人接茬儿了。"政府"不知该怎么"依法处理"，只好按照毛主席"养起来"的指示执行--"叛国案"就这么无人能知深浅、无人敢置一词地放在那儿了。

燕京大学已然撤销。北京大学全体和清华大学一部分，加上燕京的可留人马，都集合到未名湖畔，合并成"新北大"。

他回到已经更了名的校园。

没有片言只字留下来，昭示张东荪在此时，对自己这番"天上地下"的遭际，有过什么样的分析。不错，1948年的时候，对这即将来临的新纪元，他曾引庄子"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牟宗三对此的解说是：这确是一新时代，你们或者完全相信，或者完全不信。一点一滴的赞成与不赞成完全是无用的。不但无用，也象征你完全不解。你不解这新纪元的全幅来历与全幅内蕴。3

张东荪应该知道，一句"不能坐在一起开会"所具的份量，但作出解说--"亦觉人生百可疑，堪怜唯识此几希"了。4

他有没有想过那张选票--可能根本没有。除了鲁迅所说的"光明心地对阴暗、卑劣无法揣测"--所有1949年后堂而皇之的政治运动，与毛得票575张看不出丝毫联系。况且，直到参加第一届新政协的筹备会议，他对共产党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府，尚有比较乐观的估计：

革命只有在变更政府现状的那个短期内才是革命，过此即不能算革命，而应立刻即当走上建设之途，不复再是革命了。革命不能旷日持久的延续下来。5

而倡导民主，获得拥戴，对已经取得成功的领袖，哪怕仅就个人素养而言，自应是民主社会的典范。也就是说，他与他们应具有：

自由讨论的习惯，有肯与他人调和的性格，有在真理面前自甘让步的气量，有据理力争而不伤和气的胸襟。6

当然那时候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向毛泽东要求"雅量"的场面还没有发生。也许此后他才会想到，容忍治下草民（包括下属）本属于公民天然权利的"独立判断与自主意志"，对独裁者而言，是怎样的苛求。他还记得那回么？一次毛请张澜吃饭，张澜事前问他们大家有什么意见要他吃饭时向毛提。他说了关于大学改革以及工商业调整。过两天，毛见到他，径直问道："表方那天提的意见，是你让他提的吧？"（张饴慈述）他和表方哪里知道，这时已不是1946年。毛肚子里打的，已经完全是另外的主意。比如"加快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

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7

燕东园34号早在斗争会之前即已调整给其他人，张家从那栋住了将近十年（日据时候被大兵占据）的小楼，搬到校园内靠近未名湖的朗润园178号。当时给出的理由是为"车"的缘故--那部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配给他的车须放在校园围墙内。可发表于2008年的周启博回忆8讲得再明白不过，共产党员、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不仅一家一栋住在燕东园，他的专车曾在燕东园过桥时碾死另一位教授樊弘的外孙。1953年以后，张的车没了，作为委员的一份薪俸也同时撤销--未见任何程序，比如第一届全国政协的哪次全会或常务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哪次会议做出正式的委员资格撤销决议。

这是一东朝南带暖阁的中式平房，先是一家一栋，后来两家合住，邻居是懂哲学的英文名师胡稼胎。五十年代初，赵萝蕤博士（即前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公子）被任命为燕大的西语系主任。她以为战争过去，国家安定，燕京将大发展，遂努力以她个人的关系与魅力网罗人才。1949年前后，与胡先生一同被她"挖来"的还有俞大絪，以及赵系主任在芝加哥大学时候的学弟、"不远万里."越洋而归的巫宁坤。

当时，张尔田夫妇（孙辈们称"大爷爷"、"大奶奶"）均已过世。东荪长年来谨奉兄长为人处事风格，"寡嗜欲，自奉约而与人厚"，在燕东园，寄住在张家的亲戚没有断过。但到了这时候，只剩下一位孙辈们的"姨婆"--东荪夫人吴绍鸿之妹。

"姨婆"嫁到蓝家（蓝公武的兄弟）未久夫婿弃世。青年守寡的蓝吴氏一直随姐姐住。她正读大学的独子蓝文谨（张宗烨的表哥）住在学校。那段日子，唯一一桩让东荪先生表现一点生之乐趣的，就是这青年的婚礼。他毕业并且成家了，喜事由蓝家操办。宗烨记得：

那次，我们全家都去了。特别记得爸爸说："尽管我这个人现在是受批判的，还是要讲几句话。"1950年以来就这么一次，他自己说想讲几句话。

课，当然不会再安排。东荪先生有时候还到系里走走，但也不过两三次--想来场面相当尴尬。

他终于有了闭门读书的时间。读什么呢？从后来的诗作里，知道他

那时候曾拜读《南华经》（"金风拂地已添寒，一卷南华到夜阑。"）。但专业研究，特别是追索西方哲学前沿进展的旧习难改。对此，我们的主人公颇觉痛苦（"久恨乏书堪供览，倘逢旧友劝加餐。"《答谢戟门》）。与别的同样处境的人不同的是，淡巴菰，与之相伴已经半个世纪的香烟，居然戒掉了--虽然显得颇为失落、孤单：

忧患相依淡巴菰，一朝轻别亦何辜。

倘能健饭初堪偿，况是幽居更觉孤。

留眼看云犹昨日，回肠荡气失前吾。

海滨旧侣书来问，却报诗思近渐无。

没有报刊供浏览，他开始动手翻译休谟的《人类理解力》，那首"人生可疑，识此几希"的《浣溪沙》就写于此时。

这本译著未见出版，手稿也已不知去向。

一幅加框的字依旧挂在壁间。那是一通暂可称作"横联"的信笺裱糊集合，是北平围城解钮一年之后，他的一批老朋友兴奋感念之余，专门写给他的。第一封是邓文如的《围城四章并序》：

戊子之冬，幽都罷兵。城守二十万人，攻者或三倍之。生灵百万，不自意能全，将与宫室文物同烬矣。东荪先生爽然伤之，徒步两军间剖陈利害，释兵解大难。万姓欢呼，出于意外。

东荪儒者也。儒者济物仁民其功伟矣。三十年来竞言爱国爱民者，不能与之比量也。既许为文辞以称美之，越岁成此诗。惭□荒率奈何？

常山东走气纵横，

渤海湾环拥旧京，

阅世□□知古树，

有人留□梦春明。

千门尚耸凌霄阙，

万户曾辉不夜城。

说着兵戈频大息，

露盘多少泪珠莹。

才忧鼙鼓遍诸方，

一夕郊原赤帜张，

倦眼嫩舒唐社稷，

御沟还绕汉宫墙。

遗民泪共围城□，

匹练光摇北斗长，

不道回天真有术，

春风拂面柳轻扬。

不识青鞋竹杖藜，

冲寒冒雪走东西，

军中刁斗容长楫，

席上琼瑶劝短提。

一语解纷欢玉貌，

万家赊死颂金泥。

输□虎帐归来日，

细与蒙庄论物齐。

老病常□九转丹，

养生争似有生难。

愁来纸笔妨人识，

乱后莺花带泪看。

大好心期聊□远，

无多酒力勉加餐。

诗成已是隔年事，

回首惊魂总未安。

庚寅元宵节文如居士邓之诚书于成府村居之五石齐（邓之铖印）（文如）

第二封信出自时任燕京大学艺术史导师，名列"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调寄《满庭芳》，外加对当时情势的描述：

万姓生灵，五朝都会，千年文物风流。

重楼连榭，歌舞不知愁。

一旦风云变色，覆巢下，完卵难留。

堪怜见，铜驼荆棘，洒泪对神州。

书生凭舌战，折冲杯酒，慷慨陈谋。

顿日消雾瘴，浪散浮沤。

尚有东园桃李，春风待，还自归休。

何须论，名山青史，一笑付阳秋。

日敌降后，疮痍未复。蒋氏重为内战，不惜民命，人所共愤，众以违离，不旋踵一败涂地，兵火迫于燕郊，两军角抵，玉碎堪虞。

东荪先生倡议和平，乃冒险入城奔走斡旋，以为保全。予则追步骥

尾，聊效赞襄议定。君更犯风雪、冲锋镝，以至蓟东。杯酒之间，化雾瘴为光明。阁□无扰，万姓腾欢。功既告竣，君乃归去，重执教鞭，予亦埋首窗几，更理旧业。书生之事，不过如此。从兹干戈永宁，车书混一，得为太平之民，何幸如之。南宋徐君宝妻，有满庭芳词，烩炙人口。因效其体为赠，惟哀乐迥异而工拙不同耳。

庚寅上元后二日 中州 张伯驹（丛碧）（张伯驹印）

对于自己当时的努力，丛碧自谦为"追步骥尾，聊效赞襄"；而大事过后，"君乃归去，重执教鞭，予亦埋首窗几，更理旧业"--多么可敬可爱的书生本色。

此外还有林宰平的五言长歌，以及当代人已经相当陌生的西洋史专家傅岳棻（《望海潮》著者，时年已逾耳顺）；及齿序更长的国文系教授、中山公园董事长夏仁虎（1874-1963）及巢云的诗、词。横联的最后，是东荪自己的补叙：

戊子冬，北平围城。余与刘厚同、侯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当时虑或不成，慄慄为惧，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义之，有此题詠诵。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因装成幅，留示子孙。东荪自识

读者或许记得"补叙"中开列出的四位，正是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军委来电"中提到的傅作义的老师和知交（刘厚同）；李济深代表（彭泽湘）；以及平日散淡，有了大事却不让人后的侯少白和张伯驹。东荪在这里没有提到其实也相当关键的何其巩（克之），想来没有把这位前市长看作是民间人物。符定一他也没有提，个中缘故只有留给国史家了。

后来，还有一诗记叙此事，但已是从朗润园再遭驱赶，迁到校园外之后--而文如也已在严寒中遁世的1960年：

追题文如围城四章诗后

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

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

月明犹见旧山河，搔首何堪问逝波。

我感微生君辱笔，人间热泪已无多。

悬于墙上的另一幅是宗炳的朋友蒋兆和为东荪先生作的水墨速写（与他为司徒雷登作的那一幅在尺幅、笔法上逼肖，估计出于同一时期），上有梁秋水的题词：

其清如梅，其瘦如鹤，

所操者坚，所学者博。

此书生之本色，

乃吾侪之表率。

这幅画已于1966年焚于红卫兵在当院点起的革命烈火中--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

他有了足够时间思索往事，评判自己的一生。平直的自传难于落笔，从幼年时候即淀积于思绪中的诗词工夫抬头。独宜老人《草间人语》--词一百三十阕，诗七十首，就开始在这时候。用他完稿后的话说，就是"从1952年冬天开始写（虚岁六十七），至　　1955年冬至（虚岁七十）完成"。

行年六十有七，始学为诗，继而又勉为词，乃竟忘老至，不自量力，妄欲与诗伯词宗抗手，亦良堪发谑也。三年间积稿，词得一百三十阕，诗七十首，录而存之，以诗附词后，共二百首，颜曰草间人语，仅为自览之便而已。今七十已届，遂不复再作矣。虽不必如疆村所云理屈词穷，然亦精力就衰，宜不再有所作也。

自题此集

搜玄阐理只虚陈，报国孤怀似溷茵。

一事谢天多难后，余年犹许作诗人。

百年豪气向谁倾，倒海空尊亦数擎。

厌世攀天无一可，但将诗境慰今生。

万象缤纷默坐时，虚廊淡月耐长思。

人天戡破心何寄，余□难除遣入诗。

本来万物俱潜迁，烦恼只因道未坚。

寂寞料知千古笑，诗成却作自家禅。

□□人间久已□，不鑿孤镜亦阴阴。

残年何恤逢奇事，甘把孤吟换陆沉。

用夷变夏各攀辕，我谙天心不叩□。

世有乌台休再作，但留辛苦梦中痕。

寂寞千秋岂自哀，高歌神鬼莫须猜。

世间黄鹞苍鹰事，不向诗中点笔来。

静中天地自纷纭，身卧禅床眼透云。

万语苍生今已赘，小诗留待后人焚。

读者或许记得，民盟中央常委第四十一次会议"开除张东荪盟籍，并提请政府依法处理"的决议在1952年10月底作出。也就是说，从斗争会回来没多久，他就开始动笔，而第一首，不见自身命运之愤懑哀痛，竟是忆往昔之"三事叹"--叹洪宪废、对德宣战和对日作战的关键时刻，未能把握国运转折的机遇：

忆昔有三事，曾博亡友数。俱言事倘成，当时糜后患。

不忍骤回思，徒使孱颜汗。胡为今述之，自传补断片。

"补断片"，自传已经有了么？何时动笔的？有记载的，只在给龙榆生的信里说：诗写不好，只填词。而词，他自我评价，六十七岁开始学，

只几首得意之作：《八十自寿》、《梦辛弃疾》。张鹤慈清楚记得爷爷怎么抄录好郑重送给他，并一一为他讲解辛词。

虽说"静中天地"，尚有些人气。

除了家人，对他"身份"的改变，对他实际所处"软禁"状态完全不去理会，从而走得最近的，是所谓一月一次进城下小馆的"三人帮"：东荪以外，一为原美国总领馆翻译，北平英文《时事日报》总编，后入燕京任新闻系教授的孙瑞芹；还有曾留学法、德的钱公武。早在三十年代上海时候，钱公武准备拿日本人的钱办报。张东荪知道后严诫不可，并替他还了钱，二人从此成至交。到了五十年代，不拘小节的钱公武，居然成了京城凤毛麟角的独行侠，绝不在乎当局的态度，照样跟被党"灭"了的一个个前名人往来。张家的人都记得，他怎么从城里风尘仆仆到燕园，传播种种小道消息。

在1952年至1955年间，即《草间人语》成书前后，与东荪诗词和唱最多的，则属老友、正无官一身轻地"隐居"北池子家中的何其巩9。读者一定记得1949年北平和平移交时候那次何府的"四人家宴"。正是在那天（1月2日），而非傅作义将张教授请到居仁堂的1月5日，决定了奠定大局的"第二次出城谈判"。至于后来傅作义发帖宴请二十位文教界名流（徐悲鸿、许德珩等），是天津已经丢失、不和已无任何出路的1月16日下午；而何思源、康同璧等"北平市民和谈代表团"出场（1月18日），已属于大局已定之后政治家的"作秀"了。

令人难于索解的是，以何其巩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加之与共产党的合作中的屡建功勋，怎么到了人民共和国，竟没有任何安排--因为没有安排，到如今几乎没有人知道了。仅有的述说出自何家后人之笔：

北平和平解放后，新政协筹备期间，齐燕铭（毕业于中国大学并在该校任教，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著者按）、史立德（毕业于中国大学，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著者按）曾向周总理汇报了何其巩的工作情况及安排问题，没想到总理了解的情况比他们还多。按照总理的要求，何其巩书写了"自述"，他在这篇三千余字文篇的末尾写道："只求稍能裨益于人群，一息尚存、永矢不渝。"表明了自己的人生观；（此件）1950　年4月10日"交周新民同志转翔宇同志"，又按中央意见，写"自传"呈毛主席。1954年秋，齐燕铭和中央统战部同志传达总理意见，希望何其巩参加第二届政协工作。父亲告诉齐燕铭自己已身患重病，不能出来工作了。1955年秋，父亲因肝病不治在京病逝。10

时年五十六岁。而病逝前，家中竟然"不能举火"--这里边埋藏着什么隐秘呢？东荪"和克之何其巩寒食感事诗"（估计作于1953年初春）中说：

何郎奋笔咏春寒，梦入江南隔岁阑。

万事悲欢身外过，一枰黑白局中观。

放怀不作呵天语，缄口方能谋睡安。

他日西山结游侣，相摘霜后看枫丹。

"不作呵天语 缄口谋睡安"，这就是连闲职都不予安排的要害了吧。

吟诗读书，并不意味着晚年安度。当时，东荪心里最难过的一件事，是孩子们的事业受到的牵连。

虽然自己的国学学业，是在兄长的严格督责下完成的，张东荪对自己的孩子，则给以充分自主与自由。张宗烨告诉著者：

爸爸这个人，除了他的学问，还有和别有谈论时政，别的事一概都可以不要。他平常很少理我们，但对我们很好。吃饭时候聊天儿，也是他的那些天儿，脑子里一天到晚，就是那东西。人是特别好说话：请小朋友到家里来了，闹得一塌糊涂，翻了天，吵得他不能睡觉，"你们玩吧。"他就走了。好脾气，轻易不发火。从小长大，没有对我发过—两次火。但也很少引导子女。

他天天忙他的事，跟我们没有太多的接触。我们家比较自由开放，爱学什么就学什么，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没有指导。上中学想多唸就多唸，唸完了想考什么大学、什么专业， 爸爸从来不干预。婚姻也不管，自己决定。

1952至1953年，在这屈辱、困惑的一年里，他的长子与次子、193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昆虫学博士的张宗炳，和同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统计物理博士的张宗燧，碰巧都与他在同一所大学。张宗炳是因为"师范生用不着生物学"而从北师大"合并"过来；张宗燧则还没有给排斥到北师大去。

三十年代张东荪受聘到燕京大学任教时，他的两名处于少年期的儿

子，一个十五岁，一个十四岁，因为在家庭教师的辅导下不停地跳级，此时不仅都从中学毕了业，还都通过了燕京的入学考试。到了北平西郊，在充满浪漫情调的未名湖畔，这两个个子还没有长足的新生，没少被女同学捉弄。宗燧很快转学了--他非念清华不可，因为清华是国立大学，是得到国家认定的最重要的高等学府。到1936年，已然获硕士学位的两兄弟，又同时考上每科全国只有一个名额的庚款留美名额：哥哥宗炳生物；弟弟宗燧天文。按照规定，习天文的学生必先到紫金山天文台实习。张宗燧去了半年就毅然放弃了（1936年美庚）：第一他不大喜欢天文学；第二他觉得，科学重镇还是在欧洲。第二年，他再考庚款留英，这回拿到全国共有两个名额的数学。

两兄弟学成之后都是立即归国报效。获康乃尔大学昆虫学系博士学位的张宗炳，1938至1941年在东吴大学任讲师、教授。张宗燧则于剑桥毕业后去丹麦、瑞士等国，随量子物理的创始人尼·玻尔工作。1940年春，他接受了中央大学之聘，回到战时陪都重庆，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应李约瑟推荐，张宗燧再次赴英，并在1946至1947一年间，在剑桥完成四篇高水平论文--年龄不过三十出头。他知道自己的份量，提出在剑桥开课，获得届时任"鲁卡辛（Lucasian）讲学教授"狄拉克的支持，并安排讲授场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登上剑桥讲坛。

国家的宝贝啊--在那样纷乱的年月！尽管政权归属尚不明朗，北大校长胡适11还是亲自出面，安排这"难得的人才"回国任教--虽然故土正是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张宗燧说回来就回来了，好像什么都没想。

1952年的思想教育运动，因为父亲，也因为他们自己，这两名冰雪聪明、满腹最前沿科学知识，却又简单得连世俗人情都没概念的青年教授（他们一个三十八岁，一个三十七岁），都没少"经受考验"。

1951年，宗燧即成北大的批判重点。当时，大家都满怀新生国家主人翁的骄傲，学习毛主席的论述"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对此，在普林斯顿和费城做过研究的宗燧有不同意见。在批判会上，他坚持称美国的科学研究"很厉害"，"断然不可能是纸老虎"。毛主席都作结论了，你还起什么哄呀？在与会同事经党指引一阵劈头盖脸批驳之后，张教授无奈地辩解："非要说美帝是纸老虎，那起码也是厚纸的"--全场哄然。更让他不明白的是，在美国发表学术论文，为什么就成了"不爱国"。他不断地检讨，总不能过关。第二年，即被排挤到北京师范大学。

宗炳1951年从师大随生物系调整到北大。和弟弟比，他其实随和得

多，在学生心目中，是一位"博学而且性格开朗"的老师。但当时环境，据他的学生回忆：

我和所有的同学们一样，都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何事？因为同学们都模糊地知道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但具体的事情大家又说不清。他的父亲张东荪在那时被认为是出名的"反动政客"。……

我那时不关心政治，因此无心知道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只听同学说，他曾向毛泽东提议，如果建设国家需要财务支援的话，他可以和美国接触并洽谈由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在那时节，真不理解他怎会如此想，而竟然荒唐地去向毛泽东如此建言。1952年年中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全校和清华大学的部分院系及燕京的原班人马都在燕京的校址合并成为了"新北大"。一位高班同学带着我到附近郊区走走，在校址西北侧看到了一座孤零零的房舍，那位同学悄悄告诉我，张东荪就被软禁在那栋房舍里。12

这其实是不确的，张东荪并没有过这样的软禁经历。然而，从于宗瀚同学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对中国社会予以重塑的伟力：连果敢率真的大学生都在无以名状的压力下变得畏畏缩缩。所幸，同情心还没有完全泯灭，虽然只能深藏着：

我所知道的有关张师、其父、其弟的事情全是和要好同学们私下悄悄交谈而获悉的。在北京大学内部大家对所有有问题人物的事情都是避免公开谈论的。为了撰写此文，我问讯过在北大工作了数十年之久的才同学可否知道有关张家的更多的理情，回答是关于张家的事情几十年来大家都不便于多问。13

燕京大学哲学系马士沂（张东荪的学生，留北大任教直到八十年代）属于对该案前后了解比较多的人。他一直心存疑窦，认为"虽然证据确凿，但张从未表示悔意与自责，反而理直气壮宣称自己爱国。莫非背后另有内幕？"据与林孟熹八十年代交谈，他"深信这是一件内情复杂的冤案，终有大白之日"。

到1953年，新整顿好的共和国还有另一项"任务"：通过普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对此，周恩来曾对民革的代表解说道：

人民代表大会制属于苏维埃工农代表大会制的体系，完全不同于资

产阶级的议会制。议会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假民主，而人民代表大会，是经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各党派的成员怎样才能被选为人民代表？……对民主党派的要求，当然不能像对共产党员那样严格。……但原则是一致的，要选出肯为人民服务的人。只要真心为人民服务，民主党派朋友是可以得到照顾和安排的。14

从第一届普选开始，读汉字的中国人须一步步明了何谓"为人民服务"，何谓党的"照顾和安排"。

"养起来"的张东荪已经失去了民盟的盟籍，"照顾和安排"本落不到他头上，但当局和"革命群众"（读者一定记得前文，开斗争会的时候，"积极学生"怎么接受组织部署）并没有忘记他。据后来零星材料拼凑出来的场面，似乎是，政府须依法公告具有选举权的居民（公民）名单，方式是由户籍警按册抄到彩色（一般是红色）纸上张贴于墙。张东荪在燕京校园已经住了二十多年，作为居民，自然纸上有名。这名字被"革命群众"看到了--究竟是特别有心、特别觉悟高的"群众"，还是接受了什么人的部署，不详。总之，发现了"张东荪"三个字的几位，大义凛然地向公安当局表达了不可与这样的人并列为公民的愤怒。如果此情出现在1966年，他们一定自己上门极具戏剧效果地怒吼撕扯。但那时是1953年，未名湖学子表面上尚存斯文。我们只知道，那最后的结果是：被开除盟籍的张东荪自己走到海淀法院，"交"出了自己的选举和被选举权。

所谓"交"，也总要走个过场。澳门哲学会会长岑庆棋记得：一天他遇一熟人（原燕大工会主席），他告诉岑，1953年普选时，他路过海淀，见有一布告，是关于撤消张东荪公民权的公诉大会之类，发起人中竟有自己的名字！

当时作为代表，到海淀法院表达义愤的华海峰对张家后人说，他是院系调整以后到北大的，所以不了解什么情况。他曾作为学生代表，按照组织的安排，为张东荪的选举权到法院走过一次形式。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见法庭量刑定罪，公民权经"群众反应"和随后的"公诉大会"即予以剥夺，在现代法制社会似乎"匪夷所思"，但在无产阶级铁拳下，却无人不"视为当然"--张东荪本人似乎都没有为此受到很大触动。

之后呢？

五十年代中期他的一个学生偶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遇见他，只见他身穿陈旧的布衣，面容憔悴，十分苍老，低着头混在人群中，象是怕被熟人认出的样子。那学生不禁惊呼：爱国志士、学术泰斗竟潦倒至此。

1955年，张东荪境况依旧--值得欣慰的是，被忘掉，也并非坏事。只看批胡风开场时，因为1948年"呼吁和平"，已从中共元老变成"叛徒"、七年不见文字发表的张申府，区区一个"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还须按照当局所定的腔调说话：《必须严惩胡风这群万恶劣徒》。东荪躲过了这一劫，免掉充当摇旗呐喊小丑的耻辱。

政治上的朋友一个都不来了。张宗烨观察到：

蓝公武绝对不敢来。私下其实他挺想和爸爸来往。凯慈记得奶奶对他说过，蓝公武早就劝爷爷（估计1949年春北平刚刚解放的时候）："已经登峰造极，什么都别干了，你弄不过共产！"

当时还"敢"跟他来往的，据家人记忆，第一属朗润园近邻胡稼胎--住在同一栋房子的张、胡两家近到什么程度呢：共用正房客厅，连隔墙都没有，只摆一排书柜为分界。胡教授成了东荪作诗，聊天，还一同在校园散散步的朋友（1-14和稼胎用秋水诗韵）：

结邻却喜共诗书，同叹长安不易居。

未许耳谈飞室外，幸能目笑在茶余。

忘机何日心徒壮，毁马今生愿恐虚。

每苦宵吟翻扰睡，失灵文字唤何如。

此外还有北大医务室的杨大夫。即使张家没有"告病"，他也常过来看看。晚辈学生也有人来。宗烨还记得父亲的学生：吴允增（数理逻辑）、汪毅（可惜英年早逝）、沈有鼎（脑子里只有哲学，蓄一部大胡子，不洗澡，袜子破了不理会）。他的正宗同事，哲学系教授，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洪谦，也不时过来"一起谈谈哲学"，并且一直到最后还来看望。

这前后，尔田先生忘年词友，曾共同策反郝鹏举的龙榆生，因为陈毅市长的关照，在上海终于得以"专心撰述"，来函告东荪先生"将修订旧

辑宋词选"。东荪"闲中颇多杂想"，回了一封近二千字长信--以今日爱宋词之读者角度看，实不乏真知灼见：

1、原书三百余页，即增至六百页亦不为过多；

2、每一人增加公历纪元生卒年月；

3、不必限于词家，如岳武穆之《满江红》，王荆公之《桂枝香》似宜选入。二人非词家而词亦绝佳；

4、女性作家之朱淑真宜选数阕：

5、重刻时似词之本文可用较大之字模，而注及其他皆用较小字；

6、于比较最为初学者不易解之典，宜仿笺注东坡乐府之例，略力加注释，但不必过多；

7、所选之词仍可略加增益，如辛词所选似偏于沉痛一路，他如"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尔"之旷达一路，似可再增一二阕。15

在这封信里，东荪还就"比兴之说"，以辛词《摸鱼儿》"算只有"三句究竟指张浚还是秦桧，"请详言之"。仅此，著者即对张家后人所说"大爷爷读史，爷爷只对诗词有兴趣"存疑。当然，此情此景也可理解为，东荪不大读史，只因爱辛词，有宋南渡前后一段，已是熟谙贯通。

他自己最喜欢的《喜读苏辛词欲效之，不能得似万一，赋四律自嘲》就写于这前后：

苏辛读罢思如潮，摇断吟鞭不自聊。

东去大江收眼底，几番风雨卧终宵。

小舟沧海难为寄，卯酒骚魂或可招。

独立怆神更怀古，白云渺渺暮迢迢。

苍茫百感集今朝，拍遍栏杆意未消。

缺月疏桐云淡淡，野棠花落雨萧萧。

埋荒匣底千年剑，吹裂人间一尺箫。

太息共谁歌水调，暮烟衰柳自飘摇。

天高难问意难支，独抱苏辛自养痴。

风雨几番人醉后，大江东去我何之。

肠中冰炭今方尽，梦里茗柯老不知。

偏是吟来无限感，黄楼夜景最堪思。

浩荡闲心忼上驰，乾坤缩入宋人词。

杯邀明月知何夕，肠断斜阳奈此时。

飞絮帘前春去早，乱山横处鸟归迟。

遥知千载沙汀上，总有孤鸿冷自持。

盟内的前战友呢，还有人记得东荪先生么？据叶笃义回忆：

等到张东荪勾结美国特务叛国事件揭露出来之后，大家都害怕了。罗隆基曾对我说："张东荪真不够朋友了，瞒着人做那样的事。幸亏李维汉保我过了关，不然我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16

到九十年代后期，著者前往叶家问教。笃义先生的心情已经平静了许多。他怀着无限感慨，全力扶助后辈学人弄清真相。虽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模糊记得的，已经全是后来栽到张东荪头上的"罪行"：

当时民盟的人，忽然发现张东荪不见了，怎么回事？后来见到他写给毛主席的检讨。现在模糊记得的是：那时他和中共的关系已不像当初那么好，主要他反对"一面例"的外交政策。所以关于中国决心抗美援朝一事，张是有意告诉王志奇的。

他还告诉王旧政协的人里有哪些能影响。他并非一味亲美，只觉得应"两面倒"。为什么要通过特务？那时和国外的一切来往都断了。后来民盟将他开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那时候，共产党脸一变，民主党派都不敢说话。过了相当久（大约1954年），李济深还找毛："东荪先

生，可不可以请他参加一些会议？"毛回答："他的情况不一样，不处理他，就算宽大了。"17

当著者将留在张家后人手中《独宜老人：草间人语》残笺铺开给他看的时候，这位他早年的亲密助手相当吃惊：

完全不知他能诗，因为在此之前，从未见他写诗或与人唱和。当然他的兄长是大词家。

1956年，不知为什么，哲学界突然热闹起来。所谓热闹，也不过开始"打死老虎"。好像是，山东大学哲学系接到指令，大学《学报》开始连续数期对"张东荪的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及其反动的阶级本质进行揭露和批判"。18上阵诸作者，后来均已成为学界重镇。虽然当年战斗檄文，全部白纸黑字的留在母校正规期刊中，却未见其中一人，将这些文字作为学术成果而收入自己文集中。

东荪本爱诗，从青年时候起，与文友，包括兄长，都有唱和，但几乎从不发表。五十年代后，郭沫若诸人的主题诗，如版面作料般日日见报--对此，他相当不以为然。但对毛泽东，则能以开阔心胸以诗论诗。《送瘟神》在报上发表后，对这个他认为不合格的政治领袖，东荪对孙儿张饴慈说："这才是诗！"

到了1956、1957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有文章说，《文汇报》复刊，自我定位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阵地"，华罗庚、向达、潘光旦、张东荪、吴晗、费孝通等人很快就成了那里的常客。19其实不确。那些日子，用宗烨的话说，"全家特别老实"：妈妈一再发令"谁都不要说话，什么都不能说，一句都不许说"。

但并不是每家都能摊上一个吴绍鸿女士（奶奶）。在那段日子里，风头正健的《光明日报》主编储安平曾来拜望。张鹤慈撰文说：

我记得，在我向爷爷报告了储安平来我们家并且问候祖父以后，父亲也兴冲冲而来。当时谈话主要在父亲和祖母之间，祖父说得很少。

储安平当年真是意气风发、虽然他不可能有取共产党而代之的想法，但想作为一个认真的反对党和反对派，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想法肯定有。父亲感慨说，自己身在北大，对北大的鸣放情况的了解，还不如储安平。这位储兄对每天北大大字报的数目都很清楚，而一些有份量、有见解的大字报，谈起来如数家珍。当义亲谈到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时

候，我记得祖父的回答是：人家已经谈到了天下，下面还能再谈吗？

我当时感到吃惊，是因为爷爷刚刚不久前在和奶奶聊天时，谈到党天下，对储安平是十分赞叹。几年后，我才明白祖父为什么会同时对党天下，有两种似乎相反的评价。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记得祖父引用了两句黄巢的菊花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另一个是谈到整风，谈到不能相信毛泽东的话。后来，祖父也和我谈起毛泽东之"不可信"。我写在这里，作为参考和补充。祖父说：看毛泽东绝对不能看他写的。他是从来说话不算数的。看他的文章，会让你觉得是那么一回事。

到了1957年，他的两名老友，向来冰炭不同器的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在反右斗争的开场锣鼓里，成了"联盟"兼"政权的头号敌人"。那年7月上旬，章伯钧从统战部谈话回家，对秘书说："李维汉对我还是很客气，当年对张东荪可不是这样。"按照"政治地位与公费享用挂钩"原则，这两位入阁不过五六年的前交通部长和森林部长，如毫毛一般给拔掉之后，过着怎么样的日子呢？章诒和在她的书里说，章伯钧是三级降到八级，住房、专车、《大参考》和全套司机保姆保留，口腹供应上属于"肉蛋"级别。罗隆基四级降到九级，上边的那些都没有了，口腹上属于"糖豆"级。20张东荪住北大教工宿舍，没有额外享受，也就不必受这遭"主子"拨弄的屈辱了。

对张东荪的叙述，应该说，部分确切--那是在反右之前。到政治形势陡变之后，也就是说，北大已经不再由教育家，而要由无产阶级政治家掌管的时候，张东荪连做"北大教工"的资格都没有了。据历史系57级学生王曾瑜回忆：

大约是彭真嫌原来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领导反右不力，由陆平前来加强领导。加强的结果当然是在处理右派的阶段，增划了大量新右派。21江隆基在党内挨了批判，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工作做得较好。他在文革之初，不明不白地死去，很可能是遭人谋害。邓广铭先生曾对我说，江隆基无论如何也是教育家，不像陆平那样不学无术。陆平指挥了批判马校长后，就取而代之，正式当上北大校长。22

当时还在读小学的张凯慈记得这次变故。家里人（父亲和祖父）辗

转听到传言：陆平到职之后即说，"咱们的大学里怎么能有（张东荪）这样的人？"这回，既用不着民盟出来摆样子开会，也不用发动"革命群众"抗议。一纸行政文书，张教授三十年教职说没就没了。他的"关系"被转到北京市文史馆--开始，仅仅是工资关系，人还能住在校园；但反右运动一结束，随着将"反动学生、教师"彻底清出北大，他也不得在校园容身。迁到哪里去呢？与朗润园一墙之隔的北大东门外，有一处杂役人员居住区大城坊，张家给搬到三十七号。那是个标准的大杂院，住户共享茅厕，水要从胡同里提。凯慈记得张家当时只提了一个条件：要有自来水。后来北大行政在院子里给装了一个水龙头。

院里住有三、四家人。凯慈记得，东房是海淀供销社老许；还有和丈夫老打架的姓金的；西房老吕家也是供销社的。还有一个孤老太太。门外还有一排房，住着一个鞋匠。直到文革后邻里纷争，那鞋匠才亮出他高张家一等的身份："你们别横（读作hèng），早就让我们看（读作kān）着你们了。"（属于街道治安）

分到他们名下的，有四间小北房。宗烨记得，房子"很老也很差，地上的砖都化成泥团了，东西搬过去都得长毛、烂掉。借着这机会，都处理掉了"。这是张东荪夫妇最后的家。他在这里住了十年，直到给抓进秦城监狱。张夫人则住了三十年--她一生最艰难的岁月。

所谓"处理掉"的，也就是书。难道除了书没别的"资财"了？用东荪自己的话：

著者没有一亩田，一间屋，一张股票，所以常常对于论坛上的左派提出异议。23

宗烨说：

自我懂事，就从没听他们说过买房买地，那时已经在燕京了。

父亲几乎不用钱，发的工资全交给母亲，他自己唯一的一点开销，就是买点书，抽点烟--纸烟，普通的，但也不是最蹩脚的。我几乎没有见过爸爸花钱，烟也是妈妈给他买好了的。吃的东西，家里知道他喜欢吃点清淡的，都是妈妈安排，穿的也是妈妈给他弄好，从里到外。我们家是进来的工资，月月花光，没有积蓄。这钱是绝对不够买首饰古董的。家里唯一的几幅画，都是祖父留下的。不过日子过得也不扣儿，我从小过得挺好，家里请着保姆，还有一部人力车，爸爸坐车去上课。有时候

下雪了，那车也到学校去接我。……还有厨子--燕京教授的那份钱，养这么一个家是够的。一般教授大概都是这样的水平。24

日本人来了以后，家里没了收入。那时候靠卖东西贴着过日子--卖地钱换的美元，还有一点首饰什么的。后来妈妈说，她本来不想动那点美元，打算以后分成四份给我们兄妹，后来差不多贴光了，一再说很对不起我们。我想幸亏没有了，否则还不定说我们什么呢。没有了倒消停。量都不大，美元不过千把块的样子。

至于书籍，凯慈记得：

家里的书是陆陆续续丢的。爷爷刚搬到大城坊的时候，我们家在中关园153号，从爷爷那里搬来好多书，《诸子集成》、《全唐诗》等，都是成套成套的，我那时候没事就翻《韩非子》。这些书一直到文化革命后才没的。记得奶奶说过，大爷爷的书都是史书，爷爷不看。爷爷就看诗词，所以都是全的。剩下的书大部分都送给北大了。全套哲学书卖给了社科院哲学所 。奶奶说，爷爷的书，就这一套还算落个好下场。大爷爷的书最惨：全是线装书，都烂了。25

宗烨记得：

爸爸的书确实是那次搬家没了的。因为老早就想书怎么处置--家里情况愈来愈紧：一份份的钱没有了（先是政府那份，后来北大）……书，我想起来了，是卖掉了，千把块钱吧。

鹤慈也记得：

如果这批书没有毁掉，每本扉页上都有爷爷的章。会不会撕掉，或者加盖上别的什么？爷爷爱书，但不收版本。他也没有那么多钱做这个。我们一直不是一家过，养着很多亲戚。搬到大城坊再也没有了，就剩下爷爷奶奶他们俩了。

大约在1959年底或1960年刚过，忽有一人跑到大城坊三十七号，说文如先生请东荪先生过去一趟，有话要说（现在尚未弄清这人是邓先生的学生、晚辈、抑或邻居）。那年，他们俩人，一位七十三，一位七十四。尽管从张家住着的大杂院到邓家老宅（成府桑树园蒋家胡同街北偏东那"古槐阴森"的院落）不过数百米，在卷着尘埃的北风中一步步挨过去，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如果再考虑到那年月粮食、副食品和取暖煤的定量供应……东荪大意了，以为依旧不过谈诗论文，回答说"待到春

天，天气暖和些"--没想到竟……再也没有机会。

邓文如原籍江苏，邓廷祯曾孙。因为在四川出生，说的是一口儒雅成都官话。在年龄上，他其实还少东莼一岁，但因同在史学界，与尔田反倒过从更密。26三十年代初，他们三人一同受聘燕京大学，1941年同入虏狱（日军当时放过了年已六十七岁的张尔田）。1945年复校后，又一同返回燕京。1952年院校调整（特别是运动）之后，作为燕大历史系当家台柱，和极受学生爱戴的师长，六十五岁的邓之诚"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深切关怀和照顾"，特准他冠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而全薪退休。听到这一安排，有人立刻联想到给他当学生还未必够格的新任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有人则为他庆幸，觉得这回"党和人民政府"对他的"关怀和照顾"真是太慷慨了，他从此免了"以马列主义"指导而到会上去背书的灾难。

老友在冷彻骨髓的1月离世。东莼作《扬州慢》纪之--

文如病逝后多日始知并闻无人往唁赋此哭之

绝笔诗成，登楼眼瞑，闻耗老泪频弹。怕骑鲸□去，亦世外同寒。却犹有青蝇吊客，未须含恨，寂寞人间。欲招魂，怜才孤愤，翻在无言。

忆曾唱和借飞笺，絮语缠绵。奈松崩鹤瘗，吟情已冷，独倚霜天。有□言留耳，苍茫里，征验应难。共瘦灯昏影，遗篇重读千番。

又《挽文如邓之诚》一首：

翰海凄音一夕闻，

不留老眼看风云。

预期异语无缘听，文如忽遣人来邀，余覆以春暖面谈，而今已矣。

但许秋衾有梦温。

史鉴亦将同寂寞，

诗坛谁与话缤纷。闻有清诗纪事稿待刊。

北江异地遗何憾，指洪君煨莲

遁叟残笺赖孰存。先兄遁庵有诗在文如处，闻有八十首之多，今不知落何人手。

赠句苍凉重识我，

刊书微幸莫怜君。

闭门自饮西州恨，

已悟人生欠鼓盆。

其中"赠句苍凉重识我"一句，指的是邓的学生陈树普在回忆文章27中说的那首赠东荪的五言律诗：

明哲张夫子，竹林早预流。

玄谈惊四座，说论动诸侯。

老去名心澹，书成众望收。

羡君双鬓缘，愧我雪盈头。

陈树普说，邓之诚"不求名利穷居独处时以诗文相唱和"，但通过往事谈论，了解到他少怀修齐治平之大志，壮游四方，存济世匡时之宏图，而不能遂所愿。又嫉恶如仇誓不为浼……。在他逝世前的那个严冬，切切带话想见一面，文如先生要对东荪先生说什么呢？直到八十年代末，陈树普在邓之诚先生纪念会上发言，还不方便提"张东荪"三字，只以"赠一位从事哲学的朋友张教授"代之。但他认为：

这虽属赠友之作，但其中也隐约看出文如先生自己的意愿和感慨。在先生示我以此诗时，我讲"先生的诗很好，学生不敢赞一辞，但我感觉您不止是在讲张先生，实际上可说是夫子自道也"。当时先生对此笑而未答，但我却谬许自己可算是先生的一位知音。

也是在这年，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张东荪知道雷震在台湾"出了事"。想到这位同学兼老友的遭际，对比自己，东荪不免思绪联翩。当时正读高中的孙子鹤慈最爱往大城坊跑，做爷爷的遂拿出一把支架质地为黄铜、看上去已经很有年岁、但保养得相当精心的刮胡刀。祖父告诉鹤慈，这是雷震送给他的，并讲了1947年南京旅途混乱中丢了行李的故事。

在大城坊住定之后，1959年的时候，东荪写了一首《贺新郎》。词前一段前言：

曩者曾有人两度以北京大学校长向余游说，一在虏狱中，一则在石家庄旅居时。又一九五二年陈某欲余自白，以不得部长为憾，当时引为侮辱。嗣知人之自视与他人之相视，实有千里相隔，亦不足怪，但可一笑置之耳。偶然忆及，纪之以词。

亦但扪方寸，算天涯谁知我者，莫须置问。

在世是非依势转，死后屡翻更紊。

已惯看剧场打诨，岂谓枭鸾从古判，只掉头一啸余何恨。

惟两耳，欠全顺。

故吾未益今吾损，任吹唇名牛名马，自来无愠。

俗眼视人皆类己，安敢吠尧同论。

固不比佛头着粪，本似□螟集虱睫，有浮思应向虚空陨。

题往事，亦随泯。

看来对这样的侮辱，实难"一笑置之耳"。虽痛觉"人涯谁知我"，对于他"只许学科学"（奶奶家训）的晚辈，竟然什么都个提。但这并非他的信条，因为他深信"历史知识对于国民性之铸成、之功效，事关重大：

不但一个民族总是要奖励其后裔必须知道其以往的历史，即一个家族总是要使其子孙能记得祖先的前言往行，这样便把后世人们的性格加以陶冶了。28

然而，宗烨记得的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他只希望我们业务长进、生活安定，不愿以自己的思想来影响我们--没有让我们读他的书，也不提他与共产党在思想体系上有什么不同。似乎是随我们跟共产党走，他有不同意见是他自己的事。张饴慈也对著者说："在家中，祖父从来不向我们灌输他的思想。"

但目睹了反右、大跃进和大饥荒，还能眼睛一闭一心跟党走么？

1962年，他的三孙，生于1943年的张鹤慈，开始与他的同龄朋友结社作诗29，并"叩问历史"。他们拼命找书，生吞活剥而后激扬文字，发掘离经叛道的精神资源；他们觉得1959年的庐山会议实在是岂有此理，曾经爬过达园的高墙，打算会会里边的彭大将军……对于身边的爷爷，不知郭世英有没有问过他的父亲，但开始接触《通向奴役之路》和《资本家宣言》的鹤慈，一再敦劝爷爷动笔写下他所经历的一切。

据张鹤慈告诉著者，祖父已经答应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动笔自撰家谱也是在这时候。孙子对社会现实的追问，是不是让他想起了为《东方杂志》、为《甲寅》撰写意气风发之雄文的早年？但他依旧什么也不说，只为这个闻鸡起舞的爱孙起了表字：仲昂。据张鹤慈字仲昂从旁观察，祖父的《自传》已经动笔，起码〈序〉已完成。不知是不是他自己在《草间人语》结束后，再度拿起笔的1959至1960年。在他《试作六言诗，三首》中，有自注"近拟撰章回体说部名曰《梦游野语》，以代自传，故及之"。

或许就是这部《梦游野语》？

他们记得，一本或自传、或说部，公安部的人、钱公武和三叔都读过。不知是他们之中的谁，拿走之后没有还回来，或许抄家抄走了？但是，无论希望读到这段历史的人多么迫切，静坐在大杂院破烂屋檐下的"囚人"，却是百感交集、难于下笔：

无端握管复凝思，正是荒鸡唤梦时。

留得是非身后论，且屏辛苦眼前痴。

茫茫浊世归何所，历历浮生只自知。

写罢他年与谁看，一灯相对雨如丝。

不关积毁失心期，早识天涯路本歧。

自得自危因自述，无恩无怨更无奇。

今生饱领人间味，此世常存万古疑。

掷笔废然推牖望，琅华一月渐西移。（1-30）

1964年暮春，张东荪曾有一封信给老友龙榆生30。从问安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依旧难于平定的心绪（"否则竟日无事，未免有其乃亲笔砚也"），以及日渐消耗的体力（"然已骨瘦如柴，揽镜自惊矣"）。

榆生吾兄惠览

久不得书，方正驰念，乃获十七日手示，藉悉曾抱清恙，亦为之怏怏。心机硬化似不宜忽视，于脑力体力，皆有非宜。课事据弟所知，此间老教授多不授课，且有十之二三，终年养病在家，此实新社会之优点也。整录积稿何如徐徐为之。如稍习气功，目的不在治疗，而在藉此静坐以消永日，否则竟日无事，未免有其乃亲笔砚也。弟亦自阴历元旦，偶感寒疾，伤及胃肠，服药累月，近始稍□，然已骨瘦如柴，揽镜自惊矣。亦曾橐集旧作，奈每有检阅，辙作改篡，改后亦不恰意，有时又复改回，如是迄无定稿，奈何奈何。好在他日存留与否，本非所计。近数年来，益感诗之难工，因是于诗独少，即偶尔动兴，亦只词而已。绿数阕，为公病中消遣之助，倘蒙删正，固所愿也。此请大安

东叩

二十二

6月3日，又有回忆旧时事的词给龙榆生："得读新制，勉为步韵。聊藉旧事，且舒胸臆，亦遵来示勿尚雕琢之旨耳。（记倭氛，腥染遍幽燕，血喋雨花台……）。病仍未愈，家人告诫。以后不敢再扰公也。又及。"以后果然再无笔墨往来--而龙榆生两年后的文革中心肌梗死发作离世。

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斗争，没让东荪特别意外。对政客毛泽东的"八亿人口，不斗行么？""阶级斗争，七、八年一次"--他早在二十年前已经有所论述：

永久斗争……就是无论如何必须立一个对象以引起内部人们之向外敌忾心，借以团结内部，增加服从，便利指挥……。一个对象消灭后，不恤再寻另一个对象，总使永久在斗争中，庶可内部不致涣散。31

不觉间，1965年（乙未）到了。按照中国老规矩，到第二年（丙申），他已届八十。东荪在这年作了一首《沁园春·预作明年八十自寿词》，概述自己一生经历，竖写在一张横格纸上：

弹指光阴，八旬将届，愧此昂藏。

吹早年失怙，壮年游学，晚年锢党，几度阅炎凉。

虏狱刑还，围城劝解，应笑书生不自量。

休回首，似泥中曳尾，亦曰荒唐。

彷徨。更异寻常。问何事洪炉冶我狂。

喜今方抛却，耗神理窟，早曾毁弃，憎命文章。

去日空过（平声），来朝且乐，有酒聊浇铁石肠。

知衰矣，顾天留老眼，犹见和祥。

太冲道兄吟正 独宜老人稿

"太冲道兄"至今未能确切查找出名姓。据张家孙辈模糊记忆，似是同遭驱赶而住在大城坊的一位北大教师。想来东荪先生在他的新居所也有了可以谈谈的邻居。

那是文筝前夕的1966年。留眼犹见和祥--难道指六年后的美中和解？

就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文化整肃中，张东荪怎么也没有想，万里之外，与他一别二十年的挚友，正殷切地惦念着他。张娇君劢《东荪先生八十寿序》在美洲《展望》杂志发表--受主到死都没有看到：

……又其后，大陆沦陷，极权虐政，毒流人神，而余颠沛海外，皤然已老。既伤祖国，复念故人。缅憬昔游，都如隔世。是为余与东荪一散而不可复聚，将且人天永隔，长无见期，黯然喟享义之始。

尝闻之北来友人，东荪初曾以调停傅作义功，得为中共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乃不知何故，不旋踵亟解其教职，又不旋踵复撤其委员。今则软禁寓中，并行动自由而亦丧失。酷已！《易》曰，"履虎尾，咥人凶"。东荪固视自由民主过生命者，而乃独欲同旋极权淫成之下斯冀或遂愿生平，何殊与虎谋皮？几何不与格罗彩受制于墨索里尼，爱因斯坦之见逐于希特勒同其命运耶？……

对于"视自由民主过生命者"，而"独欲周旋极权淫威之下"，希翼理想实现--无疑张东荪政治生涯的写照。但在中国，不仅时时主导着统治者，且浸润于全民心灵深处的集权乃至极权傅统，令他老友所遭受的挫折与磨难，实数倍于格罗彩、爱因斯坦。

文革开始了！

冲到大城坊抄家的，不下数回。一直没有弄清楚究竟属哪路人马，一般的红卫兵？哲学系学生？民盟或者文史馆的小干部？周围胡同的孩子？

最先打上门来的，是要张家"交出电台"。这是当时最具刺激的推动力。可惜老三的事五十年代就有了结论；而亲戚林嘉通那部收听新华社消息的电台，早在当时查抄的日本兵进门之前，已经由林太太亲手毁掉了。

消息很快传来，没等肆虐降临，天津的老三夫妇--张宗颎和他的妻子吕乃朴--双双自尽，时年四十六岁。

北大抄家团的出动，已经比较有组织有纲领。因为，扑向本与"四旧"无缘之平民区大城坊的，是生物系63级的学生--显然有人告诉他们，你们教授（张东荪长子张宗炳）的老太爷，更值得一抄。

当时正在北大读一年级的凯慈记得：

抄家是在66年6月。从我们物理系开始，先抄了黄昆、沈克绮（系副主任）的家。下午全校效仿，轰轰烈烈的大抄家开始。

那天，我家和我爷爷家同时被北大生物系63级的学生抄了个底儿朝天。家里的书、画、杂志、故纸和其他东西撒满一地。撕碎的纸有半尺厚；墙上的画也全到了地上。

大城坊抄家时，我不在，是后来才去的。到底是大学生抄家，所以比起其他人要文明一点，只是把墙上的画扯到地上，抽屉里的东西全翻出来，由红卫兵一一过目，分别处理。有价值的拿走，比如周总理的信；封、资、修的统统放到院子里架起火来烧掉。书、画、对联、相册全烧了，家里的相片都是在那时候烧的。

饴慈当时也到过爷爷家。他说：

凶徒前来翻抄的时候，祖父站在一旁一动不动。骂他反共、反革命，任凭他们骂去。唯当那些人开口骂他"汉奸"，八十一岁的老人，猛扑过去，用头撞他们，要和他们拼命。

读者一定记得，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亲笔给东荪回信。张家认为正常通信而已，并没怎么深藏。文革一起，和林彪当时送的皮袍子一道，奶奶立刻把它们全烧了。只有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因为夹在一本书里没注意，被抄家的翻了出来带走了。还有一张谭嗣同的签名照片，也是这个命运。

他自己的手稿呢--自传、诗词、友人来函……都烧掉了。

围城解钮横联呢，邓文如、张伯驹他们的信？

那回抄家只倒柜没翻箱。家里有些东西，凡是放在旧式的衣箱里的，就成了漏网之鱼。也就是，外面的（书架上、书栅里、抽屉里、墙上〉都查了一遍，大概红卫兵没有书箱的概念--这幅横联没挂在墙上，也没有玻璃框，和其他一些对联、画放在一起，保存了下来。爷爷家1958年搬到大城坊时，因为地方小，处理了很多东西，有些东西就放到箱子里存放在我们家。当时家里有两个书桌，不过没我的份儿，所以我用这些箱子和一块木板搭了一个小桌，上面全是我的物理书。抄家时，这些箱子也没有动。后来又来抄过几次，但箱子里的东西还是没动。

凯慈自己也不知道给他当书桌的老式箱子里有什么东西。

67年，我们家从中关园搬到七公寓。因为搬家，所有的封条都撕开了，直到68年1月再次查封。那次所有的东西都被封了，只给我母亲留下一张床，一把椅子。1967年3月一打三反，母亲也进了公安局，家就彻底被封了。7月，北大为了腾房子，把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放到北大的仓库。而爷爷家，66年红卫兵抄家之后，三间房之中的两间也封了门。到68年，公安部来人的时候，重新开封，仔仔细细搜了一遍，临走留下一句话："没有公安部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动。"就这样，一直到1976年平反。

前两、三次抄家破坏比较大。那天，烧的东西真不少，原来满满的抽屉差不多都空了。

在1966年和1967年的红海洋和武斗高潮里，两老人怎么蜷缩在大城坊那一间平房（另外三间已查封），没有文字留下。

1968年1月，好几个军人，突然由户籍警带着来到大城坊。来人搜查了近两个小时，抽屉里的东西都扔到地下，墙壁上下左右敲个遍。不见任何法律手续，八十二岁的张东荪给带走了。那批人走后，家人突然发现一批他文革抄家后新写的诗词散篇夹在旧报纸里没给搜走--奶奶当天夜里全给烧了。

依旧在北大任课的张宗炳，也在同一天从生物系直接带走。那晚张饴慈和母亲在家等父亲回来吃饭，在大约七点多样子，系里负责人带着两名军人还有学生，再次上门抄家。和抄大城坊一样，所有东西都到了地上，一片狼藉。

至于张家在天津的另一个孙辈、"全让奶奶给惯坏了的"三房长子张佑慈，也是在这一年（1968），因"为父报仇"，给抓了起来（判刑十五年。1978年获平反）。

张家的人不知道，几乎就在同时，1968年1月初，他从前的学生、助手、老搭挡，摘帽右派叶笃义，也正在民盟机关，受到"中央统战部"的调查。来人最感兴趣的是：

张东荪1946年底到1947年初由北平到上海，又由上海到南京去见蒋介石，见了蒋介石之后又到美国大使馆同司徒雷登谈过一次话--谈了些什么？有没有提到在北平同军调部中共方面的人接头的情况？有没有谈过徐冰？32

调查人就这几个问题反复追问，并说"如果其他单位的人来问这事，不要答复，让他们直接到中央专案小组去问"。--原来如此！

直到吴法宪回忆录出版，对那个具有无上权威、动辄置人于生死的中央专案小组，世人才有粗略了解：

中央专案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碰头会的决定从军队选派，前后大约三次，一共约五百多人，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帮助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汇报工作，会议常常是从晚上八、九点钟一直到第二天拂晓，每次会议都是如此。33

到2月底，审问的人里，多了一个"解放军"。到4月，在他们对调查的拉锯战也感到腻烦的时候，只逼叶笃义写下：

我同司徒雷登是特务关系。

张东荪是一个美国特务，我在解放前曾长期为他服务，因此我同张东荪也是一种特务关系。

中央专案小组的人对叶笃义说："张东荪已经逮捕入狱，对你进行了揭发。从你同他的关系来看，他对你的揭发应当认为是有份量的。"

月底，叶笃义被正式逮捕，押到秦城监狱（当时已由军队接管，称"卫戍区监狱"）。专案组放出其最常用手段，对他说，他的罪行主要在1938、 1945年这一段时间，张东荪关于这一点有大量的交代和揭发。"张东荪今年八十多岁了，你还不到六十岁。你连张东荪都不如。""你不要抗拒交代来企图为徐冰翻案了。徐冰自己都已经交代出来了。"

到了夏天，再追问特务经费。叶笃义"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不能不按照他们所要的全部予以招认"：

我同徐冰之间的特务关系是张东荪介绍的；我把徐冰提供的情报转报给司徒雷登和张东荪，我们四人之间形成了一条特务线。张东荪把我的政治身份告诉了徐冰，接头后我和徐冰发生了特矜关系。34

到此已经可以知道，有军人参加的中央专案组，锁定的目标是徐冰35。至于徐冰之后还打算怎样，要等办案人员自己出来说话了。

著者在这里忍不住请问同为中共的1951与1968年办案人员：张东荪既然已经有了直通中共中央统战部（徐冰）、直通美国国务院（司徒雷登）的特务联络渠道，干吗要费劲巴拉地去找王志奇那样的小人物？

秦城监狱当时关押的，几乎全是中央专案组的犯人（调查对象）。秦城什么地方？那是苏联援建的第157个项目，不具法律依据的政治斗争拘留所。36哪怕关上十年二十年，也没人知道自己的隔邻难友是谁。张家父子和叶笃义三人分别关押。他们穷追不舍的那点子事，在1950年至1952年，只为让"讨嫌"的（伟大领袖常用语）张东荪长长见识，并没有牵进张宗炳（虽然父亲和"美帝"的每一次见面他都在场）。所以这回，张东荪不知道、也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长子也给关进来了。不仅关进来，逼供之下，这位聪慧、达观、兴趣广泛、爱交朋友的昆虫学家已经疯了 。

他同样不知道的是，1969年6月底，监狱外的次子宗燧，因不堪凌辱，服用安眠药自尽，终年五十四岁。晚辈同事陆启铿回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红卫兵莫明其妙地（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把张宗燧揪出来，在身上挂上牌子（或者是戴高帽子，或者两者兼有，我记不清楚了），在从前的计算所与数学所的大楼前面开了一个斗争会，然后由红卫兵押送他在中关村游街示众。第二年的夏天，我在上班的路上遇见他穿了一件冬天的大衣也是上班去劳动（打扫卫生）。我很奇怪，我说"张先生，天气那么热，为什么还穿大衣？"他说"陆启（铿）啊陆启（铿），我快要死了！"我大吃一惊，正想问他"你得了什么病如此严重？"但后面来了一些小孩，向他投掷小石头，口里还骂着难听的话，有的石头落在我身上。我赶快离开他。以后我上班总绕路而走，避免和他相遇以免受袭。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数学所造反派宣布"张宗燧畏罪自杀"。我听了后心情十分沉重。当我在听到他对我讲"快要死"的话时，应该意识到，他受到极大的人格污辱，为了人的尊严，已萌发一死的念头，可是我为了躲避几个小石头的攻击，不敢和他多谈。他的话明显有诀别的意思，如果我当时能和他多谈一会儿，了解他的话的真实意思，并且加以劝导，比方说一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之类的话，也许悲剧不致于发生……。37

痛苦自责的陆启铿想得简单了。研究本是宗燧的命。王元院士曾回忆：张宗燧几乎从一开始就挨斗。讨论到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时，他还提出不同看法："工人阶级也有不能领导的东西。"有人愤怒地质问他"什么不能领导"，张宗燧答："科学研究。"38

记录了多年积累的研究笔记被抄走，而且丢了，张宗燧伤心欲绝，夜里无法入睡，身体逐渐衰弱。无休止的斗争折磨，更使他难以忍耐。他被关在数学研究所"牛棚"里的时候，他的学生还动手打他。他的惨叫，"像老牛的声音一样，十分可怜"--数学家熊庆来家的保姆说。

他服安眠药的那天是周末。妻子包坤铎下班回家，赶快把人送到合同医院北医三院。三院的领导说，要抢救须有科学院的领导批准。数学所将情况报到科学院院部；院部已归"工宣队"领导，没有人。拖到下周一上班时间，人早已经死了 。

家里别的人呢？凯慈记得：

那年一打三反，母亲奉命在大字报给"刘少奇"三个字上画叉，不小心

画到"毛泽东"三个字上，成了"现行"，单位批斗，还被"扭送"海淀公安局关押了一年。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正逢北大教师没有宿舍，又开始撵。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因为武斗绕着走，见一辆三轮车驶过。装在车上的家具……怎么这么眼熟？赶紧往家里骑，原来有人正给我们"搬家"--怎么搬？很简单，不管什么东西都从三楼往下扔，所有的书都下来了，尘土飞扬。……东西扔出来之后，往北大仓库里边一放，就完了。出面执行搬家作业的，全都是"黑帮"：教授们、系主任们、支部书记们……。我赶紧跑到奶奶家，说那边（即父母家）什么都搬光了。所以后来他们（哥哥们）回来，包括母亲放出来，都住到奶奶处。

1972年春天，张宗烨从湖北干校回来。父亲已不在--粮票布票留了四年。老人八十多岁了啊！给带到哪里去了？九十年代中期，在她的大哥家，宗烨对著者说：

我爸爸和他爸爸给抓去之后，一点消息没有。不知上哪儿去了，不敢问，也没处去问。全家一直在等，希望有朝一日谁能告诉我们人在哪儿。后来实在等不下去了；从1968年1月，好几年过去了啊……1972年初我回来，先是去卫戍区，说不知道。"九一三"之后，饴慈、凯慈陆续回北京，萌生追问下落的念头。

饴慈记得：

一次次写信，都如石沉大海，后来想到姑姑的一个同事认识一位叫方明谦的老中医，据说常给中央领导看病，与叶帅相熟。于是以没有工作单位的奶奶的名义，通过方医生致信叶帅，问周总理地址，说有一封信给总理。叶办告诉我们一个办法：别写国务院，就寄中南海西门，能直接送到。

在给总理的信里，没敢提祖父，只以母亲的名义问儿子下落。总理不到一周就回信了，批准见面（在这年的12月）。文史馆、北大、公安部三方面都来了人，接奶奶（吴绍鸿）与母亲（刘拙如）二人先去公安部，再到秦城监狱。到了部里，头头差不多全都出来了，说"以后可以随时来探视，不要再给总理写信啦"。想来周的批复可能有很重的批评。

婆媳二人先到秦城，见到疯了的宗炳--无论母亲还是妻子，他都不认识了。东荪已经不在那里。车开回北京，经李震特批，说可以到复兴医

院见祖父--属于家属探监。

张宗烨说：

第一次到复兴医院，是我和妈妈一起去的。当时父亲在一个大病房，不是单间，但没有别的人，床都空着。他正在打点滴，看到我们去，很激动。告诉我们，在那里，他们照顾他照顾得很好。我们也告诉他"家里最艰难的一段已经过去，我已经可以见外国人，39都没事了"。

张家的人清楚记得那次奶奶回来之后的复述：

爷爷说"林彪出事了"。奶奶说"别瞎说，好好的"。"你不用骗我，我看得出来"。……他们还谈到张申府、刘清扬……说起中美建交，爷爷说"还是我对。"

宗烨记得那次父亲一直和妈妈说话，没怎么和我们子女说，她清楚记得：

带我们来的人说不能让老太大在这里呆着，怕她出事。妈妈不肯走，一定要留下来陪。最后经过商量，还是把妈妈送回家，让我和张饴慈两个人留下来照顾。可能他们当时已经觉得，父亲到了病危阶段了。但我们去的时候爸爸神志完全清醒，什么话都能说。

这时是1973年3月。林彪坠机已一年多，中美《上海公报》也已发表一年--当局正密锣紧鼓地筹备互设联络处。就在这年存春夏之交，有人来到大城坊，东看看西看看，说"房里怎么这么潮，地板都没有"；还说"老人将来回来也不会住这儿了"。

到1973年6月，有关部门向总理办公室打报告，总理于该月5日，对"张东荪病危情况的简报"做了批示：应尽力抢救。40抢救的同时，家属获准探望。

张宗烨记得：

父亲病重之后，北京市文史馆一个姓孙的41，领着公安部的人到家里来，说接到总理办公室通知，接我们去医院，我、妈妈、还有张饴慈。当时父亲已经从复兴医院转到北新桥第六医院，一栋小楼，顶层，一道楼梯上去之后，通向一间间病房。走廊的另一头堵着，站了两个兵。这层住的全是秦城监狱的犯人。如果有人出来如厕，都要把别的病

房的门从外边锁住。

张东荪的病房里，一直有一个年轻的穿军装的人。张宗烨清楚记得：

他一再跟我们说他们照顾父亲很好，要吃什么都满足，每个星期给他洗澡，还配了新的眼镜。听他的意思，只要这次病好，没有多久就可以回家了。他还说问题会很好地解决，也不会让你们再住在大城坊那个破地方了，要在城里给你们安个家。他说"话说到这个程度，你们就该清楚了。"还告诉我们，他"代表党中央、公安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

我们知道那时候中美刚刚接触，我们的理解也就到那里：是不是希望爸爸在对美国的交往上作点什么事情？不懂。也不敢问。他说我们就听着。

这些话都是当着爸爸说的。看他的表情，都呼应，也觉得他们对他好，自己快要回家了。

前前后后大约也就呆了三四天。

第二天就换了一个单独病房，旁边专门支了一张床：我们陪着的人可以在那里吃、住，不舒服还有药。但到了第二天爸爸就昏迷不醒了。大哥的事他不知道。我们没有告诉他二哥去世的事，也没说三哥。

张饴慈说：

爷爷对奶奶说："对不起。"奶奶说，"一辈子也没听他说过这句话。"知道自己时辰快到了，他对奶奶说："我死不了。"

奶奶回来大哭，简直崩溃了--因为能见面挑起了希望，现在希望一下子又没了。回来之后，她一个人到颐和园坐着，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孤单。但是想到爷爷最后总算和家人见了一面，也是一个安慰。

就在这前后，已经在团河农场"劳教"了十多年的张鹤慈，突然宣布"解除"--意味着可以探亲了。他赶着办手续，回到了北京，祖孙二人在第六医院见面。望着炯炯眼神依旧，却已瘦成一把骨头的爱孙，东荪只说了一句："健健42你受苦了……"

张鹤慈还听见他和奶奶说"回家要和阿三算账"。他不知道幼子夫妻已

然仙去，脑子里存着的还是审讯员对他的诱、诈。

张家人心头忧愦无以纾解：人都到了这份儿上，到底为什么给抓进去，竟然一无所知。他们再托方医生找叶办，问1968年进监狱到底为什么。方医生转告了自己子女也都无由入监的老帅的回答："同情，但无能为力。"

张东荪的病势一天天沉重。张宗烨记得：

迷糊的时候就叫妈妈。我告诉他："妈妈累了，回去了。我和康康留下来陪你也一样。"

爸爸和妈妈感情特别好，相爱终生。妈妈没进过学校，只粗通文字，一生就是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爸爸很愿意和妈妈谈天，什么都和她谈。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之所以老是"和家里划不清界限"，就因为非常爱妈妈。

他对她说，"还是我对"--指的什么？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刚刚解决，中国即将从扼闷、匮乏的铁幕之下走向开放世界。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对"指的是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绝对不能"一边倒"；但有谁知道，在这"我对"之中，说的不是投票者对共和国首脑的选择？1949年，那人正"如日中天"，而他自己也正当着"上宾"。他觉得名实不符，使自己的权利，不肯再拥戴这人。

"还是我对"，这是他最后说的。其实早在1915年，在他刚届而立、刚做父亲的时候，就明确宣称：

吾平生所最深恶而痛绝者，莫过于恶质而居美名，则其恶为名所掩，而常人不之见，乃为其所欺也。43

崇尚自由主义的张东荪，最不乐意的，就是"为人所欺"--不管什么人，不管如何欺。

张东荪对了。以他的哲理、以他的深思、以他遍阅大小政客的经验，他在明知没有实际效用的时候，选择反对毛泽东。他的行为不可能为自己带来丝毫实利，唯有的，是对精神独立与民主原则的维护。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44

离世的一瞬，东荪口中频频呼着"姆妈…姆妈…"--他在呼他的妻，以孩子们小时候的口吻。自1914年他们的长子诞生以来，他这样呼她已有六十年。

当时在身边的，有女儿和孙子。断气的一瞬，守在一边的青年军人脱帽肃立。

他怎么走的？张凯慈记得：

火葬是我和姑姑、康康一起去的。那天正好来一位哪国元首，长安街净街，爷爷装在一辆卡车里开过去，化名张得胜。

死亡证明还在我那里。就那么一张小条。第六医院的死亡证明书，只有号码，连代用名都没有。45

张宗烨说：

他（那青年军人）陪着去的，说我们想买什么样的骨灰盒都可以，他付钱。说放照片、写名字都可以，都是他管。当时我们还挺害怕，不知到头再给我们套上什么罪名。他倒反过来说我们：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亲属还是亲属。

他穿军装。年龄和我差不多。不敢打听是哪里的（中央三办？公安部？）。他也不肯写个东西让我们带回去请假（因为会有落款和签名）。他只肯打电话。

张夫人吴绍鸿女士没有去--难道去与一个号码最后诀别？

就在这一天，1973年6月2日，长子张宗炳从秦城监狱给送回家。他的牙齿全掉光了，一句话也不说。张饴慈记得：

爸是1973年出狱的，已给整成精神病。发病的时候，同时装成两个人：一会儿是审判员，横眉怒目；一会儿是犯人，可怜又无奈。那时候家里已经没了房子，他回来就和奶奶住大城坊--他在病中只相信自己母亲一人。

在东荪的检讨中，屡屡说及自己的恋家（"革命性不足"）。1957年之后，虽然住在与校园只有一墙之隔的大城坊，却极少踏进校门。家人记得，十数年间，对这个给他荣耀、令他受辱的燕园，东荪只进过一次--

陪着他的妻到礼堂听苏州评弹。

没有一封他们的通信留于世。在他承蒙"养起来"而后的二十年间所写的百首诗词中，也未见一首专门为她。只是他最后留在世上的语言是"姆妈…姆妈…"。

"携子之手，与子偕老"--与这为他生儿育女，并共享人生颠踬与苦难的忠诚伴侣。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夏天，张东荪的中、英文传记作者，本著者与美国布朗大学的P.J.Cowan，与宗烨、饴慈一道，在北京大学大兴土木的隆隆声中，最后凭吊东荪先生在西郊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达园（1931-34年）；大东地（1934-37年）；燕东园23号（1946-49年）；朗润园178号（1949-58年），最后来到大城坊（1958-68年）。

宗烨说，父亲走后，邻居对母亲很好。1968年宗烨在干校的时候，每月只能给母亲三十元生活费。西院老吕家的三个女儿轮流陪她。后来奶奶做主，与这家结了亲。

在大城坊的这个院子，邻居们还照拂着张家当年种下的花，一株芍药，一株月季。那月季已经长到了一人多高。邻居们问：老太太好么？"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宗烨答。著者问那些老邻居是否记得张教授：

老先生好着呢，笑咪咪的，常在这儿（大约三平方米左右的院子）遛弯儿。

"遛弯儿"之余，他返身回到那间小屋，提起毛笔--

无端握管复凝思，正是荒鸡唤梦时。

留得是非身后论，且屏辛苦眼前痴。

茫茫浊世归何所，历历浮生只自知。

写罢他年与谁看，一灯相对雨如丝。

不关积毁失心期，早识天涯路本歧。

自得自危因自述，无恩无怨更无奇。

今生饱领人间味，此世常存万古疑。

掷笔废然推牖望，琅华一月渐西移。

（拟写自传先题二律）

七年前，他的老友君劢先生在大洋彼岸呼喊的，不正是这样：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乃吾人今日破国亡家之余，并欲求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一二素心人亦不可得！则余之念东荪，宁有尽耶？

昔老杜送孔巢父诗有曰："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今日谁复能为余之巢父，足任问讯之劳者耶！而余与东荪当年携手一堂，上下议论之乐，宁可再得于今生耶！抑余与东荪者，皆使命失败之人也！则于兹东荪揽揆之辰，安忍复辞文正之诮，不一吐余二人生平之素，失败之哀，与夫东荪今者荆天棘地无所告诉之苦，于以诉之人类理性，诉之正义公道，诉之后世史家，一共评其是非曲直耶！

悠悠苍天，曷其有极！46

注释

1、沈钧儒1913年即参与起草"天坛宪法"，1928年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业务；史良自1927年入法科读书，1931年为执业律师。

2、"中央1951年"的定案，直到1978年才通过天津市和平区法院转张东荪亲属。

3、牟宗三：《自由与理想》，载《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 1978），页135。

4、张东荪：独宜老人《草间人语·续作补录》休谟《人类理解力》译后。

5、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6、同上注。

7、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337。

8、周启博：《邻家小儿话"翦老"》，《开放》，2008年8月。

9、何其巩（1899-1955），字克之，安徽桐城人，曾经任记者、西北军文书。1924年留学苏联，北伐时期任国民联军司令部秘书长。1928年国民党定于一尊并迁都南京后，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为首任市长。任职期间主张"财政公开，造成廉洁政府"、增加教育经费（占市政经费29.5%）、成立"贫民救^济总会"（北京历史上第一个贫民救济机构）等。1936接受任命为中国大学代理校长。此平沦陷期间，参加"北方救国会"活动，坚决不任伪职。他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合称为在北平坚持办学的三位著名大学校长。

10、何嗣珌：《何其巩：北平第一任市长》，"千龙网"。

11、张东荪所作文字中，没少对胡博士适之直言抨击，1947、1948年尤其多。对"研究系"不存好感的胡适不可能读不到。这些均未影响他对张宗燧的评价与重用--可见当时学人风采。

12、于宗瀚：《怀念恩师张宗炳》，"新语丝"网站（2003年）。

13、同上注。

14、周恩来：《民主党派的工作要同国家的中心任务相配合》，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5、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页176。

16、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页83-84。

17、著者1996年5月17日对叶笃义的采访。

18、计有蒋捷夫（山东社科院院长）、葛懋春（山东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的《批判张东荪的主观唯心论和不可知论》（《山东大学学

报》，1956年第1　　期）；朱作云、厩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张东荪--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代言人〉（同上刊，1956年第2期）；葛懋春的《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东荪的反动哲学的批判》（上刊1961年第4期）等。

19、参见浦熙修女儿袁冬林：《女儿回忆--浦熙修在文革期间》，"博讯新闻网"。

20、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页330。

21、2008年，陆平之女陆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老总），接受采访。对此节的叙述是："我父亲进北大时，北大的右派基本上已经划完了。"对于自己在北大的经历作为，陆平认为"不能写，写了也没法发表"："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间，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也就够了。"陆总说："父亲文革后很多年不能去北大，见到未名湖就难受，是挨打挨批斗的地方。受不了这刺激。"在接受采访中，陆总表示，一定要给父亲写一篇文章，把父亲在北大的事写出来。著者在此提醒陆莹女士，落笔时万望不要忽略掉江隆基和张东荪　　。这篇采访发表于《中华老年报》，2008年3月12日，题为《父亲是知识分子》。

22、王曾瑜：《敬爱的马校长和可悲的陆平》，"学术交流网"（2007年9月30日）。

23、张东荪：《告知识分子》，《展望》第2卷第4卷；《观察》第4卷第14期全文转载，1948年。

24、当时燕京大学不仅住宿好，师资待遇也是相当丰厚。教授级职员均月薪在三百元以上，约等于平民四十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而外籍教授更是从美国教会的领取美钞工资，更为"富庶"。参见梁茜：《不改丹青色，不减菊兰香》，《南方都市日报·人物观察》，2004年。

25、主人公与书的关系，这里插入一段别人对他的描述：张东荪当时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没有像胡适等那样搭乘南京派往北平接人的飞机，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张东荪离不开他在北平执教二十九年所收藏的中外书籍。参见谢抉惟：《怀念张东荪先生》，《传记文学》（台湾）第26卷第6　期，1976年12月。至于胡适旧居和他的书房，藏书，包括个人日记，全部为社会院近代史研究所接收。

26、郎之诚曾作《张君孟劬别传》，载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

27、陈树普：《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忆先师邓文如教授-些硕德景行》，载邓珂编：《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页27。

28、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

29、即有名的×诗社。成员除张鹤慈外，有郭世英、孙经武、紫青。

30、龙榆生（1902-1966），词学大师，编《词学季刊》，并着有《唐宋名家词选》。因毛泽东好词，本人与陈毅又有师生之谊，所以曾是毛风雅消闲时候的座上客。可喜的事，他并未以此患上政治敏感病，一直是东荪被抛出现世的淳厚友人。

31、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31、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142-43。

33、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34、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147-150。

35、据《吴法宪回忆录》揭露，中央专案小组下设办公室（主任谢富治），下属四个专案组：五·一六专案组、抓叛徒专案组、叶向真专案组、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吴认为，专案组办案最关键的要害在于，受项目审查者的"罪名"，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来制造的。估计对张家义子和叶笃义审问，属于"中央三办"中的"其他"，当然也可能归"叶向真专章组"，因为对此女学生和徐冰的定罪，最终都指向叶剑英。

36、依照《刑法》，只有法院有下设监狱。

37、陆启铿：《一位诚实的科学家--怀念张宗燧先生》，《科学时报》，2005年12月6日。

38、王元：《华罗庚》（上海：开明书店，1994）。

39、能否见外国人，是当时"是否得到党的信任"的标志。张宗烨工作的高能物理所电子对撞机项目，最早与国外合作。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598。

41、读者或许记得，自"反右斗争"之后，张东荪已经失去北大教职。自此，他的"单位"已是北京文史馆。

42、爱孙鹤慈乳名。另两个是康康（饴慈）和凯凯（钦慈）。

43、张东荪：《名实与帝制》，《正谊》，第1卷第9号，1915年6月。

44、语出《庄子·逍遥游》。

45、张家的人没有记住那号码。著者根据自己的经历，推断应是"68×"，即1968年第×个关进秦城的犯人。

46、张君劢：《张东荪先生八十寿序》，《展望》，172期，1969年。

后 记

如果不是在异国他乡遇见张鹤慈--仅因求知之渴望即遭十数年囚禁的"X案主凶"--传主于我，恐怕只是一个飘散在旧籍陈档中的杳渺魂灵。但东荪先生以及他的同侪们，曾经多么生动、有骨气地生活过--哪里像我们，逃出口号即陷进广告--但为什么谁都不敢、不愿（间或也做出不屑）说他？更何况，又有谁有本事在官员当道的中国，调出他的卷宗、追踪案件经手人、遍访他的故旧，呈上一部信史？

澳洲国立大学的白杰明（Geremie R. Barme）立刻捉住这中国近现代绝对不可无视的人物。十多年来，只要碰面或通信，一定是："动笔了么？写到哪儿了？什么时候完成？"他推荐我到大洋彼岸的Woodrow Wilson Center（著者获1999-2000年研究基金），未能完成；又将我捉至南半球，关在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著者获2007年研究基金），生怕旁骛连连的著者在北京浪掷光阴。

挣扎转熬过艰难岁月的张家后人，打开尘封的宝库：记忆中的、侥幸逃过劫难之旧箱子里的。已经不再是燕京学生、早期民盟干员、后期民盟副主席的叶笃义，也在离世前出于对传主（以及施虐者）的认识、再认识、再再认识，倾力帮助在中国近乎"路路不通"的著者。

书稿草成。如果没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鼓励性接纳，以及只有严格的学术出版机构才肯投入的上乘后期编辑：李大兴、胡泊、黎耀强、以著者资历及所受训练，恐怕只能出手一个记者写的大故事。也要感谢两本《张东荪传》的作者，著者得益于他们对传主著作所下的工夫。

另有一事，难于启齿却又不得不老实招认：张家亲属万难之中保存下的文字、诗词手迹，工科出身、仅描过几天红模子的著者，竟不全认得--查书法字典、叨扰古文家也未尽全功。书内引文中留下之"口"，切望学富五车的读者百忙之中慷慨出手友情辨析。

著者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欺蒙与箝制下度过的。随着已然敞开的国门和高效的信息互联，前天、昨天和今天被掩盖的桩桩件件将一一大白：它们不仅直接关涉国运，更是成千上万，乃至上十万、上百万、上千万及上亿家庭或生或死（或者生不如死）的直接动因。

二十多年前，中国诗人北岛呼喊"我不相信"；中国歌者崔健嘶叫"我们一无所有"。本书即将付梓，著者也想说我不相信，不相信中国百姓会永远苟安于欺蒙中。本书即将付梓，曾经一无所有的我们，清楚知道今天之所有，并不能体现完整的人类尊严，拼死也要争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思想独立，言论自由。

戴 晴

2008年10月